

回到非洲去

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史

理查德·韦斯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S. 535
124
=1

回 到 非 洲 去

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史

上 册

理查德·韦斯特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4



25.535
124
: 2

回 到 非 洲 去

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史

下 册

理查德·韦斯特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14



Richard West

BACK TO AFRICA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and Liberia

Jonathan Cape Ltd.

London 1970

根据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

1970年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回 到 非 洲 去

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史

理查德·韦斯特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1 插页9 字数265,000

1973年1月第1版 197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240 定价: (共两册) 1.76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以黑人“回到非洲去”为线索，叙述了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的历史。

奴隶贸易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英国在十八世纪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贩子；“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①，大量黑人不断地被运往美洲等地。

1772年，英国解放了本土的黑奴。福音派主张送他们回到非洲去，认为可以借此改善他们的处境，并传播基督教“文明”于非洲大陆；政府则急于撵走贫苦黑人。1787年起，先后送去了本土黑人、新斯科舍的黑人和西印度群岛的马隆人，在西非沿海建立了塞拉勒窝内殖民地。为了适应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英国便在其帝国范围内开始禁止奴隶贸易，而英国海军从贩奴船上截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的大量奴隶，也都送至塞拉勒窝内。十九世纪末，英国投入了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非洲的斗争，把内陆划为保护地，在“茅屋税”战争中血腥屠杀当地人民，在政府机关和内陆贸易中排斥黑人移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完全控制了塞拉勒窝内。

美国独立后，自由黑人逐渐增多。坚持奴隶制的南部种植园主，把他们看成社会威胁；北部各州亦存在着种族歧视。“美国殖民协会”在政府资助下陆续遣返黑人；1822年在西非建立了利比里亚殖民地，并以武力镇压内陆居民，不断扩大领土。1847年，利比里亚独立；但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依附美国。美国费尔斯通公司甚至在利比里亚搞了“国中之国”，在这一个当初由“回到非洲去”的黑人所建立的国家内，垄断着经济命脉。

史实证明：英、美两国把黑人遣返非洲，正是它们侵略和掠夺非洲的一种手段；就广大贫苦黑人而言，无非是“回到非洲去”和当地人民一起受奴役、受剥削而已。但，如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后取得独立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人民，随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殖民主义运动的日益高涨，正在为争取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奋斗。我们深信：“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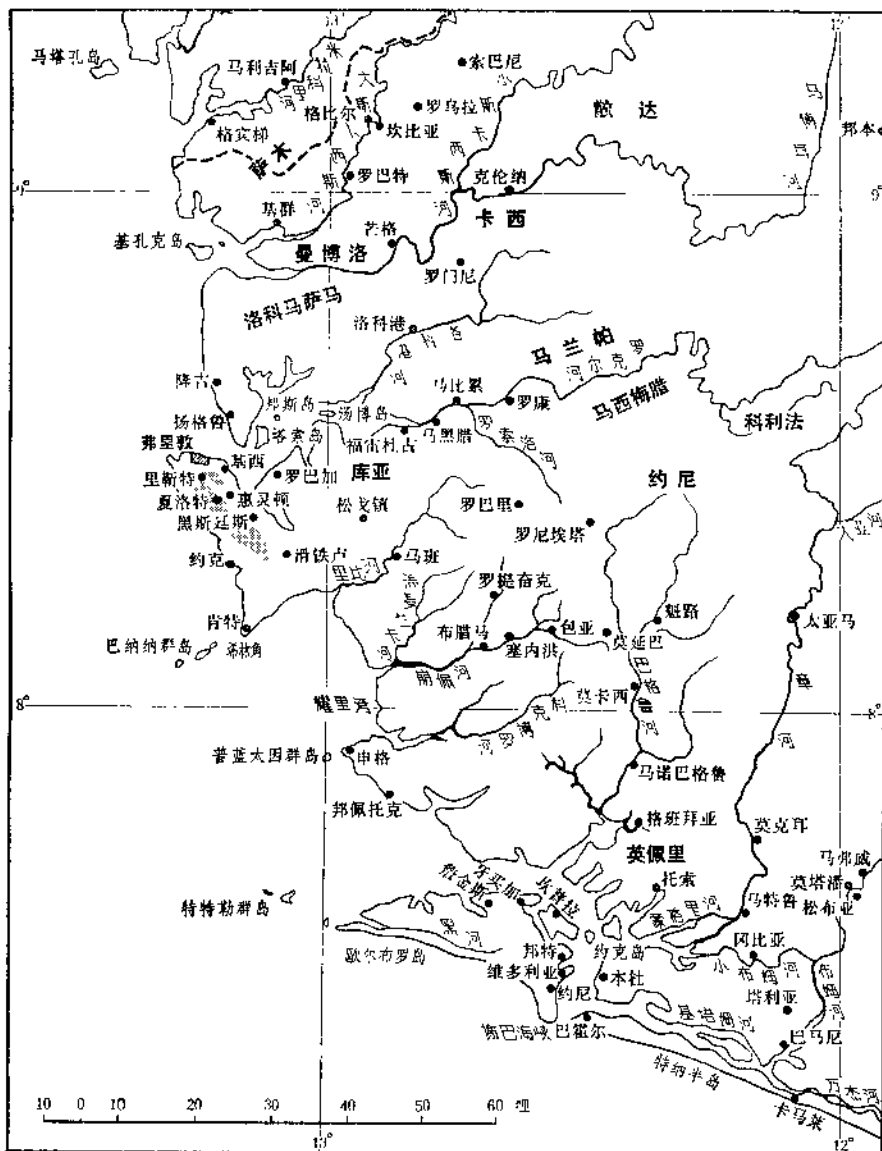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理查德·韦斯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于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附属国，自以为无所偏袒，实际上却思想混乱、自相矛盾，有些观点极端反动。他把黑人“回到非洲去”和犹太复国运动相比拟，借此为以色列制造舆论。他离开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去观察黑人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慨叹当初福音派遣送黑人“回到非洲去”的理想失败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从英雄史观出发，颂扬为殖民主义效劳的所谓慈善家、宗教家、探险家和政治家，特别是以主要笔墨，给总督们写下了列传，宣扬什么殖民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总督的性格所左右”。与此相反，黑人移民以及

① 毛泽东：《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

非洲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所占篇幅不多，却引用了不少侮辱他们的文字。更不能容忍的是：作者竟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肆意污蔑，对共产主义者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横加攻击。凡此均须严加批判。

不过，作者还是在他所选择的专题范围内，集中地提供了不少资料，虽然除某些档案文件外，大部分是第二手的。通过本书所提供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经过分析批判，还是可以看到同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殖民主义侵略史的侧影，以及侵略者的某些阴险手段和狰狞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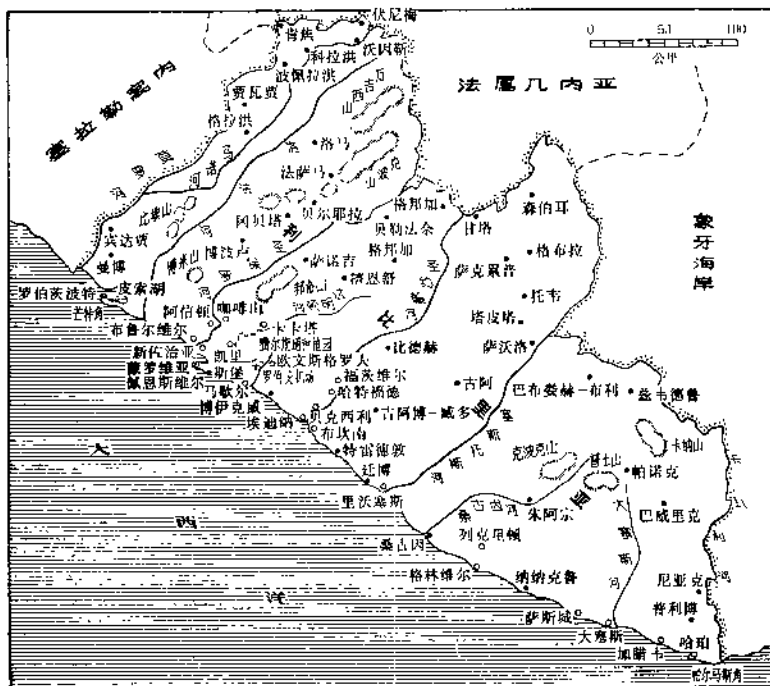
作者情况不详；只知道他写过《波多黎各，第五个产业》、《非洲的白人部族》、《美国佬在拉丁美洲》、《越南见闻》等书。



(按原图译制)



利比里亚行政区划图
(按原图译制)



(按原图译制)

目 录

第一部分	1
第二部分	125
第三部分	241
第四部分	345
第五部分	441
资料来源说明	533
参考书目	542
索引	577

第一 部 分

第一章

在英国，种族偏见看来似乎没有象在美国那样强烈……在人们的心目中，找到一个黑人仆役就好象是一大收获似的。因此，黑人仆役总是为人们所寻求，所喜爱。衣着破烂的或饥饿的黑人，在英国是看不到的。在某些场合，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下等社会的白人姑娘和黑人结交的情形。几天前，我在牛津大街上遇见一个衣着整齐的白人姑娘，她肤色红润，甚至相当漂亮。她和一个黑人男子臂挽臂地走着，谈得非常融洽。这个男人穿得象那姑娘一样整齐，他的肤色黑得发出乌木一样的光亮。由于英国是没有奴隶的，所以英国人也许并不懂得把黑人看作是下等人；而在美国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黑人除了被看作是下等人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境遇。

(引自本杰明·西利曼：《1805和1806年在英格兰、荷兰和苏格兰的旅行笔记》，1820年)

1772年在英国发表的一本小册子宣称：“王国的公众利益要求，对于输入黑人的数字的异乎寻常的增长，必须加以某种限制。”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爱德华·朗指责这些黑人移民是懒惰的，淫荡的，为了维持他们的子女的生活，国家收入的救贫税几乎都要用光了。这本小册子接下去又警告说：

英国的下等妇女特别喜欢黑人，其中的道理下流得使人无法出口；只要法律允许，她们甚至不惜与马或驴结合。这些太太们一般都给那些黑人生下了一大窝崽子。照这样下去，只要再过几个世代，英国人的血液就要被这些混血儿搞得污秽不堪了；再由于各种机缘以及人生的盛衰变迁，这种血统混杂还可能散播得如此广泛，甚至波及到人民中的中级以至更高级的阶层，直到整个民族都变得象葡萄牙人和摩尔人一样的肤色，一样的思想卑鄙。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大部分黑人都是从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带来作私人奴隶的。背风群岛的前副检察长约翰·贝克的奴隶杰克·比夫，就曾受到主人的信托，到伦敦去送信或承办事务，他和主人一块儿骑马去打猎，还得到主人给他的票子，

同自由的白人仆役一起到戏院里去看戏。尽管高尚的奴隶主觉得对这些奴隶的福利负有责任，其他的人却把他们看作仅仅是一种商品。1758年2月17日利物浦报纸上刊有这样一则典型的广告：“出售健康黑人仆役一名，身高五呎左右，身材匀称，性情和顺，诚实可靠，跟随现主人已经三年，惯于侍候膳食以及在马厩打杂。”

1772年，曼斯菲尔德法官裁定：蓄奴制度在英国是非法的；这些黑人仆役就此成为自由人，有权和他们的主人脱离雇佣关系。有些奴隶主埋怨曼斯菲尔德的这一决定，认为这对美洲大陆上的奴隶制度是一种威胁。他们遣散了自己原有的奴隶，又指责这一条新的法律，说它使这些黑人失业而陷于贫困。爱德华·朗那本恶意的小册子，就是在曼斯菲尔德作出这一决定之后出版的，它阐明了奴隶贩子的论点：自由的黑人对英国是一种危险。这种意见，甚至在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司法界同事中，也有它的支持者，其中有一个法官鲍威尔先生，他曾这样宣布：“英国的法律根本不管黑人。”

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有成千名曾经在美国

独立战争中为英国作战的黑人士兵和海员，被允许在英国避难，黑人居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就大大的多起来了。英国军队以前叫黑人充当间谍、工兵甚至第一线的士兵，认为很管用；现在就感到有责任不能让他们重新去当奴隶。尽管根据和约的条款，英国保证要把所有掠获的财产，包括奴隶在内，全部交还给美国人，但结果还是有几千名黑人获准在加拿大和英国避难。在英国的黑人居民究竟有多少，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到 1785 年时，几乎可以肯定已有两万到三万人了。这些黑人有的虽住在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以及西海岸的其他城市里，但大部分都聚集在伦敦，特别是在帕丁顿和迈耳恩德路一带。由于他们的肤色以及爱好聚居的癖性，使得黑人特别引人注目，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黑人的数量特别多似的。

两个世纪以前，黑人在英国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和讨论的问题，而不是被蔑视和厌恶的对象。在爱德华·朗那本小册子中所表述的观点，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也没有了，但在 1772 年他写那本小册子时，这种观点却是罕见的，不合时宜的，甚至是荒谬的。大部分英国人，特别是那些贫

民和妇女，对黑人是同情的，喜欢的。在富裕的社会里，黑人仆役是时髦的，因此是受到宠爱的。金斯敦公爵夫人就喜欢把她的黑人童仆打扮得很漂亮，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他一起出现在歌剧院的包厢里。一个曾到前文提及的那位曼斯菲尔德勋爵家中作客的人这样写道：“晚饭后，有一个黑人走进来，和太太们坐在一起，喝过咖啡以后，又跟着她们一起到院子里去散步。”这个女黑人名叫迪多，尽管她“既不漂亮，又没有教养”，看来对那位法官却有很大的影响；种植园主们都指责她和废奴运动有关。雇佣一个黑人仆役是这样别致的事，因此花费的钱也特别贵。几年之后巴黎就曾有过这样一则笑话：小说家大仲马是一个具有部分黑种血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穷光蛋；他经常穿着号衣站在自己的马车旁边，企图使过路的人相信，他还用得起黑人仆役。黑人仆役所得的工资是很高的，所以艾萨克·杰克曼在1781年所写的闹剧《离婚》中才会有这样一个场面：黑人散博去问白人律师魁·塔姆怎样才能够离婚：

魁·塔姆：离婚？

散博：是的，老爷——我要娶一个美丽的白种女

人。

魁·塔姆：你要娶白种女人？蒂莫西，把我的棍子拿来，我要把这无懒的黑脑袋瓜打个粉碎！

散博：一个美丽的白种女人，老爷——您看，我把一年的工资——十基尼都拿来给您了。
(把一个钱袋交给魁·塔姆)

魁·塔姆：得了，蒂莫西，你把那棍子放下吧——这么说，散博，你是想厕身于上流社会了，对不对？

散博：是的，老爷。我就是最希望成为一个上等人。

魁·塔姆：你过一个星期再来吧，散博，我会告诉你怎样做的。蒂莫西，领这位黑人绅士下楼吧。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黑人是希望厕身于上流社会的。但是，有证据可以说明，黑人在伦敦的贫苦白人的社会里是受欢迎的。被称为“黑种人舞会”的黑人跳舞会，吸引着数百狂欢作乐的人。当时，连约翰逊博士也指出一些白人妇女怎样喜爱黑人，他的黑人仆役弗朗西斯·巴伯，就为一个晒制干草的热情姑娘所追求，她一直从林肯郡追到伦敦。这些黑人有时候肯定会夺去白人的姑娘和

职业,可是白种男人非但并不怨恨,看来还把他們当作来自异国的但是值得引为同道的人。有个种植园主想绑架一个过去曾是他的奴隶的黑人,把他送回西印度群岛去,这时,伦敦的群众就起来保护这个黑人。1780年,两个黑人仆役拿着手枪进行决斗时,两个白人仆役充当他们的助手。

黑人的士兵、海员以及还有一些不熟练的仆人,在伦敦很不容易找到职业,因此很多人就在街头乞讨,或者住在政府办的贫民收容所里。这些“贫苦黑人”或“无以为生的黑人”(不久之后报纸上就这样称呼他们),得到了一个由宗教人士组成的有名团体的特殊关心和同情。这个宗教团体名叫“福音派”或“克拉彭派”,也就是人们带着讥嘲的口吻所说的“圣徒”们。这些先生和妇女们之所以要保护“贫苦黑人”,不仅是出于同情这些人的贫苦处境,而且还因为他们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福音派反对烈性酒,反对诅咒、淫乱和破坏安息日,但是他们搞得最猛烈、最有名、最成功的,还是那一场反对万恶的奴隶制度的运动。正是由于这一场大运动的机缘,他们就负担起解决英国贫苦黑人问题的责任,想出了把这些黑人遣返到

非洲去的计划，并进而建立塞拉勒窝内。

最伟大的一个“圣徒”名叫威廉·威尔伯福斯，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他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是象皮特这样的政治家的好朋友。他为人幽默而又有吸引力，但他还是摆脱不了福音主义运动的荒唐可笑。对于咽气时才转向上帝的罪人们的冗长而难以置信的故事，威尔伯福斯总是含着眼泪感到欣慰。他相信，卡斯尔雷勋爵的所以自杀，是由于他破坏了安息日。威尔伯福斯为自己的许多细小的罪过感到万分痛苦，其中最糟糕的一件就是贪食。他在日记中写道：“说也奇怪，绝大部分宽大为怀的人和有宗教信仰的人，竟都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责任是同他们的财富一起增加的，他们把钱财用于饮食等等上面，将来是会受到惩罚的。”但在相近的几天日记里，却又详细地写到他自己大吃鸭子、芦笋、乌龟以及鹿肉的事情，后面还简单地添上一句带有忏悔性的哀叹——“竟然大吃而特吃！”

最早的几个女“才子”之一，汉纳·莫尔，在她受到虔诚的信仰的冲击之前，原来是伦敦一个杰

出的剧作家和才子。她放弃了“讽刺性的幽默”，不再创作剧本，在1793年宣称：“如果我能够降低面包的价格，比起写出一本《伊利亚特》来，我更为心满意足。”她攻击她自己一度曾成为其装饰品的时髦社会；攻击这种社会里所谈的“风流”，实际上指的是通奸；攻击那种要仆人回说主人“不在家”的作风（穆里尔·耶格在《维多利亚之前》^①一书中，写到“威尔伯福斯的仆人觉得不采取这种办法非常麻烦，而他自己也有同感”）。就象另一个“圣徒”托马斯·鲍德勒一样，汉纳·莫尔也参加了反对戏院里的下流演出的运动。

汉纳·莫尔和她几个同样虔诚的姊妹们，为那些不信上帝的贫苦人创立了学校。一部分基金是由亨利·桑顿给她的。桑顿是一个银行家兼议员，也是最富有的一个“圣徒”。他是一个枯燥无味、精明而不讨人喜欢的人。他特别喜欢那种病态的虔诚。他对那种临终忏悔的故事的喜爱，连威尔伯福斯也认为是过分的。

虽然有些现代的狂热分子和那些“圣徒”同样

^① 本书引用的或其他未作详引的参考书，详目均已列入参考书目栏。

的正经、自负和固执，但“圣徒”们搞的那些运动，大部分都不是知识分子的形式。仅仅难得有一两次，他们的做法也具有新时代的格调。例如，托马斯·克拉克森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奴隶制度》，他在这里面宣称：好望角的荷兰人“比当地的野蛮人更野蛮。这些人不但毫无理由地而且没有必要地杀害自己的同伙，甚至把他们的苦恼当作消遣，把他们的痛苦当作享乐”。克拉克森的这篇文章在剑桥大学评议会中获得了一等奖。这篇文章在评议会堂宣读以后，克拉克森就骑着马从剑桥回伦敦去，半路上他想起了在文章中所用的几个论点，觉得它们是完全正确的，奴隶制度确实是可恨的。这一发现对他引起的震动竟是如此强烈，以至他不得不下马坐在路旁，把事情好好想一想。这些想法使克拉克森后来成为一个终身反对奴隶制度的“圣徒”。

塞拉勒窝内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圣徒”是慈善家格兰维尔·夏普。他不但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就设想了这一殖民地的计划，而且早就领导过一场合法斗争，结果导致了曼斯菲尔勋爵的那个决定。他在福音派中是一个比较谦恭而更受欢迎

迎的人。他出生于牧师家庭，当过布店学徒，后来又做了文官。他把闲暇的时间用来学习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涉猎过有关索西奴斯教、《启示录》、盎格鲁撒克逊十家联保制和犹太神学的神秘争论。他长得很瘦，性格和顺，是一个终日忙乱、喜欢寻根究底而又极端热心的人。他做的有些事情，是典型地属于“圣徒”的，例如他反对那个男扮女装演出的《乞丐歌剧》；又曾向约克大主教提出劝告，因为他的儿子在特伦斯的喜剧《阉人》中担任了塔伊斯这个角色。可是，夏普所做的事情，有许多却是与克拉彭派毫不相干的。他反对决斗，反对强征水手；他曾和普鲁士国王通信，讨论把英国的礼拜仪式介绍到普鲁士教堂中去的问题；他写过许多小册子，谈到英语的发音、感化院的管理方法、旧教徒的解放、驮牛的使用、泰晤士河的侵蚀和前途等等问题。他是一个怪物，不过是一个天才的怪物。

夏普和奴隶发生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是由一次偶然事件引起的。有一个黑人奴隶名叫乔纳森·斯特朗，他的主人把他打得几乎眼睛都瞎了，然后又把他当作一件废物一样丢弃在街头。1765

年的某天，斯特朗去找外科医生威廉·夏普，正巧这位医生的弟兄格兰维尔也来找他。这个英国慈善家平时走路就有些心不在焉，那个黑人奴隶因为受伤而处于半失明的状态，两个人就在医生家的门口撞了个满怀。好心的夏普一看到那黑人被打伤了的脸，就下决心要帮助他恢复健康。

格兰维尔和他那个做医生的弟兄，就一起帮助斯特朗进了医院，后来又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职业，也是当仆人。事后斯特朗曾感恩地这样写道：“我住院时，衣服鞋袜一直都由这位绅士供给；我出院时，他为我支付住宿费，又给我一些钱买生活必需品，一直周济到他替我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为止。”

夏普的这一慈善行为，原来并没有什么政治动机。不论是哪一种族的人，只要和斯特朗处境相同，夏普也一定会对他表示怜悯的。在两年之久的时间里，夏普甚至一直不知道斯特朗是一个有合法主人的奴隶。这个主人名叫戴维·莱尔，是来自巴巴多斯的一个律师。1767年的某天，他发现斯特朗站在一辆出租马车后面，侍候着新主人。看到他的奴隶已经恢复了健康，也就是说已经

恢复了原来的价值，莱尔就请伦敦市长辖下的两名警官跟踪并逮捕了斯特朗。斯特朗是深知莱尔那种残忍的性情的，他不胜惊恐，就设法把这件事通知了夏普。夏普便向市长提出申诉，指出这种拘留是非法的。这就是一场伟大的法律争端的开头。

夏普“除了《圣经》之外”从来不曾看过一本法律书，而他去请教过的律师，又是绝大部分都不同情这件事的。那位英国法律界最伟大的著作家，尊敬的布莱克斯通博士，起先是同意为夏普出力的，但后来却又断定奴隶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使夏普感到痛苦的是，连自己的几个法律顾问甚至也是反对他的，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亲自进行抗辩，因此便狂热地钻研起法律来。斯特朗的主人莱尔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起先是以法律来对抗，接着又向夏普挑战，要求进行决斗，想用暴力来进行威胁。夏普尽管为人和顺，但也相当倔强和勇敢。他坚持不懈地工作，最后写成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证明一个奴隶从他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就变成一个自由人了。这个文件受到了“四法学协会”^①的重视，莱尔的律师们因此放弃

^① “四法学协会”，英国有检定律师之权的四个协会。——译者

了这个案件，斯特朗也就获准了自由。可是夏普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高级法院作出决定，规定奴隶制度在英国是非法的。他接受处理其他黑人奴隶的问题，写了一些小册子和争论性的信件，经过五年的努力奋斗，最后终于获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对奴隶詹姆斯·萨默塞特作出的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夏普作了一件仁慈的事，起初是黑人的苦难经常萦回他的脑际；一旦关心以后，他就激烈地来反对奴隶制度了。他以通信的方式，与“新世界”反对奴隶制度的领袖，费城的安东尼·贝尼泽特，结成了联盟。他从报纸上获得有关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情况；从《圣经》中找寻证据，说明这种制度和贸易都是违反上帝的意志的。他以自己的文章折磨着政治家们和主教们。他随时准备跳出来同人家打官司。1786年7月，夏普听说一个名叫哈里·德曼的黑人被主人绑架到一只船上，将送往西印度群岛去，他就搞到了一张人身保护法的传票，在船已起锚扬帆，准备离开唐斯船舶停泊处的时候，传票正好送达。这个后来移居塞拉勒窝内的德曼，当时告诉夏普说：“他本来

准备天一黑就跳下海去，宁死也不愿被带去做奴隶。”

看来很难使人相信：夏普有这么多个人的活动和爱好，他怎么还会有时间从事正式的职业。但事实上直到 1775 年为止，他就一直在为皇家军队供应弹药和武器的军械处保有一个办事员的职位。美国独立战争使夏普面对着良心的责备，因为他的一些朋友如安东尼·贝尼泽特等都举起叛旗了。但军械处倒是特别大方，竟批准他请假离职长达两年以上；最后他们感到有责任另外找一个人来代替他时，夏普的弟兄中有两个人就出来接济他。“亲爱的格兰维尔兄弟，”詹姆斯·夏普在信里写道，“……如果你认为应该放弃你的职业的话——我现在代表我的兄弟威廉和我自己——向你表示，我们都准备、都愿意照顾你，而且感谢上帝，我们目前也有能力来照顾你，使你丝毫不受损失。”

夏普的慷慨常常使他的钱不够用。特别是他经常收到来自贫苦黑人的大量的呼吁信。

后来的一份讣告上曾这样回忆道：

因为夏普先生是他们著名的保护人，他们都拥到他那

里去，一个个地要求他援助；而他也把他们看作孤儿一样，是有某种权利来要求他照顾的，因此他也时时去救济他们。可是他们的人数很多(大约有四百人)，他觉得自己无法天天救济他们，也不能与他原来和别人约定的援助计划相协调。有好几个人是经常接受他个人补助的，他对这些人保证每年按期补助一定数额的钱，这些钱合在一起，总数是相当可观的。

1786年1月，伦敦商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帮助贫苦黑人的呼吁书。它不久就募得了八百英镑，这笔钱就作为支持一个黑人的医院和在帕丁顿以及迈耳恩德路发放每天的粮食之用。夏普在这次呼吁运动中也是出了力的，尽管由于他那种谦虚的性格，他并不是那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知道，发放粮食和金钱并不能解决贫苦黑人的问题。

早在1783年，夏普就已论述过在西非洲成立一个殖民地的办法；他那份备忘录中，就包含着大部分后来用于塞拉勒窝内的计划。其他著作家也曾讨论过非洲殖民地的计划，主张以商品贸易来代替奴隶贸易。有两个自由黑人，澳托巴·库古阿诺和古斯塔夫斯·瓦萨，曾经以他们的肤色所

给予的权威，论述过非洲西海岸的经济潜力。

在塞拉勒窝内建立一个殖民地，这个建议是由亨利·斯米思曼提出来的。他是一个植物学家，有时候也经营商业，曾经在海岸的这一部分土地上生活过三年。这个把自己称作“捉苍蝇者”的人，经受了西非洲那种有害于生命的气候，搜集到了大量昆虫的标本，但是他想大发其财的这一主要野心却是落空了。他回到欧洲时已是债台高筑，于是又急于想用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作资本，到非洲去创建一个棉花种植园。1786年初，斯米思曼就向那个“援助贫苦黑人委员会”的主席乔纳斯·汉韦扼要地提出了建立一个殖民地的建议。几个星期以后，他又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这个建议。

这本《一个殖民地的计划》，把塞拉勒窝内说成是一片肥沃的、气候适宜的地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适宜于种植棉花、水稻、甘蔗、烟草和靛青。当地出产的甘薯和葡萄可以酿制最好的白兰地酒；而且，这个地区还是一个理想的捕鲸站。就在一年之前，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在讨论设立一个安置囚犯的殖民地时，斯米思曼曾向这个委员会说：如果有两百名囚徒送到塞拉勒窝

内去，即使是在最有益健康的地点登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将有一百名死亡；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不会再有两个人活着了”。而现在，他却又把这块土地描绘成“依靠它的物产来生活的人，必将是非常健康的”了。

斯米思曼的这个殖民地计划深深地感动了“援助贫苦黑人委员会”，同样也打动了原先来自塞拉勒窝内的贫苦黑人。委员会把斯米思曼的计划转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原来就在给贫苦黑人医院补助经费，因此它是急于想把这些贫苦黑人撵出英国去的。不论是财政大臣，或是他下面的官员们，谁都不想费神翻阅斯米思曼的这份计划——我发现它的纸都没有裁开——但是他们都对这个殖民地给予支持。于是“援助贫苦黑人委员会”就印发传单，招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来得到利益的人，到这个已知的世界上最快乐、最肥沃的地方去安家落户”。

这不是一份诚实的计划书，至少斯米思曼自己是心里有数的。疟疾、黄热病、伤寒、痢疾，这些疾病杀死了很大一部分到塞拉勒窝内去旅行的人。这里的土地，从来也没有证明过是可以经营

农业种植园的，除了奴隶贸易之外，一切诚实的贸易都是无利可图的；从来也不曾有人企图向当地的酋长买进土地。斯米思曼的动机始终搞不清楚，虽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汉韦^①后来怀疑斯米思曼是否也想搞奴隶贸易。但我的意见是，斯米思曼只是不负责任而已。他所着迷的事情之一是想改进气球；而他的殖民地计划，和他的气球一样，也有一些气体似的空虚的性质。斯米思曼的人格并没有受到考验，早在他那草率的计划书所鼓吹的殖民地开拓之前，他就于1786年7月死了。

斯米思曼一死，委员会对塞拉勒窝内就失去了兴趣，想为贫苦黑人另外找寻一个殖民地。最初有人提议巴哈马群岛，后来有个商人写信给财政部称赞冈比亚，还补充说，他的两条船在三个月内就可以驶到那里。另外又有一个名叫特恩布尔·麦考利的人，带着那种苏格兰高地居民的率直性格，声称新不伦瑞克是个理想的地点，并且提出他愿意把那些“可怜的苦命人”运到那里去，代价是每人九个基尼。但黑人自己对这些建议都表示反对，理由是，在前两个地方，奴隶制度还是合

^① 据前文，此人应为乔纳斯·汉韦，此处恐有误。——译者

法的；而新不伦瑞克的气候甚至比英国更冷。他们在一份请愿书中说：“已故的斯米思曼的人道的计划使他们特别瞩目于塞拉勒窝内，因而他们认为再没有比那里更合适的地方了。”他们要求以另外一个名叫约瑟夫·欧文的白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或领袖。

财政部仍旧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因此就委托海军部为运输这些移民准备船只。到10月间，希望前往塞拉勒窝内去的黑人已从二百五十人增加到五百人；后来有一个黑人领袖预计还会有二百五十人，因此海军部又准备了第二艘船。到了11月，有一些黑人突然改变主意，不愿意去了。最后剩下不到三百人，分乘了两艘船；而这两艘船的容量，还可以容纳一倍的人数，因此海军部又要伦敦当局再去找寻一些流浪的黑人来参加移民的行列。1786年12月，这两艘运输船驶离伦敦前往朴次茅斯，在那里又增加了一艘由T·包耳登·汤普森担任船长的单桅船。这次航程一开始就遇到坏运气。原来指望在通常于5月间开始的雨季之前，顺利到达塞拉勒窝内。可是在朴次茅斯有五十个乘客患热病死了，因而耽搁了一下；后来又

有两艘船因受到风浪的损害而必须在普利茅斯港靠岸。在水上长时间的、令人失望的等待，影响了移民的信心。被委派负责这次远征的后勤供应的是一个黑人作家，名叫古斯塔夫斯·瓦萨，他跟汤普森船长、跟黑人的代理人约瑟夫·欧文、跟那个自愿充当牧师的倒霉家伙帕特里克·弗雷泽，都吵起架来。欧文（据汤普森船长说，他是没有能力的）威胁说，他要离船上岸，回到伦敦去。海军部开除了那个“强横、不安分的”瓦萨。总算还好，在1787年4月初，这个船队终于起锚向非洲进发。

一旦来到海上，那些黑人移民倒是“十分规矩”的。全部乘客共计四百一十一人，其中包括大约三百名男黑人和四十名左右女黑人，几名随带家属的白人工匠和职员，还有一批数目不详和来路不清的白种女人。大部分有关塞拉勒窝内的历史书和几乎所有的报纸上的文章，都说这第一批的黑人移民，一路上还随带着七十名伦敦妓女，通常都说她们是被灌醉后强募上船的。在塞拉勒窝内的最初四十年历史中，它的敌人甚至有这样的暗示：这次绑架行为是夏普和他的福音派朋友们策划和执行的。

关于这一段故事，唯一的证据便是安娜·福尔肯布里奇夫人所写的一本书。她是1791年到塞拉勒窝内去的，曾见到几个第一次远征中留存下来的白种女人。安娜·福尔肯布里奇夫人看到她们竟是那样猥亵和无耻，震惊之余便问了一下其中一个的经历：

她说，这些女人大部分属于在伦敦街头游荡的一类，平时就以卖淫为生。一些受雇佣的男人把她们收罗下来，带到瓦平，用酒把她们灌醉，然后诱骗上船和那些她们从未见过面的黑人们结婚。第二天早晨，她们确实对前一天晚上的事情什么也记不起了，等到有人通知她们时，才不得不问一下，到底谁是她的丈夫？之后，在直到开船之前的这一段时期里，人家又把她们即将前去的那个地方说得天花乱坠，说她们一定有很大的前途，因而使她们高兴得飘飘然起来。“就这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一百多名不幸的女人，被骗离开英国来到这个可怕的国家，干这种更加粗野的邪恶的勾当，使我的祖国蒙受了耻辱。”

福尔肯布里奇夫人是一个活泼的作家，爱听一些丑闻或轰动社会的逸事。但她还是有足够的聪明，没有把这些话都当作事实全盘接受。尽管别的女人也一致讲到了这一次绑架的故事，但福尔肯布

里奇夫人还是抱有怀疑——“在这样进步而开明的时代，而又是这样受到全世界仰慕的英国政府，不大可能执行或暗中支持这样一种破坏人类自由的野蛮举动的。”

福尔肯布里奇夫人听到的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这些女人真的是违反了她们的意志而被关在船上的，而这些船又是在英国的领水范围以内，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停留了四个月之久，那就无法想象，汤普森船长、代理人欧文、弗雷泽牧师以及其他的一些黑人和白人移民，怎么都没有听到过或注意到这些女人的抗议呢？她们也有可能真的是在瓦平喝醉了，很多旅行者在上船之前是时常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的四个月，她们肯定是有充裕的时间根据自己清醒的头脑来改变主意的。至于夏普或任何一个福音派曾支持了这一次绑架事件，这种说法更是荒谬可笑，不值一驳。我曾查找过海军部和财政部的有关文件，但没有看到过一份关于这些妓女的材料，尽管在大部分普通的历史书中，都是把这件事当作创建这一殖民地时最重大的事件来写的。1787年7月，汤普森到达非洲两个月以后，

曾写报告给海军部,说白种女人患了严重的热病。但这些可能是白人或黑人移民的合法妻子。事实上,这是对福尔肯布里奇夫人那段故事的最好的说明。在英国的女黑人是不多的,因而那些男人就去找白种女人来作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根据当代的报导,是有很多白种女人热望嫁给黑人或和黑人一起生活的。因此,很可能那七十个白种女人是自愿作为那些移民的妻子或情妇到塞拉勒窝内去的。很可能这些女人中有一些过去是做过妓女的,很可能在四年之后的今天,她们中的残存者后悔到非洲来,因而发牢骚,声明她们当时是被绑架来的。很可能这些残存者由于受到热病、饥饿以及炎热气候的损害,脾气粗暴,这就会互相咒骂对方曾经是“属于在伦敦街头游荡的那一类”人。

在这个远征队伍还没有出发到夏普称为“自由省”的地方去之前,夏普就把有关这块殖民地的政府和法律等等向移民们作了小题大做的忠告。“对任何集体来说,要想确保和平、公道以及相互的安全,最可靠而有效的方式就是古老的英国制度十家联保制,或称自由保证制,这是所有的户主

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而负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以十和百为基础按准确的数字来分配的。”每一百户各有一个百户长，两个五十户的分队长，一个区秘书，八个自治委员和八个助理委员，还有八十个十户的小队长。除了百户长以外，还要有一个司法机构和它的负责人。移民们每天工作八小时，凡是因为自己有钱而拒绝工作的，要付骄傲和懒惰税。

《士师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纪》以及十七世纪平等主义者的论著，都曾为这一空想的大杂烩加油添酱。夏普那种爱管闲事的慈悲心和热情的想象，为这个殖民地作了周详的计划，从基本的法律直到极微小的细节。例如，他在计划中规定，在塞拉勒窝内的监狱里，要有一排特设的边房，“以便那些结过婚的人，不论男女，只要他们的配偶或家属愿意来陪伴他们，就可以住在一起不必分开”。贫穷的、慷慨的、仁慈的、富于幻想的夏普……除了十家联保制、监狱里的性欲问题、骄傲和懒惰税之外，他那塞拉勒窝内的移民们将要为之发愁的事情，还多着哩。

第二章

这一批殖民者在1787年4月8日离开普利茅斯，在特内里费逗留了将近一个星期，5月10日到达塞拉勒窝内河。夏普在收到他们有关这次航行的鼓舞人心的消息以后，曾在6月23日这样写道：

今天我很高兴地听到了这批非洲移民安全到达马德拉群岛的消息。据说，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一切猜忌和怨恨都已平息；自从瓦萨先生和另外两三个不满意的人在普利茅斯离船上岸以后，他们都很守规矩。正如我所建议的那样，每艘船上都成立了学校，他们每天都做祈祷。这都是牧师弗雷泽先生提供的情况。

显然，夏普没有听到这一事实：甚至在那些船到达特内里费之前，就已经有十四个人死亡了。

5月15日，那些移民在塞拉勒窝内河口一个半岛的北岸、也就是现在称作弗里敦的地点登陆。他们披荆斩棘，通过丛林来到一个小山的顶上，在

那里挂起了英国国旗，为了纪念格兰维尔·夏普，就把这一片殖民地定名为格兰维尔镇，把那个海湾叫作圣乔治湾，把那座小山叫作圣乔治山。他们划出了街道，并把这殖民地分成三百六十块地，每块约一畹，每个家庭就在这些地上树起了自己的帐篷。他们遵从夏普的政治原则，选出了一个黑人移民理查德·韦弗作为这个自由省的首领。

汤普森船长奉命向当地的酋长购买土地，因此他就开始和泰姆奈族的一个副头领托姆王进行谈判。经过几天的讨论，托姆王终于在一份非常好听的条约上画了押：“我，非洲谷物海岸上的塞拉勒窝内的头领托姆王，征得在此署名的其他的王、酋长以及有统治权的人们的同意……兹准许将这一土地上的一定地区，永久出让给在这里定居的上述自由居民和他们的后嗣和继承者，特给此文件为证。……”。作为交换，托姆王得到的是价值将近六十英镑的货物——二十四顶有花边的帽子，三打带红鞘的腰刀，十码红布，八支滑膛枪，一桶火药，二十五根铁条，一百一十七串珠子，一木桶和一大桶甜酒。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交易礼物，托姆王可能还在暗暗奇怪：这些白人倒并没有

要求以奴隶作交换。不久之后就渐渐明白了，泰姆奈人并没有遵守，甚至也并不了解托姆王画了押的这份土地条约。

在这些移民树起了各自的帐篷以后的不多几天，灾难就袭击了他们。这个远征队原来打算在旱季的一月里就到达这儿，可是他们一直延迟到严重袭击塞拉勒窝内的雨季开始之时。他们到得太晚了，种稻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带来的种籽不能生长，暴雨又冲去了山腰里的泥土。伤感的、痛苦的、濒于饿死的移民们，把自己的枪卖给泰姆奈人以换取粮食。热病和痢疾横扫着整个殖民地，夺去了黑人的代理人约瑟夫·欧文和驻屯军官兼工程师盖萨乌的生命；而最严重的是，还夺去了那个园艺工作者里卡兹的生命，他“最善于种植葡萄树和其他作物”，夏普曾把繁荣经济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汤普森船长谴责那些移民既固执又懒惰。到10月间，连夏普也不得不承认：“从我那可怜的、多灾多难的小黑女儿——不幸的塞拉勒窝内殖民地那里，我收到的尽是悲惨的消息。”但他还是尽量去看事情的光明面，诸如塞拉勒窝内的地形是多么可爱等等：

他们已经买下了二十平方哩从未见到过的最好最美丽的土地（他们都承认这一点）。那些山冈不象休特山那么陡峭，新的乡镇的两旁，都有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澈的溪水，乡镇的前面是一个宽大的水湾，河口有九哩宽。树木和丛林美丽得无法形容，土地也是非常肥美的。

此外，夏普还强调这个殖民地是不可能失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上的：“我为这个殖民地起草的规则条文……这些移民在出发之前就采纳了；所以，他们如果恪守这些规则，就能变成世界上最自由、最幸福的人。……”可是，不多久，就从殖民地传来了政治上完全破产的消息。

黑人的代理人欧文始终没有在移民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移民们拒绝为弗雷泽牧师建造一所教堂。汤普森看到移民们安全登岸以后，就没有什么责任了，他也不愿再担负什么责任（虽然也有过一次，他曾亲自执行法律，鞭打过两个移民）。那个被选出来的领袖理查德·韦弗病倒了，他写信给夏普控告自己的继承人约翰·里德，说大部分储存的物资都被他偷出去卖掉了。而这个被控的里德却写了一封哭诉得更凶的信给夏普，他除掉

自己以外，把所有的人都责怪到了：

有六十三支滑膛枪被我们自己人偷走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干的。之后，韦弗先生和约翰逊先生跟群众勾结一起，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些东西是我自己拿走的，要他们带着武器来反对我。他们就起而谋叛，霸占了我的屋子，又把我的屋子和我所仅有的一些财物都抢走了，都卖掉了，用来抵偿那些丢失的东西……

最辛辣的一封信是另外一个名叫 A·埃利奥特的黑人写给夏普的（“……你也许记不得我是谁了。……我就是那个你曾经借给他一镑六先令的青年。为了这件事，我有义务为你的仁慈而祷告”），这封信是 1787 年 7 月 20 日从塞拉勒窝内寄出的：

尊敬的先生，我带着遗憾、实在是非常遗憾的心情报告你，亲爱的先生，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根本不适宜的。如果情况没有突然的改变，我相信在十二个月之内，我们这些人就一个也不会留下来了。任何条例或规则都无法使人们遵守，这些人的暴躁脾气都非常顽固。这实在是一件十二万分遗憾的事：在斯米思曼先生去世之后，我们竟然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事实上我们是定居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种到地里去的东西，没有一样会长到一呎以上。……

夏普不愿就此灰心。1788年初，当他听到只有一百三十人还留在这个殖民地上时，就决定与其放弃这个计划洗手不干，还不如派人去增援。他派了一艘名叫“米罗号”的双桅船，带了三十九个移民去，其中大部分是白人。

尽管他的几个朋友以及财政部都曾在经济上支持这件事，但据夏普计算，到1788年底为止，他为塞拉勒窝内花费的钱，已经超过了一千七百英镑。他让“米罗号”带去的信，还是充满着他通常所有的自信。他告诉这个“自由省的高尚居民们”说：“移民的大量死亡，不能归咎于塞拉勒窝内的气候”，倒是应该归罪于“有些轻率的人，每天都把配给他的盐和甜酒统统吃完。这是我在他们出发之前就一再告诫他们不要这样做的”。（在塞拉勒窝内，几乎有一世纪之久，竟把由于痢疾和疟疾的死亡归咎于某种品德上的过失。）他教他们怎样管理家畜，事实是船上根本没有运家畜来；他教他们怎样经营他们的银行，事实是，银行根本没有开设起来。在另一封写给搭乘“米罗号”的旅客们的信中，夏普同样地关心到道德问题以及微小的具体细节。他告诫他们：如果一定要喝甜酒，那就应该

在酒里掺些水。他教他们怎样利用一丛柠檬树来做成一个防止豹子侵袭的栅栏。还有，他当然也没有忘记十家联保制：“我也必须要求你们，船一离开伦敦港口，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性旅客，都应分成十二个人一组，每组选一个头目和一个副头目，他们的权威应该分别受每组的多数票的控制。……”

“米罗号”出发后不久，又有一份来自塞拉勒窝内的紧急报告，它使夏普那种信任的、仁慈的性格受到了更大的打击。他得知“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离开了殖民地，而且（使我大为担忧和吃惊的是）其中有一些人竟然到贩奴船上去干奴隶买卖了，其余的人都到邻近地区的买卖奴隶的商站去了！”在附近的海岸上，有一些这样的转运站即商站，只要能经受得住这里的气候，干这门行业就能赚大钱。经营其他产品的商人都在抱怨：奴隶贩子用酒和铁条向酋长们换得的奴隶，价值抵得上本钱的四倍。在塞拉勒窝内的黑人移民，只要不是文盲而又懂得一些算术，就可以充当奴隶贩子的伙计或代理人，获得诱惑人心的工资；有一些人则干脆自己来经营这种买卖。由于农业在塞拉勒

窝内已经失败，有些移民就转而靠做买卖来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也是可悲的。

事实证明，夏普和他的福音派朋友送出去的白人移民，比黑人更无耻。“米罗号”上的乘客，也就是夏普关照他们要选出自己的“头目”和“百户长”的人，几乎立刻就由一个医生领头去参加奴隶贸易了。夏普在1789年写道：“我去年派去协助和支援殖民地的全部白人，竟然邪恶透顶，都到邻近的商站里去为奴隶贸易效劳了；我相信，他们是被高工资诱骗去的。”黑人的不忠实虽然并没有白人那样普遍，却使夏普更加难以忍受。最为罪大恶极的例子就是那个哈里·德曼，他是夏普在1786年亲自把他从绑架中救出来的。当夏普听说德曼已变成一个富裕的奴隶贩子时，他写信要移民们提醒德曼，要他回忆一下他处于奴隶制度的恐怖之下，“当他被邪恶的主人诱捕到船上，面对着那桅干的时候……”他是怎么个感觉，“而今天，他又面临着永久的奴隶制的危险！”如果这几句申斥的话曾经传到过德曼的耳朵里，他也并不感到烦恼，因为十二年之后，他仍旧是一个富裕的奴隶贩子。

这一忘恩负义的打击甚至动摇了夏普对人性善良的信念。正如人们可以从他那篇题为《野蛮动物和人的比较》的小小论文中看到的：

当我还在小学读书时，在不同的时期我都蓄养着各种动物，把它们当作宝贝：其中有一只穴乌，尽管是最下贱的小动物，但它的感情却强烈得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当它听到我从学校回来走上台阶的脚步声时，它就蹦呀跳的赶紧来迎接我。……可是，由于对神的不敬，没脑子的人却把自己贬低到连野蛮的动物、甚至连狗和穴乌都不如，这些东西倒是永远不会忘恩负义的。

到 1789 年，在这个自由省的格兰维尔镇上，几乎已经不满两百个居民了，他们大部分都住在那些摇摇欲坠的茅屋和帐篷里。农业已经证明是没有希望的了。有些移民就到邻近的河流的上游去作买卖。在那里，他们往往和其他的贸易公司、特别是和一个名叫鲍伊船长的美国奴隶贩子发生了冲突。鲍伊怨恨这个突然建立起来的黑人殖民地，也讨厌它的浮夸的名字；他骂这些移民没规矩，找麻烦。这时候，托姆王已经死去，当地的新酋长叫杰米王。他拒绝履行他的前任的保证。鲍

伊是既不喜欢格兰维尔镇，也不喜欢杰米王，因此就在这两者之间挑拨，煽动他们的敌对情绪。当英国海军军舰“波莫纳号”在1790年5月开进海湾后，移民和鲍伊都来向它的船长亨利·萨维奇愤怒地控告杰米王，并互相指责。经过一番混乱的争吵之后，萨维奇要求杰米王到船上来，但是遭到拒绝。于是萨维奇便派了一批移民和海军，把杰米的村庄烧掉了。

及至“波莫纳号”一走，杰米王便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限所有的移民在三天之内离开格兰维尔镇。然后他就把这个镇烧了。格兰维尔镇本来就只有几间破茅屋，因此对这次劫掠倒也不应夸大其辞。不过这样一来，这个有形的殖民地也就全部完蛋了。有一些移民就在邻近地区住下来，但大部分都流浪到沿海的其他村子里去了。

夏普一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便立刻写信给首相威廉·皮特，请求派一艘海军军舰去帮助那些移民恢复原来的地位。可是在1790年，法国的革命正热火朝天，英国也没有时间对西非的问题多费心思；甚至连夏普狡猾地提出塞拉勒窝内可能要受到法国的袭击的话，也没有受到英国

政府的任何注意。因此，夏普写了四封信给皮特，但一封复信也没有收到。

可是，那位有影响的威尔伯福斯对于塞拉勒窝内的实验倒还没有失去兴趣，而且他又是皮特的朋友。早在1790年初，还在格兰维尔镇被焚这一消息传来之前，有几个著名的“圣徒”就已组成了一个名叫圣乔治湾公司的商业企业，以便在经济上支持这个殖民地。这家公司的董事包括夏普和他的两个弟兄，威尔伯福斯，银行家兼议员亨利·桑顿，慷慨的酒坊主塞缪尔·惠特布雷德，他早已有钱给夏普——还有成箱的啤酒给塞拉勒窝内的移民^①。这家公司公开说明的目的是“开辟和建立同非洲的贸易”，那些董事们希望它能获取很大的利润。可是，如果说他们的慈善行为只不过是商业利润的外衣，那也是不公平的；毋宁说，相反的情况倒是真实的。这些董事全都是奴隶贸易的敌人，他们是想证明：在非洲进行诚实的贸易是可能的。这些人都是机灵的商人。他们从最近的

① 惠特布雷德的酒坊曾供给弗朗西斯·奇切斯特爵士在1966—1967年环航世界时所用的啤酒。他们的慈善事业曾经作过很多宣传。

经验中得知：任何在塞拉勒窝内的冒险事业，都很可能会招致麻烦的。托马斯·克拉克森在为这一公司招股时，曾这样写道：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并不是更乐于看到为非洲带来美好的后果，而仅仅是着眼于为个人谋取大量的商业利润，那我就不允许他购买股票。这并不是说他不该指望谋取利润，而是为了万一失望时，我想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舒服一些，因为我们事先就已使他确信他对于这样一件事作出了很大的帮助：即把光明和幸福带给了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他们的思想被封闭在黑暗之中，他们的肉体专被喂养来锁上欧洲人铸造的镣铐。

在奴隶买卖中谋利的人，想方设法不让这家公司获得政府的特许状，但亏得威尔伯福斯和桑顿的影响，议院在1791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了后来改名为塞拉勒窝内公司的组织。给这个新公司任命了一个新的主席，也就是以银行家桑顿代替了慈善家夏普。正如当时一家报纸所指出的：“这一殖民地的慈善性的目的，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一种极端的幻想；因此最好还是选一个与具有公认的坚实基础的事业经常有所联系的人来作主

席，他的这种联系似乎就保证了成功的希望。”

不但夏普本人失去了原来的职位，连他的两个最得意的理想也被塞拉勒窝内公司一同放弃了：由于议员亨利·桑顿对十家联保制以及那种古老的犹太法律不感兴趣，从今以后，殖民地的管理权将由在伦敦的董事们而不是由百户制的移民们来行使了。夏普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他的殖民地来证明黑人是和白人一样的，正如《圣经》中宣称“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①一样。塞拉勒窝内公司的董事们无疑地在原则上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但在实践中却并不根据这个原则行事。从今以后，他们宁愿派白人而不是派黑人到这一殖民地去。这家公司的官员将都是白人，黑人的百户长只是备供谏议而已。

1791年初，塞拉勒窝内公司的董事们派了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的代理人，去寻找原来的殖民地上的残存者，把他们聚集起来，由他的政府管辖。选择福尔肯布里奇这样一个人来担当这个任务，倒也是很奇妙的。他过去在船上当医生，主要是在贩奴船上工作，现在则出于宗教

^① 见《新约·使徒行传》，第17章，第26节。——译者

的原则而强烈地反对这种贸易了。他不但生性好斗，而且就象大部分随船医生一样（即使在现实中并非如此，至少在小说中都是这样），他也是一个烈性酒的嗜好者。这两项缺点，在温和适中的气候下已经是够危险了，在非洲的西海岸，当然更容易闯祸。在到塞拉勒窝内去之前，他和一个布里斯托尔的姑娘安娜^①结了婚，这对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倒是一件幸运的事，尽管对福尔肯布里奇本人来说也许并不这样。安娜的旅行记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所引用。她那本新鲜、幽默而颇见才华的书《到塞拉勒窝内河的两次航行》，是一种尖锐的、一般说来是正确的叙述。至于安娜·福尔肯布里奇明显地有点儿淫荡，这一事实也只会给她的作品增添一些风趣。

安娜是和她的丈夫、他丈夫的弟弟搭乘安德森奴隶贸易公司的一艘船到塞拉勒窝内去的。这家公司在班斯岛有一个转运站。二十年前，斯米思曼就曾在这里受到过安德森的好客的接待，并

① 近时的一个传记作家艾夫里尔·麦肯齐-格里夫，和其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没有考证出福尔肯布里奇夫人结婚前的名字以及她后来的历史。

曾在“一种只有在布莱克希思和苏格兰的某些个别的方才玩的游戏——高尔夫”中一试身手。福尔肯布里奇不愿和奴隶贩子为伍，因此早在离开英国之前就已和安德森的人吵过架了。到了塞拉勒窝内之后，他坚持宁可睡在船上，也不愿到班斯岛上那个舒适的奴隶贸易堡垒中去居住。有一天晚饭时，谈论的话题又转到了那种肮脏的买卖上去。福尔肯布里奇夫人的报导中说：“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地干杯，这些绅士都兴奋起来了，他们刚撤席，我立刻就告退了。”这一对新婚夫妇在对待奴隶贩子的态度上有了分歧。安娜对于睡在这样闷热而狭窄的船上，吃的是连切也切不动的硬牛肉，成天地听执拗的丈夫发牢骚，实在感到嫌恶。她渴望着班斯岛上那种安乐而又有同伴的生活；在那里，她和非洲人以及奴隶贸易者都结交了朋友。她回忆说，有一天早晨，“……我佯装有病，要求福尔肯布里奇原谅我不能服侍他，于是他就勉强地把我留在船上，自管自出去了。等他一走，我就上岸到班斯岛好客的人家去，在那里舒适而愉快地过了一天。我讲述了昨天的那些怪事，使大家快活得了不得”。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却在到处招

集那些移民们。

格兰维尔镇的难民们，有一些就在班斯岛避难，另外有五十个人则沿河而上，住在一个非洲人的镇上。也有几个人在过往的船上找到了职业或是设法回到英国去了。福尔肯布里奇试图重建格兰维尔镇殖民地之前，曾先和塞拉勒窝内半岛的大君主纳因巴纳进行了几次谈判，这个人比起他那个副头领杰米王来，对待外国人是比较机智和友好的。福尔肯布里奇夫人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只是当她看到这位陛下的袜子上有两个洞时，出于家庭主妇的本能，她感到很生气。纳因巴纳王恢复了原来和移民所订的条约，交换条件照例还是那些同样的礼物：甜酒、烟草和铁条。福尔肯布里奇觉得，不管有没有条约，在原地重建一个殖民地可能会激怒杰米王，那是犯不着的，因此就把格兰维尔镇从原地向东迁移了大约二哩，这些茅屋都是土人因为害怕有魔鬼而放弃的。大约有五十名左右的移民搬进了新的格兰维尔镇，其中也包括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过的所谓妓女在内。

不到几个星期，移民们就在格兰维尔镇添造了茅屋和一幢用来存放武器和火药的坚固的房

屋，并且赶在大雨来到之前，整理和耕种了四亩土地。这些人决心由自己来保卫自己。他们是忠于派他们来的那个机构的，但他们对自治却已失去了兴趣，因而就要求公司的代理人来统率他们。福尔肯布里奇在 1791 年夏天送回伦敦的报告，使公司大受鼓励，他们野心勃勃地准备投资十万英镑，后来超额募得了二十三万五千二百八十英镑。

福尔肯布里奇夫妇把纳因巴纳王最大的儿子带回了英国，这就是后来在英国变得众所周知的“黑王子”。纳因巴纳王生性好奇，敏于接受新事物，而且强烈地希望知道在他这雨林以外的世界。他派了另外一个儿子到法国去接受教育，又派第三个孩子到北边的曼丁哥族去接受穆斯林教义。纳因巴纳王从格兰维尔镇的移民中找了一个人，名叫艾利奥特·格里菲思，作为他的秘书，并在他和外国人做买卖时充当翻译。格里菲思是夏普的门徒，无疑地在纳因巴纳王面前为他说了许多好话。纳因巴纳王送他儿子上船时带去的一封给夏普的信，就是格里菲思润色的，甚至可能是代为起草的。纳因巴纳王要求夏普代他找寻三个亲戚，他们是被一艘丹麦船绑架走的；同时还要夏普把

善于照顾和管理这块地方的移民派来：

这样，你就不必为他们能否在这个地方繁荣昌盛而担心了。福尔肯布里奇先生在这里的时候，我是很赞赏他的。我是永远偏爱大不列颠人民的，因此我容忍了许多来自英国人的侮辱，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我早就忍受不了了。我希望，你将照顾我的儿子，除了你认为正确的以外，不要让他有自己的主张。

这个名叫约翰·纳因巴纳的儿子，年龄在二十四岁到二十九岁之间，是和福尔肯布里奇夫妇一起于1791年6月离开非洲的。一到英国，他就被介绍给托马斯·克拉克森、亨利·桑顿以及公司的其他董事们。那位出言不逊的福尔肯布里奇夫人写道：“当我看到这些绅士，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名义上的国王的儿子，竟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如此卑躬屈节的礼貌，我禁不住暗暗发笑。”关于他是否真的见到了格兰维尔·夏普，并无记录可查；但他在受洗礼时却接受了亨利·格兰维尔这个名字，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敬意。从记录来看，这个黑王子是一个腼腆而好学的人，就象在欧洲的非洲青年所常有的情况一样，他虽然羞怯，有时也会突然发起怒来。他学习《圣经》和希伯来文，如果没

有什么特殊的工作，他一天会学习八到十小时。

他的容貌并不动人〔一份有点儿吹毛求疵的报导中说〕，但他的举止却是非常讨人喜欢，天生地很有礼貌，甚至可以说风度十分优雅。……他的一切感觉都很灵敏，有时候也容易发怒。在他的性格里也有相当程度的嫉妒，他特别不愿意回答陌生人提出的有关他本国状况的问题，因为他往往怀疑人家是有意要作出有损于他的国家的名声的比较。所以，在这种场合，他往往就把话题一转，发表意见说：象塞拉勒窝内这样一个到目前为止条件很差的¹国家，是不可能有什么有价值的成就值得在英国作为话题来谈的。

有一次，有人提到了曾经说过非洲人坏话的一个人的名字，黑王子“脱口就说出了粗暴的报复性的话”。当告诫他说这是违背基督教徒的行为时，他回答说：“谁要是破坏黑人的名声，谁就是损害了全世界所有的黑人；一个人只要一度破坏过黑人的名声，此后他们对他们就没有什么事干不出来了。……哎，他们不过是黑人而已——我为什么不把他们当作奴隶呢？”

老王在 1793 年 2 月死了，他的儿子，黑王子，就乘船回非洲去了。这个年轻人在热带海洋的某

处得了病，当这艘船即将到家时，他已是气息奄奄了。“有一次，他在神志清醒的当儿，叫记录这件事的人代他写一份遗嘱。……他在遗嘱中写进了这样一个真挚的要求：要他的弟弟用尽一切力量来结束奴隶贸易。”这艘船在塞拉勒窝内进港后不久，他就死了。下面这些他在航海时所作的日记的摘录，可以证明“圣徒”们确实已经把黑王子改造成了基督徒：“我必须当心这些我已堕入其中的伙伴们，因为他们经常开口咒骂，讲的尽是邪恶的事情。我能不能抗拒这种诱惑呢？不，我不能。但是上帝将拯救我。”这显然是在普利茅斯写的。在海上航行时，黑王子在他那袖珍笔记本的一页上写道：“我今天宣告：如果塞拉勒窝内公司的船都象这艘‘纳因巴纳号’，或是装载的都是象这样的一伙人，那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英国去的，尽管那里有的是朋友，对我来说，他们是如此亲切，就象是我父亲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一样。”

他那曾经到法国去受过教育的弟弟说，黑王子是被英国人毒死的。在以后的几个世代中，泰姆奈人始终为了他的死亡而反对塞拉勒窝内殖民地。可是，别的酋长还是把他们的儿子送到英国

去读书,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西非传统,英国人就是利用了这种传统,先是教育接着就驯服了这个雨林的统治者。这就是卢加德称之为“间接统治”的政治制度的起源。

黑王子的故事,以其恰到好处的、临终时虔诚的表现,刺激了英国的那些善男信女们到非洲去做传教工作的胃口。亨利·格兰维尔·纳因巴纳便是《在品德和虔诚上超群的、早年死去的年青人的真实故事》这本书中的英雄人物之一。书中用来叙述的语言,不象纳因巴纳讲话时那样,而是经过了很大的润色的,它谈到了“船上的伙伴们的放荡的行为和放肆的语言,使他受到了极度的震惊,这是他那种纯洁的思想所不能容忍的。”另一本标题为《非洲王子》的小册子,封面上画的是纳因巴纳一脚踢开了一本诲淫的书。

第三章

有三千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边的黑人，在到了新斯科舍之后，以极大的兴趣注意着塞拉勒窝内殖民地。这批黑人，很可能大部分是在他们的主人反叛时逃出来的奴隶；但其中也有一些原来就是自由的，甚至是富有的人。“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几年后有一个新斯科舍移民这样声称，“我已经在南部的一个州里拥有一个三百亩的农场；我的棉花和咖啡生产都很好，我相当富有，而且还在蒸蒸日上。美国人（当时称作叛党）来找我，把我当作一个自由的业主，要我参加他们的自由斗争，但我不愿意。”

在 1783 年结束了战争的巴黎条约，规定英国要归还美国人的财产，但事实上很少黑人士兵是重新去做奴隶的。有三千名以上的黑人，跟着二万五千名效忠英王的白人士兵一起，流亡到了新斯科舍。英国对这些复员士兵，不论是黑人或白

人，都答应给予土地，但这个诺言却很难实行。那些农民，习惯于南方的适合于种棉花的黑土或新英格兰青草茂盛的牧地，得到的却是一块块长着丛林和矮松的土地。那些黑人抱怨说，分配土地时白人享受了优惠的条件；这种抱怨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黑人被迫象雇工一样劳动，他们发现新斯科舍的地主们并不比美国人更仁慈一些。事实上，在这个省份里，奴隶制度还是合法的。在加拿大那种凛冽的冬天，黑人吃的苦比白人更大。

新斯科舍的黑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辩护人，他名叫托马斯·彼得斯，是一个磨坊工人，曾经在侦察队和工兵中当过中士。彼得斯在新斯科舍等待了六年也没有得到土地，于是他就横渡大西洋到伦敦去告状。这是一次冒险的旅程，因为万一他的船受到风暴袭击而不得不到一个美国港口去避难，那他就可能被当作逃亡奴隶而给抓起来。彼得斯在伦敦见到了夏普，夏普便将黑人的问题提交给塞拉勒窝内公司和政府。桑顿和皮特都同意新斯科舍的黑人可以成为苦难的塞拉勒窝内殖民地很好的移民，于是公司的董事们就决定派一个代表到新斯科舍去，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黑人真

的希望移居。

他们选中的人是约翰·克拉克森。他愉快地、甚至是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他当时二十八岁，过去曾在英国海军中当过低级军官，但后来由于读了《圣经》而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时，他就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他感情脆弱，易于激动，但他既非不讲求实际，也并非没有名利之心。他的哥哥托马斯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和“圣徒”，他支持废奴运动这一道义上的十字军，并为之提供事实和情报：他访问过利物浦以及其他进行奴隶买卖的港埠，检查过贩奴船，量过那些狭窄的船舱，访问过很多海员，还编过一本奴隶买卖情况记录。约翰虽然不象他的哥哥那样是个学者，可是和他的哥哥一样，强烈地痛恨奴隶买卖，也重视现实和细节。他感情脆弱，易于激动，但他既非不讲求实际，也并非没有名利之心；尽管在塞拉勒窝内历史上，他有时被描绘成一个脆弱的、爱流泪的歇斯底里患者；但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他的魄力和熟练的办事能力，可能也就不会有新斯科舍的黑人移民过来了。

克拉克森于1791年10月抵达哈利法克斯，

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黑人问题的狂热者。他是这样的英国人之一(这种人到今天还是很普遍的),即他不但赞助一些外国的少数民族的事业,而且对这些人产生了好感。他写到这些想去塞拉勒窝内的黑人时说:“我有一切理由相信,他们大多数都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很害怕借债,所以他们仔细地问我:究竟会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使他们不必借钱而能在塞拉勒窝内养家活口。”他特别欣赏、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普雷斯顿的黑人村庄: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在写给亨利·桑顿的信中说〕,大多数人都要比英国的任何劳动人民更优秀。我觉得他们配得上称为具有健康的感觉、敏捷的理解力和清醒的推理能力;他们对妻子儿女是仁慈的和热爱的,对邻人是友好的和亲善的。如果我对这些人的称赞超过了对其他的人,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就住在我附近,我对他们观察得比较多一些。我对他们全体作出赞扬的评价,我是有充足的理由的。

克拉克森成了向非洲移民的运动的狂热者,他甚至入迷到作出了一些不聪明的诺言。正如我们从克拉克森的报告中引用的资料表明,新斯科

舍的黑人所急切想知道的，是有关塞拉勒窝内经济生活方面的前途。他们认为他们在新斯科舍受到了虐待，因而除非保证他们可以无偿地得到土地，他们是不愿意再作远途跋涉了。总之，他们所想知道的是，他们要不要再向塞拉勒窝内公司交付地租。克拉克森一再地向他们保证，可能要他们付钱的不是地租，而只是兴办学校和救济贫民方面的税金。黑人们都感到怀疑——事实的发展证明，他们的怀疑是对的。在和难民们——受压迫的人、感到幻灭的人、抱有怀疑的人——打交道时，代替当局来许下种种诺言是卤莽的事，而克拉克森却是一再地这样做了。例如，他答应所有不到非洲去的黑人们很快就可以在新斯科舍分得土地。可是黑人们具有充分的理由回答他说：“总督老爷不理睬国王，他也不理睬你。”黑人的心里很清楚；甚至克拉克森自己也觉得新斯科舍的“总督老爷”恐怕是既无权力又无决心来给黑人们提供土地的。

虽然他们有种种顾虑，还是有一千一百九十名黑人决定跟克拉克森一起到塞拉勒窝内去。克拉克森尽管作为一个政治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在办事方面倒确实是个能手。他为这些新的移民

代办银行业务，帮助他们出售各自的财物，检查那些船只的通风情况以及干燥程度。所有的运费是由英国财政部支付的，但克拉克森还要向每一条船的船长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把黑人们当作已经付钱买票的旅客对待，在到达旅程终点时他将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如果说，克拉克森对待他心爱的黑人太善和随便了一些，那末，他对待当局的人却是强横和顶撞的。那些运输船于1792年1月15日正式启航。

即使以十八世纪的标准来讲，这一批新斯科舍黑人的航程也是凄凉的。在泰勒医生的照顾之下，至少有六十七名旅客在中途死亡。这位医生治病的唯一办法就是催吐。克拉克森搭乘的是一条病院船，他自己也在哈利法克斯得了严重的热病。他在日记中写到自己是多么悲痛地失去了

我的可怜的仆人。在我昏迷不醒的日子里，他无微不至的照料我，可能就是从我身上传染了热病。他的死使我深受感动。今天我躺在床垫上被抬上了甲板，因为我已不能走路，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使我行动……这是我自从1月21日以来第一次来到甲板上。我的房舱和床铺都进行了打扫，用醋来洗刷，并用沥

青和火药丸子烟熏过了。由于我的仆人病了，科芬船长也病了，在我卧病的后期，我严重地缺乏照顾和看护。在船长得病之前，除了他自己和一个助手以外，所有的船员都病倒了。1月29日那次大风暴很可能就夺去了我的性命。这次风暴冲击了我们的船尾，幸亏由于这个意外事故，天意逼得船长下舱来堵紧那些打破了的舷窗盖，他这才发现我滚来滚去，筋疲力尽，身上全是血和水，擦伤得很厉害，因为那时候我身上已经起了四个泡。

这些运输船载着新斯科舍的移民于2月底3月初之间到达塞拉勒窝内。对大部分航行者来说，到了目的地就高兴了；有一个人“在上岸之后，发现他当年就是在这同一地点被拉走的。他指着海滩上的某一个地方回忆说，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就在那儿，有个女人抓住了他，就把他卖给河上的美国贩奴船了”。对已经被热病和工作搞得筋疲力尽的克拉克森来说，到达只是意味着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当他同意把新斯科舍黑人带到这里来时，他认为他的任务在到达塞拉勒窝内时便可结束。但当时公司已把这里的行政机构进行了改组，废除了原来的总督（事实证明是个失职的总

督), 而代之以由七名白人来担任的理事。他们现在指望克拉克森来管理这个殖民地, 不是作为独一无二的掌权人, 而是作为这些理事们的监督人。这些理事是一群酒鬼。他们踏上这些来自加拿大的船只时, 一个个都是佩着短剑, 戴着有帽徽的帽子, 穿着有肩章的外套, 嘴里嚷嚷着各自的“可敬的”新官衔。其中军医贝尔医生更是一个突出的酒鬼。不过这些理事中的绝大多数, 也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而且在理事会上大打出手。毫无疑问, 克拉克森会见这些理事们之后, 不得不让人扶到床上, “在极度歇斯底里状态中躺了将近两个小时”。

克拉克森把 1787 年第一次建立的格兰维尔镇改名为弗里敦, 就让他那些新斯科舍人安顿在这里。这些虔诚的新国民聚集在一支高大的棉树下面, 为他们的平安到达而歌唱感恩的赞美诗。这棵棉树到今天还耸立在那里——两侧是法院、内地银行和热带俱乐部——但许多新斯科舍移民却没有过年就死了。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中就死了三十八人。4 月 1 日, 甚至在雨季还没有开始之前, 克拉克森就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住得很拥挤, 上面没有东西挡雨, 吃的都是盐腌

的食物，如果说斑疹伤寒不在我们中间发生，那完全是由于上天的特别的安排。任何钢铁制的东西都不能够保持不锈。小刀、剪子、钥匙等等，都象是古旧的锈铁。我们的表都已锈坏，扔在一边，不能用了。

5月间雨季开始以后，九十八名新的黑人移民死于“斑疹伤寒”，这一年內来到塞拉勒窝内的一百一十九名白人，也死了将近半数。那时候，安娜·福尔肯布里奇已跟她丈夫回到这里来了。她写道：“每天早晨问一声‘昨天夜里死了几个人？’这已经成了习惯了。”所有还活着的白人，在克拉克森看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不中用的了。测量员没有给新斯科舍移民们区划土地。军医贝尔只会酗酒。公司的代理人无情地盗窃供应物资。克拉克森写给董事们的信上说：“看来，你们在每一个部门都受到了欺骗。船只，仓库，货物，任何一样东西，很少真正发挥了接近于你们所花费的价值。”甚至象福尔肯布里奇这样原来算是能干的人，现在也由于喝酒而变得无所作为了。克拉克森在日记中写道：“福尔肯布里奇一直在说要出去跑一趟，为殖民地购买一些农具，可是由于他经常喝酒，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我尽力逗他高兴，

以便使他安静下来。如果不是由于他具有世界上最强壮的身体，恐怕早已呜呼哀哉了。”几个月之后，他果真死了。但他的寡妇却并不感到悲痛。她写道：“我决不干出这种卑鄙的勾当，决不在这种场合假惺惺地说：对于他的死我是多么伤心。不！我真的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感觉。”两个星期之后，她便和他的一个同事结婚了。酒鬼贝尔医生死于颤抖性酒疯。使克拉克森非常恼火的是：那些不见得比他清醒多少的理事同事们，竟然还为他进行了军人的葬礼，命令各船为他鸣放礼炮，有一个炮手竟因此炸掉了一只胳膊。

白人妇女比男人更会找麻烦。克拉克森埋怨说：“殖民地上的那些太太们，由于相互嫉妒以及对她们的身份和地位的种种荒唐无稽的想法，使大家心里都呕着气，因而常常在男人们之间引起公开的争吵。自从在唐斯船舶停泊处开船直至今今天，由她们所造成的灾害是无法估计的。”他恳求董事们“不要再让任何船长准许带有妻子的乘客上船。今后你们选派人来时，不管是移民或是技工，都要格外谨慎。目前已经在这里的人，不管是黑人或是白人，一般都是些不道德的、懒惰的、不

知足的、不服管理的家伙，他们的榜样和行为，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仿佛这些白人居民还不够麻烦似的，还有许多奇怪的船只和更奇怪的白人旅客前来访问这块殖民地。“我不断地受到陌生人的无耻干扰，”他带着自己那种典型的歇斯底里的声调写道，来自沿海的更多的白人不速之客，“使我的心情非常阴郁，因为这么多品质混杂的人在目前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我不能估计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有三个白人水手侮辱了新斯科舍的移民，克拉克森把殖民地的人召集在一起，当着他们的面叫一个黑人把这三个水手鞭挞了一顿。

如果说，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的生活使克拉克森感到气恼，那末，和邻居们的接触更使他感到不快。和纳因巴纳王的谈判特别使他愤懑：“这种访问之令人疲劳和不愉快，那是无法形容的。这么多人在一起嚷嚷着，另外一些人又通过翻译来和你讲话，而所有的人都是拚命地喝酒。”怪不得他在给桑顿的信中这样诉苦说：“一天的抑郁不乐往往是在头昏脑胀和歇斯底里中结束的。”他看来就是那种不会放松神经和安静脑子的人，总是有

什么事情来折磨他。有一天，他到巴纳纳岛去看几个奴隶贩子，晚饭后，他在沙发上躺下来休息。“不一会儿，”他回忆说，“当我睡着时，有两个女奴隶被派来给我打扇，但正是想到了有奴隶‘在我睡着时来打扇，在我醒着时又在我面前发抖’，就使我无法享受这次休息了。”

尽管克拉克森是这样的歇斯底里和大惊小怪，但在和新斯科舍移民们打交道时，他那种温和的优良天性还是常常占了上风。在这第一年的一切不幸中，他对那些黑色的部下，还是保持着尊重和爱护。公司的董事们同意他对这些新斯科舍人的高度评价：“在他们中间，结婚是极其普通的，”关于 1792 年的报告中这样说，“喝醉酒的事并不普遍，很少听到有咒骂的声音，他们对于安息日也是非常注意的。”这最后的一种品德，特别引起伦敦“圣徒”们的感动。陪审制度是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的，虽然这些黑人移民中，很少具备象英国陪审员所需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资格。董事们的报告中说：“判案一般说是很公正的。总的说来，这些新斯科舍人在陪审制度中工作的态度，正足以证明当局将这种他们如此看重的权利给予他们是适

当的和明智的。”在以后的几个世代中，对于那些到这块殖民地来访问的人们来说，这些黑人陪审员一直是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更经常的是他们谩骂的对象。

连克拉克森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新斯科舍黑人是非常喜欢争吵的。他们的谩骂吵闹把上千的移民分化了。愤懑的男人，更经常的是狂怒的女人，用那些文字上半通不通的请愿书、控诉状来折磨他，他们不但互相攻击，而且也攻击公司和克拉克森本人。董事们承认了这一失败：

他们宣称：如果不把他们的工资增加六便士，他们便认为自己是被当作奴隶来对待了。同样地，由于总督下令在甜酒出售前必须掺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持酒的标准强度），因此这个总督必须撤换，否则他们认为整个殖民地就将沦于奴隶制度了。

这种爱争吵和深刻的抱怨心情，是一种典型的难民心理。正如现代的难民一样，新斯科舍移民被劝诱离开了原来那种安全的临时居处，来到海外过着这种极度不安定和冷酷的生活。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于那些白人官员的懒惰，连原来允许给他们的土地都不曾测量好。他们没有合适的

住处来抵御猛烈的暴雨；自从贝尔医生死去以后，就没有正式的医疗措施来照顾他们。

新斯科舍人找到了托马斯·彼得斯作为他们的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这就是第一个从加拿大渡海到英国去告状的年纪较大的黑人。早在哈利法克斯的时候，他就因为选了克拉克森而没有选他作为这次移民的领袖而表示不高兴了。4月8日，克拉克森收到一份警告，说彼得斯正在策划使自己当选为总督。他在日记中记录这件事说：

我读完这封信，立刻就上岸去。为了不失时机，在前往镇中心的路，我先去找彼得斯先生（他是理事会的成员之一），要求立刻敲响大钟把移民们集合起来。他们很快地集合了，包括官员和人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会事，有些人显得很激动。我站在一棵大树下面向彼得斯说话。我说在我们两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将在谈判得到解决之前被吊死在这棵大树上……^①

这一姿态无疑是过分地戏剧化了，事实上新

① 克拉克森辞职后描写这同一事件时说：“我向托·彼〔得斯〕说话，把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对他说，如果我认为他不能为自己辩白清楚，我就立刻把他吊死在我们头顶的树枝上，因为在一个新的政府成立时，最好能吊死三、四个将来可能给本地带来不幸的人。”

斯科舍移民中支持彼得斯的人很少。有些原来是站在彼得斯一边的人，后来也告诉克拉克森说，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忠于他的意图。克拉克森尽管平时很温和，但他对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却一点儿也没有怜悯之情，而且还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跟踪：“他（彼得斯）是一个极端善于钻营和狡猾的人，”克拉克森在大树下摊牌之后，又这样写道，“因为在英国时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他就把自己看作是高人数等了。……我感到有责任不但自己要经常注意他，而且还必须要别人也注意他的行动，并在背地里把情况报告我。”几个星期之后，彼得斯因挪用公款而受到了法院的审讯，他被判有罪，并受到了严厉的惩戒。在众叛亲离、名誉扫地的情况之下，彼得斯得了热病，死于6月25日晚间。人们禁不住为彼得斯感到遗憾。他没有学问也没有做领袖的本领；他也可能不太诚实，但他毕竟是首先计划这一次向非洲移民的人，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理想被一个英国的白人接过去了，而这个白人却又成了他的敌人。一个能干的黑人看到他的人民的领导权落到了一个白人手中，这在塞拉勒窝内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克拉克森为了新斯科舍人拚命工作。到这一年年底时，他看到他们都已有了房子，身体健康，可以开始依靠种地生活了。他施展出非常熟练的外交手腕，使他那些新斯科舍黑人和第一批格兰维尔镇留存下来的移民合并起来。使他“从心底里感到满足的是，我们似乎已渐渐地建立了某种秩序；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之下，从此时此刻起，我们和你们‘格兰维尔镇’的后裔共享幸福的日子也就可以开始了”。他不倦地劝说移民们要努力工作并接受他的领导；在劝说遭到失败时，他又热烈地要他们问问自己的良心。他在9月间的一次训话中说：“长时期来，我一直在担心由于他们极端怀疑白人而产生的后果，我要他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他们处在我的地位，遇到他们中有些人那样对待我的情况，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觉。”

当劝告和恳求都告失败时，克拉克森就威胁说要回英国去了，以此来作为对不知感恩的黑人的惩罚。于是，正如另一个英国人所指出的：“他们接受了这一警告，并且热情地请求他不要遗弃他们。”黑人的结伙格斗、白人的酗酒无能，还有热病、多雨、酷热，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克拉克森的

工作成了一大痛苦。而最使他苦恼的是，他还受到从英国来的那些无法理解的忠告的折磨：他的哥哥托马斯的来信装得一面孔的虔敬和正经；桑顿发来的指示越来越严酷；当然，夏普的来信又要他重新建立百户长的制度。只有那个福尔肯布里奇夫人，她具有鉴别人品的无比锐利的眼光，认为克拉克森是唯一适宜于管理他自己带来的那些移民的人才，因此她站在他的一边，反对那些嫉妒他的白人：“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丝毫没有虚饰和浮夸，这也正是他那些理事会同事（白人官吏）极端不赞成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一种可笑的想法，认为他的坦率降低了他们的尊严。”

土地和税收的问题，使克拉克森不受塞拉勒窝内公司的欢迎。他曾答应把土地免费分配给新斯科舍的移民，但公司的董事们却坚持说，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分配。他曾答应这些移民不必支付租金（虽然他们应向公司缴纳办理学校和济贫事业的税金）；但公司方面却想实施免役税或土地税。克拉克森写给桑顿的信越来越暴躁和感情用事。桑顿给克拉克森的信也由于那种板着面孔的礼貌而显得更可恶了。“我亲爱的先生，”桑顿在

1792年9月14日的信上这样开头说，“首先让我要求你善意地解释我的话，正如不管你的来信多么激烈，而我还是以最友好的态度来解释它的每一句话一样。”接下去他便警告克拉克森，说他在塞拉勒窝内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监督。“你如果查看一下你的委任状，我相信你就会找到这样的条件——当时我们并不认为你会接受监督职位超过几星期以至几个月的。”这个声明不仅是卑鄙的，而且是不真实的。因为桑顿在给克拉克森的委任信（1791年12月28日）中，非常明显地含有这个职务将是永久性的意思。

1792年底，公司又派了两个官员到弗里敦去，表面上假装是准备在克拉克森生病或请假的时候代替他的。这两个官员，一个叫威廉·道斯，原来是海军军官；另一个叫扎卡里·麦考利，他的情况将在下面一章中予以叙述。这两个人的脾气和想法，都跟克拉克森不大一样，而是更接近于桑顿。1792年12月30日，克拉克森离开弗里敦到英国去结婚，当时他是准备不久就带着新娘一起回来继续执行总督任务的。但他到伦敦时前来欢迎的董事们，却在4月间他结婚的几天之前，就通

知说不需要他再去工作了。

这个消息传达到弗里敦时引起了群众的愤慨。当克拉克森不在的时候，代理总督道斯和他的助手麦考利激起了新斯科舍移民们的不安，他们控告这两个人实行种族歧视。他们声称公司在分配土地、测量新地以及在公司经营的百货店的物价方面，都破坏了原来的诺言。“为什么公司没有全部实现对我们的诺言呢？”移民们于1793年2月7日提出了这样的质问，“我们对克拉克森抱有极大的好感和敬意，坚决相信他在看到自己的诺言全部实现以前，是不愿离开我们的。如果这里的几位绅士还没有对这些诺言给予最可靠的保证，那末他们应该立刻就这样做。”道斯对这些要求的答复是：“克拉克森常常是这样，他许下了过多份外的诺言，事后却想也不去想它了……”

新斯科舍的移民给伦敦送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恢复克拉克森的职位。其他的人，有的扬言要离开这个殖民地；特别得到福尔肯布里奇夫人赞赏的是，有的人“以侮辱来刺激道斯先生，希望他感到大家厌恶他面自己滚蛋”。他们甚至还将法国的路易十六最近遭遇的命运来提醒道斯先生。威

胁和恳求同样都毫无效果。象道斯和麦考利这样冷酷和没有同情心的人，还要多年统治这块殖民地。

克拉克森作为一个银行家定居于剑桥郡，有时给朋友们写些自我怜悯的长信，以此来发泄他对公司的气忿。安娜·福尔肯布里奇夫人也永久离开了塞拉勒窝内，她不但抱怨公司的缺德和忘恩负义，而且还控告公司吞没了她第一个丈夫的抚恤金。经过和她所厌恶的桑顿一番恶毒的争吵，安娜终于得到了这笔钱，然后跟着她的第二个丈夫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编进她那本受人欢迎的书中的最后几封信里面，她极端不满地把这家公司里的人比作巴巴多斯岛的奴隶贩子。

第四章

〔扎卡里〕麦考利先生令人羡慕地适合于建设一个黑人殖民地的艰苦而乏味的工作。他的缺点正好帮了他的大忙；对于他必须打交道的那些环境，幸运的是，他天生对一切可笑的事物缺乏辨别力。他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荒唐现象，不受激动，不会吃惊，不知疲劳；处身于没有经验和不愿服从的沸腾的混乱之中，他屹立在秩序和权力的中央。

（引自乔治·奥托·特里维廉：《麦考利勋爵的生平和书信》，1876）

如果扎卡里·麦考利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父亲，可能现在很少人会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是最有影响的“圣徒”之一。在反对奴隶贸易的斗争中，他仅次于威尔伯福斯而居第二位；而在道德纯洁的运动中，他却是第一位。作为一个人物，由于更多的罪恶行为，他甚至比威尔伯福斯和汉纳·莫

尔更加轰动一时；作为塞拉勒窝内的副总督以至最后在 1793 年到 1799 年担任正式总督，他给这块殖民地进行了改良，确定了它的命运。他是黑非洲的伟大的白人殖民者之一，足以与斯坦利^①、卢加德^②、约翰斯顿^③、德·布拉扎^④和罗得斯^⑤并列。他的殖民地可能很小，他的殖民地人民是黑色的；但他的通过贸易和基督教来传播文明的那种幻想，却最后征服了整个大陆。他是一个冷酷而最不可爱的人，他是这样的清教徒之一：他们的自我欺骗，危险地接近于伪善的程度；但是，他那种意志的力量以及极端残酷无情的性格，却可以

-
- ① 亨利·莫顿·斯坦利(1841—1904)，英国殖民者、探险家，曾多次深入中非腹地，为英、法、比等国的殖民势力开路。——译者
- ②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1858—1945)，英国军官，“间接统治”论的鼓吹者，曾长期在尼日利亚推行殖民统治。——译者
- ③ 哈里·汉密尔顿·约翰斯顿(1858—1927)，英国探险家、殖民官员，曾为英帝国掠夺尼亚萨兰（今马拉维）、乌干达等地。——译者
- ④ 皮埃尔·保罗·德·布拉扎(1852—1905)，法国殖民者、冒险家，曾任法国政府总高级专员，在法属刚果（今刚果人民共和国）建立残酷的殖民统治。——译者
- ⑤ 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曾创办英国南非公司，侵占了坦噶尼喀湖以南、尼亚萨湖以西的大片地区。——译者

与后来更有名的维多利亚殖民者相匹敌。

麦考利这一家族原籍赫布里底群岛，但1768年当扎卡里出世时，他的父亲已经是因弗雷里地方的一个牧师了。由于家庭里的吃口太多，扎卡里在十四岁时就到格拉斯哥一个商人的办事处去工作了。关于麦考利的早年生活，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来自他在1797年担任塞拉勒窝内总督时所写的一本简要而动人心弦的自传。我们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得知，麦考利在十四岁时就已经是一个满有资格的小罪人了：“我在格拉斯哥呆了两年多，在这两年中，我确实获得了有用的知识（他读过很多各种语言的书），有所进步。但我进步得更快的却是邪恶的知识。”他的伙伴们用他们那种拍马奉承的友谊，来破坏他的宗教信仰；他在闲暇的时候，就和那些纵酒的浪子们混在一起。“在他们的教唆之下，我对于酗酒不但没有当作罪恶，反而引以为荣。因此，我欲望中的目标之一，便是要亲眼看到所有的伙伴们都醉倒在桌子底下。而更令人奇怪的是，我事实上是不喜欢，不，我甚至是讨厌酗酒的。”

年轻的扎卡里甚至也没有逃过他父亲那些可

敬的朋友们的罪恶的濡染。“由于我相当随和，我就习染了这一家庭中太太们的嗜好，她们都喜欢看新戏和大理石花纹封面的书。深夜，我如果不是喝酒，就是花费灯油来细读那些丑恶而又引人入胜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每一家流通图书馆目录中的小说项目下都可以找到。”

正象有些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一样，麦考利对于他自己所反对的东西也具有一些个人的知识，因为他才十六岁时，就到牙买加一家甘蔗园里去当副经理了。

最初，我的主要感受是〔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坦白说〕，在我当时的处境之下，我不但被迫地看到，而且还要亲手去对别人施加酷刑。回想到这一点，使我的血都冻结了。对这些可怜的奴隶的不幸，最初我的思想还是清醒的。我不仅一想到是自己把这些刑罚硬加在他们身上，心里就起反感，而且即使看到这种刑罚也感到十分难受。可是，事已至此，我已没有后退的余地了。真的，如果我可能回到欧洲去，那可就太高兴了，可是我没有钱。……在西印度，如果我不愿丧失所有打算帮我忙的人的关心，那末，我甚至连自己的一些感情都不能流露，不能使人觉得好象我是在责备他们的残忍。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只有

把自己这种迂执的脾气看作是非常不利的东西，决心尽快地把它克服掉。而在这方而，我却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成功。

研究麦考利的传记的人们，对于他竟能如此迅速地克服自己的迂执脾气，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在他的著作以及行动里，都暗示出他对肉体的虐待是在暗地里感到乐趣的。当时他在牙买加写给一个朋友的信，说明了他对这封信的作者以及他的经济困境所表示的怜悯，就超过了对不幸的黑人的怜悯：

但现在我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了，由于自己的愚蠢，结果就落得只好在荒天野地里为了挣一点微薄的衣食而拚命苦干。……如果你看到我在一块甘蔗田里，站在也许有百来个黑人中间咒骂着，咆哮着，你将完全不认识你的朋友了，想不到他竟是曾经和你在安静和愉快的环境中一同度过多少时间的人了；而鞭子打在黑人肩上的声音和这些可怜的家伙的哭喊声，也会使你想象自己被什么不幸的事故带到阴惨的冥府里去了。

也有一些种植园是管理得比较温和一些、人道一些的，但据麦考利自己的记录来看，他却是一个恶

毒的奴隶管理人。

麦考利的后来的敌人们指出，他的品德从来不曾阻止他搞到很多钱。下面是他描写从牙买加回来时在船上参加的一次扑克赌局：

有两个新手在赌博，我不幸堕入了他们一伙。其中的一个是已故总督温奇的儿子，他已经在赛马场和赌台上丢掉三万英镑了。……最初我玩得非常小心，绝不允许自己被诱去增加赌注。可是，正如一般的情况那样，我赢的钱越来越多，因而我也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即如果我迷恋地继续赌下去，最后又会遭受到这种迷恋势必带来的不幸。于是，我勇敢地下定决心截断这条锁链，并对此给自己规定了几点有力的限制。从此以后，除了仅有的几次例外以外，我对此是都能信守不渝的。

只有一个坚强的人才能克制赌博的冲动；也只有麦考利这样的人才能在赌得最顺手的时候克制这种冲动。人们只得可怜那些“赌博的新手”，谁叫他们倒了霉，竟然跟麦考利搞在一起了呢。

麦考利于 1789 年回到英国以后，就去和他的姊姊琼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托马斯·巴宾顿是累斯特郡的一个富绅。对麦考利来说，他们的会见

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他给第一个儿子（也就是那个历史学家）取的名字就叫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托马斯·巴宾顿虽然年纪比他的妻弟大不了几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个“圣徒”了，他的家园名叫罗思利院，在福音派中非常有名，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乡下的克拉彭。麦考利初来时，由于在甘蔗种植园中多年的生活，显得很粗野，没有礼貌，这对巴宾顿的虔诚的热情是一种挑战。他拚命设法要赢得麦考利的灵魂，最初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后来就采取了传教士那种率直的态度。也许，麦考利皈依宗教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也许，巴宾顿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即使在“圣徒”们中间，“他也被认为在责备和劝告的艺术上是一个无可匹敌的人”。在几个星期之内，麦考利就变成了一个福音派。自此以后，他对巴宾顿的唯一的想法，就是“他是第一个使我的思想接近救世主的人”。

巴宾顿的女儿之一曾经听到她的双亲说过：扎卡里舅舅刚从牙买加回来时，是一个自高自大和令人讨厌的青年，他的态度是傲慢和专断的——可是，过不多久，他就完全变了样啦。也许，不是这个人的本身有什么改变，而是他的欲望的

目标有了改变：过去他所追求的只是快乐和财富，现在他所追求的却是财富和救世。这个新的信徒转过来反对奴隶制度，结识了夏普、桑顿和托马斯·克拉克森，并且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狂热地支持塞拉勒窝内计划的人。他对待黑人的经验，以及他那种经过考验的、对热带气候与疾病的抵抗力，被认为是在公司中找到一个职业的优越条件。他于 1792 年到弗里敦，1793 年 4 月被任为协助道斯的副总督。

克拉克森离职之后，道斯和麦考利不再理睬那些新斯科舍移民的怨言，他们提高了塞拉勒窝内公司所属商店中货物的售价，他们拒绝使这块殖民地成为逃亡奴隶的天堂，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事情加以严厉的惩罚。“季法院开始工作了，”麦考利在 1794 年 8 月 18 日写道，“一件通奸案受到了审讯和判处：女的受到鞭挞，男的罚款五英镑。”对这样轻微的犯罪处以如此野蛮的刑罚，这在克拉克森的时代，甚至在当代的英国本土上，是不会受到赞许的；可是，麦考利对于黑色人种的态度，却由于他在牙买加的一段经历而变得残酷无情了。

麦考利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要他去访问本地的奴隶贩子，和他们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这些奴隶贩子是班斯岛的蒂利，冈比亚岛的雷诺，巴纳纳岛的克利夫兰以及在斯卡西河^①口上的阿斯皮纳尔等。克拉克森把这种访问看作是他工作中最讨厌的部分，但麦考利却是很喜欢这些奴隶贩子。事实上，人们的印象是，麦考利感到与这些奴隶贩子为伍，远比他 and 过去的奴隶在一起更加高兴。读麦考利的日记时，人们开始怀疑，他对奴隶制度的厌恶——正如他后来对猥亵文学的厌恶一样——恐怕也混杂着对这种制度的迷恋。

1794年初，道斯请假回英国去，二十二岁的麦考利就充当了这一殖民地的代理总督。他不久就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强硬并不亚于道斯：他开除了两个侮辱贩奴船船长的公司职工。那些百户长和十户长(夏普的政治制度的微弱残余)就聚集起来表示抗议，并提出了辞呈。这件事引起了骚动，使总督官邸受到了威胁。可是麦考利并不惊慌。他在大门口架起了大炮，并亲自向骚动的群众讲话，终于使他们恢复了理性。

^① 疑是斯卡西斯河之误。——译者

自从新斯科舍人来到之后的两年里，殖民地有了值得骄傲的进步。这里有了九条自西北走向东南的街道，还有三条较小的横街贯穿其间。新斯科舍的移民中，木匠的比例很大，他们建造了四百幢木屋，以红矾石作基础，顶上还盖着木板条。多少也幸亏有了较好的住屋，疾病和死亡率已经减低了。事实上，公司方面曾带着某些不高兴的暗示指出：“这些移民接待了来自贩奴船上的有病的欧洲人，他们大都是被弗里敦著名的有益健康的空气以及在这里可以得到较好的医疗指导所吸引来的。”

对伦敦的董事们来说，经济上的发展还远远不足以增加他们的财富，不过他们终于看到自己的投资获得了若干报酬。殖民地在米和蔬菜方面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而且开始种植一些出口的作物了。一个新的商业代理机构已经开始在海岸一带进行贸易，在歇尔布罗河口已经开设了一个商站。

公司长久以来就有一种企图，想在塞拉勒窝内建立一些种植园，好让自由的人在那里生产糖、棉和米，以此来对抗奴隶出口。1792年，公司在河

口的对岸购进了一平方哩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种植园，使用的劳动力都是本地的泰姆奈族。这些雇工每月得到三元钱工资，每天得到一品脱半米和二、三盎斯肉，还有“一小杯甜酒，如果他们在太阳一出来时就上班的话”。经理詹姆斯·瓦特原来是西印度的一个农场主，他从窗口监视着人们干活，有时也出来在他们中间走走。公司的报告中说，这些人的劳动“估计相等于本国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三分之二，他们工作得相当认真，虽然看来他们并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这些劳动者把他们的银币在弗里敦“出售”，换回衣服和家庭用具。

种植园几乎是公司所能指望的最有利的头等大事。它证明：使用了自由的、给付工资的劳动力，棉花、甘蔗、米都是可以生产的。它为殖民地提供了农产品加工工业。它为欧洲的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它使异教徒变成了基督徒。^①

可是，那些移民们却拒绝充当农业劳动者，他们认为这种工作只适合于奴隶去做。有些人也象麦考利总督一样，自己建立了一些小农场，但这毕竟是次要的，殖民地的真正工作是和内陆进行

^① 瓦特死于 1797 年。这个种植园的寿命并不比他长久。

贸易。

到 1794 年，麦考利已为这块小小的殖民地感到骄傲了，他开始把它说成是“我的家庭”。他于 1793 年 12 月间这样写道：

我们的学校是一片令人高兴的气象，它已足足有三百名儿童；不识字的成人，绝大部分都成群地来上夜校。我们几乎把殖民地上每一个能读会写的黑人都变成了教师。教育事业进展得如此迅速，我们预期在一两年内，殖民地上不能读《圣经》的人就很少了。

不论在识字或在虔诚方面，英国都不能和它的殖民地相比拟。“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听到或读到过任何一种人会有这么敬神的表现，”福尔肯布里奇夫人在写到新斯科舍人时这样说，“自从他们在这里上岸以来，我不记得有哪一次醒来（我夜间经常要醒）没有听到从这里或那里的屋子里传来说教的声音。”

殖民地的知识活动集中表现在亚当·阿夫济留斯身上。他是一个斯威顿博格教派的瑞典人，是林尼厄斯^①的学生，公司派他来是研究植物学的。公司为他投资开辟了两个园圃，他从 1794 年

^① 即瑞典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林奈(1707—1778)。——译者

开始给公司送报告。这个人的好奇心范围很广，他的笔记里面充满了有趣的细节。他注意到欧洲贩奴船的来到，吸干了从内陆涌来的贸易货物。他冒失地、错误地参加了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弗里敦进行着的争论：“马修斯(在描写内陆部落时)说女人都要割掉阴核，这是错误的，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在最初的年代里，塞拉勒窝内的情况在英国几乎没有什么报导。这并非出于对非洲的冷淡，在十九世纪，塞拉勒窝内是经常出现于消息报导中的；这是由于当时英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塞拉勒窝内殖民地的最初年代，正好和后来发展成为欧洲战争的法国革命处于同一时期。这些重大事件的消息传到西非以后，克拉克森于1792年曾写信给拉斐特，信里说，万一英国“邪恶”到要干涉法国对抗德国的战争，那末，希望拉斐特利用自己的影响“取得一项命令，使你们的船只不要来干扰我们这块殖民地”。英国于1793年参战。同时，在法国，左翼雅各宾派无裤党人取代了象拉斐特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即使到了1794年，雅各宾派的首领们已被推翻以后，由雅各宾派的水手操纵

的船只，仍在公海上来来往往，寻找革命，亦即寻找劫掠的机会。

1794年9月，有七艘这样的船来到了塞拉勒窝内海边，其中有一些是俘获的英国船，但全部都伪装成英国船的样子，因而殖民地起初并不吃惊。但当它们在9月28日靠近海岸时，麦考利看到有一艘巡洋舰上的人将一尊大炮对准了他的广场。移民们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样一支舰队，因而就投降了，扯起了停战的旗子，但是法国人回答他们的却是一排排的步枪子弹和葡萄弹，杀死了一个新斯科舍女人和一个小孩子。到上午10时，法国人停止了射击，带了一个名叫纽厄尔的美国奴隶贩子一同登陆。这个家伙对移民们抱着满腔的敌意。麦考利在日记中写道：纽厄尔“在六、七个几乎是怒气冲冲的无裤党人陪同之下，来到我的屋子里，把一支手枪对着我，破口大骂，要我立即满足他的要求：把他那里逃到我的保护之下的奴隶交出来”。麦考利不理睬纽厄尔，他走到最靠近的法国军官跟前，要求见他们的司令官。这个司令官请麦考利在他的船上吃饭，却解释说，他不能够控制他的船员们。这些无裤党人的样子使麦

考利既感到震惊，又觉得愤怒：“这些法国人上岸时既肮脏又褴褛；可是现在，其中许多人却穿上了女人的汗衫、长袍和裙子了。……我来到旗舰上一看，那场面更是奇妙：后甲板上拥挤着一批无赖，他们那种样子，简直是任何笔墨都无法形容的，在他们里面，竟找不出一个有一点儿绅士模样的人来。”

法国人在这里呆了两个多星期，在这一期间里，无裤党人的骚乱造成了五万英镑的损失。这些水手把他们革命的狂热行为集中在公司职员们的办公室和住家方面，他们甚至把总督花园里只要看来是美丽的或有用的植物全部砍掉。对于麦考利的每一个抗议，司令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公民，可能是这样的，但你是一个英国人。”阿夫济留斯博士写给瑞典驻伦敦的大使的信中说：“他们立刻动手打开房门抢劫，凡是他们不要的东西，就毁掉、烧掉或丢进河里。他们在田里、街上、院子里以至任何地方看到家畜和动物就全部杀掉，连驴和猫、狗都不放过。这种行动一直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直到把我们这个美丽繁荣的殖民地完全捣毁。”可怜的阿夫济留斯看到这些法国人不但

抢走了他的衣服、金钱和家具，而且更糟糕的是：

其他的东西，对敌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但在我来说却都是有相当价值以至有极大价值的，也整个儿给捣毁了，真使我感到遗憾，我看到这种景象，几乎要流下泪来。我那洁净而美丽的小花园几乎全给毁了，树木砍掉了，花草被连根拔了起来。我那些活的动物和鸟，一部分被吃掉了，另一部分被砍掉了脑袋丢在门外。我的藏书和我搜集的标本，包括动物、水果、花（保存在酒精里的），还有鸟类、昆虫、贝壳、作为标本的果实、种籽以及我的全部手稿，都被丢在地下，混在残羹剩饭、糖浆、甜酒、啤酒以及诸如此类的垃圾一起，撒满了一地。

司令官曾坚决声明对黑人移民是友好的，即使是那些无裤党人，最初也局限于攻击白人；但到了最后，劫掠所及，黑人也和白人一样受到了损失。一个来自新斯科舍的浸礼会牧师戴维·乔治写道：“他们总是把每个人的衣服全部拿走，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所以，他们把我的衣服也全部剥去……连一件替换的衬衫也不给我留下。我的妻子和儿女们，也被剥得几乎赤身露体。”

法国人的进攻，从物质上来说，对殖民地是一

次灾难；但看来倒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士气。正好相反，在无裤党人占领时期，那些欧洲人倒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坚忍性。麦考利被粗暴的无裤党人禁闭在他自己的屋子里时写道：“我们发现……这次事变给我们的损失很少。我们没有痛苦，我们既没有挨冻，也没有感到饥饿或口渴。总而言之，我们感觉到，快乐并不在于我们占有的东西多少。……现在我们又发现，人的思想对苦难要比对繁荣更能适应。”法国人离去以后，麦考利又写到那些黑人移民“在外表上对我们所有的人都表现了极大的好意；即使是最心怀不满的人，也从来没有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表示过侮辱的意思。确实，他们的行为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愉快。”

可是，法国人走后不久，殖民地又恢复了原样：不少新斯科舍人互相控告对方偷了他们的东西；麦考利控告别人盗取了公司的财物。麦考利意识到，长期的、疲劳的弗里敦的生活，使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在一封写到英国去的信中说：“我的健康情况本来是一般的，可是，我的模样已经起了如此大的变化，如果你见到了我，恐怕也要认不出来了。我的脸仍旧是那种热带的颜色，头发剪得

很短。我担心如果这种流放生活再继续五年，我将不适宜于跟任何一个女人交往了。女人……对我的鞠躬也将不屑一顾了。”

1795年5月，麦考利准备乘船回英国休假。别人象他这样长期住在热带而感到疲劳和思念家乡的话，一定是想在塞拉勒窝内公司中选一艘快速而相当舒适的船来航海的；但麦考利却选择了一条经过牙买加的路线，并决定搭乘一艘贩奴船来完成第一段航程。他选定的船是“安娜号”，它的航程终点是巴巴多斯。船长当即坚决声明，他的船装满了奴隶，没有余地再容纳一个旅客，更不要说这个旅客是塞拉勒窝内的总督了。其实，这个船长如果有先见之明，也就不至于和麦考利争论了。5月5日，麦考利付了船钱上船，给他准备好的是一个吊床。船长看到麦考利这样不舒适，也许倒在暗暗高兴，他“说他希望我不要因为吊床下而还睡着几个小奴隶而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他说：‘那种气味是不好闻的，但也只有几天功夫，等到我们驶进贸易风的区域，这种气味也就感觉不到了。’”

没有一个反对奴隶贸易的领袖人物曾经航行

过这一段从非洲到美洲的不名誉的“中程航线”^①的。但麦考利却尽量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搜集证据和数字。他经常做笔记，但为了把自己的思想隐蔽起来，不给无知的奴隶贩子知道，他的笔记都是用希腊文写的。船长也尽力掩盖自己的残暴行为，但麦考利是不容易受骗的：

5月7日：我看到一个女人带着手铐，问了一下原因。原来她最近曾企图跳海自杀，就是由于这样一种轻微的罪行，她受过一顿严厉的惩罚，而且至今还上着手铐，以此儆戒其他的人。5月23日，我看到奴隶们拒绝进食，那个值班的官员便拿九尾鞭来威胁他们。5月24日，船长叫奴隶们跳舞，但直到把九尾鞭拿出来之前，他们始终表示不愿意跳。

船长尽管对奴隶们是残暴的，但看来他对福音派的偏见也是有所了解的，因为麦考利不得不承认：“船长对我的态度是殷勤的和有礼貌的。为了尊敬我，当我在船上时，他从来不骂人，而且也不准官员和船员们骂人。不过，当我们到岸上去时，我发现他是十分嗜好骂人这种坏习惯的。”事

^① “中程航线”指非洲西岸和西印度群岛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黑人奴隶在这段路程中受到残酷的虐待。——译者

实上，麦考利发现巴巴多斯的生活几乎和在船上一样坏。他在继续登程前往英国之前，曾在日记中写到巴巴多斯人的品德“极坏”。

麦考利在休假期间，大部分的生活是跟他的姊姊和巴宾顿一起过的。有时也到克拉彭去作长时间的访问，在那里，桑顿和威尔伯福斯分享着他们那敬神的别墅，并招待那些被皮特贬称为“白种黑人”的、奴隶贸易的敌人。当麦考利还在塞拉勒窝内时，克拉彭派跟汉纳·莫尔以及她的几个同样是福音派的姊妹，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几个姊妹在布里斯托尔附近办了一所女子学校。麦考利仅仅访问了一次，就和莫尔姊妹们结成了亲密的朋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她们在布里斯托尔和巴思的家里的常客。在这里，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塞利纳·米尔斯的小姐。她是莫尔姊妹的学生，寄宿在她们家里，被她们看作是第六个姊妹。1796年，这是麦考利在恋爱中最不幸的时期。到这一年的2月间，他就应该回到塞拉勒窝内去了。他不了解塞利纳是否接受他的爱情，如果是的，那末毫无问题，他要把她作为新娘带到非洲西海岸去。他已经决定，甚至连再会也不说一声就溜走，

但莫尔姊妹们却坚持要他再去访问她们一次。

这个能够应付暴动的移民、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野蛮的酋长的男子汉，却在这满屋子的女秀才面前感到畏缩不前，不懂得怎样和她们打交道。他知道汉纳·莫尔了解他爱塞利纳，但他没有想到帕蒂·莫尔却带着“嫉妒的热情”来对待那女孩子，而这种感情必定也已经相当于爱情了。由于汉纳不愿意让自己的妹妹感到痛苦，因而就着手阻止麦考利向塞利纳求婚。这个没有计谋的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塞利纳已经接受了他的爱情。他竟然到汉纳那里去“要求她花几分钟时间谈一件事情……这件事对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汉纳却回答他说：“我看，还是不谈更好一些。因为，我恐怕，这将会增加而不是减轻你的不安。”但麦考利还是坚持要听一听真实情况，即使是令人懊丧的真实情况。这时汉纳便说，塞利纳对他完全是冷淡的，她的感情“并没有超过普通友谊的界限”。但事实上塞利纳是很爱麦考利的，所以，汉纳·莫尔的这几句话乃是弥天大谎。可是，正象从加尔文到列宁所有其他的情教徒思想家一样，福音派是不怕为正义而说谎的。

这一天的晚宴笼罩着阴郁的气氛。麦考利相信了塞利纳并不爱他，因而就避免和她谈话；莫尔姊妹们——人们可以这样假定——由于自己那种口是心非的罪过而感到良心的责备；可怜的塞利纳发现自己所爱的人在前往非洲的前夕竟对自己不理不睬。可是，爱神（或象麦考利自己所想象的，是上帝）设法拆穿了这几个姊妹的阴谋。麦考利在离开之前，正巧看到塞利纳在楼下的房间里伤心地啜泣。他立刻奔过去安慰她，并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而使他高兴的是，竟听到她说她同样也爱着他。他们俩就在当时当地订了婚。在此后他离开英国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的深厚的爱情战胜了热带的疲劳，也战胜了莫尔姊妹们的有增无减的怨恨。

麦考利从英国出发时和几个卫斯理教派的循道公会传教士同路，他们是到塞拉勒窝内的内陆去的。麦考利是从心底里重视他们的工作的。他在英国休假期间，就曾以很大一部分时间献身于在贫苦人民中传教的工作，并鼓励汉纳·莫尔写她的《给社会的中层人物阅读的故事》和《给普通人阅读的故事》等著作。可是，麦考利却不能赞扬

“卡利普索号”上的这六个传教士。他描写其中一人“虚有其表、没有头脑、傲慢不逊……他那种爱争论的癖性连他自己的一伙人都感到厌恶”。还在船上时，麦考利就预言说，那几个牧师的妻子脾气这样坏，这对他们的工作将是不适合的。果然不出所料，船一到弗里敦，这些女人就“迸发出苦恼的叹息或严重的埋怨情绪。使她们感到吃惊的是，弗里敦既不如伦敦，也不如朴次茅斯，她们看不到面包点心店，也买不到姜饼给孩子们吃”。

这些传教士很少能够在内陆呆上几个星期。其中有一个名叫雅各布·格里格的，甚至连一般的身体不好的借口都没有，就回到弗里敦来了。他和一个名叫约翰·加文的非国教徒中学教师结合在一起，对圣公会教派及其临时的代表人麦考利发动了一次挑剔性的对抗运动。当5月间有几个传教士要回英国去时，麦考利对他们这种玩忽职守的无耻行为感到非常震惊；但是有一个传教的技工向他表示了感谢，却又使他高兴地感觉到：“唯信仰主义并没有全部消除天然的感情。”麦考利对这些传教士的看法，很可能是带有圣公会教派的社会偏见的色彩，他们多数是出身微贱的非

国教派，但无论如何，大部分仍然是品质恶劣的。有两个被派到布洛姆海岸去的传教士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以致不得不去找当地的首长来作仲裁人。有一个名叫邓肯·坎贝尔的人是带着妻子一起来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容貌难看而说话带有可怕的苏格兰鼻音的人”，他叫她赤着脚去和非洲女人一起干活。几个月后她死了，坎贝尔便和一个非洲姑娘结了婚，并且变成了一个奴隶贩子。那些黑人传教士往往也是任性和令人讨厌的。当麦考利试图整理一下有关婚姻的民事法律使它与英国的制度统一起来时，新斯科舍人却把它看作是一种企图消灭不同派别的阴谋。

移民们对于宗教迫害的恐惧，是和对赋税问题的合理的埋怨情绪结合在一起的。新斯科舍人在 1791 年曾听到克拉克森的诺言：他们永远不必为他们在塞拉勒窝内的土地缴付税金。1796 年 6 月，听到公司方面宣布说将按每一畝每年征收一先令的免役税（事实上就是土地税）时，他们就记起了克拉克森的这一诺言。尽管浸礼会教徒同意缴付免役税，但循道公会以及其他较小派别的教徒们都表示拒绝缴付，这就使整个殖民地的极大

部分站到了反对的一面。尽管麦考利向移民们大声疾呼,对他们进行威胁、解释,但在他担任总督的整个时期里,没有人付过免役税。

麦考利的统治方法,是理性和粗暴无法分清的混合物。他存心要贯彻执行婚姻法、免役税等不受人欢迎的措施,虽然前者是不必要的,后者也只能带来有限的收入。他还会置法律于不顾,来打击他的私敌。他非法没收了加文的信件,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审讯,最后叫他上船回英国去。当谣传着由于征收免役税而将发生暴乱时,他就威胁那些头头们说,要把他们立刻绞死,即使“要我上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去受审也在所不惜”。他和克拉克森或夏普不同,他并不真正相信移民们有自治能力。他写道:“可怜的人民,真使人不得不爱他们。尽管他们有种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脾气,可是他们还有确实令人难以抗拒的热情。”他这几句话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恩人口气。有证据可以相信,他在私下一定粗暴地骂过黑人,只是不敢把它们写在纸上而已。

尽管如此,麦考利还不能说是有种族偏见的人。在他的塞拉勒窝内义勇军中,他任命黑人军

官担任白人士兵的上级。他对失职的白人的批评甚至比对新斯科舍人更粗暴。也许，象他这样一个罪恶累累而又痛恨自己的人，对别人是没有爱和同情心的。要是在当今的世纪里，他很可能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共产主义者；他残忍，怪僻，傲慢，擅权，枯燥而又热心，带领着那些他所藐视的人们去反对那造成他这样的人的制度。他那种自我约束的力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天不亮就起身，单独祈祷，读希腊文《圣经》，集体祈祷，然后从上午8时工作到下午7时，接着又是祈祷和读希腊文《圣经》，直到晚上10时，然后还用一两小时看“一些有趣的书”，直到入睡。

撇开麦考利作为一个新教徒的严重罪恶不说，在他的性格里还有一些卑鄙和有害的东西。在他于1797年2月写给塞利纳的一封信中，他描写到他怎样去访问一个将死的英国人：

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个人的愚昧无知，最可悲的证据是：尽管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可恶的罪人，反复不断地呼喊上帝的宽恕；但是当我问他到底是些什么罪过使他心上感到最沉重时，他却回答说无法明确地提出任何一种具体的罪恶。可是，我却毫无困难地给他

提出了无数具体的犯罪行为，并且告诉他，我自己就是这些罪恶的证人。我把这些罪恶以及它们的种种令人气愤之处都给他端了出来。“你甚至不知道怎样来向上帝祈祷，”我对他说，“你说你从来没有祈祷过，但我不是常常听到你亵渎了上帝的神圣名字，而且不知多少次为此而斥责过你吗？”他毫不迟疑地承认了我提到的这些以及其他的罪恶，可是他却完全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

麦考利向这个将死的人说了这些鼓励的话以后，便离开他，回到自己在小山上的房子去，这正是黄昏即将到来到的时候。

我向前走着〔他继续写道〕……回想着我刚离开的那个可怜的人，我深深地叹息一声。有时我又迸发出一种感恩的声音，那是因为我回想起了过去的一些时刻，那时连我自己也以为快要进坟墓了，我那清醒的理智所见到的一幕情景还远远地不如他哩——那时我只当自己躺在临终的床上，我自己也弄不清，我们那荒唐的想象为了好玩而施展的魔法，怎么会把我带到这个境地来的。“我的塞利纳，为什么要让一滴眼泪迷糊了自己的眼睛呢？抬起头来望着那远处的光明的归宿吧，在那里，千万个受到祝福的人们正围聚在上帝宝座的周围哩。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不，我

的塞利纳！这完全是爱情、幸福和快乐。呀，出现在我眼前的可是巴宾顿吗？你来得正及时，正好使我闭上眼睛，并从我手中接受一份宝贵的积蓄。我的塞利纳的保护人——我的——”不知道是由于我发出了一声不自觉的呜咽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声音，跟在我后边为我拿着弹药包的那个黑人小孩问我：“我的主人，你是累了吗？”“不，杰克，我不累，为什么你要问我呢？”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忽然看到一群蜂鸟飞过，它们那美丽的羽毛在夕阳中闪闪发光。他指着它们给我看。我举起枪来，怀着杀机对准目标，砰地一声火光直射，有两只鸟落在地上。最初，我还为我的武艺、我的机灵和收获而高兴；可是我又想到我没有办法在这山上把它们保存起来，在我到达镇上之前，它们可能就腐烂了。我这一行动，甚至也满足不了我那无聊的好奇心。“而且，我又怎么能知道，”我这样想着，“就在这个时刻里，这两只被害的雏鸟，是不是正在张嘴朝天伸长脖子等待着已经被我剥夺了的食物，它们那颤抖的身体是不是还在毫无希望地等候着母亲的温暖来保护它们不致受冻呢？”

这个冷酷的、可怜的人，不是那种能够在西非洲感到乐趣的人。他在1799年离开这里，这，不论对他本人或对整个殖民地来说，都是一件愉快的事。

第五章

到十八世纪末，也就是这个殖民地建立了二十多年以后，最初的 1787 年的移民已经和新斯科舍的移民混合在一起了。1800 年，塞拉勒窝内又吸收了第三批移民，这就是牙买加的马隆人。他们的历史是既邪恶又奇特的。1655 年，克伦威尔的军队把西班牙人赶出了牙买加，奴隶们就到这个岛的内陆的山上和浓密的丛林中避难。“马隆”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逃亡的奴隶”。他们形成了一支有纪律和有战斗力的游击军队，抵抗着英国的历次侵略。1739 年，牙买加政府和他们谈判成功，允许马隆人可以保持自己的领土和法律，交换条件是要帮助政府追捕从种植园逃亡的奴隶，每名给价三英镑。

马隆共和国最初倒还繁荣，它的首领都显耀地戴着银链和帽徽，经常接受岛上总督委任的官职。可是，1769 年英国把捕获奴隶的奖金从三英

镑削减到了两英镑,因而使马隆人受到了损失,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的迹象表明马隆人本身的堕落。爱德华·朗在他于1774年出版的《牙买加史》一书中指出:“这些黑人所散居的市镇虽比最初的时候多了一些,但由于死亡以及和种植园里的奴隶同居而不是马隆人互相通婚,他们的人数在日渐减少。”1795年,他们有两个人受到了牙买加当局的非法鞭挞,马隆人就发动战争,攻击了几处种植园,并杀死了派来抗击他们的英国士兵。英国将军乔治·沃波尔最后使用了古巴雇佣兵来追击并打败了马隆人;这些马隆人在不被遣送外地的条件下投降了。当代作家R·C·达拉斯曾一再重复当时流行的一个故事:马隆人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害怕英国派去进攻他们的一种恶狗;不过从达拉斯的同一本书中,我们看到马隆人也有狗,他们对狗并没有感到恐怖。若干年以后,马隆人坚持说,他们只是由于缺乏军火才被迫投降的。

牙买加议会破坏了自己的诺言,把马隆人放逐到了新斯科舍。正象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黑人退伍士兵一样,马隆人也埋怨新斯科舍的气候太坏,坚决拒绝把这块土地作为他们安家落户的地方。

他们向沃波尔将军提出了好几次呼吁书，并保证他们仍旧是效忠英国的。这时候，沃波尔已经辞去了职务，因为牙买加议会不尊重他的诺言。当乔治三世的儿子爱德华王子访问哈利法克斯时，他要求见见马隆人。他们的漂亮的风度和服装，使他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还告诉他，他们很希望能够参加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后来他们确实也帮助哈利法克斯建筑了一些防御工事。爱德华王子后来受封为肯特公爵，他就和沃波尔将军联合起来成了马隆人问题的代言人，使伦敦都听到了他们诉苦的声音。

马隆人送了一份呼吁书给亨利·桑顿，探询他的公司能不能把他们送到塞拉勒窝内去。桑顿虽然担心好战的马隆人对这块殖民地可能成为一种干扰的力量，但他也了解到，既然英国政府感到他们是一个麻烦的问题，财政部也就很可能会提供资金把他们送到非洲去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英国政府同意把马隆人送到塞拉勒窝内去，它从有关黄金海岸堡垒的决议案中抽出七千英镑的经费，派遣一支军队，并承担每年四千英镑的费用，最后又通过一个特许状，使公司对殖民地居民

具有全部的司法权。

1800年8月，有五百五十名自愿去的马隆人，搭乘运输船“亚细亚号”离开哈利法克斯。同他们一起派去的还有一支队英国士兵；不过马隆人在他们自己的长官的统率之下，遵守着他们原来的无可非议的纪律。

这个时候，塞拉勒窝内对于由道斯和麦考利所提出的免役税的抗议，正在日益高涨。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抱怨说，税率比听到过的任何地方的税率都高出五、六倍，比在同一时期建立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税率则高达五十倍。地耕得越好，税率增加得越大，因此连新任的总督勒德蓝也如此估计：在并非全部时间务农的移民中，实际上大部分都认为与其缴付免役税，还不如放弃那块土地。免役税最坏的作用是影响了殖民地的士气。不论是原来的移民或是新斯科舍人，他们到非洲来都是因为确信土地将归他们自己所有。对一个过去的奴隶来说，他们仍旧是在为自己的自由担心的，所以，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比生来就是自由的白人看得更为重要。对他们的土地课以如此沉重的赋税额，使移民们感到自己不过是公司的佃户

而已，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免役税的愤怒，在黑人移民中激起了更普遍的不安。在麦考利时代被忽视了的百户长和十户长，这时也开始鼓动争取实际的权力。他们要求说，应该任命新斯科舍人为治安官和法官；除了百户长和十户长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制订法律；外国人（指英国的白人移民）必须向黑人付税。勒德蓝向黑人移民们指出，他们中间没有人具有足以充当法官的法律知识；同时提醒说，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在法院中充当陪审员的权利。可是勒德蓝的努力并未见效。他的主张没有人理睬，他的论点被驳回了。勒德蓝认为还是谨慎一点，把事情拖延到马隆人来到以后再说。

马隆人并未及时到达。1800年9月3日，百户长和十户长发动了公开的暴乱，他们对有关财产、犯罪、纪律以及债务等问题，非法地公布了一套法律条文。他们规定：任何拒绝这些条文的新斯科舍人，必须立刻离开本殖民地。还有：“除了公司范围内的事务以外，总督和议会对殖民地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权过问。对站在总督等人一边而违反这些法律的任何人，均将罚金二十英镑。”

勒德蓝命令公司的雇员和少数效忠于他的新斯科舍人在桑顿山上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9月25日，这些效忠分子向叛乱者进攻，试图捕捉他们的首领。双方有过一次战斗，结果是各有一些人员负伤。比较激烈的叛乱者约占移民人数的六分之一，他们散到郊区去劫掠白人或效忠的新斯科舍人的边远的农场。绝大部分移民，虽然还没有准备战斗，但都倾向于叛乱分子而反对总督。

勒德蓝既不受人欢迎，效忠于他的人又只占少数，因而他认为必须使用军队，否则就将永远失去他的权威。这时候，托姆王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不得不在最近插手制止移民中间的争端。正好在勒德蓝调动军队准备战斗的当口，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艘大船，那便是“亚细亚号”。那些被旅程闷得发慌的马隆士兵很想打一仗，他们不久就击败了起义者，并把他们的领袖捉来交付审判。然后马隆人又到丛林中去追捕那些逃散的人，就象他们在牙买加山中追捕逃亡的奴隶一样。

1800年11月，从伦敦送来了一个命令，决定塞拉勒窝内成为由英国管辖的殖民地，它的法律地位和其他殖民地完全一样，只有一点不同，那就

是管辖权的执行者是公司而不是英国政府。百户长和十户长制度的取消，意味着夏普的理想连一点残迹也不存在了。这个已经退休的老人，继续在英国向公司提出种种忠告，诸如怎样运用十家联保制，什么是制造枫糖的最好方法，怎样保证马隆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可是大多数“圣徒”都已经对他们这个麻烦的殖民地感到头痛了。

按照威尔伯福斯的说法，新斯科舍人“干尽了一切坏事，仿佛他们是在巴黎训练和教育出来的彻头彻尾的雅各宾派似的。亏得有历届总督的最大程度的坚定、聪明、沉着的力量，否则是无法在九年之中阻止他们把殖民地搞垮的”。威尔伯福斯和其他董事们要求政府接管这一殖民地。据他们自称，公司已经在这上面花费了二十万英镑了。这个体制方面的改变是在1807年实现的，它使塞拉勒窝内变成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公司就在随后的几年中宣告结束。

从民营殖民地到官营殖民地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塞拉勒窝内来说是一段阴暗的时期。接踵而来的几个总督，面对着这一不值得羡慕的职位，不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就是表现出一阵子的

乱用热情。曾经在这一海岸上坚持了八年之久的勒德蓝写道：“世界上再没有一处地方比这里更适宜于克制多余的热情了。”麦考利之前在此当过总督的暴躁的道斯，后来又卷土重来了一个时期。休职海军军官威廉·戴伊上校在这里建筑了一座炮塔，还试图建立一个甘蔗种植园，这样空过了三年之后就死了。直辖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是托马斯·佩罗内特·汤普森海军上校，他把首都弗里敦改名为乔治敦——听起来不至太傲慢而又带有共和主义的味道^①——同时，也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又把币制从本地的元改成了英镑。“有许多事情是很可悲的，”他来到殖民地仅仅三天之后就这样写道。“欧洲人的习惯坏得无法形容。黑种的臣民比他们守秩序和正派得多。这个信教的殖民地不过如此：一方面是白种居民在烈性酒的作用下大吵大闹，另一方面则是新斯科舍人在高声地唱着颂歌。”

在十九世纪早期的那些年代里，几个白人官吏和至少有二十个黑人移民，离开塞拉勒窝内，去追求奴隶贩子的富裕生活了。免役税的计划是放

^① 下一任总督又把名字改回来了。

弃了，但移民们还是回避务农。马隆人也反对农业，因为他们对此没有经验；但他们尊重这一新的集体的法律。他们和最近被他们在战场上击败的早期移民结成了朋友。他们尽管坚持男人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但听到要废除这种习惯时，倒也并不反对。他们的熟练的军事技术，对保卫这一殖民地不受敌人侵犯是很有价值的。当1801年泰姆奈族进攻这一殖民地时，马隆人击退了他们，摧毁了托姆王的都城，并用刺刀冲杀吓坏了泰姆奈人。被征服的泰姆奈族中有一个人这样埋怨说：“你们不象别人一样打仗，不是开开枪就完事了，你们是刺杀他们，刺杀他们。”

如果不是由于废除奴隶贸易而使塞拉勒窝内的人口中增加了第四批、也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批移民——英国海军所解放的奴隶——这一块小小的直辖殖民地也许早已湮没无闻了。

第六章

今天晚上有一个女人说：“我和一只羊一样；咳，我还不如一只羊。我看到许多羊在一起走，它们在这里吃一点儿，在那里吃一点儿，它们满意了。可是，我总是有麻烦的事情，我不喜欢这，不喜欢那——我不满意，我的心比任何东西都坏。你看，我比羊更坏。《圣经》里把羊叫作邪恶的东西；而我，比邪恶的东西更坏。”

（引自塞拉勒窝内获释奴隶的传教士威廉·约翰逊的日记，1821年5月28日）

经过二十五年来“圣徒”们的运动，议会在1807年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在英帝国范围内进行奴隶贸易。由于这种贸易多数是在英国船中进行的，所以，这一法案也就意味着威尔伯福斯、夏普、克拉克森兄弟、麦考利以及桑顿等人在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里为之奋斗的目标，获得了胜利。奴隶贩子和种植园主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

对：种植园主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和我们一起反对过法国人；奴隶贸易是英国海军的温床；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将由于穷困而被迫移居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土地上去；而且由于其他国家可以来打破封锁，因此这一法案能使英国陷入穷困，却不能改善黑人的命运。

1808年3月，“圣徒”们又获得了第二次胜利：英国枢密院发布了一项命令：在弗里敦设立一所海军部高等法庭分庭，对悬赏捕获来的贩奴船进行审讯和判决。这一曾经引起这么多忧虑和失望的殖民地，终于得到它应得的地位，成为向奴隶贸易作斗争的基地和获释奴隶的避难所。这种获释奴隶，使这一殖民地的人口从1807年仅有的两千人增加到1850年的将近五万人。塞拉勒窝内也就成了有关奴隶贸易问题的争论的焦点；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为止，这种争论一直在向白热化发展。福音派坚持把这一殖民地看作是黑人也能成为自由的和信仰基督教的国民的榜样，而奴隶贩子们却攻击说，这是一个腐化堕落和疾病流行的地方。互相对立的双方的新闻记者，对塞拉勒窝内所作的报导，竟然如此不同，以至读

者很难相信他们所访问的是同一个地方。就象今天的古巴、南非或南越一样，小小的塞拉勒窝内不由自主地被拖进了一场更大的、远距离的争吵。

奴隶贸易被宣布为非法之后，英国海军的船舰立刻就在从几内亚到加蓬之间的贸易河口上设立了一道封锁线。英国海军的军官们，对于他们设法去压制的奴隶贸易，就个人而言，并不是都抱着敌意的。那一时代最伟大的海军军人纳尔逊勋爵写道：“我是由优秀的老法学校哺育出来的，它教育我们要看重我们在西印度的领地的价值。只要我还有胳膊能为保卫它们而战斗，还有舌头来驳斥威尔伯福斯和他的伪善的同盟者的可恶的、残暴的教义，那末，不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在议会里，领地的权利是决不容许受到侵犯的。”

吸引海军去追捕贩奴船的，与其说是利他主义，还不如说是贪婪的利己主义^①。任何一个船长，只要他能够缉捕到一艘贩奴船，把它带到岸边并使船主在海军部高等法庭分庭上被判有罪，那

① 对奴隶贸易的辩论，在最近有关罗得西亚的辩论中产生了遥远的回声。人们在怀疑，如果对每缉获一艘货船都给予一笔奖金的话，英国海军恐怕就会采取更有效的封锁来支持英国的制裁政策。

他就可以要求相当于这一船奴隶的价值作为奖金。在1807至1816年这几年之间，英国海军部付给这些船长的奖金将近二十万英镑。1818年，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也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它们也相互授权对方的海军去拦截贩奴船，这样一来，追捕贩奴船就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了。于是，在弗里敦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相应港口，都设立了国际混合法庭，专门审讯缉获的船只。对这四国的委员的工作，所付的薪水是很大的。弗里敦的英国法官的年薪是三千英镑，他的副手是两千英镑，书记官是一千英镑，此外还有很可观的消费津贴，任职六年以后还有一笔酬金可得。这一笔为数庞大的薪金和缉捕奖金一样，都是从议会表决通过的拨款中支付的。

连奴隶贩子也从这一法案中获得了利益。当时美国的种植园中还存在着奴隶制度，还需要奴隶，因此部分的封锁只会抬高这种商品的价格。塞拉勒窝内总督于1817年写道：

同废除奴隶买卖之前的任何时候比较起来，现在似乎有更多的船只被雇来在赤道以北运输奴隶……从被雇在海岸一带来往的商船主人的一致的报告中，我得

知他们的航行情况很糟，他们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完全由于海岸一带的奴隶买主太多了。因为那些土人感到用奴隶做交易更方便，也就不必去设法找寻其他的物资来交换欧洲的产品了。

当奴隶贩子感到西海岸和刚果一带的封锁危险性太大时，他们就南下来到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从那里选取南面的一条较长的路线航行到美国去。这个法案非但没有减轻“中程航线”的残酷性，相反地倒是鼓励了奴隶贩子在船里多装一些人。有些在塞拉勒窝内获释而自由的奴隶，由于曾被硬塞在极坏的货舱里，以至永远不能再直立走路了。

英国的奴隶贸易的辩护人，假装非常关心黑人的幸福，他们争辩说，奴隶们在贩奴船货舱中受到的痛苦，要比在解放他们的海军船只中受到的痛苦为轻。贩奴船为了逃避英国的巡洋舰，在建造时就要求航行的速度特别快，如果遇到顺水顺风，它们能在四至六星期内越过海洋到达巴西或加勒比海。而速度慢的英国船（据《布莱克伍德杂志》这样辩称），则需要经过十星期或十二星期才能“战胜风浪到达塞拉勒窝内的死亡窟”。即使到达了塞拉勒窝内，奴隶们还必须在船上停留达三

个星期之久，等待法庭证明这艘船确实是合法的缉获物。葡萄牙人还告诉奴隶们说，英国人会把他们卖给吃人的生番，因此那些奴隶往往宁可跳进海里淹死，也不愿在这个“自由的省份”登陆。

在塞拉勒窝内获释的奴隶，得到了棉布衣服的供应，被安置在现在的医院附近的国王广场上，这里在当时是作为难民营使用的。这些解放了的非洲人——或被称为获释奴隶——往往在释放后惊魂未定的情况之下，表现出一种冷淡或不知感恩的心情，但他们对真正慈爱地对待他们的任何人，却是铭记在心和知道感激的。人们可以从下面这一段由一个同情他们的证人所写的话中看到：

当几个英国缉捕船上的官员到广场去访问时，有些曾经受到他们保护的人显然是感到高兴的。有一次，把船上储存的山芋和胡椒等运到国王广场去时，伴同水手们前去搬运食物的，恰好是个黑人水手长，他是一个模样长得极丑的克鲁人，绰号叫“啤酒瓶”，把奴隶们送到这里来时，曾经在船上当过他们的管理人。当奴隶们认出了这个丑陋的“啤酒瓶”的欢乐的脸容时，大家立刻就从广场的各处奔了过来，围在他的四周，笑着呼喊他的名字。妇女和孩子们都挤到他身边来，

至少有十来个人来和他握手或抱住他的胳膊和膝盖，一个小女孩爬上他的背脊去吻他，女人们温柔地替他抹着脸上的汗水，群众对他如此喜爱，挤得他几乎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即使是有病的人，一听到他们的朋友的名字，也都从席子上爬起来，蹒跚着从棚屋里走出来欢迎他。当慈爱还没有力量来减轻他们的不幸的时候，他曾经是对他们慈爱的人。在当时当地，这种感恩的心情确实是非常动人的。

英国政府指定塞拉勒窝内作为这些获释奴隶的收容地，它的意图是使他们成为这个殖民地的公民。可是，这批新来的移民缺少象第一批移民、新斯科舍人以及马隆人那样的教育和熟练技术。他们大多数是从农村里被卖出来当奴隶的；他们不懂得英语，不习惯市镇生活，而且几乎都是没有知识的或不识字的。有许多是违反了部族的法律，犯了罪而被贬作奴隶的；但这也不足以证明那种所谓所有的获释奴隶都是罪犯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塞拉勒窝内的敌人中是很流行的。

对年轻的获释奴隶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们都被送到学校里去学习英语。不少人到移民家庭里去当学徒或仆人。更多的年轻人则被征募到英国

的皇家非洲军团中去当兵。获释奴隶虽然也有一些留在弗里敦本地，但大部分聚居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些新来的群众往往按照原来所属的部族聚居在一起。例如有一个地方就叫作刚果镇，还有一些村子则居住着人数众多的伊博人和约鲁巴人。来自现在的加纳所在地的阿散蒂人，是被马隆人当作同胞兄弟来欢迎的；马隆人声称，他们的祖先也来自这一地区。

截获贩奴船的奖金，英国海军船只的服务与供应，为获释奴隶提供的衣服和粮食，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上的商业繁荣，所有这些，给许多冒险的英国人带来了财富和机会。从阻止奴隶贸易的活动中赚钱最多的人，是扎卡里·麦考利和他的家属；这在殖民地的朋友们来讲是一种不幸，而在它的敌人来讲却是一件快事。这个前塞拉勒窝内总督，现任虔诚的《基督教观察家》月刊的编辑，他是申请奖金的英国海军的船长们在伦敦的主要代理人。他的堂兄弟乔治和肯尼思·麦考利是当地的两个主要代理人，他们经营着扎卡里商行的弗里敦分行，招牌叫作“麦考利—巴宾顿”。不管他们是否利用了“圣徒”们的势力而赢得那些可喜的

合同，总之这三个人都在代客接洽奖金中靠收取佣金发了财。而且，肯尼思·麦考利还担任着收税员和获释黑人管理员的肥缺。在他休假期间，这个工作总是交给他的兄弟乔治担任的。作为获释黑人的管理员，这两个人都掌握着购买粮食的大权，而这些粮食往往都是从“麦考利—巴宾顿”这家商行里购买的。特别是肯尼思·麦考利，他热心于利用公职的地位来满足私人的目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混合法庭中担任辩护人的职务，但他还申请当法官。他为了发展买卖，还鼓动过一次土人的战争。1826年担任代理总督时，他大权独揽，签署了这一殖民地中的全部承包合同，其实他本人就是其中最大的承包人。甚至前任总督的尸体都要用“麦考利—巴宾顿”商行的甜酒来涂抹。除了滥用职权的问题不谈，麦考利兄弟在经营商业中使用的手段也是很有问题的。由于他们对弗里敦地区的房地产拥有多至五十笔的抵押权，因而就能抬高房屋的市价。由于他们对殖民地的零售商业具有接近于专卖的权利，在伦敦售价为五先令的一件衬衫，在麦考利的一家店铺里就要卖十五先令。

奴隶贩子的朋友、“圣徒”们的敌人以及对塞拉勒窝内感到不满的官吏和商人们，兴致勃勃地联合起来攻击麦考利家族。第一次也是最有效的一次进攻发生在1815年，那是由一个脾气暴躁的爱尔兰律师罗伯特·索普发动的。他原来是殖民地法院的院长，刚刚被开除了职务。他在一封公开《致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信》中，控告扎卡里·麦考利是“殖民地中最大的商行老板”，是靠了为塞拉勒窝内公司及其后身非洲协会服务而获得地位和财富的。至于对那个获释奴隶的管理员肯尼思·麦考利，索普则控告说，他对“他所管理的黑人进行最残酷的迫害和惩罚，他有时听任他们几乎饥饿致死，有时候则放任他们的医院极端玩忽职务”。索普还补充说，肯尼思·麦考利把基督教的训诫置之度外：他鞭打黑人妇女，让她们赤裸着身体乱跑，还把她们送到妓院鸨母那里去学生意。

非洲协会的理事们对索普的控告印发了一份很长的答辩书，里面引用了原信中他的于己不利的文字，并争辩说，他在这一殖民地上呆的时间不够长，对于它的各种问题，他讲的话根据不足。对理事们的这一答辩，索普又“逐点”地作了回答，他

在某些细节上进行了有效的反击，但对自己比较软弱的论点则略而不谈。同年较后的时期，扎卡里·麦考利也参加了这一场争论，他以一些好象有理由的话对索普的品格和行为进行了抨击。不过，他对自己那种做买卖的手法，却无法自圆其说。他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写道：“我的职业是经商，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则可以禁止我在非洲，或在有相当利润可图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从事这项职业……不错，我曾经为几艘缉获船发给奖金，但我不曾主动申请来做这件事，也不曾为取得总督和驻军的代理人的地位而提出过任何申请。”

对麦考利家族以及一般地对塞拉勒窝内的攻击，在以后的十来年里一直在各种报纸上继续不断地进行着。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们，曾花了一万五千英镑，叫一个名叫詹姆斯·麦奎因的人写文章来攻击塞拉勒窝内^①。1826与1827年间，他发表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连载文章中，把塞拉勒窝内说成是一个腐败的、疾病流行的窝子；

① 麦奎因并不声明他对写塞拉勒窝内的文章有兴趣。在这一点上，他很象现在的那些宣传顾问，他们专门代替外国政府给报纸写文章，同时又装作只是一个对此并不感到兴趣的公民。麦奎因如果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在这种丑恶的行业中发财的。

在那里，“对犯罪的黑人最普通的惩罚就是鞭挞，没有任何法律来限制这种做法。他们被缚在马车后面，在弗里敦全城边拖边打，或者在某一特定的地点绑在柱子上打，一般用的都是粗大的九尾鞭”。肯尼思·麦考利曾发表一篇答辩的文章《为塞拉勒窝内殖民地辩护》，指出麦奎因的攻击中包含了无数的谎言和歪曲。这一殖民地，同海岸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卫生，如果说有些传教士会死在那里，那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气质带有病态的缘故。

自1823年开始，扎卡里·麦考利把商行的实际管理权交给肯尼思和他的外甥托马斯·巴宾顿。这两个人是如此放浪，到1826年，商行实际上已陷于破产的境地。卖不出去的货物在弗里敦堆积如山，新的厂建造好了却丢在那里不用；白白的放了许多债，从来也没有收回过。最后，商行终于倒闭，扎卡里必须承担偿付所有的损失。这位《基督教观察家》的编辑，“惩恶劝善协会”的创始人，前塞拉勒窝内总督以及唯一受到威灵顿公爵喜欢的“圣徒”，只得逃到国外去躲避他的债权人。他死于1838年。

象塞拉勒窝内这样一个小小的殖民地，往往

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总督的性格所左右。移民们由于象克拉克森这样一个和蔼的人而获得了信心，他们在象麦考利这样一个冷酷的人面前感到畏缩寡欢，他们对于象勒德蓝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则表示藐视和进行欺骗。自 1814 年到 1824 年，他们在查尔斯·麦卡锡爵士的统治下感到安乐。麦卡锡是一个公正而可爱的人，弗里敦的人至今还记得他，把他当作是最好、最聪明的总督。就他的经历而言，作为殖民地的总督是很不典型的。尽管他的名字象英国人，他的出生地却是法国，父母都是法国人，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渡海投到英国这边来的。1811 年，他参加了英国皇家非洲军团，驻在塞纳加尔时，接到了新的弗里敦的职务的任命。他的生活方式和“圣徒”们相去很远。他喜欢交际性的集会，为人非常欢乐；尽管他要求在伦敦的人为他找一个合适的妻子，事实上他却更喜欢他的几个黑种情妇。而最奇怪的是，在这一福音派的殖民地上，麦卡锡却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在心底里始终忠于罗马。

麦卡锡相信，教化获释奴隶的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组织成一个个村落，由一个传教士来进行

教导。搞这种工作的传教士，都是他从威尔伯福斯、桑顿、麦考利以及其他福音派于 1799 年创立的“英国行教会”中找来的。“英国行教会”（实际上从 1813 年开始才正式使用这个名称）开始时只是在非洲内陆的土著中进行工作。由于效果不大，才转而面向解放了的奴隶，认为使他们改信基督教要容易一些和有效一些。“英国行教会”是圣公会的一个机构，因而比那些较早的非英国国教团体更富裕、更有势力。经过对财政部的敦促和麦卡锡的一再鼓动，终于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由“英国行教会”物色传教士，由麦卡锡把他们作为政府职员予以雇用。这些人不但要当传教的牧师，而且还要当获释奴隶村落里的学校教师、行政管理者和司法官。

“英国行教会”早期派来的牧师，绝大多数是有德国血统的人，因为适合这种工作的英国人已被非洲有热病的名声吓怕了。在“英国行教会”最初派出的五十个人当中，五年之内就死掉了二十五人。有一个名叫托马斯·海韦的传教士在一星期内就死了；他为了确保无人破坏安息日，在星期日穿了太紧的衣服，整天跑来跑去检查，这可能就

是他致死的原因。那些没有害热病死亡的传教士，在拯救灵魂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这给予英国的虔诚的人们以很大的鼓舞。每年，有很多福音派的教徒付给“英国行教会”五个英镑，以求在新信教的奴隶中，有一个人受洗礼时用他自己的名字作教名。“英国行教会”发表的历史书和小册子，对于黑人的虔诚讲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你的心感到怎么样？’有人问一个获释奴隶。‘老爷，’他回答说，‘我的心不在这里了；我的心在那里，’他用手指着天空！”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个名叫威廉·约翰逊的，他的虔敬的事迹在英国的教堂和主日学校里成了广泛流传的故事。他是个德国人，尽管他有一个英国名字，但他讲的英语却如此糟糕，连麦卡锡都不容易听得懂，然而他却是第一个出去当教师的人。他定居在里靳特。这是新建立的获释奴隶村落之一，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伊博人。他们的虔诚到了狂热的程度，有时连约翰逊都对此感到震惊。有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进行祈祷礼的时候，到处都是呼喊声和祈祷声，因而我不得不停止祈祷，指定一支颂歌让他们唱，但

是没有效果。我劝他们静下来，指定一段《圣经》叫他们读，接着又指定了一支颂歌，但是全没有用。绝大部分的会众都跪着，大声呼喊 requesting 上帝宽恕……从此以后，我不得不想些办法来防止更多的干扰，因为有时候我仅仅提了一下耶稣的名字，立刻就会听到一片呼喊的声音。

使黑人的朋友们听到后感到赞许和敬畏的是，约翰逊的村子里十分尊重安息日的情形，以及这个村子里的居民有一天看到白人骑马出来游玩时感到十分震惊的情形。约翰逊在1820年写道：“我告诉他们（那些骑马来访者），他们任何时候来，我都欢迎，但看到他们破坏了安息日，却使我感到极度的遗憾。这些客人并没有回答我的话，但有一个人却对我的小马说了许多埋怨的话，因为它从牧场里出来踢了他的马。布尔先生（另外一个传教士）当时也在场。他说这匹马是笃信宗教的，它不喜欢看到绅士先生们破坏了安息日。”这一类笑话甚至使福音派都会笑起来的，但是最好的笑话却莫过于用滑稽的或老爷的口吻讲出来的黑人虔诚的故事。

在麦卡锡的统治之下，商业和宗教一样地繁

荣起来。每一船装来的获释奴隶都需要更多的粮食、衣服和住处，商人们都抬高价格来供应这些东西。混合法庭的官吏和最近在弗里敦建立的皇家非洲军团的军官们，对进口的食品和奢侈品都付出了比伦敦高出好几倍的代价。由于更多的商人知道了这种好机会，弗里敦的白人人口也就从二十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人。河流上游的木材业每年需要有五十艘船来装运价值四万英镑的产品到伦敦去。新的财主们造成了社会的进步。理发店和成衣店都开设起来了。还有一家旅馆，一个俱乐部，一家报馆以及其他戏剧和赛马活动，供弗里敦时髦的上流社会消遣娱乐。

多亏麦卡锡以哥特式建筑的保护人自居，弗里敦石头建筑的数字从六座增加到六十座。在他任内建设的公共建筑有：一个获释奴隶收容所，一座仓库，一座装有时钟的市政厅，从沃特街到码头去的一道石级，另外还着手兴建了圣乔治教堂，也就是后来的那座难看的大教堂。他说服英国政府把建筑补助费从每年四千英镑增加到一万英镑。到结束总督职务时止，他已在公共建筑上花了十五万英镑。政府对此也有些怨言，但它对麦卡锡

还是尊敬的，在 1820 年还给他封了爵位。

从气质上来讲，麦卡锡是一个旷达的、积极的人，他希望不但要建设一个城市，而且还要在各处建立帝国的统治。身为塞拉勒窝内的总督，他还照顾着非洲西海岸上各地的英国利益。他经常出去镇压土人的起义和保卫英国殖民地的利益。1824 年，他西航到现在称为加纳的海岸角，发现那里的驻军正在准备向阿散蒂族发动战争。勇敢而粗心的麦卡锡参加了这一次进攻，可是英国的军队在这次战役中被歼灭了。阿散蒂人砍掉了麦卡锡的头，却把他的脑壳留下来作为呪物，在每年的薯蓣节展出。

麦卡锡死亡的消息在弗里敦引起了哀悼。欧洲人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精明的总督，他给殖民地的经济带来了新的生命。黑人尊敬他，因为他为人公正，同情他们的心情，而且没有种族偏见。他常常把政府的工作交付给有能力的黑人，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而且他还爱过不止一个黑人姑娘。

若干年后，有一个访问塞拉勒窝内的人遇到一个来自歇尔布罗地区的非洲人，那人对于总督

查尔斯·麦卡锡勋爵说了这样几句简单的、类似墓志铭的话：“麦卡锡活着，我到这里来生活；这个人太好了；他让人人有很多工作，很多银元，很多笑声。麦卡锡死了，我也走了——回到歇尔布罗乡下去。”



第 二 部 分

第一章

我们感到的第一个差别就是肤色的差别。……肤色，不就是构成两个种族的不同程度的美的基本因素吗？白人以深浅不一的发红的脸色来表现各种情绪，这种红与白的巧妙的揉合，不是要比黑人的那种永远千篇一律的脸色，比那块遮盖着一切感情的、摘不掉的黑色面纱要好一些吗？此外，还有那飘垂的秀发，更为优美匀称的身材——那都是黑人自己赞美白人的评语；敢情他们都一致喜欢白人，就象森林人喜欢黑人妇女胜于其本族妇女一样。

（引自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札记》，1782）

回到非洲去的运动开始于英国，但是自由黑人在新生的美国处境更困难，遇到的问题更复杂。美国的黑人有好几十万。甚至在独立战争以前，许多美国人就耽心日益增多的奴隶的社会影

响。1772年，弗吉尼亚州议会就曾请求英王制止买卖非洲人，因为“我们有极多的理由耽心〔这种买卖〕将危及陛下的美洲领地的存在”。但是由于北方各州在实际买卖中发财致富，而南方各州需要奴隶作为种植园的廉价劳动力，这项请求落空了。这些利益的代表者取消了在《独立宣言》中本来打算提出的禁止奴隶制度的主张。正如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所回忆的：

谴责奴役非洲居民的……句子，为了照顾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需要而删去了。他们从来不打算禁止奴隶的进口，而且相反，他们仍想继续进口。我相信，我们北方同胞在这种谴责下也感到有点触到痛处；因为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奴隶，但是他们曾经是很重要的奴隶输送者。

杰斐逊的统计数字搞错了。在独立以前，北方的奴隶跟南方的奴隶一样多，直到1790年，只有马萨诸塞州禁止了实行奴隶制。但是，为新赢得的自由而欢欣鼓舞的许多美国人，意识到了奴役黑人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许多主人释放了他们的奴隶或允许奴隶赎买自由。这样，没多久，就形

成了一个自由黑人新阶级，而且在独立后的四十年中，这个新阶级的人数增加了五倍。许多自由黑人喜欢聚居在北方的城镇。他们在那里，象现在一样，形成了一个贫穷和不满的黑人区。但是他们的人数，在南方各州也在增加。弗吉尼亚州的自由黑人，在1780年是三千人，1790年是一万人，1810年是三万人。南方的白人把这些自由黑人看作是对奴隶有不良影响的人，而在北方，甚至非常好心肠的白人也把自由黑人叫作“流行的瘟疫”，抱怨他们态度“傲慢”，以及他们习以为常的“无知和犯罪”。自由黑人的领袖们据理辩护，认为他们贫穷，他们没有学校，他们通常都是白人剥削的对象。这些人得不到与穷苦的白人工人一视同仁的待遇，又没有黑奴的那种免费供应食宿的条件，他们的命运是极其不幸的。

这时，北方反对黑人的偏见也象在南方一样的顽强。研究独立战争时代的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写道，北方报纸上出售奴隶的广告和通缉逃亡奴隶的广告，“措辞用字象原来南方各州在两三代以后通用的措辞那么坏，甚至还要更坏

些”。^①

北方白人态度的转变，部分地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的这种转变，后来表现为废奴主义运动。南方需要不熟练的劳动力来耕种大规模的种植园；同南方相反，北方全靠小规模的家庭农庄，而且越来越依靠机器制造业。这种比较细致复杂的劳动，无需使用奴隶，而且使用奴隶恐怕反为不利。北方的大多数奴隶都是做家务仆役，自由没有给他们的经济状况带来什么变化。解雇和挨饿的威胁对自由黑人说来，几乎同奴隶挨打的威胁一样可怕。

到十八世纪末，对北方白人的另一个强大影响，是福音派狂热的广泛传布。圣经会、主日学校联合会、传教会以及禁酒同盟，在北部和中部各州

①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在他的《美国黑人的移殖》（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中引用了波士顿1771年1月4日《大陆新闻和每周广告》（《Continental Journal and Weekly Advertiser》）上的一则广告：“待售，非常理想的黑种女侍，十七岁，可以保证她是强壮的、健康的、性情温和的，她不知自由为何物，她做惯了一个农场主的厨房和牛奶棚的活计，没听说有什么缺点。但是她怀孕了，这是她被出售的唯一原因。”看来，这个黑种女侍大概是经常睡在农场主的床上的。

风起云涌。一心要做“慈善”事业的人们，救护孤儿、触礁的船员、城市贫民或受迫害的犹太遭难者；而另一些人就更严格了，公开抨击酗酒、跳舞和不守安息日。美国的福音派，同大西洋彼岸的“圣徒”一样，是白人中最先关心穷苦黑人处境、最先提倡移民的，在当时，就是移到西非的移民区，最后，这个区域就发展成为利比里亚。

移民这个设想，作为解决自由黑人问题的方法，是在独立战争以后不久首次提出讨论的。有少数人提议把黑人送到西印度群岛、佛罗里达或路易斯安那，这些地方当时都是在欧洲列强的统治之下；但是多数殖民主义者赞成英国人的主意，即在西非建立移民区。其中有一个富有的、而且多少有点浮夸的教友派信徒，名叫威廉·桑顿。他去过英国，并且结识了几个主要的“圣徒”。他想要把“圣徒”们的设想用之于美国。他写道：“我在1786—1787年的冬天，旅行于罗德艾兰和马萨诸塞州。我遇到了许多自由黑人，因为我同伦敦塞拉勒窝内协会的某些会员向来有通信关系（我在这个协会里有一些朋友），所以我很想知道，在马萨诸塞和罗德艾兰有多少自由黑人是愿意到那个

移民区去的。”他宣称有几百个自由黑人集会，听取了他的提议，而且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有两千人准备跟他到西非去。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相信他们能给移民们提供船只、装备和食物。然而，当桑顿说明了非洲是解放了的奴隶们的目的地时，“议员们表示不愿意把他们送出美国国界，而想在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穷乡僻壤的最南端建立一个国内移民区”。

当然，桑顿阻止了这项计划，因为这项计划会使不幸的黑人很快地死于箭矢和战斧之下。他反对在美国国内的任何移殖。他问道：“在他们（指自由黑人）的同族中的多数人仍处在奴隶制之下的国家内，他们能享有平等的待遇吗？”

在罗德艾兰州的新港，有一个名叫塞缪尔·霍普金斯的公理会的牧师，也很关心自由黑人的命运。甚至在独立战争以前，霍普金斯就打算派黑人传教士回到非洲去，而且对好几个黑人进行了神学教育。塞拉勒窝内的新闻报导增强了他的这种热情，他在1789年写信给格兰维尔·夏普：

当我搬到这个市镇的时候，我很快就注意到奴隶贸易问题，这种奴隶贸易很久以来就在这里进行着，而且

现在还在进行着……据我当时所知，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这种贸易和对非洲人的奴役。但是，后来我读了你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著作，感到非常满意，我相信这些著作中有一些是在上述的时间以前发表的……有许多我认识的虔诚的黑人，愿意另组一个教会或宗教协会，委派一个黑人作他们的教士，然后同所有愿意跟他们一起迁移的黑人到非洲去……这项计划，我已经考虑了好几年，我也很想努力促其实现。但是，在美国还没有实现这一计划的途径；派一条船，运送一批黑人，去非洲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作为移民区吧，支付船费的办法却还没有找到。同时，我们很高兴地知道，这样一种计划已经在英国提出并付诸实施了。

横渡大西洋的邮件在当时是很慢的。在霍普金斯的信到达夏普手中时，从塞拉勒窝内来的消息是很令人沮丧的。夏普在回信中，不得不承认塞拉勒窝内的多数白人居民已经离开当地去搞奴隶贸易了，但是他欢迎任何美国黑人加入他的殖民地。霍普金斯的计划落空了。罗德艾兰州议会象马萨诸塞州议会一样，不准备资助任何国外移殖；而且，另外一些牧师还敌视霍普金斯，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一个空想家。

当时，美国的风气是反对向外冒险的。当战争和革命在欧洲猛烈进行时，美国人很庆幸他们自己远离在一旁。当时离 1776 年也才不久，美国还没有开始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初自由黑人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虔诚的美国人才开始酝酿在西非建立移民区的想法。1815 年欧洲战乱结束，这个想法才成了好象是有道理的计划。新泽西州的罗伯特·芬利牧师是一个精力充沛又有家财的福音派。他在 1816 年决定从事于殖民事业，并聘请了一个年轻的牧师塞缪尔·约翰·米尔斯，作为巡回募款人。他们向传教会和圣经会宣传，同自由黑人讨论移民的想法，征求那些去过非洲的人的意见，最后，在 1816 年 11 月准备创立美国殖民协会。他们还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把总部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迁到政府所在地华盛顿。

建立塞拉勒窝内的英国“圣徒”们有足够的财力和势力，他们以私人的力量来资助他们的冒险事业，只是偶尔才向财政部领取补助。美国殖民主义者则从一开始就认为他们必须得到政府的财政援助。他们是有希望得到这种援助的，因为到

1816年，多数政治家已象道德家一样关心怎样安置自由黑人了。《独立宣言》发表以后仅仅四十年，种族问题和奴隶制问题就成了美国的最具有不吉之兆的问题。

奴隶贸易终止后，奴隶制远未废除；由于棉花价格的惊人高涨，奴隶制更有所发展了。美国出口的棉花从1790年的十三万磅增加到1800年的三千五百万吨。象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这些产棉州，土地和奴隶的价格大大上涨。在另外一些蓄奴州，如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大多数奴隶都是用于家务劳动而不是用于种植园劳动；但是这些州的政治家们也倾向于同情他们的南方内地的朋友们。

反对奴隶制度作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有所发展，但是北方和南方之间在其它问题上早在1800年就有所争论。北方的工业家赞成高关税以保护他们的弱小工业；而主要靠出口农产品的南方人，则希望保持较低的关税。北方人倾向于权力、英国、和平和殷实的财政；南方人偏爱民主、法国和强硬的对外政策。这些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又与对奴隶制是非善恶的

不同看法纠缠在一起，后来在密苏里问题上就算达到了顶点：密苏里河以西的新土地应该成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最后的妥协也只是把后来爆发成为内战的那个创口暂时缝合一下而已。

福音派把自由黑人看作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政治家们则把自由黑人看作是社会的威胁。更有权力和更为富有的政治家们，后来就成了殖民运动背后的推动力。当代的几个最伟大的政治家促进了利比里亚的建立。

美国的三个弗吉尼亚籍的总统，在白宫统治了二十四年，他们都是向非洲殖民的积极支持者。高贵的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廉洁、最豁达的政治家，他终身同奴隶制艰苦奋斗。他在一篇经常被人引用的文章中问道：“人们心目中坚信，自由是神的赐予，除了神罚以外，这些自由是不能被侵犯的。这种坚定的信念，是自由的唯一坚实的基础；当我们移去这一基础时，一个国家的自由还能认为是有保证的吗？当我想到神是正义的，他的正义不会永远得不到伸张的时候，我确实为我们的国家耽心……”杰斐逊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拥有一百五十个奴隶——不过我们不能把他当

作一个伪君子而一笔抹煞。尽管他对自己的奴隶是人道的，甚至是慈爱的，然而他并不相信各个种族是平等的。他的关于黑人问题的著作显示了他那个时代——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白人的偏见：

他们通过肾排泄得少，倒是通过汗腺排泄得多，这就使他们有一股强烈的难闻的气味……他们好象不大需要睡眠……他们对他们的女性特别热情：但是爱情对他们说来，与其说是一种感情和感觉的温柔优美的结合，倒不如说是一种迫切的欲望。他们的悲伤转瞬即逝……因此，我仅仅作为一种怀疑提出我的看法：不管黑人原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种族，还是时间和环境使得他们成了一个特殊的种族，他们在身心方面的天赋恐怕都是劣于白人的。

这些看法并不是某个粗鲁的南方土老儿的看法，而是那个《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法国大革命之友和美国历史上的左翼保护神的看法。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詹姆斯·门罗总统和詹姆斯·麦迪逊总统，都是蓄奴州弗吉尼亚人，而且他们自己都拥有奴隶，但是都为奴隶制度感到不安。我们从麦迪逊的传记作者那里得知，麦迪

逊是以一种“近似溺爱的体恤”来对待他的奴隶的，而且直到他临死时，手头实在万分拮据，这才卖掉了奴隶。就象他以后的许多美国人一样，麦迪逊很痛心，认为奴隶制存在于美国是有损于美国的政治典范的影响的。门罗和杰斐逊都赞成把黑人移到欧洲殖民地去。以“最后一个弗吉尼亚人”闻名的、严肃而削瘦的门罗，被一起可能发生的黑人起义，如象杜桑·卢维杜尔在海地领导的那种起义，搅得不安了。杜桑·卢维杜尔所领导的起义曾使整个白人美国吓得发抖。1800年，当门罗任弗吉尼亚州长时，他发现了一个奴隶起义的计划，他就召来了国民警卫队，对起义的带头人进行审讯并予以处决——死刑是当时对起义者的唯一惩罚。后来，门罗写信要求杰斐逊购买“国外的土地，把凡是触犯法律或危害社会治安的人都送到那里去。……这种买地的想法是出于人道的动机而提出的……是为那些该受死刑的人提供另外一种惩罚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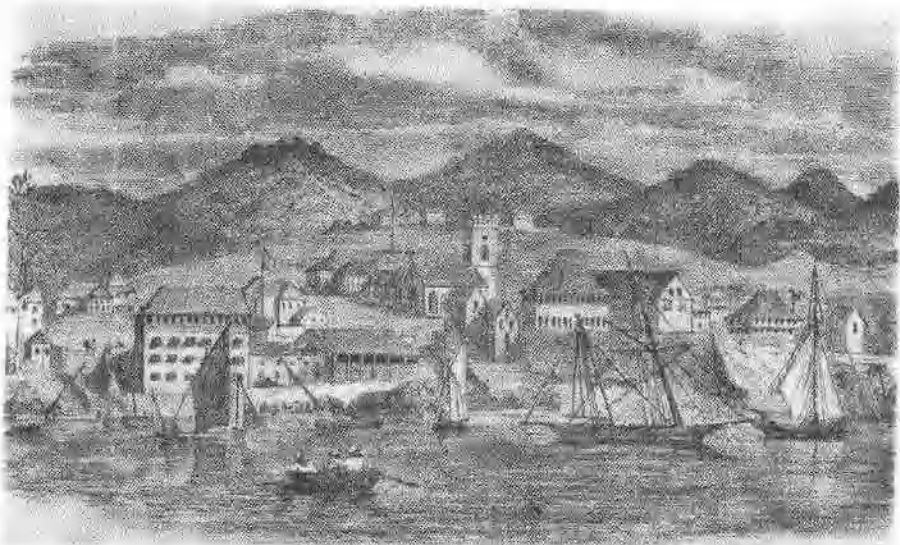
并不是所有赞成殖民的政治家都是南方人或奴隶主。著名的演说家丹尼尔·韦伯斯特是新罕布什尔州人。在政治上他是一个保守派，他反对

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他认为他们都是热衷于异端和改革。他对殖民事业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独特技巧，虽然他的有些演说词，在今天读起来，有点象狄更斯对美国人的讽刺：“美国，英勇地跳出了英国狮噬人的利齿，现正以全盛的独立国姿态庄严兴起，并命其雄鹰展翅飞翔……牛津、剑桥，这些文坛的熠熠明星，现将消逝，而美国科学的皎皎烈日，正以永不失色的光辉普照环宇。”

韦伯斯特的辩论的主要对手、又是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就是那个发起建立利比里亚运动的人。好说大话的亨利·克莱——“肯塔基的雄鸡”、“西部的性急人”、“西部的勇士亨利”，有时还叫“西部的犹大”——岂止是没有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绅士风度和尊严而已。他傲慢、轻率、爱说空话，很少看书，然而他生气勃勃，兴高采烈，这就使他成为边疆居民的宠儿。肯塔基是一个蓄奴州，克莱是一个奴隶主，他精通他那个阶级的诡辩术，他经常说：“我的奴隶们吃得好、穿得好，看来既整洁又强健，他们的态度谦恭有礼，而且象你一样，丝毫不打算损伤任何人的感情。”克莱的一个客人说，克



左上图：扎卡里·麦考利，塞拉勒窝内总督(1793—1799)。 右上图：杰胡迪·阿什曼，原是正统派经济学家，后转为商人；利比里亚的实际创立者。
左中图：约瑟夫·詹金斯·罗伯茨，利比里亚总统(1849—1855)，后为利比里亚学院第一任院长。 右中图：塞缪尔·克劳瑟主教。获释奴隶，后来成为第一个黑人主教，塞拉勒窝内进步的象征。 左下图：理查德·伯顿爵士。“虽不是抨击塞拉勒窝内的第一个批评家，却是最猛烈的一个批评家。” 右下图：塞缪尔·刘易斯爵士，塞拉勒窝内的克里奥尔资产阶级反对英国统治的有影响的领袖。



左上图：格兰维尔·夏普与奴隶乔纳森·斯特朗见面的情景。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幅版画。

右上图：格兰维尔·夏普(1735—1813)，慈善家，塞拉勒窝内的创立者。

下图：塞拉勒窝内的弗里敦。这是早期的版画，图中圣乔治教堂尚未扩建为大教堂。

莱的一个侍仆查尔斯是如此忠心，只有野兽的力气才能把他从主人身旁拖开。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心满意足的奴隶中，确实有些人试图逃跑，而克莱不得不派人把他的奴隶财产再抓回来。

韦伯斯特、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是以恩赐仁慈的态度对待黑人的，而粗鲁的西部人克莱却是一个不害臊的种族主义者。他不相信印第安人“值得保存”，通常以蛮横轻蔑的态度谈论黑人。他把殖民视同放逐；把殖民作为迁走一个可恶的、讨厌的少数民族的手段。

就是这样一些人建立了利比里亚，并以他们的性格影响了利比里亚。在思想上他们同英国“圣徒”的想法相距很远。他们都是律师，他们习惯于高声聒耳的辩论；他们是不为小事而忙碌或不讲废话的世俗之人。韦伯斯特有敬神的名声，但三个弗吉尼亚籍总统充其量不过是自然神论者，并对科学和雅各宾思潮有所涉猎而已；克莱则在不寻常的七十岁接受了洗礼。爱国心、西部或宪法对他们的鼓舞比《圣经》对他们的鼓舞还大；他们害怕反对票比害怕地狱之火还厉害；他们的私生活一定会使克拉彭派嗤之以鼻。在华盛顿的国会议

员居住的大厦里，一日三餐都有一瓶瓶白兰地和威士忌供应，不另收费。甚至那个清教徒韦伯斯特之死，部分地也是由于饮酒，他的名字早已成了一种潘趣酒的别名；潘趣酒即甜酒、白兰地、香槟、烧酒、樱桃酒、绿茶、糖和柠檬汁等混合而成的一种酒。至于年轻的参议员克莱，“赌得多，读得少，而且几乎每天晚上同女士们出游”。当他出庭的时候，他就倒一杯红葡萄酒款待对方的辩护人；他决斗过两次，两次都安然无恙；有一天晚上打牌，他输了八千美元又赢回来了。

这样一些政治家，以他们的名誉和辩才支持殖民运动，而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则留给象芬利和米尔斯这样的福音派去做。整个1816年，芬利都在运动议员、演说宣传和筹募经费。他很幸运地同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结成联盟；基是一个政治家，后来转变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以美国国歌《星条旗》的作者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熟知。通过基和其他社会名流，芬利鼓起了能给殖民运动以物质上和精神上赞助的政治家和实业家们的兴趣。12月8日，在时机似乎成熟的时候，在《华盛顿通讯》上刊登了一则广告，邀请所有“赞助

提出一个移殖美国自由黑人计划”的绅士们参加一个集会。约有二十个著名人士出席了这个集会，集会是在戴维斯饭店的一个小小的烟雾弥漫的房间里举行的，这家饭店是华盛顿的第一流酒家。

亨利·克莱主持了这次集会，正象《通讯》所报导的那样，他的开场白是未来利比里亚国家的第一个、奇妙的请求：

他深知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考虑：移殖美国的黑皮肤的自由人并为此组织一个协会，是否适当和切实可行。在我国各种居民中，那个阶级的处境是很特殊的。他们既享受不到自由人的特权，也不受奴隶的无权地位的支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兼而有之。从他们的情况和由于他们的肤色而产生的难以克服的偏见来看，他们永远不能同这个国家的自由白人融合在一起。所以，既为他们着想，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居民着想，就值得考虑把他们统统送出去……我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会集在一起，塞拉勒窝内殖民地获得的成功可以在这方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个殖民地是在大约二十或二十五年前在英国的私人赞助下开始建立的。这个殖民地的基本居民是独立战争时期南方各州的逃亡奴隶，他们先是被带往新斯科舍，

此后,大约在 1792 年,根据他们自己的、几乎是全体的请求,被移往非洲西海岸……我们有他们的先行经验;而且我们,一方面要摆脱我们自己国内的那部分即使不算危险的,至少也是有害无益的居民,另一方面还打算传播文明生活的艺术,还要尽可能地去开化一个蒙昧的地区,改变那里野蛮无知的状态,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高尚的事业吗?……集会不打算讨论,也根本不打算考虑解放黑奴的问题,或与废除奴隶制有关的任何问题。他确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在座的来自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先生们才出席了集会,并可望共同合作。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本人才出席了集会。

听众中的怀疑论者可能会问“无用的、有害的,而且危险的”黑人,怎么去开化野蛮的非洲呢?其他发言者看来都没有什么怀疑。最高法院书记伊莱亚斯·考德威尔强调,让自由黑人尝一尝他们永远得不到的特权的滋味,这是对他们的残忍。暴躁的约翰·伦道夫——后来同克莱决斗的对手之一——把自由黑人叫做“祸根”,他欢迎把殖民作为确保奴隶制的手段。

第一次集会显露了后来分裂殖民运动的裂痕。美国殖民协会努力使自己在福音派北方成为

废除奴隶制的机构；而它在南方的代理人则把它当作一个保护奴隶制的机构。这种两面派的态度当时就被人注意到了。虽然报界整个说来是倾向于协会的——乔治敦的《信使报》上说协会要肃清国内的“劣等种族”——然而自由黑人显然是有所警惕的。里士满的一群黑人下结论说，移民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去非洲的前景是可怕的。他们要求换个地方，在密苏里搞一个移民区。费城的两个黑人演说家说，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现在的家乡，他们正确地预言，移民可能会变成获得自由的交换条件。他们怕他们的家庭再度被大西洋拆散，那些被带走的人将会“无儿无女地、鳏寡孤独地徘徊在几内亚的灼热的平原上”。

在协会成立后不久，芬利就去从事于大学的工作了。他的福音派同事，以他们的政界和经济界的朋友为后盾，继续在首都和全国运动议员、筹募经费。但是在协会的某些代表到非洲去物色一个地点、从当地酋长手中买到土地以前，移民区还是建立不起来的。

第二章

当我注视弗里敦的兴旺情景，再看看基西城、累斯特山和里靳特镇、希林角，这就使我心向往之，渴望有朝一日美国能在大陆上获得一个立足点。

(丹尼尔·科克尔，同第一批移民航行到非洲的一个自由黑人。1820年9月25日)

塞缪尔·约翰·米尔斯牧师被选派去非洲寻找一个殖民地地点。他是一个典型的为利比里亚而工作、而献身的热心的年轻人。同米尔斯一样虔诚的、米尔斯的传记作者宣称：“能有这样虔诚的祖先，是这个可敬爱的人的光荣。”他的祖先住在康涅狄格州，在十九世纪末，康涅狄格州象新英格兰的多数地方一样，被一次宗教复兴运动所震撼。年轻的塞缪尔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感到苦恼极了，有时他真想起来反抗他的上帝。他在十六

岁那一年，同他母亲有过一次极为伤感的谈话，他“抬起头，两眼流着泪水，大声说，‘啊！如果我没有生下来多好！已经有两年了，我为上帝制造了我而感到遗憾’……她说，‘我的孩子，你是生下来了，你永远不能舍弃你的生存；你也永远不能舍弃你对自己的一切行为的无穷无尽的责任。’这个严肃的思想就象一把匕首刺入他的灵魂”。

在马萨诸塞的威廉斯学院，宗教上的痛苦继续折磨着米尔斯，他在日记上写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安息日。”但是甚至在学院里，他就磨练出一手本领，能使别人为他们自己的罪孽抽泣。在一次为新生举行的祈祷会以后，他满意地写道：“一个很好的集会。许多人都是很严肃的。克××着实胆寒了。”

他从威廉斯学院出来又到耶鲁大学、到安多佛神学院继续求学。他在神学院对传教工作有了特殊兴趣。此后，他就成了专为传教会和慈善团体筹募经费的人员。他曾两次周游西部，那里缺少《圣经》，据他看来，这是“我们民族特征的莫大污点”。到1816年，他已经很关心贫穷黑人的困境了，并自愿以普通的报酬为新的美国殖民协会服

务。这个协会则因获得了当时以最善于筹款而闻名的人，感到高兴。

总得选中一个地点，哪怕是一个试验性的地点也好，否则为建立非洲殖民地而募款就成为无的放矢了。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写信请教英国的反对奴隶制度的鼓动者托马斯·克拉克森，他的弟弟约翰曾在塞拉勒窝内工作过。他建议在弗里敦之南八哩的歇尔布罗岛着手建立一个殖民地；现在这个岛是塞拉勒窝内的一部分，但是当时这个岛是由几个独立的王统治的。

协会提议，米尔斯在旅途中必须有个同伴——无疑地，这是因为担心他在回来报告以前就死掉了——米尔斯选择了佛蒙特的一个数学教授埃比尼泽·伯吉斯和他同行。

这两个人取道英国前往非洲，但是甚至这样一段旅程也是危险的。米尔斯高兴地写道：“伊列克特拉号”的船长“不容许褻渎的语言，不容许过度的饮酒，也不容许在船上进行任何种类的赌博”。但是当“伊列克特拉号”在暴风雨中失事，似乎就要沉船的时刻，这个虔诚的船长把他的一家满载在唯一的救生艇上，却把他的旅客和水手都

丢弃不管了。然而，船没有沉，米尔斯和伯吉斯安全地来到伦敦。他们在伦敦度过了有益的一个月，见到了威尔伯福斯和其他福音派信徒。他们乘另外一条船到西非去，当他们停泊在塞拉勒窝内时，他们高兴得热血沸腾。甚至还在海上时，米尔斯就滔滔不绝地称赞座落在累斯特山上的教堂的景色，并得意扬扬地想着异教的圣坛倾倒在“永生的上帝的大教堂前面，就象大袞的神像倾倒在耶和华的约柜^①前面一样”。他们在陆地上也没有感到失望。他们称赞为获释奴隶的孩子们所设立的学校，他们还骑了马到里靳特镇去做礼拜，他们评论里靳特镇说：“旷野里只见奇葩异花，美丽得象玫瑰一样”。

如果米尔斯和伯吉斯曾经读过塞拉勒窝内的早期历史，他们就可能在购买歌尔布罗岛的土地时避免他们的先驱所犯过的同样的错误。他们是在1820年^②4月2日到达歌尔布罗岛的。因为米尔斯和伯吉斯性急、易欺，而且对非洲的法律和外

① 大袞(Dagon)——非利士人信奉的半人半鱼的神。大袞的神像倾倒在约柜前的故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5章。——译者

② 这里的“1820年”疑是“1818年”之误。——译者

交手腕一窍不通，他们在本地诸王的眼里必然成为两个阔傻瓜而被当作摇钱树。他们在岛上选择朋友时上了当。他们选择的一个朋友是在美国当过奴隶的黑人商人，名叫约翰·基泽耳。他很讨人喜欢、很殷勤、很虔诚，所以米尔斯不久就在日记上写道，“谁也不会比他更为非洲人及其后裔的世俗的和超俗的幸福操心了”。反过来，基泽耳对这两个白人说，他们两人的殖民计划“是有其天意根源的”。事实上，他是一个贪心的、假装虔诚的流氓无赖。在此后长时间的谈判中，基泽耳作为当地酋长们的中间人和译员，怂恿美国白人采取了愚蠢的外交方针。

当他们在一个很小的名叫萨莫的村子里进行第一次谈判时，米尔斯和伯吉斯见到了萨马诺王和萨法赫王。萨法赫王“穿着一件镶有银边的外套，戴着一顶华丽的三角帽，披着一件几乎拖到地上的披风，穿着一条相当破旧的蓝色印度粗布裤子；没有穿袜子或鞋子”。虽然米尔斯以傲慢的笔调描写了土王，但他送礼还是很大方的，而土王所要的也只是礼品而已。

〔他在4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礼品有一块印

度粗布、一小桶火药、几束烟草和一瓶甜酒。这最后一项礼品是请基〔泽耳〕先生为我们弄来的，因为我们听说，没有这么一瓶酒，他们是决不进行谈判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情报是正确的。这些人不过是长得比较大的孩子，我们指望通过暂时的迁就，逐渐去掉他们的坏习惯。起初在他们面前只放一瓶酒；他们提出他们有两个王，必须有两瓶酒；对这一点他们坚决不肯让步，直到拿出第二瓶酒来才罢。

在两天的谈判以后，当这两个王得到了一大批礼品时，他们透露了真情，他们说他们只不过是下级酋长，要得出谈判的结论还得请示歇尔布罗王。歇尔布罗王得到礼品后告诉米尔斯和伯吉斯，叫他们去见考伯王，而考伯王又叫他们去见一群下一级的王。4月9日，米尔斯在日记上感慨系之地写道：“今天早上这些王集会商讨。再送一些礼品是必要的。这些人办事是那么懒散，而收受客人的礼品却是那么心切，去拜访他们的人真要有最最到家的耐心，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和心情。”

考伯王看来是个丛林外交的能手。为什么移民们没有直接写信给他本人呢？如果所有的美国

黑人都要来住在歇尔布罗岛那怎么办呢？他一定得同他的人民商量商量，但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雨季就要到来；人民在清理他们的种植场、播种稻子；那些王是贫穷的，必须象人民一样地劳动……只要是美国人用更多的东西购买土地的话……

最后连米尔斯也觉得要立个契约是没有指望了，他准备离开这里到沿海的别的地方去。但是歇尔布罗的几个王还要讨得最后一次礼品，才肯同他们的客人说声再见。米尔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们说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在他们祖先的坟墓上滴一点儿酒，并且说‘善良的陌生人到我们这儿来了，保佑善良的陌生人吧’，他们还需要一点儿酒滴在一度倒下而现在挺立着的一棵树的树根上。”米尔斯不知道这棵树其实是色欲的象征，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在其他方面他已经不象初到海岸时那么天真了。“同他们深情地告别以后，我们回到船上，送给他们一瓶葡萄酒，与其说是去滴在他们祖先的遗骨上或浇在那棵奇异的树上，毋宁说是去沾润他们的尊唇。”

在歇尔布罗岛上，米尔斯和伯吉斯每天以歌

唱“救世主，哦，快乐的声音”使土著们高兴；一个月以后，他们无精打采地回到弗里敦。弗里敦的麦卡锡总督友好地接待了他们。米尔斯写道，的确，总督被公正地尊为该殖民地之父和保护人。这两个人从塞拉勒窝内乘船回美国。他们已经决定歇尔布罗岛应该是殖民地的地点。他们深信，该岛土地肥沃、水质良好、气候有益于健康而且土著也很友好——所有这些结论，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同当地的王一样，英国人也欺骗了这两个初到海岸的生手，因为麦卡锡不愿意在自己殖民地的附近另外有一个殖民地同它竞争，而且他还致函伦敦要求允许他接管歇尔布罗岛。

米尔斯没有活到看见他的愚蠢的建议的结果。由于谈判拖得很长，这两个人在沿海地区一直住到热病盛行的雨季。六月，可怜的米尔斯病倒了。他的传记作者说，“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米尔斯“似乎高兴地等待着在天之神即刻来临。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1818年6月16日〕他不再打呃了。他安静地把双手合在胸前，仿佛他在做某种祈祷似的——圣洁的微笑显露在他的容颜上，他的面部处处表现出他的灵魂的平静和

柔顺，这时候，他停止呼吸了”。

高高兴兴的死，结束了忧郁的一生。但是米尔斯一定是个有相当魅力的人，因为在把他的尸体投入海中时，船上的水手同伯吉斯一起流下了眼泪。米尔斯的一生成为了福音派说教的最好课题，更不用说他的死了。

当米尔斯和伯吉斯不在的时候，美国殖民协会发起了多次巡回演说，募集了更多的基金，并争取了国会和政府的支持。殖民地的前途似乎完全决定于来自非洲的消息了；当伯吉斯带着米尔斯逝世的噩耗回来时，协会一时只能为他的殉难而悲戚。但是读了米尔斯和伯吉斯所写的文件，欣喜之情很快就取代了悲戚之感。协会的委员会读到了：大米、甘蔗、牲畜和香料的前景大好，只要用几张烟叶就能购得精巧的土产，而一俟奴隶贸易停顿，正当的商业肯定是兴旺的，那时，想象起来，在非洲海岸上就会出现一长排的美国殖民地。

这时，殖民幻想在华盛顿已经成熟了。国会正打算通过一项法案在西非建立一个类似英国在塞拉勒窝内所建立的那种代监管辖区，以接受由美国海军舰只所截获的成船的获释奴隶。美国殖

民协会却要把这个政府代监管辖区同他们自己的自由黑人的未来移民区合而为一。但是国会中的某些集团,以宪法为根据,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殖民地,他们设法阻止这个计划成为法律。于是门罗总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折衷方案。他设置两名政府代监官看管获释奴隶,这两名代监官同时也作为美国殖民协会的代监官,而获释奴隶站所需要的工人和机匠,必须是那些希望着手建立一个移民区的自由黑人。

被挑选为兼任政府和协会的代监官的是塞缪尔·培根,三十八岁,是一个主教派牧师。培根象他以前的米尔斯和他以后的其他后继者一样,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忧郁的旅程。他也有一个虔诚的传记作者,杰胡迪·阿什曼。后来,阿什曼在建立利比里亚的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培根,这个中等阶级的新英格兰人,也象大多数作牧师的移民一样,在担任牧师以前,从事过好几种职业。他曾经做过教员,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参加过1812年战争,还同一个人进行一次决斗。大约在1816年,当他三十四岁的时候,他显出了一个信仰复兴运动者的歇斯底里的

常见症状。他的传记作者以明显的赞许口吻报导了培根如何因为在安息日骑马感到有罪而几乎发疯的情景。他最初是在自由州的主日学校中对殖民计划发生了兴趣的，他在主日学校专门研究一种病态算学。“如果一个不幸的鬼魂能从地狱里出来告诉你们在地狱里看到的前所未闻的和意料不到的折磨，你们一定都会双膝颤抖，跪倒在地……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在死去，有学问的人说，每一分钟有六十个人死亡。你能多么快地说死，死，死，死，他们就那么快地死去。我在说死，死，死，死这些字的时候，就有四个人死了……”培根帮忙建立了二十六所主日学校。他成了一个主教派牧师，并被派往圣经会做传教工作。他的能力，也许还有他在军队里的经历，使美国殖民协会确信他适宜于到非洲去工作。

据培根的传记作者说，培根的“胸中经常蕴藏着一股最虔敬、最崇高的爱，这就使他的胸怀神圣得象一座圣堂一样”，而“他的思想的最自然的工作是祈祷，他的思想的最愉快的活动是赞美上帝”。他还很性急（甚至阿什曼也承认这一点），能干，勤快，而且稍微有点神经质。他身材高大，精

力旺盛，体格强壮——至少，在他去非洲西海岸前是这样的。

塞缪尔·培根同另外两个白人代监官和八十九个自由黑人移民，于1820年1月31日乘“伊丽莎白号”离开纽约。“伊丽莎白号”正好同“五月花号”^①的航向相反，这成了当地轰动一时的大事。当五、六千纽约黑人拥挤在北河的岸边时，培根深怕人群会挤落水中，为了分散人群，他不得不在附近举行了一个祈祷会。关于这次航行的情况，我们都是从丹尼尔·科克尔的日记中得知的。科克尔是巴尔的摩的一个黑人，是移民中卫理公会教徒的牧师。他作为培根的一个非正式的副手分担着生活在陌生非洲的忧虑。他在2月19日写道：“塞缪尔·培根先生和我昨夜睡得很晚，我们仔细考虑着我们对一个城镇的计划。”这次航行的唯一不幸事件发生在启航后的下一周，一个黑人移民的一只狗同船长的狗打起架来，激怒了两个主人。移民们愤怒了，船长拿出了手枪，米尔斯^②不得不出来调解，船长这才冷静下来，移民们也回到船舱

^① “五月花号”是1620年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译者

这里的“米尔斯”疑是“科克尔”之误。——译者

里去了。后来，流着泪的培根喊道：“科克尔兄弟呵，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可怕的惩罚啊；来，我们到下面去做一次虔诚的礼拜吧。”后来，培根告诉科克尔，在这次远征中，有他（科克尔）作为白人和有色人之间的桥梁，这是多么幸运。对此，科克尔十分礼貌地回答说，培根只要“换上黑色的皮肤，就是一个非洲人了”。在弗里敦，培根很赞美当地的非洲人，他写道：“在他们中间，看不到费城的有色人的那种病态的、沮丧的面孔。”想到面前的传教工作，他不禁舐了舐嘴唇——“呵，真是传播福音的大好天地呵！”

美国政府本来打算派一艘军舰访问歇尔布罗，先买好一块适宜的土地等待移民到来。不幸的是，被挑选的这艘军舰就在那时候到非洲沿海地区执行其他任务了；所以，“伊丽莎白号”船上的移民们，就象塞拉勒窝内的拓荒者一样，他们在着手建设以前，先得买地。更糟糕的是，他们受到了卑鄙的约翰·基泽耳的迎接和蒙骗。他油嘴滑舌地表示欢迎，说是他在坎佩拉买好了一块地，并为他们搭好了茅舍作为栖身之所。

培根被基泽耳表面的诚挚所欺骗，而且以感

激的心情同意在他们自己买到土地以前就住在这些茅舍里。培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受到了基泽耳先生及其家属的愉快的接待。当我同他一起走到他家去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我同他一起进餐，有棕榈油烹调的鱼和大米饭……基泽耳先生是一个虔诚的人。”

移民们把行李搬上岸以后，发现坎佩拉低洼潮湿，有恶臭，到处是红树丛生的沼泽。基泽耳的饮水是从大陆上运来的，而移民们则不得不喝沼泽地里的死水。茅屋是极其简陋的，而且没有新鲜食物。

“伊丽莎白号”的船体太大，不能靠近这个小岛，所以一切供应品必须用一艘多桅帆船往来不绝的运送。这项叫人筋疲力尽的工作又用去了两个星期。同时，美国殖民协会的另一个代表塞缪尔·克罗泽，又重新开始了一度停顿的同酋长们的谈判。他没有获得什么成果。酋长们热衷于得到礼品，但是不愿意移民们住在他们自己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上。此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作为译员的基泽耳，则有同样确凿的理由要让移民们留在坎佩拉。

象塞拉勒窝内的早期移民们一样，“伊丽莎白号”上的移民们来得很不是时候。购买土地的争议，卸货的长期耽搁，都使他们在雨季开始时仍然没有适当的防御办法。4月初，就有十五个人生病了。4月6日培根写道：

现在我们有二十一个人患热病……我今天听到人们的抱怨：因为岛上弄不到好的水——因为他们被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我没有凭武力占有土地——因为他们被疾病所侵袭——因为没有新鲜的肉、糖、糖浆、面粉……因为我拿不出鞋和衣服给他们，因为我不能给他们好一点的烟草——因为同土人的谈判还没有结果……

等等。

因为更多的人生病了，所以有更多的工作落在培根身上：开药方，盖房子，卸小帆船上的货，划一只小艇拖运货物靠岸。没有袜子，有的时候就光着脚，常常是既没有帽子又没有外衣，他从黎明一直干到深夜，吃一点定量的硬面包、咸肉和水。他写道：“感谢上帝，虽然如此，我还是很健康。”但是，健康并没有维持很久。

4月13日，只有六个人还是健康的。15日，

克罗泽死了。17日，只剩下两个强壮的人了，而这两个人还都得同酋长们进行那使人恼火的、徒然的谈判。但是酋长们和狗腿子基泽耳却还在那儿等待时机，他们要等到这些移民全部病死，那时，存留下来的东西就都是他们的外快了。

1820年4月8日，离开纽约还不到两个月，培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就我自己来说，在我离开美国以前，我已经计算过从事这一项工作的代价。我来到这海岸上原是准备死的，能够不死，不管怎样，总要比我预期的强多了。”16日，他觉得不舒服了，就吃了一些吐药，准备着热病的发作，果然不久热病就发作了。

他神志昏迷地躺在病床上，听说从塞拉勒窝内来了一条船，而且旅客中有一个医生。移民们要求医生上岸，给他们的病人看看病，但这是白费口舌。不过船长同意第二天早上把培根带走。随后发生的事件，听起来简直就象一个高烧病人做的恶梦一样。

第二天早上，培根被抬上一只小艇，打算划出去同大船会合。时间比约定会合的时间还早一小时。但是当培根的小艇靠近的时候，大船却起了

锚，向塞拉勒窝内开去了。培根命令桨手追赶大船，幸而风不大，起初他们的速度还能勉强赶上。“可是大船扯起了满帆；虽然小船在一个相当的距离以外还紧紧地追赶了几个钟头，但后来大船终于把小船远远地抛在后面，使桨手的努力全部落了空。”发烧的培根在灼热的太阳下已度过了六个小时，除了一顶轻便阳伞以外，什么遮盖都没有，而这时小艇离开家已经好几哩了。他们在普蓝太因群岛过了夜，第二天又无遮无盖地划了一整天，终于来到了希林角。在这里，一家英国人仁慈地款待了培根。但是在无遮无盖的小艇上晒了两天，他的热病恶化了，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了。因为没有牧师在培根身旁，所以我们对他的临终时虔诚的言语举止缺乏常见的鼓舞人心的记录。他逝世的日期是5月2日。他到那一带海岸去，原是准备死在那里的，果然得到了预期的结局。

留在坎佩拉的那些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随着美国白人的相继死去或逃亡，丹尼尔·科克尔成了定居地的领导人，他为了维持纪律和振作士气，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对移民们大声疾呼以资鼓舞，对本地土著则进行宗教训导。但是，在

那个疾病流行、肮脏不堪的小岛上生活下去，移民们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土著是那么贪财图利，他们上主日学校都要报酬。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于1820年10月18日来到岛上，他很尊重科克尔。他写道，科克尔意气销沉，准备不久就要离开定居地。果然，不久以后，科克尔和其余大多数人回到塞拉勒窝内的福拉湾，在那里，英国人给了他们一个安身之地。^①

成立于1789年的塞拉勒窝内的第一个定居地只维持了两年。美国殖民协会的第一个定居地维持了不到两个月。美国人没有从塞拉勒窝内的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他们犯的几乎都是同样的错误。他们来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来得很不是时候，又没有同酋长们达成任何协议。象米尔斯、伯吉斯和培根这样一些人，对非洲毫无所知，而且

① 从歌尔布罗岛定居地来的有些难民，在第二年随同一个远征队到后来成为利比里亚的地方去了。可敬的科克尔则留在塞拉勒窝内。查尔斯·亨利·胡布里希在他的巨著《利比里亚的政治和立法史》（纽约，1947年版）第1卷第137页上说，“美国殖民协会没有委派科克尔在新的定居地担任某项高级职务，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否则，就可以让这位最忠实、最聪明、最能干的早期移民之一继续作出贡献。这只不过是协会不授权给有色人的一贯政策的第一个例证而已……”

又愚钝、又顽固，也学不到东西。

美国人在下一次的殖民尝试中，向沿海更南边的地方发展，这次他们犯的错误比较少些，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对这项工作有天才的人作为他们的代监官——这人就是杰胡迪·阿什曼。

第三章

我从来没有一小时或一分钟希望我自己在美国，不，甚至当炮弹在我脑袋周围飞驰而过的刹那间，我都不希望我自己再在美国。

（洛特·凯里牧师，利比里亚的黑人先驱之一）

一直到1821年末，那些残存的美国移民们，还作为难民住在塞拉勒窝内。自从“伊丽莎白号”从纽约开出以来，已经将近两年了，然而美国殖民协会还没有殖民地，美国政府还没有收容获释奴隶的站头。协会理事会的成员们并不因这些挫折而沮丧；事实上，在已经开始了而且弄糟了的冒险事业中丧失了这么多生命，这件事本身反而使他们更加下决心去争取成功。门罗总统也没有忘记他对获释奴隶的计划。1821年末，他派了四个白人代监官和三十三黑人去建立另一个西非殖民地，他指示他们，除了歇尔布罗岛以外，可以选

择任何地点。新的派遣队首先到了塞拉勒窝内，不出所料，两个白人代监官死了，还有一个，因为怕死开小差了。政府和协会的主要代监官职务就落在伊莱·艾尔斯医生身上了。他是巴尔的摩的一个外科医生。作为他的同伴的是海军上尉罗伯特·斯托克顿。这两个性急而顽强的人，决定在离塞拉勒窝内东南二百二十五哩的谷物海岸的梅苏腊多角为利比里亚购买一块土地。

梅苏腊多角即后来的蒙罗维亚，是梅苏腊多河和大西洋之间的一个半岛的末端。在地形上，它同塞拉勒窝内的移民区很相象。无论塞拉勒窝内的移民或梅苏腊多角的移民，都把他们的城镇安排在角的北侧，即靠内陆一侧。当艾尔斯和斯托克顿于1821年12月12日登上这个半岛时，梅苏腊多角还是“布满了参天密林，盘根连枝地错杂着藤蔓和矮林的地方；是野兽出没的地方；而柏柏尔人则惯于穿过这些密林丛棘开辟他们的通向海岸的狭窄而弯曲的道路”。

这些“柏柏尔人”很熟悉白人。据说，诺曼人曾于十四世纪到过这里，葡萄牙人曾于1461年从这个海岸带去一个俘虏向他们的国王夸耀。葡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牙人给这个海岸起过一些名字，如象梅苏腊多，还引进了橘子、椰子、菠萝和烟叶。然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也来了，他们穿着北方的厚衣服大出其汗，但是以土著经常用水和肥皂给他们洗浴为乐。欧洲人要黄金、象牙、奴隶和马拉盖塔胡椒——就是所谓“天堂的谷物”，该海岸即以此而得名。谷物海岸又以克鲁族人或克鲁少年而闻名，他们是敏捷、胆大的水手，至今还为西非货船提供甲板水手。

住在梅苏腊多角附近的两个主要部族是曼巴族和德族^①。荷兰人和英国人同他们打交道时，经常带着武器、扣下人质，但是，法国马歇爵士认为这是非常不必要的。1723年他访问了这个地方以后，对土著极口称赞：

他们聪明、伶俐、诚实，他们很懂得自己的利益，同他们的老朋友诺曼人一样，他们谈吐应对都很合乎自己的身份，甚至是很有礼貌的。他们精心耕种土地。他们做每一件事都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他们愿意劳

① 在写到部族名称时，我用标准的现代拼法，如 De（德族），Vai（瓦依族），Mende（门迪族），Temne（泰姆奈族），等等。在引用其他作者的文字时，我保留他们的拼法，不予改动。

动时就卖力地干，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太多，未免叫人失望。他们除了把他们的判罪的犯人卖给欧洲人以外，此外就不再买卖奴隶了，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同那些酋长首领还在买卖奴隶的地方不一样，这里的人口并没有减少。

在马歇来访以后大约一百年，德族和曼巴族遇到了另一种白人。1821年初，美国政府和美国殖民协会的代监官们曾要求梅苏腊多的酋长们允许他们定居。为首的酋长彼得王，明确而有礼貌地拒绝了。现在艾尔斯和斯托克顿又来进行一次新的谈判，塞拉勒窝内的英国朋友们使他们确信梅苏腊多角是最适于作殖民地的地方。1821年12月12日，他们上岸来找彼得王，在他们等他的时候，他们讲了一通关于文明的即席演说。彼得王终于来了，他接受了甜酒和烟草两样礼品，但是他说他不能出售梅苏腊多角，因为“他的女人们会嚎啕大哭的”。不过他同意，明天再同他的两个客人谈谈。

两个美国人空等了两天。第三天，斯托克顿光火了，他说服艾尔斯，他们应该到六哩以外的彼得王的村庄去责问这个没有礼貌的王。这两个美

国人开辟了一条小道穿过密林，又闯过了几个沼泽，蹚过了几条小河，才到达村庄上，见到怒气冲冲的彼得王。彼得王说：“你们要那块土地干什么？”显然，他还不相信美国殖民协会。其他村民责怪这两个白人要挑起战争，责怪他们绑架人而且试图停止奴隶贸易。这两个美国人既恼火又失望，他们就采用了异乎寻常的商业方法。斯托克顿上尉拔出一把手枪，扳上板机交给艾尔斯，叫他在必要的时候就开枪。然后他拿出另一把手枪瞄准彼得王的头。这样，使听众聚精会神以后，他就当众演说一番，说明建立一个定居地的好处。他举起手臂做了一个演说者的挥舞动作用，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太阳破云而出。这一幕精采表演可能并没有打动非洲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手枪——倒是感动了为美国殖民协会服务的、整整一代的小册子作者、牧师和演说家。

斯托克顿的办法也取得了一些成功。12月15日，彼得王和五个酋长立契出售了梅苏腊多角，换得的是枪、火药、床、衣服、镜子、食物、甜酒和烟草，所有这一切，价值不到三百美元。这两个美国人高兴极了，但事实上，那纸契约是毫无价值的。

彼得王并不需要移民们；他希望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后来几乎就是这样干的；这场交易完完全全是在枪口下做成的。奇怪的是，美国殖民协会的这两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平日动辄高谈关心黑种人的苦境，如今竟以如此粗暴愚昧的狂妄态度，对待这个非洲的王。

美国殖民协会把它的殖民地依照自由 (Liberty) 一词取名为利比里亚 (Liberia)，把尚未建设的首都依照总统门罗 (Monroe) 之名命名为蒙罗维亚 (Monrovia)。但是，门罗虽然是殖民地的教父，却无权代表美国给予殖民地以补助或保护。利比里亚政府是由美国殖民协会华盛顿办事处的一群平民组成的。他们为利比里亚起草宪法，并根据美国的法律为利比里亚拟订法律，不过做了一些诸如禁止“含酒精的饮料”之类的变动而已。甚至蒙罗维亚的宏伟的城市规划，也是由一个华盛顿的建筑师设计的。

新的移民们和从歇尔布罗岛生还的一些人是用两只小帆船分几批由塞拉勒窝内运来的。在开垦梅苏腊多角本土的土地时，第一批利比里亚人栖身于珀西佛伦斯岛，这不过是海岸附近海面上

的一大块岩石而已。当移民们还在珀西佛伦斯岛上时，就同土著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一艘开往塞拉勒窝内的载有获释奴隶的英国军舰在梅苏腊多角对面的海岸失事了，于是当地的德族人按照西海岸的习惯，赶到舰上抢劫东西或者说“抢救”货物。这些抢劫失事船只货物的非洲人，很少伤害海员，而且也无从证明军舰上的水手遭到了生命危险。但是不了解非洲人习惯的移民们，决定予以干涉。他们从梅苏腊多岛向土著发了一炮，打死打伤了七个人。而且火炮引线的火苗烧着了移民们的仓库，毁掉了武器、弹药、商品和食物等，共值三千美元。这轻率的一炮激怒了土著，也烧掉了移民区自身给养的一半。

移民们在1822年4月28日搬到梅苏腊多角本土，并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来鼓舞他们的士气。他们干得很快，但快得还不足以赶在雨季前修建好一个象样的移民区。几天以后，雨季开始的时候，士气再度低落。蒙罗维亚的三十幢房子很少有象样的屋顶；雨季一到，热病也突然发生了，而最糟糕的是，移民们还受到几百个愤怒的土著的威胁。甚至代监官艾尔斯医生也认为离开这

里到塞拉勒窝内去是上策，胆小的移民们要求跟他一起去。即使比较勇敢的移民也极其踌躇不决。从歇尔布罗岛上不幸的定居地生还的、最受尊重的黑人之一伊莱贾·约翰逊，用简短有力的话激励了犹豫不决的人们。他说：“两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家；在这里我找到了家，我就呆在这里了。”他的希望和勇气，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8月8日，双桅船“斯特朗号”，载着三十五个移民、新鲜的给养和杰胡迪·阿什曼，驶抵蒙罗维亚。阿什曼是个奇怪的青年商人，将由他来建立一个国家。在以后的六年里，他成了利比里亚的将军、总督、仲裁者、经济学家和编年史家。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在那个吓人的海岸上，一些比他强壮得多的人只过了一个月就死了或撒手不干了，可是他经受了战争、热病和绝望的磨难之后，仍还活着。若就虔诚和狂热这两点而言，阿什曼很象另外两个美国人，米尔斯和培根；但是阿什曼身上还有一种特殊的品质，这不同于一般的杰出人物，这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品质。他坐立不定，郁郁寡欢，非常自负和富于想象力；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领袖，他运气好，而且懂得如何利用这个好运气。如

果利比里亚今天是一个重要大国的话，那么阿什曼肯定会在非洲史册中被列为伟大的先驱之一。

关于阿什曼的身世我们都是从阿什曼自己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文章和信件，以及他的朋友、协会秘书拉尔夫·格利给他写的传记中知道的。阿什曼于1794年生于纽约的香普冷。他生性十分好学，专门研究古典语文，到1815年，就已经在一个神学校得到了一个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职位。后来阿什曼在写到这一段经历时说：“我的天赋和癖性，在很多情况下，无疑是倾向于苦行的。我决心不仅要放弃那欢乐的世界，而且要放弃那文明的世界；我要在远方的蛮族之中度过我的一生。”这种阴郁的自我禁欲，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但是留下的一些迹象可以表明，阿什曼的癖性不完全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倾向于“苦行”。

1815年，他认识了他的未来的妻子，接着又很快地为了另一个姑娘而抛弃了她，那另一个姑娘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幻影……无比可爱的形象。一向苦恼地戴着的链子换成了迷人的金环。但是，天哪！荣誉和宗教命令他斩断他想永世保持下去的情谊”。1818年10月，阿什曼同在纽约等着他

的原来的未婚妻结了婚。多情的阿什曼和他的“无比可爱的形象”之间的下文如何，我们或许永远不得而知了，但这件事污辱了神学校，这是肯定的。当阿什曼从纽约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到弗吉尼亚州去了），猥亵的谣言很多，学生们抵制他讲课。他在他的伤心的日记中写道：“我已经玷污了我的基督徒的身份。我料定现在对外传教协会不会同意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了。”既羞耻又负债，他就到南方找他妻子去了。

他的日记透露出不少世俗的苦恼，也有通常的宗教忏悔：

我现在二十五岁了；离开学校差不多三年了；没有专门职业；自从我离开学校以来，雇我干的工作一向强制我形成某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却是不利于获得专门职业的。我负债累累，既没有书又没有钱，但是我要养活一个最心爱的、娇美的妻子。……我的灵魂里充满了肉欲和尘世的迷恋。……不要使我受到贫穷和匮乏的痛苦吧，免得我会脱离我的伟大目标。如果没有更多的荣誉，我也不希望有财富。

在以后的不安定的三年里，即便不说荣誉，至少是财富这一点，阿什曼就没有得到过。他先是

找到了一个工作，给几个小姐当家庭教师；然后又当上了一个主教派杂志的记者。他研究了几个月的医学，又丢掉了医学去研究法律。1820年，他开始为《非洲通讯员》撰稿，这本杂志标明是一本综合性杂志，但实际上是为美国殖民协会宣传的刊物。作为一个记者，阿什曼写了许多关于培根的生和死的文章。后来，他犯了一个对于记者来说是最共通的大错，这就是他决定把这些文章印成一本书。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阿什曼很自信，他认为这本书的销路一定会很好，有助于他偿清债务。阿什曼是如此确信不疑，而出版商却感到毫无把握，于是阿什曼就又借了许多钱来支付印刷费，结果在这本书上蚀了大本。

失败的难堪和债权人的纠缠，使得阿什曼决定到非洲去旅行。他从培根的命运知道西非的危险，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阿什曼一心想作为一个殉道者而死。事实上，他的野心大部分是出于商业的目的。他想通过带领美国殖民协会的一支移民队伍而得到旅费和一点报酬，但是他打算一到非洲，就给巴尔的摩的一家商店做代理人。阿什

曼在他所谓的“商人狂”的情绪下，他希望协会给予他在利比里亚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专利权，或者甚至办一家轮船公司来运输货物。因为阿什曼不打算在西非久留，至多也不超过必要的时间，所以虽然他很耽心他妻子的健康，他还是勉强同意带她同行。他们于1822年5月同佐治亚州的一队自由黑人一起乘“斯特朗号”启程了。

当8月中旬阿什曼到达蒙罗维亚时，他发现两个白人代监官都走了，蒙罗维亚不过是一片林间的开垦地，没有多余的粮食给新来的移民，在雨季高潮时节还没有蔽身之所。好象这些苦恼还不够，居民点还受到好几百个用滑膛枪武装起来的愤怒的非洲人的威胁，这些非洲人公然表示了进攻的意图。后来阿什曼回忆道：“在当地美国人中，有二十七个人在不生病的时候是能够拿起武器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受过使用武器的训练；在他们目前这种漫无纪律的状况之下，事实上只能进行极其微弱的防御。”

阿什曼从踏上居民点的那天起，就放弃了进行商业冒险的希望，因为他必须向之购买货物的内陆土著，不是要做生意而是一心要打仗。如果

他要在利比里亚呆下去，那么他就非得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加强防卫居民点不可。阿什曼没有责任留在这里。他还不是协会所雇用的代监官。没有人指示他担任已离职的艾尔斯的代监官工作。留下来，这意味着拿他妻子的生命和他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但他到底留了下来，而且移民们似乎也很欢迎他作领袖。

尽管阿什曼外表看来很虚弱，而且过去一向埋头读书，甚至也不爱交际，但他很快就表明是一个活动家。他在利比里亚的头几个月里最关心的是来自土著的军事威胁。起初他向几个主要的王派出外交使节，想以此来对付这种威胁，但是他发现他们是冷淡的、多疑的。这些王从来就反对这个居民点；过去他们是被迫签订条约的；而且他们不可能理解利比里亚人——这些怪人——非常厌恶饮酒、放荡和奴隶买卖的，热心的、消瘦的、患热病的白人，以及身穿欧洲式样的衣服、口说英语的黑人基督徒。

阿什曼猜想，这些王正在计划打一仗，他就催促移民们准备防御。首先必须清除居民点三面陆地上的矮丛林，这样，敌人就不能偷偷逼近进行突

然袭击。多数移民投入了这项工作，而另一组人则修建一个炮塔，作为主要的堡垒和军械库。在这项工作以外的休息时间，移民们就在阿什曼指导下进行操练，阿什曼还从最友好的土著当中征募人员、训练军队。

在一个月之内，阿什曼就完成了基本的防御工事。他的防御计划“是围绕整个居民点画一个三角形，把五门重炮设置在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每一个角都要选在一个适当的制高点上，从那里要能纵射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能扫射防线后面相当广阔的一片地带”。一门架在轨道上的铜制大炮放在炮塔旁，炮塔用尖头桩围成栅栏保护起来。正如在以后的战斗中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个很好的防御计划，而且阿什曼把计划十分透彻地向移民们做了讲解，以防万一他被打死或打昏。

阿什曼在记述这一段早期的历史时，他表示感谢上帝让他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有生病，终于修好了基本的防御工事。一个科学家会注意到，他所谓没有生病的这一段时期，其实是他的疟疾第一次发作前的潜伏期。9月中旬，恰好是他到这

里以后的两个多星期，他因疟疾^①病倒了^②。三天以后，他的妻子也病了，发的烧还要厉害得多。她一向是一个娇弱的妇女——那么娇弱，根本就不应该到这个海岸上来——而她的病床又“简直是一个漏水的草窝，茅草顶挡不住雨水”。

被暑热和工作搞得筋疲力尽的不幸的阿什曼，自己因为发烧而打着颤，受着疟疾的病痛的折磨，但他还是在妻子的身旁守护了四夜。他们的婚姻不是由爱情缔结的婚姻，但是阿什曼喜欢他的妻子，他后悔把她带到非洲来。她死的那天——1822年9月15日——阿什曼自己已经烧得完全神志昏迷了。从那时起直到11月的第一周，他的“身心十分衰弱，几至不能行动，除了感到痛苦以外，对什么都没有感觉。”没有别人扶着，他就不能走动。此外，他因妻子的死亡和害怕自己的死亡而非常销沉，以至不能参与管理工作了。领导利比里亚的职权就移交给还没有因热病而病倒的那些年长的黑人了。

① 也可能是黄热病。见第三部分。

② 关于阿什曼到达蒙罗维亚的时间和生病的时间，前后有矛盾。原文如此。——译者

11月的第一周，阿什曼病愈时，得知土著随便在哪一天都会进攻。布朗利、托多、“总督”、康科、吉米、格雷、朗、彼得、乔治和威利这些酋长，把他们的战士都编入彼得王的军队，彼得王的军队集中在离蒙罗维亚大约四哩的布希罗德岛上，也集中在圣保罗河的阵地上。土著大约有八百人，用滑膛枪、矛和剑武装起来。阿什曼只能勉强用二十来个移民组成的队伍和很少几个靠不住的土著雇佣兵同他们抗衡。

不管阿什曼是出于确信他的抵御能力还是仅仅出于试探性的虚张声势，他派了一个使者到敌营说：“尽管他们费尽心机地保密，但是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他们的敌意布署。而且如果他们不请求用友好的态度解决他们的争端而仍旧要同美国人打一仗，那末他们就要付出巨大牺牲才懂得跟白人^①打仗是怎么回事。”

对于上述威胁土著的尝试会取得效果这一点，阿什曼不抱多少希望，他并不放松他的戒备。移民们不得不布置人员彻夜放哨，白天除放哨以外还要干勤杂活儿。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夜晚，即

^① 非洲人用“白人”一词，指任何肤色的文明人。

11月10日、11日和12日，筋疲力竭的人们都不得不牺牲睡觉，因为阿什曼的土著探子带来了即将进攻的消息。探子的消息是正确的，戒备也证明是有道理的。11月11日拂晓，一群敌人从六十码以外的森林中冲出来，一边放着滑膛枪，一边挥舞着长矛向前猛冲。他们进攻并抢占了阿什曼为掩护侧面而修建的三个堡垒中最西面的一个堡垒。移民们没有来得及开炮就退了下来，然后惊慌地跑进炮塔。

如果土著们进攻炮塔，他们可能已经毁灭了居民点；但是他们的战士却停下来去抢劫他们所攻占的移民们的茅舍。就在这几分钟里，阿什曼和他的黑人副手洛特·凯里牧师，使移民们重新鼓起了勇气，向敌军放了一阵子弹和葡萄弹。

土著们先是退缩了一下，然后就停下来收容他们的死伤人员。

〔阿什曼在使人胆战心惊的一段中写道〕当时美国人就乘机夺回了西面据点，并立即用九磅炮弹的大炮向敌人全线轰击。一大群人这样暴露在现代战争机器的杀伤力之下，最好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致命的处境了！八百个人肩靠肩地挤在一起，龟缩成

密集的一堆，一个小孩子可以很容易地在人群的脑袋上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在他们后面还有一个宽达二、三十人的行列，完全暴露于距此只有三十到六十码远的、架设在炮台上的大火力炮的火力之下！每一发炮弹都在密密层层的血肉之躯中十足发挥了它的威力！他们的射击突然停止了。只听见一阵狂叫，使阴惨惨的森林中刹那间充满了恐怖。叫声逐渐消失了；这一大群人也全都不见了。

据阿什曼讲，移民们只用三十五个人的战斗力击溃了他们的敌人，其中有六个人还是“不到十六岁的本地青年”，有一半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他们的伤亡主要是非战斗人员，计死四人，伤四人，七个儿童失踪。敌人的死伤极大，根本无法作出精确的估计，但据阿什曼报告说，他们为了把死伤人员送过梅苏腊多河，要用一只大型独木舟往来运送十至十二次。

阿什曼再次去同土著谈判，土著再次提出美国人无权占有已占的土地。12月1日，彼得王的军队又开始了对居民点的第二次进攻，向炮塔反复发动冲锋。但是，阿什曼已经设下了坚强的防御工事。“在这次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中，射进

栅栏的子弹，还有竟然打进防线里来的子弹，多得简直叫人不敢相信；但是命中率这样低，只能归之于上帝的特别保佑了。”在敌人的第二次进攻中，只死了一个移民，两个移民受重伤。虽然有三颗子弹射穿了阿什曼的衣服，但是他没有受伤。看了在医院所发生的情况，阿什曼一定曾为他的幸免于难而双倍地感谢上帝：

当时外科知识很贫乏，技术更欠缺，工具根本一点也没有——整个居民点既没有一把柳叶刀，也没有一枚探针！在小小的药房里，詹姆斯氏药粉^①和退热药倒是不少——但是要医治骨折，从移民们受伤的四肢中取出铁片或铜弹片，就完全没有这种设备了。没有柳叶刀，只好使用一把钝的削笔刀和普通的剃刀；没有探针，只好利用一个一般的饰针。

这两次对土著的胜利，使移民们终于有了信心：他们应当呆在利比里亚，他们要留在利比里亚。阿什曼在叙述第二次战斗时说：“他们在最后二十天的艰难困苦和忧虑不安，达到了那么紧张的程度，以致敌人火力的第一次齐射一响，每个人

^① 十八世纪英国医生罗伯特·詹姆斯配制的一种药粉，发汗、催吐用。——译者

反而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这枪声保证了：结束他们的焦虑的那个时刻已经来到了。”

移民们一直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阿什曼写到他们时说，“就是最老练的军队也不可能表现得比他们更沉着、更坚定了”。这些战斗的祖先在利比里亚至今还受到尊重。12月1日为纪念一个女移民而定名为“马蒂尔达·纽波特日”，这个女移民把她烟管中的火种投入炸药，向敌人开了一炮。至少传说里是这样讲的。唯一留下了文字记载的目击者阿什曼没有提到马蒂尔达·纽波特，只是挑出洛特·凯里牧师予以特殊的赞扬。是他，在敌人第一次进攻时重整了惊惶的队伍；是他，给伤员做了最简单的外科手术。凯里的出身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奴隶，他用他当大杂货店经理赚得的钱为自己及其一家赎了身。当奴隶时他就用功读书——一边干活一边读斯密的《原富》——后来被任命为牧师。他到非洲去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一个非洲人，我愿意到一个按照我的功过而不是按照我的肤色来评价我的国家去。”

凯里在给美国的一封信中，把这第一批利比里亚人比之于那些古代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在

重建他们的城市时，“一手拿着武器，一手劳动”。其实也可以把他们比之于现代的犹太人，现代的犹太人在建立以色列时，对阿拉伯人发动了两次惩罚性的袭击。利比里亚人，象以色列人一样，对于他们所占领的领土是没有真正权利的，但是由于他们在海外受到迫害，由于他们自认为有优秀的文明，他们呆在那里就变得有理由了。技术、火力和生存的意志，是在利比里亚一边——也在以色列一边；几乎没有什么人同情瓦依族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第四章

我们每个星期日布道，每天晚上都举行祈祷会。许多获释的非洲人前来接受洗礼，我们预计不久来的人会更好；看来他们比美国人更勤奋。

(一个利比里亚的移民给他在美国的旧主人写的信)

到1823年2月，利比里亚已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小国家了。彼得王及其同盟者在两次大败之后已退回他们的村庄，移民区终于得以放松戒备。负伤的移民们还没有恢复工作，但是至少能够吊着悬带、扶着拐杖活动活动了。在11月里被拐走的儿童们，在第二年初，大多数都送回给移民了。虽然阿什曼曾预言这些孩子们将遭到厄运，但实际上土著们待他们极好，甚至把他们都宠坏了，以致孩子们都不想回到他们那些比较严格的双亲这边来。现在移民们自己有五十五幢房子，还有一些

屋顶盖得厚厚的茅舍，可供预计在夏季到来的下一批移民居住。贮藏的食物剩的不多了，但是烟草存货还有不少，可以用来到内陆去换取山羊、公牛、小鸡和蔬菜。

阿什曼的勇气曾有助于保存利比里亚，但他是属于危难之际得意、顺利之时烦恼的那种人。在他的1822年的日记和信件中充满了激昂的情绪和旺盛的活力，甚至还带有幽默味儿，但是在1823年，却又出现了一种哀伤的调子。他在3月23日写道：“我的天性是不会太轻易地发牢骚的”，接着他却非常轻易地用整整一页篇幅来发牢骚……“但是试想，有这么一个生来爱好交际的青年人，他几乎完全脱离了文明的和基督教的世界；他的身体被六个月的热病损伤了；他的唯一的尘世的安慰者突然被夺走了。”我们是不难同情他的痛苦的，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阿什曼、培根、米尔斯以及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的无数其他人都十分了解在西非能有什么样的遭遇。培根到那里原是准备去死的；培根的传记作者阿什曼原是要“抛弃文明世界”，在野蛮人中度过他的一生的。如果他们后来觉得不中意，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

不过，阿什曼的自怜情绪是不多见的，至少有时是有充分道理的。1823年5月23日，官方的代监官艾尔斯医生又回来重新执掌他的指挥权了。我们知道，阿什曼很看不起艾尔斯，艾尔斯在一年以前曾逃出利比里亚，并曾尽力劝说移民们跟他一起走。是艾尔斯同彼得王缔结了一团糟的、毫无用处的条约，就是这项条约成了战争的祸根。现在，战争结束以后，艾尔斯回来了，而且准备重新就任。单是想到这些，阿什曼就有充分理由感到懊恼了。美国殖民协会的来信中还有更坏的消息。政府和协会对阿什曼的贡献表示感谢，但他们拒绝给他任何正式的任命；他们也不拿出一笔钱来酬答他的功劳，而且他们还拒不支付阿什曼替他们订购商品的货款。

协会的理事们对阿什曼从来没有好感，他们叫艾尔斯剥夺他在移民区的一切权力。一般人如果怀着阿什曼这样的委屈，一定会一怒而离开利比里亚。然而，阿什曼仍然梦想靠经商发财；他仍然希望协会会给他一笔酬劳。也许他有所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艾尔斯医生将会再次逃离这个危险的移民区，让他来作它的统治者。

阿什曼被剥夺了正式职务，他就把他的精力投入经商。他同塞拉勒窝内的扎卡里·麦考利一样，也为贪婪所诱惑。同麦考利不同的是，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错误和伪善：

追求利得显出了过去我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诱惑力。这颠倒了本来是很好的目的。我有债要还；必须筹点钱。但是一旦沉溺于这种追求，我的思想就会自己直接滑到其他种种个人发财致富和懒惰放任的观点上去……只要金钱成了生活的主旨，邪恶的欲望便把灵魂中的一切高贵的感情刚一出现就扼杀了。

从这一段怨言中，人们可以想象阿什曼的生活已经完全热衷于做生意和享受了。然而他却写了短论、文章和一系列行动准则，诸如：“一天二十四小时内只有一顿饭吃肉、吃鱼或吃鸡”，“除纯正的典雅的隽语以外，决不可说俏皮话”，以及“与其同极平庸的在世演员交往，毋宁同卓越的已故作家作伴”——在蒙罗维亚，这是一条容易遵守的准则，因为不管好的或坏的，那里根本没有演员。他的勤奋是惊人的。每天，他用四个小时来读布莱克斯通的《评论集》。在西海岸住过的人都知道，用四个小时去读一本平易的侦探小说就已够苦

了，更不用说去读布莱克斯通的东西了，特别是在整整一天的做生意、写日记、读哲学书和宗教书以后。然而，阿什曼在1823年4月居然能够写道：“我为天父作工，常为我自己的懒惰和愚蠢所累。唉！唉！在祈祷时、在读圣经时、在神交时，我的真诚何在！”

阿什曼离职的时间不长。坏脾气的、生硬的艾尔斯医生，硬要实行在华盛顿设计的建镇规划，几乎立即得罪了所有的移民。那些移民，他们建设了自己的家园并为之而奋斗过，当然不愿意搬家。他们怨恨那些得到同样的食物和给养的、新从美国来的移民。到第一个雨季来临时，这种不满情绪已极严重，当时艾尔斯得了热病，再一次逃走了——这次可再也没有回到非洲。阿什曼再次成为没有名义的代监官。

1822年，移民们为生存而战的时候，是有纪律的，是勤恳工作的。1823年，他们的心情是腻烦的、好挑剔而又懒散的，这使得他们不愿意种地，不愿意做公共的事情，吃了协会仓库中的口粮而不愿干活。阿什曼急于讨好协会，所以他坚持艾尔斯的严厉的政策。他轻率地重新分配土地。

他坚持人们每周要用两天做公共工作，并以对缺勤者停发口粮相威胁。不满发展成为暴动，移民们袭击了仓库，并写信给协会控告阿什曼贪污渎职。

由于孤立和发火，阿什曼斥责反抗者，说他们卤莽、造次。“你们的田里什么也没有长出来——连供应一个星期的东西也没有希望。你们今天感觉到贫困的魔掌带来的苦恼，可是明天的情况势必更加糟糕。你们要是继续玩忽职务，你们就将沿着海岸到处流浪，或者毁于饥饿。”

不满分子的领袖就是那个洛特·凯里。他同阿什曼一起来到非洲、那么勇敢地同阿什曼一起并肩战斗，而且在行动上曾是忠实于移民区的模范。阿什曼向美国殖民协会委员会汇报了自己的困难，得到的回音是对移民们采取果断手段。他们收回了洛特·凯里的布道许可证，批评了阿什曼过于宽容，嘱咐他今后要以立即罚款或下狱的办法来惩罚任何的无礼行为。必要时，他可以请美国海军军舰支持。

在这些指示下达时，阿什曼已经被迫离开蒙罗维亚了。当时大多数移民都是怀有敌意的，在

1824年3月，当阿什曼限定了移民区的粮食供应以后，他们就举行了武装暴动。面对群情愤慨而束手无策的阿什曼，决定到佛得角群岛去，那里的气候比较温和些，但是离海岸不远，不妨碍继续进行贸易活动。阿什曼在离开利比里亚以前，写下了一份尖刻的留言，向一切责难者进行答辩。“我走以后，不管谁，要是说我虽然在梅苏腊多角作过种种牺牲，劳动和受过苦，却除了一件值钱的礼物——沃斯威果制的衣服——以外，还接受过一法寻^①酬金，谁就是硬在说谎，总有一天他会感到不胜羞耻。”代监官家里吃的饭，从来没有“使移民们的午餐少掉一片卷心菜的叶子”。这个留言一而再地对个别移民发出恶狠狠的侮辱，如象“B. J.，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象恶魔一样，敢于对我肆意诽谤。”

阿什曼于1824年4月1日离开利比里亚时，情况是很凄凉的。几天以前，当他打算拔掉一个坏牙时，他把他嘴里的一根动脉搞断了，流血不止。正当他遭此不幸的时候，贼跑进他的仓库，偷

^① 法寻——英国最小的铜币名，等于一便士的四分之一。——译者

走了他的价值一百七十五美元的财产。

协会和美国政府为暴动的消息十分恼火，所以派了一个代表乘军舰到利比里亚去。他们所挑选的人是拉尔夫·R·格利，当时二十六岁，最近参加了协会，作为一个基金筹募人。他是一个沉着、文雅的人，他具有清教徒中少见的宽宏大量，后来他把他的漫长的一生献给了利比里亚和协会。

当他乘上美国的“海豚号”的时候，他似乎也象一般人一样对阿什曼的能力抱着怀疑态度。在阿什曼离开后不久，有一批美国海军官员在梅苏腊多上过岸，听到了“弱者的谣言和恶人的毁谤”，这批官员把移民们的控诉传播了出去。然而格利急于听取有关这一事件的双方的意见，所以他首先驶往佛得角群岛去访问阿什曼。这两个人立即相互尊重和喜欢对方。格利在十二年以后写的阿什曼的传记中，回忆了他对阿什曼的第一个印象，说他是一个“为暴风雨所震撼但能自我控制的神灵。……他象雄鹰一样顶着暴风雨和雷云凌空而上，已经瞥见了天国的纯洁和光明”。格利以并不怎么抒情但更为中肯的语言写道：“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阿什曼先生的品格的良好印象被以

后的每一次谈话所加深……要证实强加于阿什曼的那些责难，连一点儿证据的影子也没有。”

格利在普腊约港停留了三周以后，决定重新任命阿什曼为协会的代监官，虽然他很了解这样做会使协会理事们不高兴。然后他们两人一同乘船到利比里亚去。格利在利比里亚呆了一周，阿什曼则留下来履行职务。虽然阿什曼因为移民们前几个月的令人不愉快的举动还在生他们的气，格利还是主张采取一种安抚政策。他没有对暴动者提起诉讼，他建立了一个移民会议，请他们给政府提意见；他鼓励移民们在代监官的领导下执行职务，同时他就他们作为这一新共和国之公民的义务作了一通演说。美国殖民协会的理事们不同意格利的政策，也不肯批准他的改良办法，相反，他们要求惩罚暴动领袖。但是因为横渡大西洋的邮件的长期迟滞，这些指示传到利比里亚时，已经完全过时了。那时，由格利的代理人阿什曼所实行的格利的改良办法，已经把一個反复无常的移民区变成了一个有生气的、繁荣的国家。

感情的变化一定是开始于阿什曼不在的五个月时期里。在洛特·凯里的统治下，移民们很后

悔他们对代监官的敌视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得不到美国的粮食供应了。阿什曼回来以后写道：“起先我认为给予格利先生和我的欢迎并非出于诚意；但是不管表现得怎样过火，我现在相信这都是出自内心的。自从8月24日以来，以无礼侮慢对待你们的代监官的事，我连一个例子也举不出来，而是每天亲眼看到一些好感和尊敬的表情。”许多移民放弃了他们一向从协会得到的口粮，并且约定今后靠他们自己的劳动生活。大多数先前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对阿什曼表示抱歉。这种心情的变化，在洛特·凯里身上最为显著，他克服了他先前的“讨厌的和无情的坏脾气”，而现在则保持“一种无比亲切而诚恳的歉恭态度”。

阿什曼利用移民们的这种变化了的心理去完成公共事务的计划。在他回来的几个月之内，他已经监造了石头的防波堤，改进了防御工事和扩大了耕地而积。他给华盛顿的那些冗长的信件，描写了移民们发生的精神变化、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好品格”。协会的理事们最后相信了，而且在1825年初，他们任命阿什曼为殖民地的永久代监官，同时对他的“思虑明达和稳妥可靠”表示感

谢。

拉尔夫·格利支持阿什曼并对移民采取宽大政策，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了。1825年，他被选为协会秘书，年俸一千二百五十美元。他现在能够同阿什曼一起工作来加强、改进和扩大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在读利比里亚历史时，也象读塞拉勒窝内的历史一样，人们往往会因为运气的突然变化而感到惊奇。1823年初，利比里亚是欢乐、团结和自信的。1824年初，它是痛苦、反抗和阴暗的。1825年初，同样是这些移民，在同一个代监官的领导下，它再一次成为欢乐、团结和自信的了。在西海岸，忧虑能象雨后的嫩叶那么快地生长出来，希望也能象碧空那样突然重现。阿什曼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领导者，他懂得如何遏止忧虑而培育希望。他继续执政的三年，几乎完全是成功的。

阿什曼的作为协会代监官的职位，使他有权领导殖民地。阿什曼的作为美国政府对获释非洲人的代监官的职位，使他从1819年《奴隶贸易法案》所设置的基金中获得了一大笔欢迎之不暇的收入。这些钱，多半是用于防御工事。在1822年曾经抵挡过土著进攻的斯托克顿堡垒，为中央堡

垒所代替，这是一个坚固的三角形炮台。阿什曼在靠近梅苏腊多角的顶端的第二个炮台里安置了四门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大炮，并且在克朗山上造了一个有八门大炮的炮台。为殖民地防范了土著、海盗、奴隶贩子的威胁以后，阿什曼就为由美国海军送来的获释奴隶建立了一个营地。不久，建筑工程就扩大到了与《奴隶贸易法案》不是很相关的其他计划上去了。美国政府为以下建筑付出了经费：两座货栈，一座谷仓，一座石头军火库，一条多桅船，以及阿什曼自己的代监官官邸，这是一所由美国运来的黄松木造的木结构房屋，造价七千五百美元。移民中的比较富有者也不得不为市政建设付一笔税，不久就造起了两座大礼拜堂，五所学校和一个小型殖民地图书馆。

同毗邻部族的关系已经改善到这种程度，阿什曼可以用一只公牛和“很少一点甜酒”宴请五十个土著。但是为了保证安全起见，他建立了四个国民警卫连，其中列在第一线的是“巴伯上尉的轻步兵，由经过选择的青年组成，全副武装配备，受过严格训练（相对地说），共约四十人。制服是淡蓝色的，镶着白边”。

殖民地的规模，随着美国每来一批移民而扩大：1825 年来了六十六人；1826 年来了一百八十二人；1827 年来了二百二十二；1828 年来了一百六十三人。由于殖民地发达了，新到达的移民也就有了适当的住处和食物，所以很少有人死于“创业初期的热病”。而且，洛特·凯里在医学研究上也有了进步，成了一个很好的业余内外科医生。

象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的许多总督一样，阿什曼严责移民们的与其依靠农业不如依靠商业生活的思想。这件麻烦事是很奇怪的，因为阿什曼同塞拉勒窝内的麦考利一样，本人是一个宁肯经商而最不会种地的人。然而，作为美国殖民协会的代监官，他觉得有责任应该促进糖、咖啡和棉花的种植计划。他写作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热带农业的手册。他随意向农民建议，如何改进他们的庄稼，而且他经常警告忽视农业的危险；如果移民们不得不依靠内陆土著供应他们的食物，那么食物的价格就会猛涨四、五倍。

这些论证并不能解决经济上的实际问题。蒙罗维亚左近的土地是贫瘠的；殖民地没有驮兽；雨

季和稀奇古怪的虫害往往毁掉在烈日下辛勤劳动的成果。而且移民们简直不愿意吃本地的薯蕷、香蕉和山芋，情愿花钱买高价的进口食品。他们为自己的家庭饲养小猪、山羊、小鸡和鸭子，但很少热心用全部时间为市场耕种土地。当一个工匠为另一个人劳动一天能赚两美元的时候，他是不愿意用农业上的靠不住的命运来冒不利储蓄和浪费时间的危险的。

大多数有力量从事贸易的移民都经商去了。他们从美国买来衣服、甜酒和烟草之类的货物，然后把它们卖给内陆，换回非洲的货物。从1826年第一次发行的《利比里亚先驱报》上的一则广告，就可以看出贸易的范围：

急需征求下列商品：薄木板，厚木板，盖屋板，窗玻璃，钉子，陶器，各种金属器具，家具，刀剑，烟草，烟斗，大号串珠；美国棉布，方格花布，印花布，皮鞋，长筒袜，白葛布，细洋布，亚麻布，钮扣，纱线，梳子，奶油，羔肉，火腿。上述物品如愿出让，可换取下列货物：赤色染料木，象牙，龟壳，金沙，鹿皮，豹皮和虎皮；米，鸡，鱼，山羊，绵羊和水果。

这张货单没有提到酒，这暗示，这个商人也许就是

在同一张报纸上警告老百姓的那个人，这个警告是：“与土著进行人血或含酒精饮料的交易是违反宪法的”。

违反宪法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正如阿什曼对协会理事所解释的那样，只要卖酒有利可图，那末，酒是必定会走私进来的。所以他建议应该由特许的零售商卖酒。甜酒和威士忌的批发商享有完全的专卖权，并强取300%的利润。这个批发商就是阿什曼自己。

除了阿什曼以外，没有白人商人，但是黑人热心地做起生意来。一个移民大为惊异地看到“连最年轻的人也不要多少时间就很老练了，做起生意来就同康涅狄格州的贩卖各色洋铁制品、肉豆蔻、书籍和干货等的流动商贩一样苛刻”。甚至牧师也投入了贸易活动；如洛特·凯里成了里士满一家商行的代理人，他给这家商行寄去了六千磅本地产“利比里亚”咖啡。美国的买主当时深受感动，可是以后揭露出来，原来凯里是从一艘过往的商船上买到这些咖啡豆的。

有些移民发了很大的财。有一个移民，名叫弗朗西斯·德瓦尼，从1823年起，以二百美元为

资本，在七年内，他的资产已达两万美元。科尔森·M·韦林牧师经营一项商业，毛收入达七万美元。黑人资本主义——在现代美国是如此之薄弱——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非洲是很兴旺的。

兴旺激起了扩大利比里亚边界的决心。阿什曼在 1825 年同彼得王缔约取得了布希罗德岛，接着又在圣保罗河上游二十哩处弄到了一个地盘，还在斯托克顿小湾附近设立了一个站头，作为获释奴隶的转运站。但是，阿什曼的野心并不限于利比里亚附近的沿海那一小块地方。他谈论过并写过有关深入西非的、贡献给上帝和自由的、伟大的美国殖民帝国的问题。他以奴隶贸易的不道德行径，证明这些帝国美梦是正当的；当时奴隶贸易还在蒙罗维亚的视线范围内继续进行。他很有理由地断言，奴隶贩子是用拐骗绑架和海盗行为来增进他们的贸易的。但是，阿什曼之反对奴隶贩子，部分地是由于商业嫉妒所引起的。他在 1825 年 7 月 18 日写道：“这一周，有两百个奴隶的定洋流入了我们的领土，使殖民地受到了难以计算的损失。”奴隶的出售不仅提高了其他土产的价格，而且奴隶贩子购买奴隶都使用了不正当

的通货——甜酒。

同年8月，阿什曼对西班牙奴隶贩子的奴隶转运站发动了一次进攻，因为他认为这些奴隶贩子犯了海盗行为的罪。当他们沿海岸南向进军时，阿什曼及其部队经过另一个奴隶转运站，从那里传出了呻吟和叮咣作响的镣铐声，但是他们觉得不能予以干涉，因为那里没有犯海盗行为的罪。他们的袭击和摧毁那个有罪的奴隶转运站，证明是一次军事上的和道德上的胜利：“在当时组成这支部队的五十四个人当中，没有看到一个不法行为的例子……没有拿过一只鸡或一只香蕉。”

1826年，阿什曼对扬格-谢斯特斯地区的名誉极坏的特雷德镇，发动了一次更为抱负不凡的进攻。阿什曼用三艘美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向岸上进攻，在进攻中阿什曼撞在一块石头上，受了伤。但是疼痛并没有减少他看到特雷德镇在二百五十筒火药的轰击下燃烧和毁灭时的喜悦。喜欢战争喧哗的阿什曼写道，“显示了一种令人害怕的壮观”。

这几场小小的战斗引得阿什曼产生一种按捺不住的好战心理。1828年11月28日，他在向华盛顿

报告近来同买卖奴隶的巴萨族争吵的情况时说：“我们不要打仗，但是，哼，如果我们打，就狠狠的打。但愿上帝防止流血的命运！但我们的小小武装力量是可以一战的。如果理事会主张不使用武力，要使他们的殖民地永远地完全地避免战争的灾难，我看只有撤回他们现在的代监官，由一个更为聪明的（我不是说更为温和的）人来代替他的职位才行。”阿什曼清楚地知道，他的好战政策是受协会欢迎的。这一时期，美国的殖民主义者谈到要“扭转帝国的潮流”，由向西发展变为向东发展，还谈到要建立一个包括现在的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等国在内的新美国。

1828年及其以后的好几年，美国的殖民主义者喜欢利比里亚，也为利比里亚而骄傲。来自移民区的大多数报告，证明了在非洲为自由黑人谋得较好的生活完全是可能的。局外人又增添了他们对利比里亚人的赞美。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1832年写道：

他们的房子建筑得很好，用花园和其他令人喜爱的装饰品点缀起来，而且房子的内部也是非常整洁的——墙壁粉刷得很白，房间摆设得很整齐。他们对客人是

很殷勤的，在停泊地的许多英国海军官员曾被他们邀请去参加宴会，也曾同他们在一起便餐，这些膳食都是很卫生、很好的……他们都能说很好的英语，而且没有任何发音方面的缺点。他们的书籍供应很好，特别是《圣经》和祷告书。

英国作家哈里森·兰金在塞拉勒窝内呆过几个月，他以称赞的口吻把利比里亚同塞拉勒窝内相比较，而且特别赞扬了蒙罗维亚的新闻工作。

许多利比里亚人写信到美国，对殖民地和他们的新生活作了很好的评价。有时，先前的奴隶写信给释放了他们的主人。有一个哈特太太写信给她的女主人道：

我们的房子有一间正房，有一间堆房，还有一间在二楼。我们的地皮位子镇上一个非常美丽的地区，我种了很多非常好看的树。我托哈特先生送给您一些玳瑁壳和一小块象牙；并送给××小姐和××小姐一些贝壳。请代我向她们问好，并且告诉她们，我祝她们也有象这里一样可爱的海滨，早晚在那儿散步。亲爱的女主人，您不知道我多么感谢您，因为您买了我的丈夫。

另外一个利比里亚人，很满足于每个星期日的礼拜和每夜的祈祷会。他写道：“我一定不为我在美

国所看到的一切而放弃我自从来到非洲所得到的快乐。”

象这样一些讨好白人殖民主义者的信，都被协会用来作为宣传品，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信的诚意。

有好几年，阿什曼是殖民地上唯一的白人，他平等地看待他的黑人公民。在他的日记中，既看不到蔑视，也看不到什么优越感；他似乎没有沾染到他的同胞所有的种族偏见。有些黑人，他不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怀有恶意，但是他不因为不喜欢个别黑人就推而广之不喜欢整个黑色种族。他对他的黑人朋友也是从个人来评价，而不是作为幻想中的、黑人虔信宗教的象征来评价的。

1828年3月，阿什曼再一次病倒了，他决定到西印度群岛去恢复健康。26日，他离开利比亚的时候——我们来引用洛特·凯里的记录吧——“这时候，几乎全部（至少是三分之二）蒙罗维亚居民，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都出来了，而且几乎都是含着眼泪同他告别，我认为，在几个月之内他会回来的希望才使得他们放他走的。”但是，在船上以及到达西印度群岛的圣巴塞洛缪医院以后，阿

什曼的病更重了。甚至在医院里，在他病危时，他还有精力写了许多小册子、祈祷文和劝世文——“呵！让我的心永远象刚刚耕过的土地，尽情地吸取天国的清新露水吧。”他在临终前被送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在那里，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格利见到了他并安慰了他。在他死的那个傍晚，“他同好几个来访的先生们谈了话；作了一些关于他从海盗手中营救出来的、后来又陪他一起航行的那个非洲少年的指示……快到12点时，他坐起来了，提出了一、两个要求，当他再次躺到枕头上的时候，几乎立刻就死了”。那是1828年8月25日，离阿什曼登上非洲大陆差不多是整整六年。

阿什曼逝世的噩耗还没有传到利比里亚时，临时代监官洛特·凯里在一次火药爆炸事件中炸死了。为建立和保卫利比里亚做了许多工作的这两个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的死，在殖民主义者当中引起了某些敬畏的反应。《非洲宝库》上说：“这两个人的相遇是多么意料不到，多么有趣，多么动人。他们如此长久地团结在基督教的友谊中、在仁慈而艰难的劳动中、在那个光荣而永生的世界中！”

第五章

上帝啊，我们祈求那个七个头、十个角的怪物，殖民协会，能为火炽的真理之鏊彻底毁灭，并象鲸鱼处在旗鱼和鲨鱼之间那么苦恼。

（斯诺登神甫，一个黑人传教士，他的会众大都是来自波士顿的捕鲸队）

阿什曼的非洲帝国之梦并不比他长命多少。虽然利比里亚把它的边界沿海岸向南发展了，但它仍然是西非的最小国家之一。自从美国北方佬的福音派带领十字军在整个非洲传播基督的教义以来，一百五十年已经过去了，然而非洲大陆的十分之九的人仍然是穆斯林或异教徒。这个失败不应归咎于美国黑人移民——他们确实从来不希望建立一个帝国——而是应该由美国的白人政治家负责。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正当利比里亚最兴旺的时候，美国殖民协会陷入了一场对自己不利的、甚至是损害重大的争论之中。

当时，美国已经逐渐被州权和奴隶制的争端所分裂。这个争论一直可以回溯到独立后的头几年，它是同经济上的差别紧密相连的。北方的工业各州赞成高关税以保护他们的工业。而南方依靠出口的各农业州则需要低关税和廉价的进口货。这个争论不可避免地就牵涉到了奴隶制。北方人不需要奴隶在他们的工厂中工作，他们对需要廉价奴隶劳动为其种植园工作的南方人，意见就越来越大。因为北方和南方都要求在西部领土上实行自己的原则，所以双方的敌对形势就更加尖锐了。就密西西比以西的新土地达成的密苏里妥协案并没有解决这种敌对形势。

在这场争论中，比较次要的受害者之一是美国殖民协会。只有联邦的补助才能提供足够的货物、船只和移民把利比里亚变成一个兴旺的国家。南方人在原则上就反对联邦给予援助，而协会同亨利·克莱的关系，更使协会吃了苦头。几年来，克莱一直想当总统。南方的死顽固们指责克莱利用协会作为在北方争取人心的工具，他们认为根据宪法美国没有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权力。有一个反对克莱的参议员叫嚷道：“在我国所有已经设计

出来的一切大胆的计划中，没有一个计划比这个殖民计划来得更狂妄、更不实际或更为有害的了”，他还责备阿什曼“同西班牙人、法国人以及土著开了仗”。当南方人安德鲁·杰克逊在1832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克莱的时候，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否决了一项大规模扩张利比里亚的法案。从此以后，利比里亚就不得不依靠私人捐助和公众的热心支持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协会又遭到了一个挫折。

南方政治家们攻击殖民主义者的时候，往往谴责他们试图取消奴隶制。南方的立法者和报纸社论把协会描写成为“国内所有狂热精神的仓库”，把它的观点描写成为“盛上帝之大怒的金碗”^①。历史学家托马斯·R·迪尤作了一个不太狂妄但是更为致命的攻击。他预言：把黑人移往非洲只会抬高奴隶的价格，鼓励奴隶的繁殖，而最后造成黑人人口的增加。当时由于棉花价格的上涨造成了奴隶价格的提高，这就使得他的论据更有了权威性。

协会坚决声明，它不是反对奴隶制，而仅仅是

^① 意即“灾难”。见《新约·启示录》，第16章。——译者

关心自由黑人。协会秘书拉尔夫·格利说：“这个协会没有发表什么新的、危险的主张。它的唯一目的是清除对我们的社会利益有害的和危险的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是愚昧的、品行不端的和不吉利的人。”殖民主义者为了贯彻他们的主张，就不厌其烦地反复罗索自由黑人的悖逆和无用。他们的小册子作者写道：“1826年，在二百九十六个判了罪而被送往费城监狱的人中，有一百一十七个人是有色人，差不多七个里面就有三个。如果把有色人罪犯的人数按州里有色人的人口比例加以折算的话，应该只有六个，而不是一百一十七个。”他接下去断言，有肤色的穷人有同样的高比例，而且警告说，在六十年时间内（到1898年），在美国可能有八百万黑人——“一个有八百万堕落的、受到鄙视和压制的人的国家！”无论如何，从统计数字上讲，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这些反对黑人的言论可能减轻了奴隶贩子的敌意，但是大大激怒了自由黑人。在费城，监狱和感化院里的黑人拥挤不堪，协会代理人抱怨说自由黑人“没有一个愿意听一听那个计划，更别说迁往国外了”。在纽约的一次自由黑人的集会的决

议中说：“这里是我们的家，这里是我们的国家。在它的地下埋葬着我们祖先的尸骨：我们的有些祖先曾为它而战、而流血、而死亡。我们生在这里，我们也要死在这里。”自由黑人抱怨说，送往利比里亚的移民，不是他们村镇上的渣滓，就是不需要的奴隶，只是因为要把他们移往非洲才把他们释放了。这种非难基本上是正确的。到1866年为止，送往利比里亚的一万一千九百零九名移民中，有四千五百四十一名生来就是自由的，有三百四十四名是赎买了自由的，有五千九百五十七名是特地为了移往国外而释放的。这最大的一部分人中，虽然大多数人无疑是感到满意的，然而他们不是迁移出去，而是被放逐出去的。

协会为了抚慰奴隶主，在原则上做了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招致了来自废奴派的猛烈的和越来越厉害的攻击。这种攻击，以其摧毁性的力量始自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笔下。

反对奴隶制运动没有加里森这个人也会成长壮大起来，不过他用他的犀利的笔锋使它燃烧得更为旺盛。象路德、卢梭和潘恩，象马克思、希特勒和毛泽东一样，他能够表达一个革命运动的义

愤和希望。他是一个把一生献给黑人的白人，一个具有魔鬼之盛怒的基督徒，一个挑起内战的和平主义者，他的观点是不容易捉摸的，而且是似非而是的。但是，不管是对是错，加里森以其愤慨和天才进行了写作。现在，他还以其对奴隶制进行的伟大的讨伐运动而为人所追忆，但是许多年来他的主要的怨恨是针对美国殖民协会的，协会始终没有从它所受的震惊中完全苏醒过来。

他所受的那种教养，就是适合于造就一个反抗者的。他的嗜酒的父亲抛弃了他；他的唠唠叨叨的母亲不大关心他；他的小学教师叱责他，不许他用左手写字。他在作印刷工学徒时，不久就发现自己从事报业的才能，并在二十一岁时买下了一家报馆，这是他所主办的第一份报纸。二十三岁时，他又转入一家宣传戒酒的报纸，他在报上不仅严厉批评了暴饮的恶劣行为，也批评了戏院、跳舞、赌博、怒骂、卖淫、不守安息日、决斗以及把债务人下狱等恶劣行为。这最后一项，特别符合他的心愿，因为他必须借债办报。

加里森在二十三岁时，对殖民运动是有好感的，对奴隶制倒还不那么关心。以后，他因诽谤罪

而坐牢时，他认识了几个逃亡奴隶，他们都在等待着被他们的主人领回去。这件悲惨事实是如此震惊了他，他决心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废除奴隶制度的事业，并为此目的而创办了《解放者报》，于1831年1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他事先从对这个报纸感兴趣的白人、自由黑人和各种友好的牧师那里收取了报纸的预订费；但是这张报纸的成功还是由于加里森的文风。他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论战的老手。创刊号的第一版登出了一篇传遍全国的、号角一般的社论，而且，每一本历史书论及那一时期时，也都引用这篇社论。

我知道，很多人会反对我的严厉的语言；但是难道没有严厉的正当理由吗？我一定要象真理那样的严格，象正义那样的不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意用温和的态度去想、去说、去写。不！不！你可以叫一个家里起火的人温和地向人呼救；你可以叫一个男人温和地从强奸者的手中把他的妻子救出来；你可以叫母亲慢慢地把掉在火里的婴儿救出来；但是在当前这样一个事业中，你不要劝我使用温和的态度。我是认真的——我毫不含糊——我决不宽恕——我一吋也不后退——我一定要说给人听。

《解放者报》的读者，在头几个月里是很少的，而且几乎全部限于自由黑人。1831年下半年，加里森在新英格兰做了一连串的演说来壮大他的号角般的社论的声势以后，有更多的白人和黑人都相信他的论点了。这一年年底，他已经集聚了足够的力量建立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加里森的最终目的是废除奴隶制，但是他的最初目的则是扑灭殖民运动。《解放者报》用于攻击殖民运动的版面比用于攻击奴隶制本身的版面多十倍。加里森对他的黑人听众发誓，他一定要领导一个十字军来“反抗这些不义行动的宣传者”。

殖民主义者不是在一开始就了解加里森的敌意的危险的。1831年4月，格利在《非洲宝库》中提到一个“卤莽的、受了欺骗的青年，正在从波士顿散播火种”，然后他还是不指名地责备这个“声言谴责战争的人，是在竭尽全力挑起敌对情绪和最可怕的激情”。殖民协会的新英格兰代理人乔舒亚·丹福思以这种危险警告华盛顿，但是理事会并不感到紧张。就象法国的吉伦特派和俄国的社会党人一样，这些温和的改良派没有认识到，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最可怕的敌人总是左派。

1832年夏，加里森以其愤怒的全部火力攻击殖民主义者。他长期来搜集和分析了每一期《非洲宝库》，现在他就用协会的这个机关报作为协会缺德悖道的证据。他在1832年写的《关于非洲殖民的意见》一书，就是打算用对手自己嘴里的证据来攻击对手。他引经据典地证明殖民助长了奴隶贸易，贬低了黑人，有害于非洲而仅仅有助于南方的种植园主。他在写到《非洲宝库》时说“我逐页细读，先是困惑，继则惊愕，最后是愤怒”。

加里森在《关于非洲殖民的意见》中论证说（应当承认他论证得很有道理），移民的办法永远不能消除美国的奴隶制度。根据殖民协会印发的传单，美国有二百万奴隶和五十万自由黑人，这两种黑人都在迅速增加。在最近十年中，殖民协会的收入是112,841.89美元，而支出是106,457.72美元。在这一时期内，有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被运往非洲。那末，要把全国的全部黑人都送出去该用多少时间和多少钱？

殖民主义者认为，虽然黑人很坏，不能留在美国，但是他们能够使非洲得到开化。加里森在一篇标满惊叹号的文章里，猛烈抨击了殖民主义者

的这一论点。“我们把凡是同我们的道德观念不合的，或是危及我们的平安的，或是品性极其卑劣的人，都仁慈地丢给了非洲，说这不但是为了非洲的现时利益，也是为了它的长远利益。”加里森在引用了殖民主义者把自由黑人称为“众所周知的愚昧、下贱和肮脏”的话以后，他愤怒得咆哮了起来：“呵唷，呵唷！连我的心都疼了；我的心都翻腾起来了！”

没有什么再比阿什曼关于战胜敌对的土著军队的记事更使加里森生气了：

土著“对岛民的大炮的恐惧”（用阿什曼先生的语言），一定从一开始就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深刻而有益的印象，因此，不久以后，从这些大炮射出的“每一发炮弹都在密密层层的血肉之躯（是他们自己的肉体）中十足发挥了它的威力”的时候，他们一定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死里逃生！……多么高明的办法：硬使人相信，强迫人感谢，加快非洲人改信基督教的速度。

加里森把《非洲宝库》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视为美国殖民协会的正式政策。他断章取义；他无视利比里亚的许多成就；他曲解利比里亚缔造者的动机和方法；一句话，他的书是不公正的。但是，

加里森所着手干的，不仅仅是争论殖民的功过而已。他发动了一个道义上的十字军。问题不在于

非洲的气候是否有益于健康，或者殖民地是否处于兴旺状态，或者我们的全部有色人口是否能在三十年内或三个世纪内运送完毕；或者有的奴隶是否以放逐为条件而被解放的。问题是在于协会的主义和原则是否符合于福音的主义和原则，奴隶主是否是其奴隶的合理的所有者，马上废除奴隶制，并把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蒙受不应有的耻辱的有色人视为同胞和国人，究竟是不是国家的神圣义务。

殖民主义者要改良。废奴主义者要革命。而具有真正革命本能的加里森懂得，他首先必须打倒改良主义者。他在这时说道：“我把推翻殖民协会视同推翻奴隶制本身。要么就让它们统统存在，要么就把它一起打倒。”《意见》这本书并没有摧毁奴隶制，却严重地打击了殖民主义者的事业。协会在新英格兰、纽约以及远到俄亥俄州的代表们，揭发了对于反对奴隶制阵营的大量反叛行为。文雅的格利不是能抵抗如此刻毒攻击的人。他只是温和地要求发发善心，以此来回答加里森的凌辱。他警告产生于对人权要求过急的危险；他多少有点

苦恼地抱怨，废奴主义者只不过是靠大量发行他们的小册子而得到了拥护者。“我毫不怀疑，他们印的东西比殖民协会印的多十倍，而且把他们的刊物免费送给所有的牧师，送给美国的大部分有名望的人。”格利回答加里森的方式反映了他自己的想法是摇摆不定的。他个人希望完全解放，而且他知道这个问题“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肯定会越来越成为讨论的题目”。他的意见是“我们要尽快地行动起来，使公众的感情跟着我们走，然而也不能太快，以免引起南方的抵制。”格利没有能看到加里森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问题——对奴隶制的争论已经不再能靠妥协和好心来解决了。南方要保存奴隶；北方越来越要解放奴隶。殖民主义者要两边讨好——所以两边都把他们看成伪君子。

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1833年1月他们的年会上变成公开的了。由格利自己领导的“北方”派，企图罢免管理委员会中的五个人，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南方奴隶主，有的是拥护蓄奴派的。在吵吵闹闹的年会以后，代表们驳回了格利的计划而使“南方人”官复原职。虽然格利新近表现的严厉态度使南方的殖民主义者非常难受，但这并

没有使他从废奴主义者的不断的攻击中得到一刻喘息。象加里森的意见一样苛刻的新意见，也投入了对格利及其协会的抨击。

一个威斯特切斯特的法官，威廉·杰伊，写到了一个已经从康涅狄格州的坎特伯雷的一所寄宿学校开除出来的自由黑人姑娘。当她要求作为一个自由的美国公民的权利时，该城的行政长官竟科以罚金，如不缴纳，“她就要赤身露体地挨十下以内的鞭挞”^①（杰伊原文着重标出此句）。这种应归殖民主义者负责的声名狼藉的行为，有助于激起废奴主义者的忿懑情绪。1833年春，商人阿瑟·塔彭抛弃了殖民事业，带着大量将给协会造成极大危害的机密，帮助对方去了。

（使加里森高兴的是，塔彭透露说），使我对协会的信心动摇的第一件事是，殖民地允许出售烧酒，而且代监官们从利比里亚写信给我，在适合于编制装货清单的各色货物中，也认为这些酒是“不可缺少的”。我利用我同协会已有的小小影响，获得了不允许把这些烧酒运往殖民地的禁令，但结果如何可以从事实上看出：

① 象不够高尚的作者一样，废奴主义者的小册子作者懂得，象这样的细节描写，很可能增加销路。

一年之内卖了不少于一千四百桶的毒液。

殖民主义者解释道，在利比里亚进行商业活动，甜酒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解释是徒劳的。他们报导说，一个利比里亚人的戒酒协会包括了殖民地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样的报导是枉然的；他们引用在利比里亚住过一段时间的美国海军军官的证言：“我在蒙罗维亚时，就是说在当地的美国人中，只看到一个人喝醉了酒，但是在我到蒙罗维亚以前，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他们躺在街上，就象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证言也是无济于事的。所有这些都是没用的。损害已经是事实。塔彭的背叛已经绞死了戒酒派。

在国内斗输了的殖民主义者企图纠合他们的英国朋友。英国在反对奴隶制十字军和在非洲殖民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一个富有的教友派信徒埃利奥特·克雷森于1831年到英国去，为协会奔走捐款并宣传利比里亚的成就。他不久就发现加里森的宣传在英国也造成了影响。杰出的反对奴隶制的鼓动者查尔斯·斯图尔特，把殖民主义者描写为“地狱的牧师”，并进而鼓吹不同种族间互相通婚。老扎卡里·麦考利的脾气并没有随着他

的年龄而变得圆通，他拒绝克雷森在《反对奴隶制通讯员》上发表言论。在利物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街上招呼克雷森，并谴责他的反黑人的情绪。

到 1833 年春，克雷森已完全抛开了英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并已在苏塞克斯公爵的赞助下着手组织了一个对抗的殖民团体。这个新协会的高级职员中有好几个重要的贵族和都柏林的大主教，但是没有急进派和非国教派。当时，在英国，也象在美国一样，殖民运动的领导权已经不在空想家的手里，空想家主要关心的是黑人，而掌握领导权的都是一些具有政治动机的人。克雷森极力主张在西非取得更多的英国领土的好处，他还说要把塞拉勒窝内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利比里亚帝国”中去。

克雷森一时意气用事，曾把斯图尔特叫作“第二个加里森”。使殖民主义者更不利的是，那个真正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于 1833 年夏天从美国乘船到英国来了。他的公开目的是为美国的一所黑人学校筹募基金，但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惹惹那些殖民主义者。他极力主张英国去袭击“那个暴戾的大巴士底狱——美国殖民协会。

……让英国用正义的大斧去狠狠打击它；让英国的真理的大炮，把弹药一直装到炮口，对着它猛轰”^①。加里森嘲笑克雷森是个“骗子”，并向他挑战，要展开公开的辩论。当克雷森拒绝的时候，加里森就以人身攻击来使他苦恼：“我不能象克雷森先生那样夸耀我花了多少钱，因为他阔，我穷。”他在一封致克雷森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敢断言，美国殖民协会是十足腐败的，它的政策是墨守成规的，而你正是这个协会的一个代理人。”

当时热心的英国人没有比对一场光明正大的、哲学上的职业性拳击赛更感兴趣了。他们的同情心大大偏向于年轻的竞争者一边。当包括传奇人物威尔伯福斯在内的十一个英国慈善家签署了一项反对美国殖民协会的责难性“抗议”时，加里森胜利了。几天以后，威尔伯福斯死了，这份“抗议”就被视为他的明智的遗嘱了。

英国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都支持加里森。慈善家威廉·艾伦写信给他说：

本月 13 日在埃克塞特会堂的集会上听到了关于美国殖民协会的起源和主要宗旨，并看到了他们自己印行

^① 象许多和平主义者一样，加里森喜欢用军事比喻。

的文件，我几乎不知道如何充分表达我的惊讶和愤慨：我在北美的通讯员竟会没有把该协会的真实宗旨告诉我；埃利奥特·克雷森知道（他肯定知道）该协会刊印发表的那些可鄙的意见，他竟还会自贬身价，做了该协会的代理人。

因为艾伦和克雷森都是教友派会员，所以这个谴责就显得格外尖锐了。

威尔伯福斯的后继者托马斯·巴克斯顿，作为在下院中反对奴隶制的首席发言人，告诉加里森说：“我对殖民协会的看法，你是知道的。我的看法同我的朋友（詹姆士）克罗珀先生的意见差不多，他把该协会的宗旨称之为穷凶极恶。”

不幸的克雷森是抱着很大希望来到伦敦的，满以为可取得曾为塞拉勒窝内努力工作过的扎卡里·麦考利的支持。当克雷森终于弄清楚麦考利很冷淡的时候，他私下里称麦考利为“嫉妒利比亚的发展”的“大老粗”，把他一笔抹煞了。他真想不到这个“老爱尔兰人”（他还这样称呼麦考利）会给加里森以公开的支持。麦考利在1833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的确，为了使非洲得到开化，为了使地球上深受损害

的这一地区扩大对基督教的信仰，我对于在非洲殖民的计划不能有所异议……但是在我看来，殖民协会之作为其计划基础的，不是对黑种人的爱，而是对黑种人的嫌恶和轻蔑，而且他们认为凡是带有黑种人血统的人，就不能友爱相待、当作同胞，却应该深恶痛绝……

1834年初，美国殖民协会到了严重的关头。在国内的继续不断的攻击和英国舆论的不容情的谴责之下，它又为债务所困。管理委员会辞退了一些职员，削减了《非洲宝库》的印数，公布了一份坦率的帐目分析：殖民地代监官在利比里亚已卖出了一千八百五十七加仑的威士忌、白兰地和甜酒，这就使废奴主义者得以幸灾乐祸了。格利在周游美国筹募基金时发现，在以前的殖民主义者当中有一种普遍的忧郁情绪。这时他才完全清楚废奴主义者的威胁，他预言，废奴主义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警告说，废奴主义的鼓动者是在煽动“社会上最奸猾的和最可怕的分子——这些人一旦发起狂来，如果不是血洗大地的话，也将是震撼大地。”

美国殖民协会的一些分支机构开始脱离华盛

顿的组织。纽约和费城的分支机构站到解放黑奴这一边来了，而且还要切断同南方的一切联系。这时候，马里兰在蒙罗维亚以南沿海的帕尔马斯角已经建立起它自己的小小的居民点。它最初被称为利比里亚的马里兰，它经历了蒙罗维亚和塞拉勒窝内的早期移民所遭到的一切困难，但是，因为它规模小，管理它的那个协会更小，所以它的给养和资金更加短绌。

1838年，美国殖民协会采取了一种新的体制，以便把更多的支配权交给各州的分支机构。新的理事会任命了一个有行政权的主席，这样，格利就几乎没事可干了。1840年，他访问了英格兰，试图恢复已经黯然失色的协会的威信。他在那里的演说和他的悲观失望的语气，暴露了殖民理想的逐步衰落。在向英国听众演讲时，他发现他自己的倾向不只是在驳斥废奴主义者，而且是在为奴隶制本身作辩护：

一般说来(我是从个人对于美国这个共和国几乎所有南方各州的观察来讲的)，这些州的公民是和善的、人道的、慷慨的，而且在全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同基督教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多)是虔敬的、模范的

基督徒。奴隶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比在这些州所能找到的更好的朋友。苛刻的待遇、严厉的刑罚、放肆地漠视奴隶们的感情——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

殖民运动开始时本来就是各种利害关系的一个联盟。一方面是慈善家，他们为穷苦黑人的苦境而悲伤。另一方面是政治家，其中多数是南方的奴隶主，他们要甩掉他们认为是无用的和麻烦的少数民族。当对奴隶制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时，大多数慈善家转到废奴主义的一边，这就使殖民运动落在政治家的手中了。这些人可决不都是热心的奴隶贩子。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亚伯拉罕·林肯，是主张把这两个种族分开的。他在1857年说：“这种分离要是真能实现的话，一定要通过殖民面实现。”

直到内战爆发和以后的几十年内，美国殖民协会继续向利比里亚输送了好几批移民。南方的种植园主在遗嘱里表示愿意给奴隶以自由，条件是要他们迁往非洲。前任总统麦迪逊临死时送给协会两千美元。但是1835年以后，殖民运动就再没有生气了，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认识到：即将到

来的危机——黑人和白人如何能共居于一个国家中的问题——实在太大了，要把它弄到非洲西海岸隐藏起来是藏不了的。

第六章

1847年，利比里亚这个原来小小的移民区，在做了二十五年殖民地以后，变成了一个主权国家，并且第一次选举了一个总统。利比里亚的演说家们喜欢给这些事件抹上一层为独立而斗争的光荣和激昂慷慨的色彩。实际上，并没有斗争；关于独立，与其说是利比里亚公民们赢得的，不如说是硬塞给他们的。美国殖民协会，经费极端困窘，又受到它的主张反对奴隶制的敌人的严厉批评，它急于要卸掉这个花费很大的包袱。美国政府不要说再去招惹非洲的是非了，单是它国内的麻烦事就已经够多了。在毗邻的塞拉勒窝内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在这个不利于健康的海岸有一块殖民地已经够了，甚至嫌多了。利比里亚的公民之所以控制了个国家，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掠夺者。

土著的战争，蒙罗维亚与一些较小的美国居

民点之间的争吵，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搞糟了。美国殖民协会于1839年改变了体制，授予蒙罗维亚的行政部门以更多的权力，给予代监官托马斯·布坎南以总督的名义。布坎南因在战争中的勇敢行为而以“大炮”总督闻名；他是这个殖民地的最后一个白人统治者，他对这个殖民地不大尊重。他在1840年写道：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们“甚至愚蠢到这种程度，他们竟然声称，在我至少是放弃否决权以前，他们什么都不愿干”。他暗地里向协会抱怨，“我国政府制度中的最大错误是大力鼓吹了民主原则”。海岸上最激烈的民主主义者——热病，于1841年夺去了“大炮”总督的生命。副总督约瑟夫·詹金斯·罗伯茨取代了他的职位，他是后来利比里亚的第一任总统，是这个国家的枯燥历史中最著名的政治家。他也是第一个黑人领袖。

罗伯茨的黑色，与其说是生理上的，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因为他再黑也不过是一个有白人血统八分之七、黑人血统八分之一的混血儿。在这个时间前后，他被描写为一个文弱、俊美的男子，有一张很象英国人的面孔，棕色的头发，亚麻色的胡

子和灰色的眼睛。说实在话，他的面孔在后半生变成淡黄色的了——不过大多数欧洲人在西非住的时间长了，他们的面色都是这样的。在今天的美国，一个具有罗伯茨肤色的黑种人，无疑会说他自己是一个黑人，但是罗伯茨本人却使用“有色人”这个词。

罗伯茨总督，象他今天的后裔一样，属于利比里亚的贵族。他于1809年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同两个弟弟一起来到蒙罗维亚，后来，一个弟弟成了医生，另一个弟弟成了主教。约瑟夫·罗伯茨从事商业，他的经商是完全成功的。他在国民警卫队中训练成为一个军官，当上了行政司法长官，并领导过一次侵略土著的活动。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作为总督而发表的一些声明，反映了利比里亚资产阶级的坚强信心。他毫不含糊地主张节酒：“有些人无疑会撇撇嘴说在利比里亚没有什么可耽心的，因为比这里更节制饮酒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承认这话是不错的，但是毕竟为什么要喝酒呢？”他懊悔对负债缺乏监禁措施。象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的那许多富商一样，他反对别人企图靠经商致富：

“妨害我们利比里亚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的极大多数人民都抱着一种招致毁灭的欲望，想在最短时间内发财，……他们变成了商人，然而十之九，由于他们不熟悉商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几年之内他们就都破产了。”尽管对国会有这样的忠告，罗伯茨还是宽大的、仁慈的，而且“很有理由为增进了殖民地的公共福利而欣喜”。利比里亚的观光者对它的领袖都有很深刻的印象。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在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中写道：罗伯茨和马里兰的总督勒斯沃姆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有色人完全有能力管理他们自己”。

虽然马里兰和利比里亚仍然是分立的，但是罗伯茨总督和勒斯沃姆总督对于外界仍然是采取共同的政策，而且同样征收6%的进口税。往来于这个海岸的英国商人很不满意这一税收，都企图逃税。当利比里亚的海关人员抓到一只塞拉勒窝内的船时，在弗里敦的英国人就派出一艘炮舰到格朗-巴萨，并抓住一只利比里亚的商船。英国的海军准将琼斯于1844年写信给罗伯茨说，征税的权力只能由主权国和独立国行使。他继续写道：“我无需提醒阁下，上述权力还不适用于‘利比里

亚’，因为它还没有被承认为一个现存的国家，甚至还没有被它的居民由之移出的那个国家的政府所承认。”罗伯茨温和地回答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正确的。”他承认英国人提出的理由是不错的；说句公道话，英国人对利比里亚也并没有恶意。罗伯茨虽然对某些商人不满意，但是他说：“我们同英国官员的交往是非常友好的。”海军准将琼斯的信中暗示，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只要利比里亚宣布独立，关于进口税的争论是容易解决的。

然而，如果这种独立意味着失去美国殖民协会的经济援助，利比里亚人就不要独立。他们一直迟疑到了1846年，那时协会的领导人实质上已经嘱咐移民们，叫他们要求主权。1847年7月在蒙罗维亚召开了一次会议，起草了一个宪法，并公开发表了一项独立宣言。这两个文件都写得明白清楚、切合实际。宪法的拟订者规定：总统、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的半数议员，每两年选举一次，这可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招致了经常的政治混乱。更何况事后发现，宪法规定的利益只适用于城市居民——来自美国的移民——却不适用于内陆土著，这似乎是不公正的。后来，当移民们把

势力扩大到腹地时，这两部分人对比之下的差别，果然有了很大的不公平。但是在制宪时期，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是生活于另外一种政治制度中的。正如宪法中所说的，利比里亚还不是今天地图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只不过是海岸边上的少数几个移民区而已。

哈里·约翰斯顿爵士曾写过最好的利比里亚史，他对利比里亚选择星条旗（而只用一颗星）作为国旗表示不满意。哈里爵士写道：“在世界各国的国旗中，再也没有象老是用红、白、蓝三色配合那样俗不可耐的了。”他提出了他自己设计的一面未来的国旗。这面国旗是绿底上一颗白星，绿底代表非洲的森林。他把国旗上的条子改为黑黄相间，代表沿海的黑人和内陆的伊斯兰部族。哈里爵士为了使国旗的含义更全面，另外又加了一道白条子，象征对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白人的仁慈行为的感谢，并承认“非洲西海岸的黑人共和国决不在其领土上排斥白人的企业或活动”。哈里爵士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希望把他自己的企业和活动伸入利比里亚的橡胶种植业中去。他的商业投机失败了；如今在利比里亚注册的数百艘外国

船上飘扬的利比里亚星条旗，仍然是原来的红、白、蓝三色。

独立，虽然不是付出很大代价赢得的，但还是受到了普遍的激动人心的欢迎。1847年8月24日，这一个升起新国旗的日子，“老年人仿佛又变得年轻了，而年轻人则迈开了更为轻快而富有弹力的步伐”。9点正，当部队向中央堡垒行进的时候，总督和他的全体阁僚会集在广场上。1822年的英雄之一，老陆军上校伊莱贾·约翰逊以立正姿势站在卫理会教堂圣坛上的国旗旁边。然后，“很多女士和先生们出席了晚上的宴会，宴会上有他们本国的富饶土地的丰盛产品。他们为爱国的祝词和英勇的感情而干杯，杯子里注满了蒙罗维亚最纯的清水”。这个日子至今仍然是他们的国庆节，但是在现时代，女士们和先生们为他们的冗长的祝词而干杯时，杯子里却注满了苏格兰高地的最纯的威士忌。

罗伯茨总督于1847年10月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并于次年1月举行就职典礼。在他就职后的头几个月里，他的最急迫的任务是使利比里亚取得列强的承认。由于美国政府不愿意有黑人外交

官派到华盛顿去，所以直到 1862 年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已经不再怕伤白人的感情时，美国才承认了利比里亚。长期以来一直对殖民地友好的英国，是第一个承认利比里亚为主权国的国家。1848 年，罗伯茨总统到伦敦去，在那里同帕麦斯顿签订了一项友好和通商条约，并会见了象伦敦主教和阿什利勋爵之类的慈善家，他们曾在利比里亚反对奴隶贩子的战争中筹款帮助过利比里亚。罗伯茨总统曾在皇家游艇上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她送给利比里亚一艘运输船和一艘装有四门大炮的单桅船。女王终身对黑人共和国深表关怀；利比里亚人也以同样的感情报答女王。直到今天，人们还能碰到一些利比里亚人，他们相信维多利亚女王至今还活着；还有一些利比里亚人则颂扬她，说她有黑人的血统。

在利比里亚的毗邻象牙海岸建立了移民区的法国，不久就继英国之后承认了利比里亚。所以，这个新国家的东西两侧就没有遭受侵略之忧了；至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觊觎这个处在别国领土包围之中的非洲主权国，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荷兰和普鲁士于 1849 年承认了利比里亚，其后是葡

萄牙、奥地利、丹麦、瑞典和挪威、巴西、海地、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

利比里亚不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黑人国家。埃塞俄比亚帝国，以它的崇山峡谷的威严雉堞为屏障，已存在了几千年。不屈服的非洲奴隶已经在海地赢得了一个血迹斑斑的然而却是长久的主权。无论如何，利比里亚是采取了进步的白人世界的政府观念的第一个黑人国家。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根据法律、民主选举和公民权利的原则治理的。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利比里亚没有实现它的祖先的愿望——几乎没有国家做得到——但是它至少把立宪政府的形式维持了一百二十年。

在利比里亚独立时，访问过它的美国的、英国的和欧洲的白人，对黑人共和国的观念并不感到特别惊奇。而当加纳、肯尼亚和象牙海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获得独立时，白人世界倒是分成两派，争论这些国家是否能治理得好。一派说，黑人还不能自治；另一派则坚持立即给予自由。这个争论，到非洲的殖民时代，才真正热烈展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好望角以北只有很少

几个白人居民点；欧洲列强还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把他们的贸易点变为花费很大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对于一个黑人共和国并没有什么戒心。到了十九世纪末，当非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已分割成为殖民地的时候，才产生了对黑人自治的猜忌，并随之产生了对利比里亚的敌意。利比里亚在1847年获得了主权，因为当时白人列强没有理由去害怕一个黑人管辖权的样品。如果利比里亚不是在1847年而是在1947年要求独立，毫无疑问，许多人一定会说它自治的时机还不成熟。



第三部分

第一章

1824年麦卡锡（塞拉勒窝内最伟大的一位总督）被杀时，他治下的殖民地已经颇具规模。贸易蓬勃兴旺，英国海军每年还要送上数千名获释奴隶来受英国传教士的教化和开导，因而塞拉勒窝内早已在冈比亚河和黄金海岸一带又另辟了一些附属的殖民点。不过，英国在西非洲大力扩展这一初具雏形的帝国，那还是到十九世纪末叶的事。塞拉勒窝内约有五十年之久，始终是海岸上的一个孤立的殖民地；等到英国满心想要把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它这块老殖民地的势力比起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来，就已经相形见绌了。

十九世纪的塞拉勒窝内，处于一种静止而非停滞的状态。它在成长，在发展，有时甚至还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圣徒”们早先要把这里变为非洲文明的滩头堡的梦想，却始终没有实现。其所以没有实现，主要还得怪那些“圣徒”自己。夏普和

威尔伯福斯之流，他们原来想通过塞拉勒窝内来拯救黑人，使他们脱离愚昧、野蛮和被奴役的状态。“禁止奴隶贸易法案”于1807年生效以后，他们满以为英国海军以弗里敦为基地，可以设法根绝奴隶贸易。殊不知英国人企图制止奴隶买卖的做法，实际上可能反而助长了奴隶买卖。由于美国南方大量种植棉花，同时古巴和巴西对种植园奴隶的需求也愈来愈大，所以奴隶贩子仍然有的是兴旺的市场。英国海军如果抓不到船上有奴隶的确凿证据，就无法给奴隶贩子定罪，所以，奴隶贩子一旦遇有被截获的危险，往往干脆就把奴隶扔进大海，喂了鲨鱼。1822年有个英国海军准将申诉说：只要欧洲某些国家对奴隶贸易继续暗中加以保护，奴隶贸易就不可能减少。1830年，弗里敦混合法庭的英国委员向伦敦报告说，奴隶贸易事实上还是有增无已。近代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人士W·E·F·沃德写道：“1837年，法庭给二十七条船判了罪，但是就在这一年，有七十二条船离开哈瓦那驶往非洲海岸，有九十二条船不顾法令，把总计四万六千名奴隶运到了巴西。海军只不过是来捣捣蛋罢了。”这一点，那些英国“圣徒”

也是明白的。每有一个奴隶获得释放送到弗里敦，就有好多个黑人被运到美洲去当了奴隶。那些英国的“圣徒”也同他们的美国同道一样，终于明白了：制止奴隶贸易的唯一办法就是取消奴隶制度。因而他们对塞拉勒窝内就失去了兴趣。

英国政府对这块殖民地也兴趣不大，事实上他们对整个西非洲就没有多大兴趣。到十九世纪后期，由于资本过剩，需要寻求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热带原料，英国这才急切投入了“争夺非洲”的竞争。不过，大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英国在思想上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届政府都认为在这些热病流行的海边上殖民没有什么意义，更不必说开发腹地的森林了。英国商人根本无需政府的权威，他们都径自同酋长取得协议。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塞拉勒窝内的统治权扩展到了东邻的一些地区，但这也是为了同利比里亚调整边界，而不是出于什么扩张的政策。

尽管塞拉勒窝内在十九世纪中很少成就，但是外界对它却有很大的兴趣。在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在刮起“改变之风”以前的一百多年里，黑人本是参与了一个近代国家的管理工作的。黑人商

人、医生、律师(尤其是律师),都同白人平起平坐,分庭抗礼。那时有黑人官员,有个时期还有过一个带有黑人血统的总督,更不去说那第一位黑人主教塞缪尔·阿贾·克劳瑟和那第一位黑人爵士塞缪尔·刘易斯爵士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白人对于社会地位的差别和种族差别向来一样敏感,当时他们就谈起了“黑人绅士”这种新奇的现象。那时也一如现在,大家都在议论黑种人到底是不是有自治的能力,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和战后,这种争论就渐渐变得激烈了。论争双方都举出塞拉勒窝内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论点,双方给这个殖民地描绘的生活图景相去极其悬殊。

十九世纪塞拉勒窝内的黑人统治阶级,是由获释奴隶形成的。自1807年英国宣布奴隶买卖为非法起,至1863年最后一船奴隶在弗里敦上岸止,总共约有五万名奴隶(即每年近一千名)把这个殖民地当作了新的家乡。虽然第一批获释奴隶不得不经过一番奋斗才在社会上挣得了一个地位,但是他们不久就在人数上压倒了老移民、新斯科舍人和马隆人的后裔,后来更把这些人同化了。人家怂恿、甚至强迫他们住在弗里敦以外的

村子里，他们常常以颇近于农奴的条件去给人家当学徒，残暴虐待获释奴隶的案子也不在少数。黑斯廷斯村有个传教士就写道：“使人担心的是，这些当了学徒的可怜姑娘，有许多不但得不到师傅的保护，反而会被当作发泄兽欲的牺牲品，她们因为怕遭到残害，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牺牲。”有个女传教士还说：在一个村子里，当局规定没有经过验尸就不许埋葬死去的学徒，没有呈验尸体就不准申报死亡。一直迟至 1855 年，肯尼迪总督还向议会报告说，有许多做学徒的孩子被人卖到内陆去当了奴隶。

许多获释奴隶为了自卫，就参加了互助组织。他们的这些所谓“同伴会”，往往是由贩奴船上的同船难友所组成，但更多的是按获释奴隶所属的部落或民族组织起来的。其中人数最多的两个民族，一个是来自现今尼日利亚西部一带的约鲁巴人，浑名阿库人；另一个是来自近时称为比夫拉的那一带地方的伊博人。

伶俐一点的获释奴隶学了英语，信了基督教，就自认为已享有殖民地公民的一切权利。年轻的获释奴隶进了 1827 年在福拉湾开办的教会学院。

有个伊博族教师挨了村长的一顿鞭子，他提出控告获得了胜诉，以此证明他同殖民地上任何人都享有一样的权利。受过相当教育的获释奴隶不久即被批准参加陪审团。弗里敦的白人一向对老移民和新斯科舍人充当陪审员颇有怨言，这下子对获释奴隶就骂得更凶了，特别是对约鲁巴人，因为约鲁巴人据说是决不会作出不利于自己同族的裁决的。

许多有事业心的获释奴隶丢下了村子里的小块土地，跑到弗里敦去做买卖。他们有的单干，有的利用“同伴会”，把截获的贩奴船上的贸易货物收买下来，转手卖给货摊或小店。当时给人叫做“非洲犹太佬”的约鲁巴人，以及今天也让人起了同样绰号的伊博人，对经商之道特别精通。这些商人依靠的是获释奴隶出身的学徒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学徒一般都是从自己的部族中挑选的。到1840年，有个“阿库”承包商艾萨克·普拉特已经发达到可以雇用一个新斯科舍人做木匠；1853年的一份纳税名册也表明，殖民地上十九个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中就有七个是获释奴隶。一部分老移民和新斯科舍人，看到获释奴隶（他们还是硬

要管获释奴隶叫“俘虏”)日益得势,十分不满。很多马隆人因为看不入眼,回到老家牙买加去了。不过,原有三个移民派别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就同获释奴隶这个庞大得多的派别相互通婚,渐渐被同化了。获释奴隶也反过来承袭了这些早期移民的态度和观点。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四个派别都已通称为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历史学家阿瑟·T·波特博士在著作中说:到1870年,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最喜欢听乞儿变富翁的故事,因而对这些奴隶发迹的历史也特别欣赏。有些获释奴隶发迹的速度着实惊人。有个努比族少年奴隶约翰·伊济迪澳,1827年获释时还一无所有,他经过自学,当上了一名商人的代理人,到1841年他攒下的钱就已经够在乔治街买下一座考究的住宅了。他成了虔诚的卫斯理派教徒,到英国去跑了一趟,回来当上了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又在殖民地的第一届立法会议里获得了一个席位。同许多发达的克里奥尔商人一样,他对签署抗议书和请愿书最起劲,一听到白人的恶言中伤就要起来捍卫克里奥尔人的尊严,他销售的商品有女

式的围巾、丝袜，男式的套头呢料，漆皮靴子，什锦饼干，各色成药，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还有黑啤酒。人如其货，此人是个十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

约鲁巴人西布尔·博伊尔（他根据搭救他的英国船“西比耳号”和他第一个主子博伊尔医生的姓起了这么个名字）生性爱好科学，也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在1865年举行的塞拉勒窝内实业展览会上，塞内加尔的法国人获得了最高荣誉，但是博伊尔展出的土布土药的样品，也为塞拉勒窝内挣得了面子。有个参观者不胜钦佩，写道：“在植物纤维制成的产品方面，他的成就自是一时无二的，”另外他还称赞了照相设备。博伊尔到了老年，已厕身于这个殖民地的“上流社会”之列。按照克里斯托弗·法伊夫的描写，博伊尔在特里劳尼街上的住宅

表明了他和他的朋友们追求的是怎样一个水平。三角顶的窗户、铁栏杆的阳台、楼上那柱子耸立的客厅、客厅里壁炉顶上的维多利亚女王胸像和镶金大镜子，完全是模仿欧洲富裕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里正在兴建的那一类住宅的格局。在这里他尽可以招待殖民大

臣或欧洲的第一流商人，这种环境布置会使那些贵客也都心向往之。

弗里敦第一个取得伦敦法学协会律师资格的律师是一个马隆人，叫约翰·索普，此人后来就毕生住在英国。不久以后，又有好几个克里奥尔人，包括获释奴隶，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塞拉勒窝内最早的三个医生都是获释奴隶的儿子，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詹姆斯·艾弗里卡纳斯·霍顿，很快就在医学和文学两方面都获得了名声。同弗里敦的一切医生和医生以外的绝大多数其他人士一样，在非洲西海岸居民的健康问题上，他的看法是非常坚定的^①，但是他好辩的性格还是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个痛斥外国批评者、为克里奥尔人坚决辩护的勇猛斗士，明确地说：“一个民族，有利条件如此有限，而在五十年内竟能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要求延长塞拉勒窝内的特许权，建立一个弗里敦自治市，任命一个卫生官员。他赞成独立，主张这种独立应仿照利比里亚的方式，但要采用君主政体。“和冈比亚一样，共和国不合这里人民的口味。

^① 这些意见详见下章。

……土著居民一向尊敬他们的国王，共和国对他们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和效果。”

霍顿医生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塞拉勒窝内。他的著作《西非国家和人民》，对沿海一带的人民生活作了生动而又详尽的记载。他对于自己家乡伊博兰的那番见解是很引人入胜的，因为这就是近代关于伊博人和比夫拉的想法的一种预见。“人们认为伊格博人（他把伊博人写作伊格博人^①）是整个西非地区最有模仿力、最好胜要强的一个民族。”他们对滥用权力的君王可予以废黜，他们的妇女“享有非常崇高的社会地位”。霍顿医生认为，他们的宗教是“犹太教，但掺杂着大量异教的仪式和礼法”，他甚至还断言伊格博人起源于希伯^②这一湮没了的支派^③。在霍顿医生所著书籍前面的地图上，尼日尔河下游东岸一带，伊博人的地区，

① 他这样写，很可能使伊博人即“伊格博人”同尼日利亚中西部的“埃格巴人”发生混淆。

② 犹太人的祖先之一，见《旧约·创世记》，第10章，第21节。——译者

③ 虽然伊博人在近代常被比作犹太人，但是犹太人的传说在附近的伊比比奥人中更为盛行。详见巴里·弗洛伊德：《东尼日利亚》，麦克米伦书店1969年版，第26页（Barry Floyd, 《Eastern Nigeria》，Macmillan, 1969, p. 26）。

明白地标着“比夫拉”的字样。

霍顿医生指出，有许多克里奥尔人离开了塞拉勒窝内，在冈比亚、黄金海岸或拉各斯（拉各斯于1861年即为英国所占领）担任了各种文职或军职。

而且〔他在书中又继续说〕，在沿海各地还到处可以看到克里奥尔人，以大小商人和政府职员的身份，在那里拚命追逐黄金——在法属塞内加尔；在冈比亚河、卡札芒斯河、努内兹河、庞加河、歇尔布罗河和加利纳斯河；在利比里亚共和国；在黄金海岸；在达荷美王国；在拉各斯和阿贝奥库塔；在尼日尔流域；在博尼、新老卡拉巴尔、喀麦隆、斐南多波、加蓬、圣赫勒拿岛、阿森松岛；凡此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

十八世纪的第一批塞拉勒窝内移民是顺着海岸南下去做买卖的。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奥尔商人还要跑得远得多。他们大半是获释的约鲁巴人，或是先前住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一带的人，他们可以利用懂得当地语言之便，同土著居民谈生意、做买卖。1839年，有二十一个克里奥尔商人结成一个团体，请求弗里敦政府协助在尼日尔河以西的海边上开辟一个殖民点。政府拒绝给予协助，但

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六十七个人以私人身份顺着海岸南下。到 1842 年，获释奴隶而成为商人回到自己原籍家乡的已多至五百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种大迁移据信就使塞拉勒窝内的人口成千成地减少。仅拉各斯一地，就有塞拉勒窝内的克里奥尔人达数百之多，这些人就同白人争夺诸如主任和海关收税员一类的优厚官职。弗里敦的伊博族出身的商人，则溯尼日尔河而上，到奥尼查这个大市镇上去经商。

这些商人多半是基督教徒，他们在赚钱的同时，还去传教——至少是装成个传教的样子。英国行教会起初只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教化获释奴隶，如今也开始寻找他们活动的新天地了，因而到 1874 年，亨利·塞达耳牧师才有可能这样写道：“塞拉勒窝内现在与其说是一个传教点，倒不如说是在非洲扩大传教的大本营。”塞拉勒窝内的克里奥尔人在英属西非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充分体现在那第一位黑人主教、奴隶出身的塞缪尔·阿贾·克劳瑟的一生经历中。

阿贾（这是他的本名）于 1810 年左右出生于现今尼日利亚的中西部。这一地区，当时受到了

猎奴战争的蹂躏。1822年有一天，阿贾同他的母亲、两个姊妹、一个堂兄，带着一个娃娃，正在耕地的时候，忽然受到一伙烧抢掳掠的士兵的袭击。阿贾还没有来得及张弓搭箭就被逮住了，后来就被抓去当了奴隶。他起初被拿去换了一匹马，以后又被用来换了一袋烟草，最后被带到海边去卖给外国奴隶贩子。

男人和男孩〔他后来回忆道〕起初就让一条约有三十六呎长的链条拴在一起，链条穿过各人脖子上的一面铁枷，两头都用挂锁扣住。在这种情况下，就数孩子最受罪了。大人气愤起来，就把链条一拉，拉得可猛了，我们那可可怜的小小的脖子上没有不留下乌青大块的，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大人为了减轻链条的压力好躺得舒服一点，就把链条尽往自己身边拉，这下子就使我们差点儿被卡死，或者勒得皮青肉紫，险些送命。

有个时候，他竟要把自己掐死——为了这个罪过，他后来终身感到悔恨。

这位未来的主教同其他数百名奴隶一起，给押上了一条葡萄牙贩奴船。船一出海，就为英国海军的舰艇所截获。这些得救的奴隶最初对他们

的救星比对抓他们的人还要害怕。阿贾看到一大片猪肉和一堆堆炮弹,简直吓坏了。“我把前者当作了人肉,把后者当作人被宰了吃掉留下的脑袋。”后来恐惧终于消除了,在船上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阿贾就成了水手们的宠儿,他或许还学会了一点英语。到了塞拉勒窝内,阿贾住在一对英国传教士夫妇的家里,才六个月,他就已经会读《新约全书》了。那些传教士把他带到英国,替他行了洗礼,用一个英国神学家的名字替他起了名,然后在弗里敦附近一个村子里替他找了个小学教员的职位。1827年,塞缪尔·阿贾·克劳瑟成了英国行教会创办的福拉湾学院的第一个学生。

学院院长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叫查尔斯·L·F·亨泽尔。亨泽尔是位古板先生,不允许学生逾越本分。年轻的克劳瑟和他的同学,一个星期有六天可以光着脚板,但是到星期日,他们就必须穿上靴子,走上三哩路到教堂去。他们觉得穿鞋是件大苦事,克劳瑟后来回忆道:“走到看不见学校了,我们就在路上一坐,脱下靴子,光着脚走,一直到教堂的门廊口再穿上。……可是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就自己花钱去买靴子了,我们还一定

要买走走路来叽嘎叽嘎发响的靴子，穿着这种靴子走路，我们心里得意极了，我们的小同学看着也羡慕。”这些小同学还十分羡慕克劳瑟的那套蓝衣服，还有背心和白长袜，更不必说他星期日戴的那顶獭皮帽了。

亨泽尔博士规定所有的学生都要写日记，在日记里要用第三人称记下自己一天的工作。克劳瑟在1828年3月22日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向成年跨出的重要一步：

当塞缪尔·克劳瑟将上周的日记交给老师时，老师要他在自己名下添上“辅导”两个字。老师还告诉了他这两个字的含意，这意思不是“管理”同学的人，而是“规劝”同学的人。老师还说，他希望学校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众兄弟的“辅导”，但是他特别要叫塞缪尔做“辅导”，因为塞缪尔年纪最大，他盼望塞缪尔如果看到别的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或者该做好事而没有做，就要随时去规劝他们。

克劳瑟离开学院以后，就同一个获释奴隶出身的姑娘结了婚，回到弗里敦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去做教师。克劳瑟既是一个教会学校的教师，又是一个约鲁巴人，因此他对于去尼日尔河传教加

倍感到兴趣。他和他的教会同事 J·F·舍恩一样，相信塞拉勒窝内一定会“象古代的耶路撒冷一样成为一个中心，神的谕示将从这里传播到非洲许许多多蒙昧的部落”。但是，派一支远征队去尼日尔地区费用太大，也太危险，英国行教会难以独力承担。因而那些传教士和他们在伦敦的后台就逼着英国政府支持他们的这个冒险事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自由党政府虽然反对在非洲略取领土，但他们对增进贸易和发展基督教，可也确实抱着欢迎的态度。反对奴隶制度的鼓吹者如巴克斯顿之流，对于派远征队非常热心，他们在 1839 年帮着说服了政府。约翰·罗素勋爵^① 宣布成立尼日尔远征队时，说明远征队的目标是要做到废止奴隶贸易，并“在有利的条件下准予输入货物以供本国消费”。

尼日尔远征队于 1841 年扬帆起航，队里有两个英国行教会的人员充当传教士兼翻译，就是舍恩和克劳瑟。两艘船沿着那条水波浩渺的神秘的大河往上航行，一路的经过远没有这些航行者事

^① 约翰·罗素(1792—1878)，当时英国的陆军兼殖民大臣。——译者

先想象的那么危险。有些土人很不高兴，因为这伙虔诚的英国人没有甜酒请他们喝，但多数土人是谦和而好奇的。克劳瑟对待这些异教的同胞，从他的日记来看，却是抱着一种倨傲自大的态度，譬如他讲到有位来访的酋长“在后甲板上大步走来走去，因为结交了白人朋友而流露出洋洋自得的样子”。远征队遇到的仅有的威胁就是河上的蚊子和热病。单是在最后两个月里，船上的欧洲人就死了近三分之一，整个远征队里只有克劳瑟一个人没有害病。他的朋友、给他写传记的杰西·佩奇写道：“他是一个天生的旅行家，个子不大，性格刚强，无论是沼泽地还是蚊子都休想在他身上留下一颗致命的病菌。”正因他体质茁壮，又兼意志坚强，所以才能在丛林地带长期从事传教的生涯。

从尼日尔河远征回来，克劳瑟就被送到英国去受圣职。回到塞拉勒窝内以后，他成了一位既能用英语又能用约鲁巴语讲道的名牧师。尽管他的同胞中有一些人骂他是背教分子，然而就连信伊斯兰教的约鲁巴人也都要来听他的布道。1847年，克劳瑟作为一名传教士又回到了约鲁巴兰。到

后不久，他就找到了他的母亲和一个姊妹，自从二十五年前奴隶贩子把他一家拆散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克劳瑟写到母亲时，说道：“她一看见我，就浑身哆嗦。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互相紧紧抱住，相对而视，都默默无语，惊异万分。大颗的泪珠顺着她消瘦的面颊直滚下来。”母亲后来就成了克劳瑟所收的第一个信徒。

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克劳瑟走遍了约鲁巴兰，还在伊博人的主要市镇奥尼查创办了一个传道会。虽然英国还是不打算在尼日尔河畔建立一个殖民地，但是社会上对这个全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却怀有巨大的兴趣。利物浦的商人接在克里奥尔传教士之后，也坐船溯河面上。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特地召见了克劳瑟，同他研究如何根绝拉各斯的奴隶贸易，他们还听了约鲁巴语的主祷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64年5月一期的《英国行教会通讯》上写道，土著的教会和教士发展得这样快，“如再迟迟不设置一位土著的主教，恐怕就会妨碍土著教会的发展，似嫌未妥”。坎特伯雷大主教似乎也领会了这一层暗示，因为就在下一个月，即1864年6月29日，克劳瑟被授

予主教的圣职。从伦敦到坎特伯雷特地开了专门列车，大教堂里挤得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在前来向克劳瑟致敬的许多老朋友当中，就有海军上将H·利克爵士，四十二年前还是个年轻军官的时候，他曾经搭救并照料过那个惊惶的奴隶阿贾。

克劳瑟主教在尼日尔地区供职，一直到他1891年去世为止。他的传记作者评论得很正确：“在尼日尔流域能获得这样的商业利益，还有政治利益，真是全亏这位主教。”塞拉勒窝内的克里奥尔人在改造西非洲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塞拉勒窝内本身却是变得愈来愈不重要了。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结束以后，再也没有获释奴隶送到弗里敦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瓜分了沿海地区，新的港口开辟了，新的市镇兴建了，论商业、论地位，这些地方都超过了弗里敦。过去一向是由塞拉勒窝内来管理的黄金海岸和拉各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都已发展成为独立自主、富饶兴旺的殖民地。从弗里敦出去的克里奥尔人住在海外，都做了他们新的家乡的公民。等到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创办了大学和教会学院以后，弗里敦这个西非洲的“雅典”或“耶路撒冷”，便失去

了它在文化上的先导地位。

弗里敦有些克里奥尔人之所以要去外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这块殖民地上感到灰心失望。十九世纪的末三十年，克里奥尔人的势力达到了最高峰，但即便在这一时期，他们也始终没有从英国人手里夺得过政权。白厅的一贯宗旨是，塞拉勒窝内的总督必须从外边派进去。克里奥尔人无论如何杰出，从来没有一个人派到过总督的职务，那唯一的一个有色人总督威廉·弗格森，是个西印度的军医。这种对克里奥尔人的歧视，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种族偏见。但是，弗格森在1845年害热病去世以前做了一年总督，干得却是那样出色，就连那个倨傲固执的随军牧师托马斯·艾尔·普尔牧师，对他也赞扬备至：

当时身为总督的弗格森先生温文大方地接待了我。他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这确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一般非洲人和有色人如果地位高出于邻居的欧洲人，态度往往就不会这样。他举止谈吐之间颇有绅士之风。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没有一点浮夸或骄矜之态；这是他那种尽人皆知的性格的一个特色，在一般小殖民地的掌权人物中间是难得看到的。弗格森先生身材

高大而匀称；神情显得机智而慈祥；长年担任军职的人所固有的、而且也是他们所独有的那种雄伟的气概，使他的体态之间自有一种优秀人物的风度。……我称弗格森先生为“阁下”。他和蔼地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到一边，脸上现出了谦和可亲的笑容——“普尔先生，”他说，“请你不要叫我阁下。用不着这样。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管我叫‘弗格森先生’。请别那样吧。”

虽然普尔也承认弗格森这样的总督“不仅无人过之，恐亦无人可及”，但他还是认为选用白人做官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里有些人士具有本地的实际经验，并非仅凭道听途说，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意见和看法是颇为可信的；他们认为不论在哪个部门，让非洲人或有色人做英国人的上司总不是最合适、最明智的办法；在英国人中间是可以找到同样正直能干、足以担负公职的人士的。

这个方针对塞拉勒窝内历任总督任命殖民地官员似乎颇有影响。虽然英国政府在1830年宣布白人官员将逐步为黑人所替换，但是这个计划不但始终未见推行，相反倒是有点倒退了。譬如，继西印度人弗格森担任总督的诺曼·麦克唐纳，

在六个月的任期中坚决主张非洲人不能做官，白厅一再敦促任用非洲人，他都抵制了。两次长期担任总督的阿瑟·肯尼迪爵士，原则上是愿意给非洲人委派工作的，然而实际上只派给了他们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同时他还替欧洲人规定了优厚的薪金，规定每两年有六个月的归国假，使欧洲人更乐于来任职。真正想要提拔克里奥尔人的唯一的一个总督是约翰·波普-亨尼西，这是一位爱尔兰天主教会的激进分子，在远东身经了一番充满惊涛骇浪的古怪的经历以后，于1872年来到了这里。他写信给金伯利伯爵^①说：“只要事情一有实现的可能，我就要坚决建议解除欧洲人在本地的职务。所幸此事是有实现的可能的，而且实施的范围可较一般想象的更大。立法会议里最有才干的两位代表都是纯粹的黑人，当然我说此话并不是想贬低其他各位代表。”是想贬低也罢，不是想贬低也罢，反正这样一种态度就使波普-亨尼西无法赢得欧洲人的欢心。他如此卖力地支持有色人种，就使他在塞拉勒窝内的白人中间不受欢迎，

^① 金伯利伯爵即约翰·沃德豪斯(1826—1902)，1870—1874年曾任英国殖民大臣。——译者

正如他以前在香港，以后又在西印度，为此而不受白人欢迎一样。象波普-亨尼西这样不甘妥协却又不通机变的激进派，其实也同通常蝉联总督一职的粗暴的保守派一样，根本无助于促进克里奥尔人的事业。波普-亨尼西是克里奥尔人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克里奥尔人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和他对他们事业的同情，不过多少也正是由于他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声望，所以他在弗里敦呆了一年以后，就被调任新职去了。

尽管克里奥尔人始终没有能把白人从这块殖民地的掌权地位上赶下台来，但是塞拉勒窝内的商业和各项专门职业有个时期确实是受克里奥尔人支配的。按照波特博士的讲法，1870年至1900年这一段时期，“诚可谓克里奥尔人文明与权势之顶峰”。在1867年，弗里敦的律师威廉·雷尼就已经可以在巴黎的一次反对奴隶制度的会议上这样说了：

重要的英国商人是有几个，但是土著商人却占有极高的地位。零售业几乎全属他们所有，他们已经有能力让子女到英国去接受高等普通教育，使之受惠无穷。他们在弗里敦还创办了一份杰出的报纸……叫《非洲

宣讲报》，不少教会学校还得到他们的资助。

1876年，福拉湾的学院附入达拉姆大学^①，从而成为西非第一所有权授与学位的学校。克里奥尔人尽管在殖民地政府中势力薄弱，然而在弗里敦市政机构中却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抱负、成就和引为骄傲的一切，十分集中地表现在那第一位克里奥尔爵士——塞缪尔·刘易斯爵士的一生事业中。

塞缪尔·刘易斯生于1843年，父亲威廉是个约鲁巴人，1828年在塞拉勒窝内获得了解放。威廉·刘易斯也走了通常的那条发迹的道路，入了卫斯理教派以后，就做了小店老板，批发商人，后来还成了一个船主。他出于教会宗派的原因，不肯让儿子塞缪尔靠圣公会的奖学金到伦敦去求学，但是到1866年，他就已经有能力让儿子自费去受这种教育了。塞缪尔·刘易斯成了塞拉勒窝内第三个获得高级法庭律师资格的律师，也是远远胜过一切同行的一位最红、最受尊敬的律师，他从克里奥尔商人和欧洲商号那里赚进了大量的法律顾问费。在他名声最高的时候，据说单是请他

^① 在英国达拉姆市。——译者

“谈话”一次就要索费达一百基尼之多，西海岸上远至拉各斯的人都要来请教他。他在法庭上的风格是既尖刻又凶狠的。有一次他跟诉讼对方的律师说：“我情愿先用你自己的剑，把你刺死；然后再用我的剑，把你的尸体戳个稀烂。”

虽然刘易斯有时也担任代理王室民法顾问，还常常受理案子为殖民地政府辩护，可是他从未担任——显然官方也从未请他担任——常设的政府职务。他热中公务的那股热情，在1863年立法会议成立时就有了明显的出路。刘易斯是第一批民选代表之一，这个席位他一直保持了二十年。尽管刘易斯珍惜克里奥尔人的特权——他曾经逼着一个代理总督否决了一份威胁到报纸自由的议案——然而他却从来没有为此而反对过政府。他做过三任弗里敦市长，后来只是因为不愿人家误会克里奥尔人只有他适任此职，这才让了位。

他在1896年成了塞缪尔爵士，这位爵士最喜欢人家说他“比英国人还英国人”。他是个热心的爱国者，在1887年曾资助过女王即位五十周年庆祝大典。同弗里敦和蒙罗维亚的许多有钱人一样，他经常宣传奖励农业的必要性，他还创办了一个

模范农场，结果当然是赔了钱。然而有了这所农场以后，塞缪尔爵士就过上了乡村富绅式的生活。1893年刘易斯五十岁生日那天，弗莱明总督和另外三十七位客人包了一艘轮船来赴他的宴会，刘易斯派了他的私人轿夫在码头上专诚迎接。星期日刘易斯一家坐轿去做礼拜的时候，后面列队跟着走的门迪族工人就有八十名之多。刘易斯属卫斯理教派，他的第一个妻子却是天主教徒，他们结婚的地点圣乔治大教堂则属于圣公会——可是弗里敦名声最响的就数这座教堂。

在两个世纪交接的当口，塞缪尔·刘易斯爵士在动荡的政界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度过了克里奥尔人权势鼎盛的黄金时代以后，他亲眼看到了克里奥尔人衰落的开始。他是个温和派又是个亲英派，他直到晚年才认识到：纵然有了财富、声望、甚至爵士的名位，他也不能同英国人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黑人的绅士，就是没法替黑人争得权力。

第二章

“这座市镇本身就是一派风光如画。镇子从水边耸起，白色的住房、茂盛的庭园，蜿蜒伸展到四围山冈的坡上；远处，高高的树林梢头露出了白人绅士的乡间宅邸，还有一块块专种咖啡和水果的土地。”这一段话是F·H·兰金写的。兰金于1832年在塞拉勒窝内住过八个月，为这个殖民地描绘了一幅可人的图景。不过，即便是对塞拉勒窝内最深恶痛绝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里的自然景色之美。一片浓绿的山峦，嵌着一处处同样鲜艳的鬼斧神工般的红土断崖，突出地耸立在西非海岸边上那一片单调、阴暗的红树丛生的沼泽地里。在十九世纪，就连弗里敦城，也往往以其动人的风光，有时还以其绮丽的景致，而受到赞美。

一般房屋的建筑式样〔兰金接下去又写道〕给这里的景色抹上了一层东方的色彩。这里有木房也有石屋，有刷成白色的也有刷成黄色的。屋外的游廊上，一根

根柱子间隔适度，上面托着廊顶，这样就是在晌午时分也可以在室外有个散步的荫凉所在。游廊上只见一排排帘子，那是一种漆成绿色的威尼斯式百叶帘。屋顶主要是由叫做木瓦的薄薄的木板片儿盖起来的，向外伸出老远，屋檐也都很宽。

有位英国女士也写过一本关于这个殖民地的书，她认为“尽管游廊十分宽敞，甚至十分高大，然而我乍看之下，却觉得那仿佛象个阁楼，这不仅是因为屋顶压得很低，直伸到外边窗子的顶上，而且还因为屋顶全部是由木板盖成的，木瓦都钉在木板上。”两位作者对弗里敦的宽阔的街道都有很深的印象，一到雨季，满街上就茁长起一片茂密的杂草、野花和靛青。全亏了在屋前啃草的牛羊，才不致于让这些花草妨碍了交通。

弗里敦居民的服饰就更显眼、更离奇了。脸上有疤的丑陋的克鲁人喜欢光着身子来来往往，引起了传教士极度的厌恶。来自内地的穆斯林商人也象现在一样，穿着雅致的蓝色长袍，十分惹人注目。克里奥尔人的衣着多少有点模仿英国派头。由于裸体是奴隶的标记，所以人们往往穿了许许多多衣服，甚至穿得过了头，来证明他们是自由

人。富裕一点的人穿布料的上装、背心和裤子，有时还自找苦吃，穿起了毛料的套头西装，因为他们觉得这比棉布衣服更“英国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大礼帽和短绑腿是常见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个游客，曾经用小说的形式记载过这个殖民地的情况，在文章里他嘲笑了

这种服装。按照“国内”最新流行式样打扮起来的肥胖的黑人妇女，紧紧的裹在色彩鲜艳的筒子一样的时装里，她们以最优雅的语言跟具有格兰迪森^①一般风度的黑人绅士相互寒暄，那些黑人绅士穿着长长的紧身的黑色大礼服，白衬衫的大袖口上扣着豪华的袖扣，配着高高的领头，结着鹦鹉色的领结或领带，手上戴柠檬色或淡紫色的小山羊皮手套，头上戴高顶帽，脱帽的姿势非常花哨。他们的靴子是漆皮做的，靴面上都扣着贝壳钮子。

从塞拉勒窝内开创一直到今天，有关该地的一切记载没有不提到那里信教之虔诚的。卫斯理派，浸礼会，以及一些更加希奇的教派如“追逐女人的托姆集团”（那些信徒对“杭廷登夫人会”的谑

^① 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是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1689—1761)所著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传》一书中的人物，是个典型的“英国绅士”。——译者

称^①),彼此都在比赛信教的热情。在数不清的大小教堂里,又是讲道又是唱诗,又是吟哦又是喊叫,从清早一直要闹到深夜。安息日的规矩守得严格极了,有个苏格兰传教士听到这一片极度的静寂,回想起苏格兰的星期日亵渎了神圣,感到不胜羞惭。有个美国牧师参观了获释奴隶在丛林中开辟的一个村落,说:在星期日那里“是一片沉寂,静得就象六年前一样森严而深沉,那时,荒野里除了豹子准备扑向其饵食而悄悄潜行的脚步声以外,什么声息也没有”。

圣乔治教堂(后来改为圣乔治大教堂)代表了英国殖民政府在宗教上的势力,但是修建教堂的步调之慢,使许多热心的圣公会教徒感到丢脸。教堂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由麦卡锡着手建造的,到1837年尚未完工,当局为了省钱,于是就“在中央匆匆造起了一座难看的砖墙,一半供执行祭务之用,另一半给公众做礼拜”。其实要不是后

① “杭廷登夫人会”原文为 Lady Huntingdon's Connection,“追逐女人的托姆集团”原文为 Lady Hunting Tom's Collection,两者音甚相近,故云。“杭廷登夫人会”是英国塞利纳·杭廷登伯爵夫人(1707—1791)在英国所创立的一个教派。
——译者

来接任的几个总督对建筑式样随意乱改的话，教堂恐怕早就造好了。原定的哥特式尖窗结果都换上了圆窗，主塔嫌造得太小，又重新拆毁，改建一座更大的。随军牧师普尔在圣乔治教堂司祭时，被穿着白袍的土著唱诗班深深打动了，可是抬眼朝“十诫”上一望，发现第七条戒律和第八条戒律位置摆错了。“这个大错误摆在那里一直没人纠正，有多久了？”普尔不知道。星期日来做礼拜，在热气蒸腾的会堂里汗流浹背、昏昏欲睡的那些白人教徒，恐怕也不会知道吧。

弗里敦黑人对饮酒的节制，与他们信教的虔诚就未必相称了。有一座卫斯理派的“上帝嚼舌堂”，对面就是一幢至少也一样门庭若市的大楼——一家酒馆。“这两个时髦的热闹场所，看来相处得相当友好，好象彼此都很帮对方的忙似的。一班沉迷之徒就象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去；倦怠的心灵想靠酒精的力量燃起精神的狂热。”1848年，有个美国传教士乔治·汤普森看到那些信徒嗜酒成癖，感到很恼火。“在克鲁镇教堂我简直无法同他们交谈，因为他们灌了烈性酒”，他要他们签字保证戒酒，也没有多大效果。“施洗牧师（一

个有色人)狂饮无度,他自己不愿意签名,却拿着纸到处要人签名。”不过,这位传教士在一次讲道中可叫那帮卖酒的都听得坐立不安了,他还叫小孩子跟他一起唱《酒杯快滚开》。他把这件罪恶都怪在他的祖国美国、甚至都怪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州身上:“美国给这个市镇,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无数的烟草运到了这里,而且卖价极其高昂。可还有烧酒!哎呀!从我家乡进口的烧酒,简直如山如海……前几天我数了数就有五十大桶,都是刚刚从我家乡的那个州运来的,就是这个州,还派我来传播福音呢!”

虔敬的外国人看到殖民地居民对待男女问题的态度,往往都很气愤。信基督教的黑人认为娶个“乡下”老婆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而女人却又可以随意抛开凶狠或小气的“丈夫”。有个美国人写道:“弗里敦的风气真是败坏得可怕。……那种可恨的事儿还不是在黑夜的遮盖下干的呢——简直就是在白天干的。”从1827年法庭受理的一件相当发噱的案例来看,黑夜也不一定就遮盖得了。有个马隆族商人,又是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叫威廉·索普,被一个木匠告了通奸罪。原告律

师在辩论中把案情概括的讲了一遍，这一篇发言，实在值得详加摘录：

先生们，我受权声明：被告已经接近生命的晚年，他已经活到了这把年纪，血气旺盛的时代按说已经过去，而且，他一向是宣扬仁义道德的，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天生的缺陷妨碍他身体力行。

[律师又继续说：然而索普牧师……]竟打发一个孩子把波利·伯纳德太太请到他家里去。先生们，你们一定知道，塞缪尔·索普先生^①同我的当事人当时就住在一条街上(据我所知他现在还住在那里)，而且两家相距不远，可是我的当事人家里当时就只有他妻子独自一人居住。我听到，被告这样派人去请伯纳德太太的目的，据说只是为了要给他收拾床铺。这位先生不愿让他的几个男仆来收拾床铺，以他偌大的家私却又不雇用一女仆，这着实令人惊讶。所以，伯纳德太太这样被请到被告家里去的真实目的，也就不难明白了。女的进去以后，窗户里的灯光消失了……窗门都关上了，把这一对犯罪的男女关在里面。狡猾太过往往要弄巧成拙：离这荒淫作乐的地点不远，偏偏就有那么个人，为了要维护她认为按习惯理应属她的权利，正以尖利的妒忌的眼光，在监视着夜晚发生的一

^① 姓名前后不符，原文如此。——译者

切。对了，先生们，塞缪尔太太(又是塞缪尔·索普牧师的一位相好!)……赶到了那所房子里……于是……就对伯纳德太太进行攻击。想一想吧，先生们，这个场面在画家和道学家的眼里有多妙啊。深更半夜，两个有夫之妇在这位虔敬笃信的被告的卧室里大打出手；而被告(他没有防到这一着)只好在游廊上团团转，想不出该怎么办好，他生怕这一阵轻率的喧嚷张扬出去会露了他的底，只吓得浑身哆嗦。

结果狼狈的索普被处五十镑罚金，可是两个吵架的女人的那股子气，一定是更够他受的。

这个殖民地创建才两年，“泼妇嘴箍”的刑法就传了进来；塞拉勒窝内爱骂人的名声，从此就一直传闻四方。普尔牧师在不经意间写下过一段诙谐妙文，他在文章里说连他也吃过这种“嚼舌头”的苦头。他谢绝了一位黑人女邻居的过于亲热的接近，收到的却是她伤了自尊心的凶悍报复。“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谩骂都忍受得了的，可是她却总象还把我骂得不够似的。”普尔起初想回避她；不行，就传她到法庭，想靠法律来钳住她的嘴，可是这一招也被击败了：“继吵闹和嘲骂而来的，是喧嚣不减从前，然而却是名正言顺的狂喊大叫。她

的小屋里每星期总要举行三、四次各种各样的宗教聚会；又是嚎叫，又是祈求上帝，我刚摆脱一个祸害，又来了个同样够受的祸害。”塞拉勒窝内女人的好奇心也是有名的。外出的人回到家里，常常会发现有个姑娘在察看他的衣橱；吃饭的人抬起头来，常常会看见“隔着玻璃窗有张黑黑的脸，在那里从容自在地观察你摄取营养的整个过程”。

塞拉勒窝内的对头，老是讲这里的人爱打官司。不错，有许多律师为了打赢官司，特别是为了帮助黑人打赢白人，确是使用了欺诈的手段。黑人的陪审团怀有成见，对白人作出不公正的判决，这种案子无疑也有不少。不过，哪一个国家的律师和陪审员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弗里敦，黑人只有行使法律之责而无制订法律之权，所以更加可能产生成见。这种郁郁不得志之感，也可以有助于说明克里奥尔人的态度何以会如此傲慢、暴躁，同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居民的谦和有礼截然不同。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里白人的人数大概还不到一千，内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政府或军队的人员。他们人数虽少，却管理着塞拉勒窝内，而

且还可以说给克里奥尔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这批英国人，他们都是为了想发迹而到这热病流行的海岸上来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些优秀而又优秀的人物。其实，说得精确一点，这里真正的英国人也极少。麦考利，麦卡锡，坎贝尔，芬德利，麦克唐纳，肯尼迪，是这里最最有名的六位总督的姓。有个来殖民地游历过的人写道：“有件希奇事情就是，在塞拉勒窝内，白人居民除了少数例外，一概都姓苏格兰人的姓。”有些非洲人也觉察到了这种种族上的差异，有人就听到过克鲁人把苏格兰人叫做“英国乡下佬”。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上面才专门选择有学识的人来担任殖民地政府的工作。在塞拉勒窝内，直至1885年还只有两个白人（医生不算）是得有大学学位的。这里的英国人恐怕多半是背了债的，是冒险家，是在其他殖民地上干不下去的人，或者是从陆军或海军里出来的心怀不满的军官。

白人妇女跟着丈夫到非洲来的为数不多。1837年来的那十来个妇女彼此也很少交往，一则因为她们的住宅都相隔很远，二则“因为束于礼法。即便在这里也受到礼法的影响，已经很少的

几个人又分成了几个小圈子”。上面提到的妇女中有一位梅尔维尔太太，是个法官的妻子，她写过一本有趣的书，记载了她在殖民地上的宅邸。她住在高高的山上，靠近现今学院所在的地方。看来她同邻居并无多大的交往，她的书里尽是写些仆人的闲谈，乡下的漫步，看看花、鸟、蚂蚁，还有那奇妙的、也是更希罕的变色龙。梅尔维尔太太写道：“雨季里最杀风景的就是不能出去适当的运动一下，”因为随时都有突然下雨的危险，遇上了雨就非得以“火车速度”奔回家去不可。

另一位白人妇女丘奇太太，则极口称赞跑马场，以及跑马场里那些“腿子细长匀称、鼻孔血红、脖子弯成拱形”的“巴巴利半纯种”马。可惜这些马是训练来专供赛马用的，因而妇女不宜乘骑。1850年以后，萃萃蝇飞到了这块殖民地上，各种马匹绝少幸免，因此无论白人还是黑人的上层阶级，都以网轿^①或大轿作为交通工具。

“这里连个戏院都开不起来，”有个白人不胜感叹地写道，“事实上这里什么剧目也上演不了，要演就只能演只有奥赛罗和奥里诺科这一类角色

^① 当地的一种轿子，参阅本书插图(第168页)。——译者

的戏。”其实他的话说得不对。大约过了二十年，到 1857 年，这里的驻军军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演出了一场由清一色白人登台表演的《奥赛罗》。戏的收场也很别致：扮演奥赛罗一角的司令官竟下毒手开枪打死了那个演卡西奥的，后来只因他先死在狱中，这才免了上绞台。类此的口角纠纷在白人中是常有的，他们经常就在跑马场里靠决斗来解决争论。

虽然驻军象土老儿似的，孤单单的缩在一边，但是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白人大半都同克里奥尔人很合得来。许多传教士和商人同黑人妇女结了婚。克里奥尔人如医生迈克尔·贾勒特和律师 J·B·麦卡锡，也娶了他们在留学时结识的英国姑娘，把她们带回塞拉勒窝内来。此外，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恋爱事件”也不算什么丢人，生下的孩子也很少受到歧视。麦卡锡总督很喜欢黑人姑娘，他就有好多私生子。芬德利总督也一样，他敌视黑人的偏见，一遇到男女问题，就都撂在脑后了。那个最最富裕、又是极受尊敬的克里奥尔人查尔斯·赫德尔，其父亲一方就是白人的血统。新办的女子教会学校拒绝招收

白人的私生女儿，其出发点也和道德观念毫不相干。学校当局因为校舍不足，要白人自己去办一所学校。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末，从英国来跟丈夫住在一起的白人妇女愈来愈多，殖民地上的人对那班克里奥尔“女护士”和“女管家”才渐渐地皱起眉头来了。

酗酒是白人所特有的，也是最叫人头痛的一个毛病。从苦难的船舱生活中获得一两天解放的水手，醉步踉跄地从一家酒店撞进又一家酒店，最后便在人家门口或草地上呼呼入睡。有位作者怀着极大的反感写到，他看见有个船上的大副“弯倒了身子，摇摇晃晃地经过大街向码头而去，一路语无伦次地大声嚷嚷；一个克鲁人和一个焦洛夫人，一边一个扶着他，听着他的漫骂在那里发笑，这个家伙尽管没有他们扶着就连站都站不住，可还是一个劲儿地骂他们居然胆敢抓住一个白人”。最最体面的欧洲人吃早饭惯常都要喝啤酒和红葡萄酒——事实上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健身之道。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如果有人初来此地，就会发现这里到晚上还能喝上由杜松子酒、白兰地和柑香酒配成的鸡尾酒；按照一篇报告中的说法，于是

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天下头一号的聪明人，就会感到西非这地方倒也满不错——特别是逢到空中有一轮明月，点缀着几颗星星，荡漾着赤素馨花浓郁的花香”。但是，那位道学家警告说，到最后，这个新来的人就难免要走上前人的老路。“这里每四十个人中大约只有十个人不是每天晚上多少带点醉意的。除了数不尽的鸡尾酒以外，白天他们还灌黑啤酒和瓶头啤酒，烈性的雪利酒，还有一杯连一杯的甜酒或威士忌。……这里的人之所以喝酒，多半是纯粹出于害怕，是为了要驱除对热病的恐惧，这种恐惧一到晚上就象贼一样偷偷的来了。”

害怕热病，这多少只是要喝酒的一种借口罢了——不过这种恐惧倒是一点不假的。早在十九世纪初，塞拉勒窝内就得了个“白人坟”的外号，有三本关于这个殖民地的书籍，还有数不清的有关文章，都是以这个名字做标题的。这个外号一直流传到本世纪，就是在今天，一提起塞拉勒窝内，还常常有人问：“可那儿不是病很多吗？”在维多利亚时代，塞拉勒窝内简直就成了疫病的代名词。就是在西非一带常来常往的人，也对弗里敦怀着无比的恐怖。有个美国游客说过：“这里通常

就被白人看成是一个疫病猖獗的地方，欧洲船长或美国船长除非要处理业务万不得已，否则是不大肯在这里多事逗留的。”

毫无疑问，十九世纪的塞拉勒窝内对白人来说，肯定是有损于健康的。总督的平均任期只有两年，好多总督得了热病虽然侥幸未死，可是病后身体大亏，不久也都死了。死亡率有时真高得吓人。特纳于1825年2月接了麦卡锡的班，到来年三月就死了。他的后任尼尔·坎贝尔爵士先还称赞了塞拉勒窝内的天气，还说驻军死亡太多是由于他们暴饮过度，可是到第二年八月他就害上热病死了。尼尔爵士的后任德纳姆上任后只活了一个月，而德纳姆的后任拉姆利过两个月也死了，同前任两个总督一起葬在花园里一棵李树下而。拉姆利的后任里基茨发了疯，倒给他逃到英国去了。当时那个爱说俏皮话的西德尼·史密斯^①就说过，塞拉勒窝内永远有两个总督，一个上任，一个回国；《约翰牛》杂志一向痛恨那班“圣徒”和他们的殖民地，杂志上也说，派总督得象发公文一样，总要一式三份才行。

^① 西德尼·史密斯(1771—1845)，英国牧师、作家。——译者

根据统计表来看，有些年头的死亡率急遽上升，例如 1836 年，1837 年，1844 年和 1847 年就是如此。1859 年是最糟糕的年度之一，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就酷热难当，一直到七月才开始有雨。常年的死亡人数平均在五百人左右，而这一年却达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九人，据此可以推定，病死的就有一千人以上。根据传说，就在这一年兀鹰第一次飞到了弗里敦，今天在弗里敦兀鹰可就象伦敦的鸽子一样平常了。到 1872 年，白人居民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害热病死的。到底害的是什么病，也不一定都弄得明白。麻疹、天花、痢疾，这些都是查得出来的。欧洲人到了这里，恐怕多半在头两个雨季就得了疟疾；很多人就此病死了，他们便简单地把这个病称之为“热病”。在闹得最凶的那几个年头，造成大量死亡的则是黄热病，就是那凶险无比的所谓“黄杰克”。

塞拉勒窝内的居民人人都有一套得意的防治热病之道。有人认为必须早早起床，避过中午的烈日。有人带着几分本能的感觉，最害怕黎明和黄昏的时刻——不过他们以为这病是由弥雾传来的，而不是蚊子叮后传染的。有位海军中校接到

坎贝尔总督的邀请，请他在8点钟一起共进早餐，但是他“辞谢了，说是他来到非洲海岸就定下了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不到10点钟不能上岸”。绝大多数人都同意饮酒过量是取祸之道，但是普尔牧师却说他有“一种审慎可靠、调节得当的饮用葡萄酒和啤酒的方法，白兰地只要是上等货色亦可应用”。他还提到——不过却很难使人信服——说是有个“传教士（属哪个教派的我不知道）因为听信了哪个热心的戒酒派的劝告，结果却上了当”，死了。

这位随军牧师爱喝酒，相信喝酒对他有好处。他还喜欢早起，喜欢早餐要丰盛：“在热带地方，如果你要保持健康，要享受一天中最爽快的时刻——事实上也是一天中仅有的爽快时刻，你就必须早起。……一天的第一顿饭，要吃牛排、羊排、咖喱菜，以及诸如此类富于营养、作料充足的菜肴；另外再喝点上等的苦啤酒，就更好了。”那位优雅的梅尔维尔太太也赞成早饭要备得丰盛，要有“加足作料、盖着盖子还直冒热气的大盘肉、鱼、鸡、蔬菜；要象吃正餐一样，把酸菜和酱油传来递去，把酒瓶和水壶面对面摆好；红葡萄酒和啤酒都要准

备妥当”。多数白人还赞成要作些运动,但决不能象那十二个人一样干得过了分。据兰金的记载,那十二个人在树荫下都还有九十八度(华氏)的高温时,在跑马场上打板球。“场边还备了充足的葡萄酒和利久酒,好提神解渴,招待客人。结果咎由自取,他们离开球场时,个个发了高烧;过了两个星期,据说只有一个人还有命。”

如果预防热病的办法不见效的话,那么这里的治病方法听起来可实在危险。从伦敦运来的都是滑头药,多年来医生建议采用的就是放血疗法。有个害了热病的孕妇服了一剂份量很重的汞剂,总算侥幸才没有送命。根据梅尔维尔太太的书上所说,那帮新斯科舍护士干她们这一行,简直就象是从萨拉·甘普^①那儿学来的:

假如你将各式美酒听任她们白天黑夜放量地喝,那么,她们为了表示谢意,一等你身体开始复原,就会劝你把威斯特法伦火腿当早饭吃完;她们就不再遵从医嘱给你喝几小匙白葡萄酒,而会朝你杯子里一气倒上个近半瓶,那种大方的态度倒不是表明她们精于此

^① 狄更斯所著小说《马丁·朱兹尔威特》一书中的人物,是个专门照料产妇的护士,声名很坏。——译者

道、卓有识见，而是表明了，你待她们怎样，她们也就愿意怎样待你。

克里奥尔医生詹姆斯·艾弗里卡纳斯·霍顿把弗里敦有害健康的原因归之于天气，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他又坚决认为，除开弗里敦以外，塞拉勒窝内就是“整个西非海岸上最合乎卫生的地方之一。巍峨高峻的山峰在向地势低洼、雾气迷蒙的弗里敦的居民招手，可是没人理会”。他劝欧洲来的人，衣服要穿棉布的，早饭要吃得清淡，没有成熟的水果要少吃。他坚决认为，为害最大的莫过于“热带地方有一些人，早上一睁开眼睛就非要来‘一大杯火辣辣的白兰地’不可”。

霍顿等人都正确地观察到了，低洼地区要比海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不过他们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认识到，低洼地区有一汪汪积水，其所以具有危险性，原因就在于蚊子^①。固然，兰金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过这主要是一句俏皮话，不一定具有科学的正确性），他说：“蚊子其实也不多……因为根据报告说，塞拉勒窝内的气候实在太厉害了，以

^① 霍顿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弗里敦居民每年排出的一百八十二万五千加仑的尿不知到哪里去了。

致连这些残害人类的東西，连这个疫疠横行的沼泽地本身的产物，也都无法生存。”

把塞拉勒窝内这个“白人坟”用作预防疟疾的试验地是最合适不过的。罗纳德·罗斯爵士（当时还是罗斯少校）根据他在印度所作的研究，认识到这个病可能是由疟蚊传播的。为了给他的理论求得进一步的证明，他率领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一个小队前往塞拉勒窝内。1899年12月15日，他向殖民部汇报了他的尽管非常慎重、然而已是轰动一时的研究结果。他发现有两种蚊子可以传播这种疾病，这两种蚊子的幼虫多半存在于小水坑里；他虽然并不排除其他媒介传染疟疾的可能性，但是他也说明了何以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他把他的防疟措施建议归纳为：排除积水以消灭蚊子的孳生地，彻底扑灭了孳，房子都要造在支架上，要安装纱窗，张上蚊帐。研究塞拉勒窝内历史的专家克里斯托弗·法伊夫，为医学史上的这一个篇章加了个带有讽刺的脚注：“约瑟夫·张伯伦（殖民大臣）在公开演说中多次表示他对热带医学深为关心——可惜这份划时代的报告送达殖民部时，他和他的几位次官谁也没有费神去看一看。”

法伊夫一向是热心为塞拉勒窝内辩护的，他认为塞拉勒窝内有碍卫生的坏名声未免言过其实。这种意见，在十九世纪也有人提出过。“西印度欧洲籍居民的死亡率无疑要比塞拉勒窝内高得多，但是承认这一事实的人就很少了。我们在非洲的侨民，人口往往不满百数，每个人都占有一个显眼的重要的地位。谁死了都有人注意。……”欧洲人非但没有生活在死亡的恐怖中，连星期日专诚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也极少。“他们在哪儿呢？他们早已把六天来的心事抛在九霄云外，在那里享受安闲的时光：有的在跑马场上跑马，有的在通向海盗湾即科克耳湾的阳光灿烂的河口坐船兜风，有的则在家里闲聊天。”兰金还引证了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的玩笑话：“你受到我们这样的殷勤款待，如果到了英国还要告诉人家说殖民地上气候宜人，或者还想纠正人家从过去的恐怖传说得来的印象，那你就未免太忘恩负义了；因为你这么一来，就会降低我们的薪金，削减我们的津贴，我们为了公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来忍受这样极端恶劣的气候，拿这么一点津贴还不应当吗。”

塞拉勒窝内的白人看到兰金书中的这一段话

很恼火，嗤笑说他在这个国家里只住了这么几天，根本没有看到过热病的大流行。不过兰金的话倒是颇有点道理的。其实塞拉勒窝内同西印度、同马德拉斯、同加尔各答都差不多，事实上同西非海岸的其他地方也都一样，并没有什么格外有害于健康之处。如果说塞拉勒窝内死亡的白人比冈比亚、比黄金海岸、比拉各斯都多，应该记住：住在这里的白人本来就比别处多。这个殖民地之所以会有“白人坟”的丑名，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应该归之于它在英国的一些对头，其中名气最大、仇恨最深的一个，就是理查德·伯顿爵士。

第三章

我到过东方也到过西方，我去过北方也去过南方，我上过高山也下过深矿，可是我就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象塞拉勒窝内这样恶劣、这样多病多灾、这样可怜巴巴的地方。简而言之，我虽不知道魔鬼会在哪里出现，但是我知道，魔鬼的收信地址，或者他的留局待领邮件，准是在塞拉勒窝内。

（引自 F·查米尔：《一个水手的生涯》）

探险家、学者兼文学家理查德·伯顿爵士虽不是塞拉勒窝内的头号大对头，却算得上是最凶狠的一个了。自从1787年这块小小的殖民地创建以来，英国和非洲的评论家一直对它大肆攻击。有些人讨厌那班“圣徒”，因而也讨厌他们政治上的被保护人；还有一些人，如奴隶贩子、糖商、烟商、棉花商，则把塞拉勒窝内看做是对奴隶制度的最大威胁，因而心怀疑惧。而另一方面，那些鼓

吹反对蓄奴的极端派，却又和他们的美国同道一样，觉得给获释奴隶搞个殖民地转移了注意力，会忽视废除奴隶制度这个根本目标。托利党讨厌塞拉勒窝内，因为这个仁慈好善的殖民地建立在“凡人生而平等”这样一个危险的民主思想上。自由党和左派也讨厌塞拉勒窝内，因为他们不愿这里成为英国在非洲建立帝国的基地。这种种态度，哪怕有些看来是相互矛盾的态度，到十九世纪中叶便已凝聚而为一种十分普遍的刻毒的偏见，理查德·伯顿爵士于1862年到弗里敦作三天访问以前，无疑也已经怀着这样的偏见。次年他出版了《西非漫游记》一书，书中就有他对这个殖民地的报道——这本书的影响，在塞拉勒窝内一直到今天还可以感觉到。

伯顿即便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也常爱使性子闹别扭，何况1862年又是他失意的年头之一。名誉，财富，个人的幸福，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十年前，英国公众对于他假扮阿拉伯人前往麦加和麦地那一事曾大声喝采。在更近一点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他一直夸口（后来证明是他弄错了）说他找到了尼罗河的发源地。他到埃塞俄

比亚的哈拉尔、到盐湖城^①、到阿拉伯和印度的下层社会都去探过险，出版的几本书都获得了成功。伯顿是英国独步一时的一个外语通，是专门采集人类学资料的一个残酷无情的收藏家，是个虽然刻薄、却富有机智的兼擅诗文的作家，又是个具有神奇的迷人风度的男子，所以他自认是个天才，而且要大家知道他是天才。他本来是个军官，离队以后做过领事工作，还去探过险，他跟军队、跟外交部、跟同行探险的大部分同事，都吵过架，闹得沸沸扬扬。伯顿在去西非游历前七个月，同伊莎贝尔·阿伦德尔结了婚。伊莎贝尔是个性格浪漫、能惹得人发狂的女人，她从小就对伯顿十分拜倒，后来在伯顿死后，她为了表示对伯顿的崇敬，把凡是伯顿留下而她认为不妥当的一切手稿全销毁了。伯顿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丈夫。他坐立不定，性格孤独，伊莎贝尔的爱护奉承只有使他感到焦躁。有个近代的传记家方恩·M·布罗迪，认为伯顿在阿拉伯染上了梅毒，因而可能有阳痿之疾。伯顿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些诗和其他作品中，确

① 在美国的犹他州。——译者

实有证据表明他突然觉得衰老了，筋疲力尽了。不管这种感觉原因何在，反正职业生活中的重重挫折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感觉。他和伊莎贝尔都是阿拉伯通，他们本来打通了外交部，要派伯顿到大马士革去做领事，可是当年在公文中挨过伯顿臭骂的那许多官员都记着仇，结果伯顿却给派到了比夫拉湾中那个地处偏僻、疫病横行的西属斐南多波岛上。伯顿说那里的气候太坏，白人妇女受不了，于是就不顾伊莎贝尔的抗议，把她留在英国；伯顿的内心，恐怕也有点想摆脱她那种常常使他受不了的殷勤关怀吧。

“起初一阵心如刀搅——但随即就都平静了，”伯顿的西非记行一开头是这样说的。可怜的伊莎贝尔则以连篇累牍的绝望哀歌记述了这一场诀别。她也跟伯顿一样，知道伯顿完全有可能被热病夺去，从此一去不返。但是伯顿的悲伤却似乎借发火而得到了发泄。他除了满腹其他的怨恨以外，对非洲还怀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并且断言“按照智力的等级来排列，黑人当介于澳洲人和印第安人（通称红种人）之间，印第安人还比他们强些”。他感到愤慨：“我们的黑人朋友现在竟厚颜

提出了 *egalité*^① 和 *fraternité*^② 的要求，好象君王和群氓之间也可以谈什么兄弟情谊似的！”应当承认，伯顿所轻视的也不只限于黑人这一种族。他还敌视斯拉夫人、犹太人、多数的印度人，有时甚至还敌视自己的同胞爱尔兰人。他觉得有一些非洲人倒也并不如另一些那么讨厌。因此他称道曼丁哥人、索马里人和黄金海岸一带的人，而痛恨约鲁巴人和伊博人。看伯顿的文章，有时也真使人捉摸不透：他这种仇恨黑人的心理到底有几分是出乎真心，有几分是故意要去气气那些福音派和自由党。伯顿被派到斐南多波去的时候，美国的南北战争打得正激烈；伯顿即使没有实际站在南方人一边，看来他至少也认为南方人一定能打赢。他的《西非漫游记》一书的题辞是：“献给非洲真正的朋友——可不是给那班‘慈善家’，也不是给埃克塞特会堂的”——埃克塞特会堂就是那些废奴派集会的地方。伯顿既是个无神论者又是个托利党，所以他要嘲笑那些对非洲人大动感情的好心的基督教徒。

① 法语：平等。——译者

② 法语：博爱。——译者

伯顿前往非洲，心里已有了讨厌塞拉勒窝内的先入之见，一路上又没好事，扭转不了他恶劣的心情。在一个灰蒙蒙的大雾天，他离开了利物浦，“跟心爱祖国从此分手了，可还得付六镑两先令的行李费”。在船上，他抱怨船员太喧闹，女服务员太少（“就是黑女人也总比没人强些”），而最糟糕的就是酒了。“这里的波尔多酒其实是下等红酒，德国白葡萄酒味道发酸，香槟酒全是糖浆，布尔戈尼酒好比改革俱乐部^①的自酿‘布尔戈尼’——不但酒是这样，菜肴也是如此；摩泽尔葡萄酒 *sent son perrequier*^②；雪利酒叫人喝了就有气；至于波尔图酒——‘这种穷凶极恶的冒牌货’还是干脆少提为妙。”船在马德拉岛、特内里费岛和冈比亚各停了一天，伯顿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采集到的材料，足足写了一百七十二页的报导，里面尽是一些卖弄学问的细节和玄之又玄的引证——引的又往往都是外文。这三个地方，伯顿觉得都是看不顺眼的多，可以称道的少。在马德拉岛，向导想骗他的钱，烟草又糟不可言，马德拉“散发出的那股倦怠

① 英国自由党于 1834 年建立的一个俱乐部。——译者

② 法语：有理发师的气味。——译者

的气息也真古怪，你只要呆上几个钟头就感觉到了”。他说马德拉岛简直是个监狱，是个“伦敦化的监狱”。在特内里费，他很欣赏那些塞约利答^①，却对那里的饭菜、酒，还有骆驼——对这一门，不用说，他当然是位行家。到了巴瑟斯特，也即是到了真正的黑非洲，伯顿的气就上来了，心里的嫌恶直往上涌，他简直到了暴跳如雷的地步。“那些获得了解放的非洲人——主要是阿库人和伊博人，已经开始在那里‘大喧大闹’了，我们往后可以看到，那在塞拉勒窝内就达到了最高峰。他们组织了‘同伴会’这种最要不得的工会，选出了头头(将来准会成为他们的霸王)，还发动了罢工，同军队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冲突。他们都给掌握在教会的手里，教会予他们以教育，这就使他们格外具有危险性。”把“英国和花旗国”的废奴派挖苦了几句以后，伯顿就提出英国应该把这个殖民地干脆丢掉。“谁要主张保留冈比亚，我希望至少也该让他们在那里住上一年，或者说得恰当点，让他们在那里关上一年。”

早在《西非漫游记》一书中，伯顿就针对有人

^① 西班牙语“姑娘”。——译者

指责他轻率发表意见一事，作了答辩：

亲爱的读者，可不要轻视最初的印象，尤其是一个旅客的最初的印象。我深信……要勾勒一个线条分明、干净利落的轮廓，那是到了一个地方马上就能做到的，因为这时脑子里的对比感还很新鲜，第二批、第三批想法还没有把第一批想法赶走。……在一个地方住了二十来年的人，早已把他初见时的感觉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如果他还要为这地方写点什么的话，那是写给他自己、写给他同道的老头们看的，不是写给公众看的。

最初的印象到底是否可靠，这个问题自然还大有探讨的余地；不过伯顿的这些印象，则往往在他到达之前就已形成了。

还在船上的时候，伯顿就已经注意研究了两个携眷回国的塞拉勒窝内黑人的举止谈吐。“一个是牙买加的小店老板，有那么一点点常见的小聪明，又有十分高明的‘胡说’的本领，这完全证实了那位古怪的菲尔·比弗船长的一句话：他船上‘宁可带一条响尾蛇，也不愿意搭一个到过伦敦的黑人’。”另一个黑人旅客，伯顿管他叫“我们的大猩猩”或“猿人”，这人就是塞缪尔·克劳瑟的儿子，

伯顿怀着不寒而慄的心情，当时就预言克劳瑟不久即可当上主教。伯顿指责他们俩态度倨傲，自命不凡：

Chez eux^①，他们向来就是围块遮羞布，穿双“天然”袜——ecco tutto^②。可在这里，他们的外衣是特级的萨克森毛料，镶着最阔的丝天鹅绒领。长长的椰子脑袋上气派十足地戴一顶黑色的卷边圆毡帽，帽子上缠着鲜艳的天蓝色丝带；脖子上的蝴蝶结，同摩西父子公司^③家乡出品的一件最最花哨的背心，在那里竞相炫耀。……华丽夺目的衬衫上钉着吓人的领扣袖扣，那黑猩猩般的手指上也下了一笔小小的投资，戴起了浮华俗气的廉价戒指；一到室外，就要戴上柠檬色的手套，那布满青筋的发硬的手皮，可使我想起了在火热的沙地上悠闲漫步的鹤。

伯顿认为他们的妻子长得相当俊俏，又说这两个黑人都很看不起自己家乡的同胞。但是，克劳瑟在书中也好，在英国也好，都是极力颂扬了非洲君王的尊严的。“我听到过一个黑人说话，他摆

① 法语：在他们家乡。——译者

② 意大利语：如此而已。——译者

③ 据《圣经》所载，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这里是伯顿对英国“福音派”的蔑称。——译者

出了黑人在埃克塞特会堂或是在一群学者面前作大演说的那股厚颜无耻的劲儿，比方讲拉各斯吧，这是一个贼窝，可是他却硬说那里没有盗窃案，说是人们把钱留在仓库里，或是丢在大路上，都管保没事。说完，他就回家去了，‘暗里伸伸舌头’，对英国人那么容易丢掉钱表示很看不起。”伯顿对那两个同船的黑人所作的评论，最后说：“让这些人在轮船的餐厅里吃饭，不但是个社会的错误，也是个政治的错误，到头来餐厅难免要被他们完全霸占。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对这些小事一定要十二万分注意。”

从远远望去，伯顿觉得弗里敦“也未始不美，不过这种美一如来因古堡，带着荒凉败落的情调”。市镇所选择的地点是最糟糕不过的，他认为疟疾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市镇没有建在高地上。“从欧洲来的人如果已过了中年，那就大有很快送命的可能。保险公司的人都不肯承保。谁也不想在这里呆到两年以上，就是这两年，也是一个漫长难捱的苦难。所以大家也都不愿费神去修路，也不想去买块田地，或者在山上造所住宅。”他对这里没有五光十色的船舶和规模相当的码头表示不

满；他嘲笑了“矮个儿的灯塔”和“区区的防波堤”。他还描述了“这个没落的欧式热带殖民地霉臭、溃烂、腐败的面貌”，和土著的“茅顶小屋”。

同到过塞拉勒窝内的一切游客一样，伯顿对这里所表现的信教之虔诚也感到吃惊；不过他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讥笑了圣乔治大教堂建筑上的种种缺陷。“造这座教堂花了十五万镑哪，”他感叹道，“这还不包括巴克斯顿（反对蓄奴的领袖人物）的一尊塑像，这尊塑像倒也相当别致，竟缩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当地的教堂真是多如牛毛。”伯顿也跟别人一样，谈到这里守安息日如何严格，但是他还加了个刻薄的脚注：“那些传教士个个称赞非洲人严格遵守安息日制度。其实非洲人也真巴不得一年能有三百六十五个安息日，真要那样的话他们一定同样认真，天天照守不误。”然而，他断言信教的虔诚并未养成真正的道德，他坚决认为英国政府的基督式的慈悲心肠促成了土著的堕落。他认为这里甚至连沿海朝南一带的真正原始民族的那种法令都没有：

在贝宁湾和比夫拉湾一带，酋长带着法术师和刽子手到处巡行，那里的男人还有点丈夫气概，女人还懂点

贞节——纵然不是“内在的精神的美德”，至少也有那么一种外表的可见的形式。在那里，犯了过失的妻子害怕“沙西水”^①和杀头；在这里，妻子离开丈夫（丈夫抛弃妻子比较少见）却可以逍遥法外。这里的女人已经变得同埃及这个最最下贱的王国的女人一样道德败坏了^②。在弗里敦，窃贼横行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其实若就财产而言，这里是一个最最共产的社会。

伯顿把“黑小子”大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商人，这是一个体面的称号，凡是能够买上五、六匹布，在交易场所一坐，把布摆在面前，整天在那里闲聊天，什么事儿也不干的，这种人都一概自称为商人。第二类是裁缝，他们的老婆就准是洗衣妇无疑。……第三类是传教士，这种人还是少提为妙。”固然，伯顿认为也有那么一个商人，即西布尔·博伊尔，是谦恭有礼、为人正直的，事实上伯顿还光顾过他的铺子——但是他又一口咬定说博伊尔只是一个“可敬的例外”。伯顿对各个不同类

① 用沙西树汁来进行审判，即以服下毒汁是否中毒来判定是否有罪。

② 伯顿的性病是从一个埃及女人那里传染到的。

型的“黑小子”也有所区别，尽管那也无非是为了要证明他们都各有其不同方式的可恶。老移民、新斯科舍人和马隆人如今地位已极卑微，无法与较有活力的获释奴隶竞争，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些获释奴隶原来都是罪犯，所以才会被卖为奴隶。在获释奴隶的两大种族中，伯顿认为“阿库人为了捞钱可以不择手段，伊博人为了报仇可以无所不为。两个种族按其智力程度都已足可造成危害——因为他们的才能是绝少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虽然伯顿也攻击了塞拉勒窝内的某些白人和混血儿，但是他那股最激烈的怒气，都出在克里奥尔人身上——“这些纵坏了的孩子，他们的习气幼稚愚昧，他们的语言极其粗野，他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他们还老是要找人吵架。”尽管塞拉勒窝内人子某些行业也有点本领，但是“在沿海一带，只有一个十足的大傻瓜才会请他们做要有点本领的工作。塞拉勒窝内人都是贼性难改的小偷；他们喝酒，赌博，搞鬼，一味讲究打扮，把进账花完以后，就什么都要叫雇主去偿付。”伯顿在这块殖民地上呆了三天，他有足够的功夫研究并痛骂了那里的公墓、邮局（在邮局里他碰了局长的一个钉

子)、监狱(“完全按慈善家的原则管理”)、报纸(“最最低级的‘吃饭第一主义’”)、一所学校(都用死板的方法施教),特别是那里的法律制度。

“我们一到,‘黑人的嚼舌头’就开始了,”伯顿接下去就记述了一个案子,说的是一个英国人因为把一个黑人撵了出去,结果被罚款五十镑。伯顿不但把过去有关塞拉勒窝内的陪审团的一切流言蜚语统统照搬过来,而且还以他特有的那种刻毒的俏皮劲儿,给故事添油加酱了一番。

英国宪法规定,一个人只能受同等地位的人的审判。在塞拉勒窝内,这同等地位的人也许就是十二个纯种的黑人、解放的奴隶、半归化的拜物教徒,这些人有时在心里还喜欢偷偷参拜山果^①呢,他们即使不是自己国中的罪犯,至少也是些穿得破破烂烂、涂着棕榈油的叫化子。你要提出“异议”也没用,因为不同意这几个黑人,肯定又会换上另几个黑人。……法官也说不定是“柏油刷子刷过的”,不过即使法官白得象牛奶一样,他也得按陪审团的决定来下判决,如果赔偿费在两百镑以下,就不得上诉。……我们的祖先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好几个世纪以来流血奋斗所争取的那

① 约鲁巴人传说中的雷神。——译者

种自由、那种制度，竟会遭到这样的糟蹋——竟会滥送给一切获释的黑人奴隶，不管他是杀人凶手，是盗贼，还是巫师，只要在英帝国的一个黑角落里住过约莫十四天就行了。要知道，就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到了美国，也要过上五年左右，受过点文明的熏陶，才能取得选举权呢。

说一个奴隶获释十四天后就能在塞拉勒窝内当陪审员，这当然是不真实的。这种讲法，同伯顿这本尖酸刻薄的书里写的许多报道和逸事一样，不但不真实，而且也不公道。伯顿带着抱憾的口气也承认了：虽然在他看来克里奥尔人的狂妄无礼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他自己却没有亲身碰到过；就是那个邮局局长的顶撞，在文章中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许后来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书写得可不大公道，因为二十年后旧地重游，他对这个殖民地的报道就略有不同了。那时他正担任英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但是他大半的时间却在近东一带航行。伯顿多年来一直害着“淘金热”，他在阿拉伯一边的红海海岸上已经掘过几个矿，却一无所获。到了1881年，他又深信在黄金海岸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一定能掘到黄金，发笔大财。于

是在另一个比较年轻的探险家洛维特·卡梅伦的结伴同行下，他就再一次动身前往使他如此反感，却又使他如此向往的非洲。两个月以后，两个人都得了热病；外交部早就特地告诫过伯顿不要到海外去搞商业冒险，这下子可就发了火；不消说，这次探矿也就失败了。大概为了要补偿他们的费用，伯顿和卡梅伦合作写了一部《黄金海岸淘金记》。这本书，可以肯定大部分是出于伯顿的手笔；事实上其中有些就是从《西非漫游记》和《两游大猩猩之国》两本书中不改一字整段抄录的。伯顿以自矜渊博而又尖刻的笔触，再一次记述了他们一路停泊的那些港口的风土人情。在塞拉勒窝内，他再一次对“黑小子”们发出了先前那样的嘲笑，他心里大概在想：既然以前读者对这些笑话很欣赏，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读，一定会加倍的欣赏。

不过，这第二次的报道中却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更动。对克劳瑟的漫骂都删去了，大概伯顿也顾虑到，克劳瑟的父亲已是主教，他可能会告伯顿一个诽谤罪。伯顿在书中还表示了一个完全违背他性格的意见：“对作者也好，对读者也好，赞扬总比非议好，”接着，六十岁的伯顿又发表了一个

肯定会使四十岁时代的伯顿大惊失色的声明：“英国人多半都见过这么一些‘有色人’，也见过这么一些纯种的黑人，他们在牛津等地已证明了他们的智力和能力完全比得上欧美的白人。”问题——伯顿接下去又解释说——就在于黑人得不到均等的机会。伯顿在重复他对弗里敦的大部分谩骂的同时，也承认这里的情况有了改善，“物质上，有了净水的供应；道德上，有了制止痛骂黑人的勇气。二十年前，管一个黑人叫‘黑鬼’就可以被起诉；也不知有多少人因为犯了不敬‘同胞兄弟’的罪，得掏出五镑钱的罚款。……”现在，多亏有了一条新的法律，规定凡是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先证明本人是有资产的人，这样，黑人“在郊外就再也不在你面前摆开一副挑战的架势，挑逗‘白鬼’去打‘黑人绅士’了。”其实黑人是从来不会这样做的，只有在伯顿一类英国人的爱动肝火的想象中，才会有这样的事。

伯顿一再表示惊奇，有些事情他这次竟没有看到，其实这些事情在二十年前他头一次来的时候恐怕也未必见过：

二十年前的那种极端的“自命不凡”和狂妄好斗的样

子已经看不见了；海滩上的当差，尽管是一帮没有出息的人，也确实已经有点礼貌了。……那种桀骜不驯、无法无天的非洲性格也未尝有所表现，在以前那可是经常表现出来的，比如殴斗、扯头发、咒骂，他们骂起人来，把英国和这个黑暗大陆两者的观念和措辞都揉合在一起，其 *tout ensemble*^① 实在可怕。

或许是伯顿年纪大了，人也圆滑了。或许是伯顿以前记载的那些邪恶的现象，合作写书的卡梅伦没有见到，卡梅伦对这个比他年长、也比他有名的人物就在不失尊重的情况下，委婉地提出建议，请他把以前有些比较激烈的意见改得温和一点。在《黄金海岸淘金记》一书中，伯顿（这一段也可能是卡梅伦写的）大大赞扬了克里奥尔商人威廉·格兰特在英国发表的一篇讲话。格兰特在那篇讲话中申诉说：黑人是受错了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合黑人的需要，只适用于英国人。格兰特说：“你给黑人受了这种教育，他就以为他一切都得模仿你——学你的一举一动，跟你一样穿起上等呢料衣服。这样一来，你看，结果他就忘其所以了；他把自己弄迷糊了，等到他再要用自己的脑子独立

① 法语：总的效果。——译者

思考的时候,他就手足无措了。”看到非洲人模仿英国人,心里感到讨厌,这也是伯顿比较喜欢穆斯林的原因之一。他觉得阿拉伯人的清真寺要比圣乔治大教堂高明。他认为弗里敦灰暗发霉的建筑远远不如穆斯林非洲那些蓝色的、黄色的或白色的房子。他一再夸奖他在弗里敦碰到的曼丁哥人气度威严;对他们惯常拐骗克里奥尔儿童的行径,他也就一笑了之。

伯顿为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所勾勒的一幅无比放肆的讽刺画,往往是歪曲的、粗野的、愚蠢的,然而这对英国的公众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伯顿是非洲探险家又是知名的学者,因此人家把他看成是一位权威作家,批评家攻击他就得担风险。这个人既然能使皇家地理学会相信白尼罗河的发源地是坦噶尼喀湖而不是维多利亚湖,他也就能使人们接受弗里敦克里奥尔人性格问题上的一个同样虚妄的印象。伯顿的书也影响了写非洲题材的其他作家。后来以《人的牺牲》一书获得盛名的年轻的 W·温伍德·里德,同伯顿一样,也是个托利党,也是反对基督教的,也是认为原始人胜于沿海非洲人的一位浪漫派。他在《野蛮的非洲》一书的

绪言中写道：“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我是第一个年轻的高等游民，到西非去作了一次善意的旅行，自掏腰包，漫无目的地在那一片赏心悦目、气候宜人的土地上游览，在原始森林中 flâner^①，跟健壮的蛮子逗逗趣，在食人生番中间抽抽雪茄。”里德对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的讥讽挖苦，几乎也跟伯顿一样刻薄。他也照搬那老一套的故事，讲到陪审团如何腐败，讲到人们如何偷懒，还讲到有一个克里奥尔人“打扮得好象在彩虹里洗了个澡一样”。替他搬箱子的搬运工人“因为打破了安息日的常例”，问他多要了六个便士，这下子里德可“乐了，原来我们传教士的劳力真没有白费”。1868年里德再次来到塞拉勒窝内，他这回的报道就写得厚道多了。“同一切没有成熟的东西一样，青年时代总有点生硬、尖酸的味道，”他解释说，“……我现在就不大象从前那样喜欢冷嘲热讽了。”凭了六年来增长的许多智慧，里德终于觉得：他是喜欢弗里敦人的。“当然，他们都是无赖和乞丐，不过我们对子他们应该有所谅解；他们都是奴隶或奴隶的子女。……这些黑人讲的、写的

① 法语：踟蹰。——译者

英语固然都极糟糕；但是话要说回来，他们能够讲一点、写一点英语，这不就很值得称赞么？”

伯顿对那个异乎常人的玛丽·金斯利也有所影响。金斯利不幸早死，但当时她即已被推崇为写西非题材的古今最伟大的作家。她也是一个唯理论者，一个保守派。她虽然是位有才能的科学家，可也是怀着浪漫的憧憬到非洲去的。她也认为原始的非洲人，哪怕是吃人的非洲人，也要比沿海城镇里的基督教徒好些。她也取笑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虽然她的嘲笑比起伯顿来要和气一些。她那爽利、奔放而不事修饰的文字——这种特色半是天赋，半是技巧的熟练——在描写弗里敦的那一段里发挥得最出色了，举个例子，比如对圣乔治大教堂屋顶上的兀鹰，是这样描写的：

……那座大建筑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壮观，还赶不上教堂顶上那一排恶鸟这么动人心目。这些鸟儿就一字儿栖息在屋顶上，翅膀摆成各式各样互不相同的角度，都显出一副“筋疲力竭”的样子。有的一个翅膀笔直伸在前面，另一个翅膀正巧摆成了一个直角，有的两个翅膀都直挺挺伸在前头，也有的两个翅膀都无力地垂在两边，但是没有一头是象正常的鸟儿那样把

翅膀收拢得整整齐齐的。这些鸟儿全都给人一个印象，好象昨天晚上都喝得沉沉大醉，事后就陷于一种极不痛快的难受的状态——要能选择的话，它们是宁可去血战一场的。

在敌视沿海的非洲人这一点上，伯顿比英国的殖民思想先行了三十年。到十九世纪末，英国由于经济上和地理政治上的原因开始向腹地推进，伯顿的想法从此才成为一般流行的想法。卢加德勋爵接管了信伊斯兰教的弗拉尼人和豪萨人的领土，不过他尊重他们的制度，只是通过“间接统治”行使政权。在黄金海岸的腹地，英国又一次使用了武力，最后终于摧毁了凶猛英勇的阿散蒂人的王国。从伯顿死的那一年即 1890 年前后起，英国就着手开发塞拉勒窝内的内陆。从此以后，在英属西非，克里奥尔人的势力就衰落了。英国的官员、专家和商人，同内地的酋长合作，从如今已被人嗤之以鼻的“黑人绅士”手里，接管了管理公务的机构。

第四章

理查德·伯顿爵士轻视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以为内陆的土著倒比他们好些，这个意见在1862年发表、后来在1882年再次发表的时候，被认为是希奇古怪、甚至很不象话的。到1902年，即伯顿死了近十二年以后，这些观点却已成为英国政府的官方看法。这其间的二十年，经历了一场“争夺非洲”的竞争，非洲大陆的地图也重新画过了。在西海岸，英国攫取了尼日利亚大片人烟稠密的土地和黄金海岸。法国人把他们的帝国从塞内加尔一直向东推进到苏丹，并且在沿海又添了几块殖民地。德国人是搞帝国事业的新手，也夺到了多哥、喀麦隆、坦噶尼喀和西南非洲。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瓜分了刚果河流域，而英国在东非和南非则获得了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尼亚萨兰、南北罗得西亚，还有若干个保护国，以及那几个被打败的布尔人的共和国。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

里，英国人深入了塞拉勒窝内的腹地。1898年英国人同一些不服的内陆部族发生了战争，在战争中克里奥尔人同时受到了双方的厌恶和猜疑。从此他们就成为独处一隅、显得有点凄凉可怜的一群，虽然也苟延残喘到二十世纪中叶，但是他们的势力和意气就此一蹶不振；“圣徒”们以为得意的试验，就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给推翻了，踩烂了。

英国人 1882 年进攻埃及，挑起了抢夺非洲属地的竞赛；然而在开头的十多年里，英国自己却动作迟缓，也不大带劲。它所以一心要尼罗河，考虑的是地中海的安全，以及同它的远东帝国之间的连络。格莱斯顿^①说过：“英国利益的重大关键”，在苏伊士运河。为了保卫这一利益，英国把势力扩张到苏丹、红海，甚至远到肯尼亚。但是对黑非洲，特别是对西非洲，英国政府却没有多大兴趣。格莱斯顿以及其后接任的托利党人都主张英国可以在那里自由贸易，但以不吞并腹地为前提。英国所要的热带原料大半已经从东方和拉丁美洲获得，因而认为西非的物产在经济上没有多大价值。

^①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译者

掌握西海岸大部分贸易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商人，当时在威斯敏斯特^①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帮派”。

英国在西非的贸易政策历来是以它同其他商业大国的一项默契为基础的，根据默契，无论何国都不得打乱现有的安排。占领了埃及，情况就全变了。俾斯麦的德国最近提高了国家的声威，意气扬扬，把这个行动看成是一种挑战。法国在欧洲吃了败仗至今心有余痛，急于要在非洲和远东挣得 *gloire*^②。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也对他刚果河那块巨大领地的丰富宝藏垂涎三尺。在1884年就非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柏林会议上，他们三方的计划都领到了通行证。独有英国，还是不愿意同西非发生关系。它鼓励尼日利亚的戈尔迪一类的英国商人同酋长们订立私人的协议，但是不主张政府花那一份力气，更不用说花那一笔代价，去直接进行兼并。英国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一般政治家都不想把这个帝国再进一步扩大了。英国舆论界对西非的看法，都是由塞拉勒窝内这

① 伦敦的中心区，英国议会大厦所在地。——译者

② 法语：荣誉。——译者

个“白人坟”而来的。法国动手把非洲内陆抢走的时候，英国也没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不安。正如玛丽·金斯利(她本人是一个激烈的扩张主义者)忧伤地谈到的：

在英国，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这样看待法国在非洲的兼进行动：“哎呀，那个要命的苦地方就让它拿去吧，但愿它受用无穷！”法国可非常清楚它有些什么可以受用。……它知道非洲是一个超等的军官培养地，……下次它再要同我们条顿民族的哪一个国家见个高低的话，它手上就有了一批在塞内加尔灼热的沙漠里训练纯熟的军人，这批人可就不容易对付了。我们不是要非洲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印度就是一所再好不过的军事学院；但是我们一定要我们能够到手的非洲一切地方，西部，东部，南部都要，为的是要一个市场，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法国是有冲突的，因为法国不仅为自身的利益而不发展其殖民地的贸易，而且还利用优惠关税，把一般贸易也统统卡死。……

好战的法国人久已在勘探尼日尔河的上游，而且还同富塔贾隆^①拟订了一个条约，大有分割塞拉勒窝内的腹地之势。这一行动在弗里敦引起了不安。多年来一向顺着海岸南下、去谋经商和

① 富塔贾隆在塞拉勒窝内以北，今几内亚的西部一带。——译者

做官机会的克里奥尔资产阶级，近来已将注意力移向腹地。在 1880 年前的五十年中，这个殖民地的贸易额增加了五倍，增加的数字大部分是克里奥尔人在内陆的贸易。克里奥尔商人，还有那班很不好对付的女商人，在许多遥远的地区的河源一带都设立了贸易站。到过“土著”茅屋的人都见到克里奥尔人影响的痕迹，诸如“两三张藤面椅子，一张罩着罩布的冷杉木大桌子，一只靠墙的小台子〔和〕一张套着印花布椅套的白木板躺椅”。传教士也生意兴隆。有个从衣阿华^①跑来传教的空头演说家丹尼尔·弗利金格，起初在歇尔布罗河畔待了十三年只收到两名教徒，但是据他自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几千人来做礼拜，大概是他新得的那个头衔——“德国与非洲联合兄弟会主教”，使他们都不胜敬畏吧。曼彻斯特的纺织商人对这位主教一定是深有好感的，因为这位主教不辞劳累，千方百计劝说土著不要让小娃娃光着身子。

克里奥尔人入迁腹地，同样也有移民到弗里敦来寻找工作。克里奥尔人很感谢这种廉价劳动

^① 美国中部一州。——译者

力的补给，但又指责这些新来的人偷东西，不干净，耍巫术，还要在夜里打鼓跳舞，嚷嚷吵吵。有些克里奥尔大老粗有时就会结伙侮辱和殴打这些移民，连有些资产阶级人物也赞成用这种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外来人。那个有名的克里奥尔绅士 A·J·索耶，据说在 1886 年曾在一次会上讲过：“在本殖民地的历史上有过一个时期，年幼的塞拉勒窝内人踢了一个泰姆奈人或苏苏人可以免受处分。可现在我们却听到了泰姆奈人‘罢工’的事。这可是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呵，各位！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营房里有了一团兵，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连一个酋长的儿子亚雷赫·库尔，也照样免不了要受到克里奥尔人的轻侮。这孩子是英国行教会文法学校的学生，在学校里经常受到戏弄——“库尔，库尔，库尔，库尔，克鲁人呀，划小船儿”——弄得他的监护人只好把他的名字改为爱德华·卡鲁。从这个受人作弄的例子，也就可以明白从内陆来的穆斯林何以都要脱下他们凉爽舒服的布袍，换上克里奥尔人的那种走了样的英国式华丽服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弗里敦担心法国会从北方入侵的时候，这块殖民地受到了一次严重的贸易衰退的打击。这次衰退，主要是由于塞拉勒窝内的大宗产品如橡胶、棕榈仁和棕榈油之类在世界上价格普遍下跌而引起的。克里奥尔人把衰退的原因归之于腹地的“部族战争”。这些战争，其实倒真是些贸易战：一些酋长都要管辖河源，也就是商入收购内陆货物的集中地，结果就打了起来。虽然这些战争有时或许也阻碍了贸易，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倒是棕榈油贸易大量增加、打乱了相邻各酋长间历来的贸易协定的结果。克里奥尔商人和英国官员不懂丛林外交和丛林贸易的微妙之处，也插手进来想居间调停，结果往往使争吵越发如火上加油。

到1885年，绝大多数克里奥尔商人都提出应该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制止战争，并确保商人的安全。代表弗里敦资产阶级的塞拉勒窝内公会召开了一个千人大会，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殖民地政府用武力维护治安，派军队保护通商航路，同法国划定边界，还要派考察团去开辟新的贸易区。塞缪尔·刘易斯爵士选择了庆祝女王即位五十周年

的机会，发表了一篇要求扩张的公开演说。他不赞成“用购买和平的手段对侵犯英国领土的半野蛮的侵略者”进行安抚。当时许多克里奥尔人都讲到一定要教化这些土著，使他们脱离野蛮的状态。弗里敦的基督教徒近一个世纪来从未过问过腹地的风土人情，如今都对蓄奴、吃人以及豹子会、鳄鱼会一类杀人匪帮横行不法等恐怖现象表示不胜愤慨了。

1885年再次来担任总督的塞缪尔·罗爵士，对克里奥尔人的扩张要求抱着冷淡的态度。他到内陆巡行了一周，想给争执的首长调停讲和，但是他知道，积极进取的政策是不会得到伦敦方面的赞许的。一则，去接管一个至今还实行奴隶制度的地区，被认为是不策略的。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费不足。塞缪尔·刘易斯爵士同绝大多数克里奥尔人一样，主张“由帝国提供贷款，实行和平归并”。塞缪尔·罗爵士则因为面前反正摆着个亏空的局面，所以赞成征收进口税或直接税。

克里奥尔人同意收从价税，但是坚决反对收直接税。塞缪尔·刘易斯爵士和一个书商兼政客

A·J·索耶，则赞成改用降低政府官员薪俸的办法。弗里敦的新闻界群情激昂，有个本地的诗人J·T·麦克福伊把他的意见按《上帝保佑女王》^①的调子填了词：

但愿捐税的魔掌
再也不要从天而降
落在我们心爱的国土上；
多亏刘易斯雄辩的力量
还有索耶温和的演讲
妖怪的大口象血盆一样
也给他们捣得百孔千疮。

塞拉勒窝内有一些白人嘲笑克里奥尔人不肯缴税，他们也在报纸上写了打油诗，表明自己的观点：

有件事儿真扎手，孩子呀咱们可怎么好？
保险箱里没有钱，看来大事真不妙。
总督他一天忙到晚，只想把收支摆摆平，
可是三二相加不得六，任你戏法再高明。
又是哄呀又是骗，加上胡话一大堆，
出了个索耶又来个大律师，殖民地难免要倒霉。

^① 英国国歌。——译者

虽然弗里敦的白人商人都和克里奥尔人一道要求向内陆扩张，然而也有人把这块殖民地看成是一股具有破坏性的势力。这个意见是由约翰·迈·哈里斯提出的，他在南方的苏利马（塞拉勒窝内政府不久前已在那里设了收税站）从事贸易已有二十年。他的论点是：不收直接税而靠进口税来筹款，就是提高运销内陆的货物价格，这种政策无异是向内陆人民征收捐税，这是战争的根源，是极不公道的做法。他指责殖民地

想要吞并一向在土著酋长统治下独立自主的边远地区，以便向他们征取贸易税，可是，殖民地方面除了付予酋长以全然空有其名的微薄棒给以外，却不打算对被归并地区报之以任何利益，既不履行一个征税政府的首要职责，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又不修筑道路或为纳税货物提供其他便利。

哈里斯指出，征收关税非但不能保证安全，实际上反而促成了战争：

贸易上的竞争和嫉妒，虽不是人所公认的触发战争的的决定性原因，然而却往往是酿成某些战争的根源所在。一旦内陆的酋长发觉沿海的人们已在诱迫之下接受了一种税收办法，使得他们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

涨了价，他们这种怨恨的心情肯定是有增无减的。这些部族自有他们的一套法律和规矩，他们对此极为精熟，并且严格执行，他们的依据就是所谓“扑尔洛”，即他们从祖上传下的国家的神圣传统。

任何一位酋长如果没有得到其他酋长的同意而订立了条约，那就会成为敌视和攻击的对象。

哈里斯根据他同许多酋长二十年的友谊，相信他们是需要英国保护的。而他们所得到的则是导致战争的税收措施，继之以塞拉勒窝内军队的惩罚性的野蛮袭击，村子烧成了平地，炮弹打进了圣林。哈里斯的结论是：“真正要不得的就是这种部分归并制度，对这个地区既不肯不管，又不肯全管。”

玛丽·金斯利把英国的殖民政策挖苦为“一阵昏迷，却间歇发作了几次”。这位怪僻的女士跟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商人是一党，她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即使说不上坚定不移，至少也算得劲头十足。她的两本大书中有一本，里面是这样讲的：

我的意见是，法国对待非洲的办法是当前最好的办法。先要在地图上尽量把非洲的地方都划为自己的领土，无论到哪里都要使土著觉得你的国旗神圣无

比——使得他们不敢侵犯。等到这一点办到以后，你就可以把法国的计划丢开一边，逐渐改用英国的方式——可不是英国用之于塞拉勒窝内的那种方式——来发展贸易。

她主张要开发内陆，不过她是为英国商人打算，并不是为塞拉勒窝内的克里奥尔人打算。

非洲帮的商人和帝国主义者 在 1895 年以前还不受注意。1895 年约瑟夫·张伯伦在新成立的统一派政府里担任了殖民大臣。他也同玛丽·金斯利一样，主张英国应该在非洲略取土地，但是他的动机却有些微妙的不同。张伯伦的朋友和敌人，还有那些历史书上，都把张伯伦说成是个激进派，虽然这个头衔其实并没有多大意思。张伯伦认为世界的经济体系正朝着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又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剽窃来一项主张，提出国家应对公众福利有所贡献；他相信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两个原则都可以得到贯彻。人们历来都很重视张伯伦的伯明翰中产阶级背景，其实他的基本信念却是跟那个容克贵族俾斯麦一样的。

张伯伦对他的所谓非洲“未开发领地”是贪得无厌的。他指责自由党政府采取自由贸易主义方

针，让非洲那么多的地方落在几个强敌的手里。在另一个帝国主义者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的支持下，张伯伦马上投入角逐，急起直追。他给戈尔迪发了一张特许状，鼓励他在尼日利亚掠夺土地。他敦促黄金海岸政府把顽强的阿散蒂人镇压下去。最后一点——应当承认比较起来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助长了在塞拉勒窝内扩张的政策。说来也怪，偏偏就是在三个殖民地中最小、也最不重要的塞拉勒窝内，张伯伦的帝国主义政策却终于闯了大祸。

注定该去执行张伯伦的政策的那一任塞拉勒窝内总督，是个职业军人，叫弗雷德里克·卡迪尤上校，是1894年来到殖民地的。卡迪尤上校在印度呆过二十年，在南非也呆了五年，打过巴丹人和祖鲁人。他脸儿肥胖，眼睛鼓出，粗大的脖子长满了肥肉，军装的钮扣好不容易才在胸口勉强扣住，那副样子看起来活象漫画里一个患有多血症的前印度的上校。卡迪尤脾气暴烈，不过他有两个特点，对他这种人说来却是不够典型的，那就是他信教虔诚，又涓滴不饮。这最后一点，或许就可说明他何以能有这样过人的体力，在五十五岁上还

能深入他的殖民地的腹地，开始作一系列牛车旅行中的第一次旅行。他的宗旨，是要把“势力范围”变为英国的保护地，让酋长照旧保有权力，但是要受弗里敦的领导。这种政策，他在祖鲁兰有过经验，认为不错，后来卢加德又把这种政策发展而为“间接统治”的理论。卡迪尤到塞拉勒窝内头一年，就改编了1890年成立的边警队。他整饬纪律，把渎职的警察不是开革就是关押，还开办了训练新警察的学校。法、英两国政府拟订一项边界协定，他是塞拉勒窝内一方的负责人。他还积极推行他的得意计划，就是修建铁路。

修建铁路的事从1872年以来就谈起了，可是一直筹措不到资金来冒这个风险。在利物浦市商会的压力下，政府派了两个测量员来勘测几条可行的路线。卡迪尤认为这条铁路线应该向东穿出产油棕最多的地区，最后获得采纳的，正是这个建议。立法会议为了这个计划兴奋万分，弗里敦市上出售的一种瓷盆，上面就画了总督的头像，周围绕着一列火车。卡迪尤回国休假时，把计划告诉了利物浦市商会，市商会对此大为欢迎。可是，英国政府不给补贴的话，私人投资者是谁也不肯

拿出这笔剩余资金去进行冒险的。不过卡迪尤的计划运气不错，提出铁路问题的时候，即 1895 年年中，正好张伯伦接管了殖民部。张伯伦是赞成铺设这条铁路的——这是英属西非的第一条铁路，于是他就派了英国政府代表来负责筑路事宜。

卡迪尤认为部落的非洲人是“愚昧、迷信而又野蛮的”，可是他又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文明的侵袭，特别是不受克里奥尔人的影响。其实殖民部的既定政策早已是如此。还在 1893 年，当时的土著事务部部长克里奥尔人 J·C·帕克斯曾经提出保护地应由克里奥尔人充当官员去管理，殖民部就拒绝了。有一个官员写道：“不过帕克斯先生可是个例外，我始终认为，要找象先生这样可委以此类重任的土著，那是连五、六个也找不到的。”另一个官员也写道：“我们不能信赖他们，他们很可能会把我们拖进各种各样的纠葛。我倒是非常赞成派两个称职的欧洲人做巡回专员，带上一队警卫，到各地去巡视，解决纠纷。”卡迪尤总督起初只是不信任克里奥尔官员，不久就干脆对一切克里奥尔人都不信任了，特别是对商人、律师和记者。

和大多数新上任的总督一样，卡迪尤同克里奥尔人也度过了一个短短的蜜月，在此期间他赞许克里奥尔人，也受到克里奥尔人的称道。他到圣乔治大教堂做礼拜，在威尔伯福斯会堂的跳舞会上同他们的太太一起跳舞，还参加他们家里举行的（当然是免酒的）招待会。塞缪尔·刘易斯和他相互钦敬不已。那个克里奥尔人赞扬总督为殖民地的利益巡行各地，进行了不倦的工作，他对卡迪尤的铁路即可提供的投资机会也表示了欢迎；总之，他相信保护地不久即可享受到工业和文明的“福泽”。总督大概听了这些奉承话很高兴，就为刘易斯请授爵士位。

友好的刘易斯先生不久却变了个敌对的刘易斯爵士。争吵是从有关保护地地位的一个法律问题上开始的。其他争论也就随之而起，到1897年6月卡迪尤本人获得爵位时，双方已经闹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这时候卡迪尤也觉得他已经把克里奥尔人完全看透了。他的王室民法顾问收受私人的钱财被察觉了；他的克里奥尔秘书把他欺骗了；两个克里奥尔邮政局长又查出有贪污的行为。他认为内陆的克里奥尔人都是贩卖枪枝糖酒、诈

骗霸占土地的家伙，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则不是敲诈勒索的律师，就是专事匿名攻击的可恶的记者。同许多本来也打算提拔克里奥尔人的塞拉勒窝内总督一样，卡迪尤不久也就变得只信任英国人了。他不再任命克里奥尔人为立法会议代表，尽管立法会议也愈来愈软弱无力了。

1896年8月，根据英国议会的一项法案，正式宣布把内陆划为保护地。事前既未同酋长们磋商，公告也仅在殖民地范围内发布。当时殖民地的人口约有七万三千人，而保护地则拥地四万平方哩，人口几近一百万。然而殖民地上的克里奥尔人似乎还是没有理会到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被内陆的居民所淹没。即便是刘易斯吧，他虽然从法律上极力强调这件事没有同酋长磋商、没有征得酋长同意，然而就他个人来说，看来他对保护地还是抱着欢迎态度的。

1898年保护地的暴动，后来就被称为“茅屋税战争”，这场暴动的发生主要应归咎于这种筹款的办法。卡迪尤固然是当其事者，应当直接负责，但是张伯伦的西非政策历来规定，要开发内陆必须先铺设铁路，派上一大批行政人员和警察，而这

批人员的浩大开支，就应由土著的房屋税来担负一部分。黄金海岸也征收了类似的捐税，那里之所以没有引起战争，与其说是由于措置英明，倒不如说是因为走运。当然卡迪尤本人也是赞成征收房屋税的。他认为殖民地太穷，负担不起内地的开发经费，而在保护地内，则反正流通现金多的是。在呈给伦敦的一份公文里，他说：“首先我相信土著是愿意缴纳货币的（比起缴纳货物来）；其次，我相信他们即使目前还无力缴纳，可是很快就会缴付得起的。以前我在祖鲁兰一向征收茅屋税，而且自第二年起一直征收现款，我根据祖鲁兰的经验，得出了以上的结论。”他建议四个房间的屋子抽十先令，四间以下的抽五先令。其他英国官员也都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以助理督察员身份来到塞拉勒窝内的 C·布雷思韦特·沃利斯写道：

在利比里亚，住在政府势力范围之内、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每人每年要缴税六先令三便士，征收并无困难。在巴苏陀兰，1885年的税率是十先令，以后还有所提高；在纳塔尔，凡是卡菲尔人每所小屋都要征税两镑左右。所以塞拉勒窝内保护地目前征收的五先

令的税额并不算过高，也决不至于使多数居民无力负担。

卡迪尤总督先就关照了殖民部，说收税可能会遇到一些反抗。他虽然自信能够对付，不过还是先向政府打个招呼：如果他们对征税的后果感到担心的话，那也可以从英国政府的经费中拨出一笔资金以供开发之用。政府并没有理会这个暗示，其实卡迪尤也正希望他们不理睬。因为从卡迪尤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是主张抽税的，他不仅要把税收作为一种收入的来源，还要作为一种发展的手段，尤其要作为获取劳动力的一条渠道。卡迪尤说过：“在祖鲁兰第一年征收茅屋税，有的祖鲁人还用牲畜来偿付，从第二年起他们就总是用现金来缴纳了。那些酋长经常派他们的年青人到金伯利和纳塔尔干活的地方去挣这十四个先令——不是五个先令，他们每所屋子就得缴纳十四个先令。”在南非和中非，各地的殖民政府差不多都要征收（事实上至今还在征收）一种只收现款的捐税，好迫使非洲人流入劳动力市场。卡迪尤为了给这种税收辩护，后来写道：

由于铺设了铁路，改建了公路，并采用了其他交通工

具，由于以贸易公司和开发公司的形式引入了资本，现在保护地的物产才刚刚开始得到开发。由此看来，保护地的财源要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翻上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此期间，劳动力不但是可用以缴付房屋税的一项额外的经济来源，而且对劳动力本身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那都是由土著提供的，为此付给了他们很高的报酬），不仅弗里敦需要劳动力，每天要雇用好几百人，他如军队、边警和保护地其他政府机关的军需给养都要运输，即将铺设到保护地境内的铁路还要施工，此项费用每年至少要支出一万六千镑，此外，为开发保护地而正在筹组中的贸易公司和其他公司也都需要劳动力。

此项税收预定自 1898 年起开征，可是 1896 年末税法一宣布，保护地内顿时哗然。许多酋长纷纷叫苦（其实往往是装假），说他们没有钱应付这笔开支。在政府大厦举行的一次会上，卡迪尤详细讲解了他所以要征税的理由之后，有个酋长就说“他真想不通：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就在每个铜板上刻着，怎么她也会没有钱？”许多酋长可就认真多了，他们认为这项新的法令就是剥夺了他们产业的所有权，认为这种赋税无异是向政府缴付的一种租金。例如，六个泰姆奈族酋长的一份

请愿书里就说：“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的房子出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能力。”

宣布征收茅屋税，这只是保护地特别法令中的一条。还有另外几款条文也使内陆的酋长们感到忧虑。他们担心总督有征用“无人荒地”之权，对他们祖产的所有权是一种威胁。他们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反对在自己国内做买卖得先花两镑钱领张执照。他们担心这项法令会有损于他们在部落朝廷中的威信，甚至会不让他们再打自己的妻子。反对这些条款的大多数意见，也如反对茅屋税的意见一样，是出于误解多，而真正出于不满的少。在这方面，卡迪尤推行他的改革操之过急，缺乏协商，是难辞其咎的。他也同许许多多英国人一样，不了解丛林里的非洲人对公道极其尊重，因此对他们必须进行耐心的解释。那些酋长其实是完全同意接受英国保护的，而且结果证明他们也都是缴得起税的。暴动过后，那位思想上属于金斯利一派的英国记者 E·D·莫雷尔，把塞拉勒窝内实行的征税办法同毗邻的几内亚作了一番很中肯的比较：

法属几内亚于 1897 年实施人头税法。……到现在一

直都能太太平平的把税款收齐。是因为那里拥有强大的兵力么？并非如此，因为法属几内亚虽然现有面积约当塞拉勒窝内的三倍，可是这块法国保护地的军队——或者应该说是警察——只及塞拉勒窝内的一半略多一点。可见，“显示力量”论历来是无而反彰的。……〔莫雷尔接着指出了塞拉勒窝内的处置失当之处〕法属几内亚征收的是人头税，塞拉勒窝内征收的则是财产税。前者对土著的土地占有权并无干预，后者则间接干犯了土著的土地占有权。

1897年整整一年群情激愤。到来年元旦税法实施时，种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反抗就在保护地内到处爆发。酋长们宣布他们拒绝缴税，甚至不再同白人做买卖。边警的回答是陈兵示威，有时还进行凶伤人。C·布雷思韦特·沃利斯后来在文章里提到了他1898年初在门迪人地区的一次旅行：“一个最足以表示风向的明白迹象就是：我一到这几个镇上，那里大半的居民就会顷刻逃进丛林。我到处都得不到友好的接待。”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弗里敦以北、洛科港一带的泰姆奈族地区。当地的酋长们下了命令：凡有缴税者一律处死。政府的一支部队来劝说酋长；劝说无效，就把其中五名加以

逮捕,判处徒刑,用船送到弗里敦的牢里。消息传报到了上游卡西地区的大酋长拜伊布里赫那里。这个粗壮、好酒、却又极有机智的汉子,在1894年就已惹起过麻烦,当时曾派了一支远征队去抓他,没有抓着。1898年2月,又派了一队边警去逮捕拜伊布里赫,却又一次失败了。边警遭受伤亡退了回来,于是在保护地北部的许多地方,就爆发了暴力行动。

事实证明,弗雷德里克·卡迪尤爵士(他是1897年封为爵士的)根本没有办法防止战争。神经痛,带状疱疹,失眠,再加心理上对弗里敦的恐怖,使他变得多疑而易怒。他对酋长们的申诉愈来愈冒火,也愈来愈赞成使用武力。该用以研究保护地各种问题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同他的英国同事们的无聊争吵上。他特别嫌恶驻军司令兼副总督、尊敬的詹姆斯·考尔菲尔德上校。1898年1月15日,在他们两人理应郑重考虑殖民地的战争危险的时候,卡迪尤却写了一封信给考尔菲尔德:

先生:关于我们昨天所谈你出席会议没有佩剑,以及在谈话中你表示对我要你佩剑的权力有所异议一事,

我特荣幸地通知你：除了我认为一个身穿军装的军官在执行公职时必须佩剑，并认为在出席行政会议或立法会议时只有佩了剑才能与这些会议的尊严协调一致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统率军队的指挥官出席会议必须佩剑是近二十八年来 的惯例，而且我相信是古已有之的惯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你一定会顺从这个久已通行的习惯，并且希望你能保证一定照办不误，因为违背这一点，是我所不同意，也是我所不许可的。

这场荒唐可笑的无聊争吵，最后以考尔菲尔德憋着一肚子气，不再在会议上露面而告终，这倒使人想起了玛丽·金斯利批评一个殖民地的一句话（我相信这个殖民地一定是塞拉勒窝内无疑），说是那里的“官员甚至还在政府的公文上用高级的官样文章进行个人争吵，其实他们还不如每个星期抽出一个钟点，互相揍几下脑瓜来得痛快些”。

二月里泰姆奈人的闹事，就是茅屋税引起的一个反应。弗里敦南方和东方一带门迪人地区的暴动，反映了保护地上普遍的不信任心理。反叛的酋长利用秘密的波罗会^①，在歇尔布罗人、门迪

^① 又称普拉会，塞拉勒窝内势力最大的一种秘密结社。——译者

人和加利纳斯人的整个地区同时发动攻击。几百个外来人，有白人也有克里奥尔人，遭到了屠杀，那种屠杀有时真残酷得可怕。住在孤零零的地点的传教士和商人接不到事变的警报，都免不了遭到伤害。有些人设法弄到了船，逃到了安全的弗里敦，他们诉说的经历叫人听得胆战心寒。在这些暴行的传说激怒之下，英国人就以同样野蛮的手段进行报复。

暴动的头几天，被杀的白人和克里奥尔人就有好几百。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暴行早就在议会里引起轰动了，对负责的总督也早就即时惩办了。卡迪尤却也走运，茅屋税战争还得同这一年发生的其他许多暴动和战事争夺报纸的版面。多少是由于张伯伦先生的政策的关系，当时在索马里兰、斯威士兰、下尼日尔河、婆罗洲、新西兰和乌干达同时都闹了事，更何况为了争夺上尼罗河的控制权，同法国还大有开战的危险。因此茅屋税暴动就得以在最不惹人注意的情况下给压了下去。

战斗的详细经过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因为那结果是不言可知的。东部的门迪人表现得很勇敢，

可是因为他们老是在旷野上对着机枪发动冲锋，所以他们对英国人来说来也不算什么麻烦。用一个英国青年军官的话来说，把他们一一射倒，真是“好玩儿极了”。泰姆奈人地区的拜伊布里赫则是一员精明过人的老将，他同英国人周旋了很久。他的军队常常在英国军队的前头选择伏击地点挖壕沟、筑栅栏，然后在近距离内，用专门售给殖民地的那种老式枪枝一齐开火。被逼紧了，他们会消失在丛林里。泰姆奈族的战士都热爱他们的这位酋长，他还赢得了一个英国军官的无可奈何的称赞：“他是个愚昧可怜的蛮子，可也是个第一流的战士。”拜伊布里赫一直战斗到十月，那时他的部下大半因为没有吃的而逃走了。老酋长是讲究现实的，因此他就带了一个琴师和一壶棕榈酒，跑去向英国军队投降，说：“仗打好啦。”

和平恢复以后，弗里敦政府就着手惩办叛乱分子。象拜伊布里赫这样的泰姆奈人定的是武装叛乱罪，不过还没有什么残酷的暴行，所以只是在海外流放了几年。为了惩办门迪人地区的杀人凶手，政府特地请来了一位英国律师，在地区内巡回裁判，还带了五个克里奥尔商人做陪审官。这位

代理法官乔治·邦纳，发现多数被告若从法律来讲都是犯有谋杀罪的，但是鉴于这些年轻人只是服从酋长的命令，所以他建议予以从宽发落。“后来，”他事后写道，“巡回裁判了两个月我回到弗里敦，却遗憾地发现我建议从宽发落的好多‘小伙子’并没有得到赦免，却还是被处了极刑。”不过，同被屠杀的一千多人相比，绞死的毕竟只有八十三人。

许多英国人主张从严惩处。C·布雷思韦特·沃利斯记述过一个英国人如何受到严刑拷打，被折磨得“只剩了一堆抖动的、支离破碎的肉”，接着他就写道：“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调停办法求得所谓‘平定’，也不管以后我们对这次暴动的首恶分子如何惩处，恐怕都远远抵偿不了那样的罪恶。英国人即使把这个国家的黑人统统斩尽杀绝，于理也并无不可。”

也有一些人比较宽大为怀，他们以为保护地的土著是一时气愤而起来造反的。例如，战争期间在“西非团”服役的J·斯图尔特中尉，就把叛乱归咎于茅屋税、白人官员的行径和边警队使用的威逼手段。这个观点，又由E·D·莫雷尔和玛

丽·金斯利一类著名的非洲问题作家作了生动有味的阐述，他们把这种捐税比之于激起“印度兵变”^①的那些擦得亮亮的子弹。这些议论对张伯伦产生了影响，张伯伦就决定派一位特别专员去调查战争的原因和殖民地的全面情况。中选的戴维·查默斯爵士，曾经在西非当过十年法官，其间在塞拉勒窝内也做过一任，因而这就使人疑心：他去执行这一任务恐怕未必是没有带着一点成见的。1898年7月他一到，就同卡迪尤关系搞得很坏，准备把出的漏于统统算在卡迪尤账上。

对保护地的叛乱分子责备也罢，原谅也罢，总之人们对于克里奥尔人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都是一致加以谴责的。卡迪尤指责克里奥尔人煽动土著抗缴茅屋税，认为战争的责任应由他们担负。克里奥尔人的报纸上确是有文章抨击了茅屋税，这些文章也确是传到了内陆，但是要说到克里奥尔人煽动土著抗命，却还缺少证据。真要如此的话，那他们就是些非常无能的煽动分子，因为在门迪人的地区，在这场大屠杀中首先遭害的几乎处处都是克里奥尔人。有个在暴动中侥幸逃生的人

^① 指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译者

说：“他们常说塞拉勒窝内人是总督的孩子，总督通过了我们才知道他们有钱缴税，所以假如我们全给杀了，总督就没法再靠我们去叫他们完税了。”土著常常管克里奥尔人叫“白人”，或者叫“白人的孩子”，或者叫“英国人”。有人指责克里奥尔人煽动叛乱；也有人如斯图尔特中尉，则责备他们态度狂妄、为人奸诈。斯图尔特还说：“这最后一点一定是有点道理的，你只要看一看人家对塞拉勒窝内人的一切——人也好，财产也好——搞那种野蛮报复的样子，就可以明白了。”1919年在俄国，就是同样的逻辑，一方面谴责犹太人指挥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又谴责他们因贪财而挑起革命。

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对这场战争则抱着恐怖与愤怒交集的心理。他们想到一旦土著涌入城市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命运，都吓坏了；他们看到卡迪尤想把叛乱的责任推在他们身上，又感到怒不可遏。报纸向卡迪尤和他的政府发动了反击，极力为克里奥尔人辩白。这些文章更进一步激起了政府的敌意。克里奥尔资产阶级中几乎只有塞缪尔·刘易斯一个人报名参加了民防军，但是他也驳回了卡迪尤的谴责，以捍卫克里奥尔人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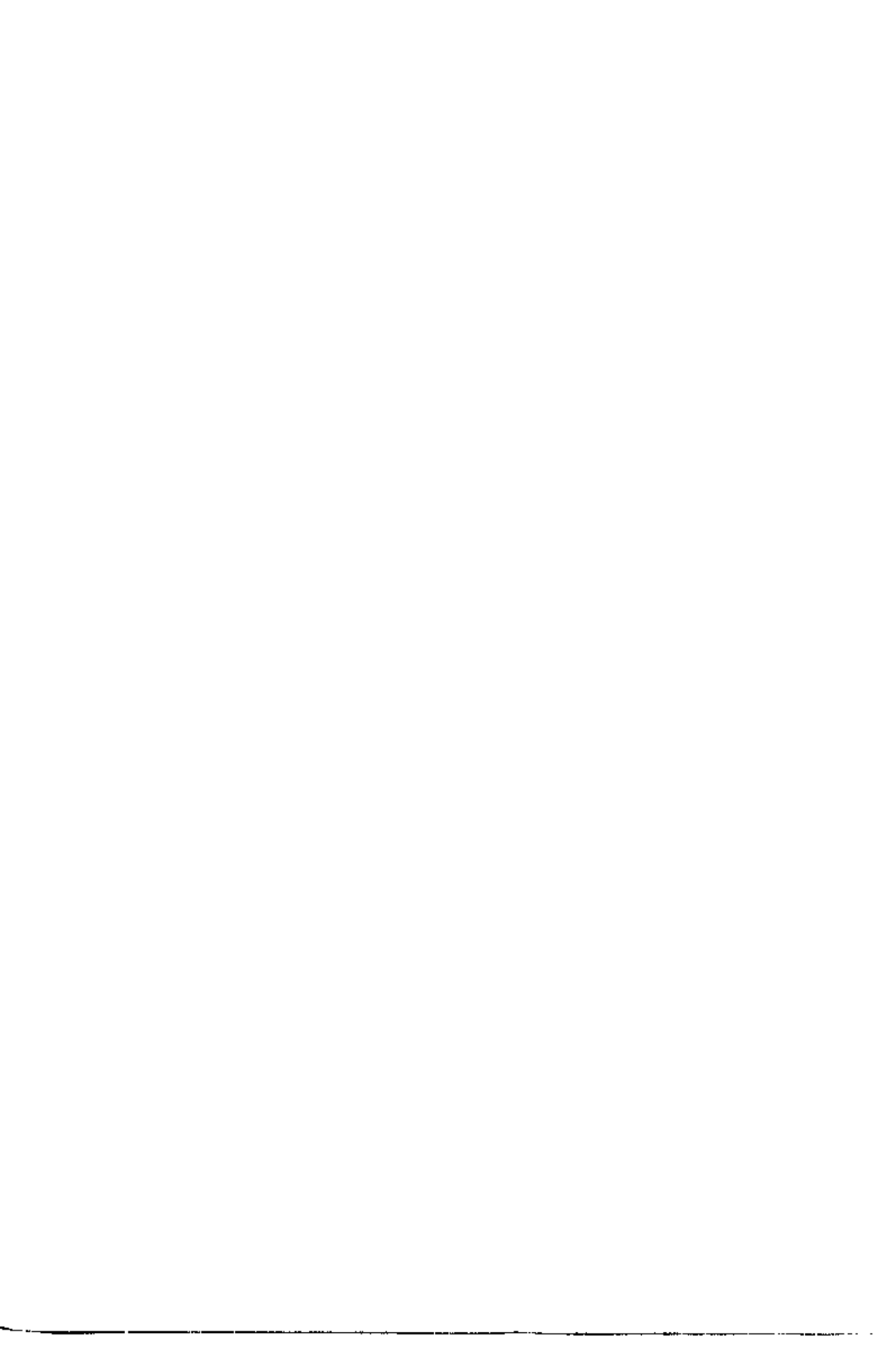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卡迪尤也极力削弱克里奥尔人的权力，特别是削弱他们在司法部门中的权力。邦纳在门迪人的地区进行巡回裁判时，所以要随带克里奥尔人做陪审员，是因为在丛林地带带上十二个人的陪审团在物质条件上有困难。他对这些陪审员很有意见，说他们巴不得把每个被告都给定罪。作为一时权宜之计而采用的陪审员制度，从此就保持了下来，成为一种永久性的规定。克里奥尔人向来恃为权力之保障的陪审团制度，到1898年除死刑案件外就都废除不用了。接着又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殖民地同保护地要一体征收茅屋税。为了再进一步削弱克里奥尔人的影响，卡迪尤就不再让克里奥尔人选进立法会议，也不再提拔克里奥尔人担任官职。J·D·哈格里夫斯在塞缪尔·刘易斯爵士的传记中写道：“象刘易斯这样的非洲资产阶级领袖，已经不再被视为前进过程中的合作者而受到上面的欢迎了，而民主政治家从下面取得权力的时代又还没有到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殖民地政治上前进的步子，不能不受到保护地的限制。”1899年4月，塞缪尔·刘易斯爵士坐上了他提倡已久的火车，却没想到被

一个英国兵捶了一拳，原来这个士兵要刘易斯仆人的座位。塞拉勒窝内不过是成了又一个殖民地罢了。

茅屋税战争的最后一仗是 1899 年在伦敦打的。那年，查默斯送上了他的报告。果如所料，这份报告谴责了卡迪尤。报告把战争的责任归之于税收不公平，加以又未能使酋长熟悉制度的改革。报告还指责边警残忍不仁，并且说许多边警是“逃亡奴隶——通常都是人家最懒惰、最不规矩的奴隶”。报告还宣布，弗里敦的报界和克里奥尔人一般说来对叛乱是没有责任的。

查默斯的报告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其总的倾向未免有所偏颇，而且在某几点上也不大公道。卡迪尤总督在答覆中指责查默斯对证人作了诱导讯问，又谎报了他们的证词。他举出殖民地所赖以取得的进步，来为边警、茅屋税和铁路辩护。张伯伦虽然审阅了查默斯的报告，并听取了玛丽·金斯利为之声援的发言，但最后还是象一切政治家一样，决定相信合乎他的先入之见的那些论据。在下院的一篇冗长的演说中，他否定了查默斯的报告，对卡迪尤的政府表示了信

任。但是就在几个钟头以前，查默斯已经走上了在塞拉勒窝内好歹工作过的许许多多人很快就走上道路——死了。



第 四 部 分

30500

第一章

利比里亚在它独立后的头二十年，是一个经济上繁荣昌盛、受人重视的国家。它所产生的咖啡，著名的“利比里卡”，是圣保罗河畔的种植园的产品，行销欧洲和美国。大片的甘蔗田，足供一家有蒸气设备和三家使用牛力的工厂常年进行生产。朱克河沿岸盛产棉花。运到欧洲的第一批棕榈仁就是利比里亚生产的。1851年一个移民写回美国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只要你有一幢住房和一块种植园地，

那末即使你每天工作两小时，也肯定要比你在美国整天工作生活得好。你可以种甘薯、薯蓣、木薯、棉花、咖啡和其他各种蔬菜。……假如一个人种上十亩咖啡，四、五年内他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种植咖啡所花劳动很少，在二十年之内，你种植咖啡所生产的价值要比你在美国所生产的任何东西的价值高……

以上所述，正如我们从利比里亚出口贸易中所见情况一样，绝非空洞的夸口之言。到 1870 年为止，蒙罗维亚的船坞里已建造了三十到八十吨之间的小型沿海航船约五十艘。比较大型的航船悬挂着一星旗远航至纽约和利物浦。这些船只属利比里亚人所有，并配备了利比里亚船员。当时这样小的国家能取得这些成就，就使人更为钦佩了。在二百八十六哩长的沿海地带连同向后方延伸仅四十五哩的腹地上，出生在美国的利比里亚人，不超过一万，可能还不到七千。此外，人们一定还记得，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原先美国南部各州种植园的愚昧的奴隶，他们显然不具备拓荒者应有的素质。1857 年，一位移民 G·W·霍尔写道：“许多致力于殖民事业的朋友都认为，这种愚蠢的东西实在太不开化了，不配送到非洲去；所以他们宁愿代之以北方城市中较为文雅的自由民。他们完全忘了：在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健壮的劳动者和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可是，霍尔感到遗憾的是：“北方有色的自由民对利比里亚并不太关心。……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同那些刚从奴隶主的种植园里赎身、披着粗劣的混纺衣

衫、土头土脑的奴隶一起移殖到利比里亚那样的国家去。”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大多数外国来访者往往怀有偏见，拿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相比较而赞扬利比里亚。世界上受到理查德·伯顿爵士推崇的地区很少，利比里亚确实是受到他推崇的地方之一，因而出了名。伯顿爵士在其著名的弗里敦之行以后，又在帕尔马斯角停留。他对利比里亚所怀的好感，丝毫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利比里亚是由有教养的黑人管理的；它的虔诚是远近闻名的；它的居民都是从伯顿称为“花旗国”的国家来的，伯顿把这个“花旗国”的星条旗描绘为“牡蛎和烤肉铁架”。的确，伯顿自己也承认，他所了解的有关利比里亚的知识只限于“一个美国船长提到汤姆叔叔的那个穷人避难所^①时所说的一句名言，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狒狒倒要载着利比里亚人的皮出海去做买卖了”。

不用多说，这是伯顿拿利比里亚人开玩笑取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斯陀夫人著）一书，提到有黑奴逃离美国，最后前往利比里亚，书中并主张把黑人最后都送到非洲去。故此处“汤姆叔叔的那个穷人避难所”即指利比里亚。
——译者

乐。他遇见那些渴望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获胜的、虔诚的白人传教士时，“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咯咯笑声”，高兴地把南方在布耳朗得胜的捷报告诉他们。但是，旅馆的清洁，工人的勤恳以及利比里亚人的彬彬有礼，使他感到满意。他把利比里亚人称为“有色人”而不用他的习惯用语“黑人”。^①有时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伯顿赞扬利比里亚人只是为了进一步贬低被憎恶的弗里敦人。伯顿介绍道：“说来也怪，黑人木匠在工作台上干活，黑人箍桶匠——这是我在塞拉勒窝内未曾见过的——正全神贯注地在修理用来盛新棕榈油的旧木桶。”伯顿想为他的一只快艇招募水手和两个仆役，那些谋职者态度相当规矩；“他们向我们拥来，但是叫他们走开时，他们也就走了。这在塞拉勒窝内一定会形成一场诉讼，至少也会被传去讯问。”在伯顿看来，利比里亚幸亏不是从自由自在的英国而是从专横霸道的美国移来了移民，因而使它得到了好处。“开化的和完全能够管理与支配那些未开化的土著的移民们，看来是要比他们的北方邻族半归化的阿库人和伊博人好得多。”接着伯顿

^① 不过，伯顿也曾把利比里亚称为“美国佬的黑人共和国”。

又谈到了利比里亚应并吞塞拉勒窝内的计划，这个计划原是罗伯茨总统所提出，而于1854年被英国政府所驳回。伯顿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深信不疑，如果这一计划被批准的话，塞拉勒窝内一定会立刻发生重大变化。利比里亚是一个共和国，也就是说，它在专制政治方面走得很远——专制政治是唯一适合于‘非洲和非洲人’的政体。”

伯顿的门徒温伍德·里德也访问过利比里亚，而且还使利比里亚成为一些嘲弄美国的笑柄。他一见到蒙罗维亚的众议院，就联想起它的母体，在华盛顿的美国众议院。“在两者的会场里都有痰盂，而且经常有人往里而吐痰；脚也都搁在桌子上。”里德赞扬利比里亚的社会领袖文化高而且聪明，但谴责他们对纯血统的非洲人抱有成见。一个美裔利比里亚人告诉里德：多么奇怪，与其说非洲人有头发还不如说有羊毛，而非洲的羊与其说有羊毛还不如说有头发。里德喜欢利比里亚，但他仍正确地指出，利比里亚必将因缺乏劳动力和资金而陷于困境。他说：“我将经常以愉快的心情回忆我的利比里亚之行。利比里亚是一个宁静、高尚、有秩序的国家。但是不论哪个美国黑人如



上图：塞拉勒窝内一港口街景。(1923年)

下图：弗里敦一个善于经营的老板。(1931年)



右图：马克斯·加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回到非洲去”运动的领袖。



下图：1944年起到现在
的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
在他第六次就任总统的就
职典礼上。（*杜伯曼已于
1971年2月去世，由托尔
伯特继任总统。——译者）



果偶尔阅读我这本书，我奉劝他们还是不去利比里亚为好。我想，美国殖民协会所能赐予非洲人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投票解散协会本身。”

大约直到 1870 年，利比里亚的政治生活象它的经济生活一样，既有秩序而又健康。罗伯茨于 1849 年再度当选总统，此后每两年连选连任，直到 1855 年，他才把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让给有同样威望的副总统 S·A·本森将军。总统人选的第一次更迭，并不是罗伯茨政治生涯的结束，他卸任后，继续从事于安抚国内各部族和杜绝奴隶贩子的工作。1854 年他去欧洲，受到报界和政界人士的热情接待，特别是在英国更为热烈，他在那里接洽铸造利比里亚的第一批硬币。罗伯茨虽已卸任，但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是一个主要角色。在马里兰省并入利比里亚以前不久，罗伯茨曾带领远征队前往救援。1857 年，他被任命为利比里亚学院第一任院长；1862 年又奉派赴欧，为时半年。利比里亚的两个主要政党，在它们成立后的第一个二十年期间，经常改变它们的名称和政策，但是两者之间的真正分界线，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肤色。罗伯茨领导的混血儿执政以来，一直

面对着“纯”黑种人的日益加剧的妒忌。1871年，这两个集团的对立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如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利比里亚最关心的事就是确定和保卫边疆。在早期，它未曾有过来自邻邦的骚扰。法国在象牙海岸有一个移民区，但它并不想加以扩大，而塞拉勒窝内的总督除麦卡锡这样极个别的人之外，都反对扩大他们那块讨厌和麻烦的领土。1848年，罗伯茨总统首次去英国时，伦敦的主教和其他慈善家为利比里亚募集了两千英镑，供它购买马诺河以北的加利纳斯地区，并清除那里的西班牙奴隶贩子。可是正当利比里亚按照这个政策购买土地和向北占领土地的时候，英国政府改变了主意，宣称这块土地应归它所有。棕榈油贸易的兴起，使这块一度是不毛之地的地区吸引了不少欧洲商人。特别是一个英国人约翰·迈尔斯·哈里斯^①，他开创了马诺河与苏利马河之间的贸易往来。1860年，利比里亚人要哈里斯尊重他们的政治权利，哈里斯断然加以拒绝。当利比里亚政府宣称哈里斯本人在从事某种

^① 参见第三部分，第四章。

形式的奴隶买卖时，哈里斯公然说利比里亚的关税肯定会破坏内陆的贸易。本森总统派一艘海岸巡逻艇前去捕获了两艘哈里斯的多桅船，哈里斯便立即求援于弗里敦。英国当局的反应是：派一艘炮艇把那两艘多桅船夺回来，并继续给予哈里斯以支持。美国于 1862 年承认了利比里亚，这使利比里亚增强了外交力量，但是利比里亚仍然认为巩固或扩张它的疆界是当务之急。上述动机加上渴望开展贸易的心情，说明了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腹地的旅行。人们时常责备利比里亚对内陆情况一无所知和不闻不问；所以我们把某些现在已被遗忘了的旅行记录下来是必要的。

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格雷-里彭伯爵在 1860 年 5 月 28 日所作的年度报告中，提供了不少有关非洲的见闻。斯皮克和伯顿刚从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旅行归来，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引起争论的旅行。当美国青年杜·夏伊于从大猩猩之国送来第一批报告时，利文斯敦仍在非洲南部忙碌地工作着。尽管时间有限，学会会长仍然将两个名叫阿什和西摩的人在“引人注目的非洲利比里

亚共和国”的发现，作了丰富多采的叙述。这两位探险家虽然没有学过三角，但他们说他们曾到过宽加城。这个城离蒙罗维亚二百八十七哩，离格朗-巴萨三百八十四哩，离塞拉勒窝内有两星期的路程。尽管迄今还没有人找到过这个城^①，但他们的叙述看来还是真实的。宽加是一座有城墙的城镇，方圆二千五百步，有五个城门，每个城门外有道路通往其他城镇。这两位探险家受到了该城居民的热情接待。他们赞赏那里的妇女容貌美丽，赞赏她们所穿的白色布衣和她们的富丽华贵的金饰。格雷伯爵在他的同一报告中，又提到另外还有两个美国黑人，坎贝尔和德拉尼，曾在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旅行，与此同时还有第四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克鲁梅耳，曾溯卡瓦利河而上。

第二年，也就是在皇家地理学会 1861 年度的会报上，报导了西摩在他进行第二次旅行时去世的消息。“作为通常处于不幸地位的非洲混血种阶层中的一员”，西摩早年没有机会受教育，但是他以自己的毅力和精力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西

① 这些到处是茅草顶泥屋的城镇，经常被人丢弃或遭到破坏，有时它们的名称也被改掉。

摩并未企图提供非常精确的经纬度，但是他所作的关于利比里亚的特点，它的土壤和生产、贸易和文化等的报告，还是正确的和有见地的。

本杰明·安德森是一个利比里亚人，说句公平话，他应与非洲最著名的探险家并列。他是一个纯黑种人，生于利比里亚，受过良好教育，在政府担任文职，曾任财政部部长两年。他于1866年离职后去美国，在那里遇到许多关心非洲的慈善家，其中有些人建议利比里亚应派一远征队深入腹地，绘制该地区的地图，并划定国界。安德森说，他准备亲自作这次旅行。于是他就募集了一笔经费，以支付挑夫、商品、礼品以及装备等费用。装备共包括：一只六分仪，两只温度表，两只小型日夜两用指南针，“一只相当好的挂表”和一只水平仪。出发前，安德森想招一个有文化的人作伴，但是他所问到的年轻人都认为，“与其远征深入到他们国家的心脏地区去，还不如走在安全、柔软而多草的蒙罗维亚街道上来得好”。1868年2月14日，安德森自蒙罗维亚出发踏上旅途，在内陆逗留了一年多。《木萨杜旅行纪实》于1870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与伯顿、斯坦利和利文斯敦所写的大部头著

作相比，只能算是一本小书。它不象一本科学著作那样引人注目。这个位于曼丁哥族地区的木萨杜城，在现代不曾被考证查实过，因此安德森不能称为伟大的发现者。不过无论如何，在那种为数极少的旅行家、探险家而又有才华的作家中，他也算得上是一个。这本《纪实》是我所读过的有关非洲探险书籍中最有趣、最生动和最令人喜爱的。安德森本人是一个黑人，他能用白人探险家不可能做到的办法与非洲土著交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他写的《纪实》具有分外的魅力。安德森对他所遇见的任何人总是平等相待，从不装模作样，也毫无文明的非洲人有时表现出来的势利神态。大多数白人探险家蔑视非洲人，如同一个大入瞧不起一个孩子一样；见好的就抚摸抚摸、夸奖几句，对顽皮的就要加以惩罚。安德森待人接物是通情达理的。谁仁慈、友爱，他就喜欢谁。谁怀有敌意，他就反感并要与之搏斗。他对待非洲内陆土著的态度，同英国人对待爱尔兰或法国的土著的态度是一样的。

安德森的黑色皮肤并不能使他免受非洲探险常有的风险。他离开蒙罗维亚，走了还不到十哩

路，他的克鲁人挑夫，除了那个名叫本的领班以外，都因为惧怕德族人而统统逃走了。安德森重新招募了一队刚果人^①挑夫来代替他们。安德森原定向正北进入曼了哥族地区，但为了绕过他听说的一段非常不友好的地区，他决定向西北方向迂回，可是这样的迂回把他带到了更不友好的贝萨城。贝萨王是一个贪得无厌、残暴成性的家伙，他决心使安德森耽搁下来，以便乘机抢劫安德森所携带的物品。他煽动安德森的挑夫们罢工。安德森要雇佣一个向导，他则加以破坏。而且他还经常以诱骗、恐吓的手法向安德森诈取更多的礼品。“他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安德森写道，“在最初两三小时的暴饮之后，他终于变得冷静起来了，这也就是他的贪婪心最大、对别人的权利最不尊重的时候。……我不愿叙述这样的全部情景：他鞭打一个年老的奴隶，直打得这个奴隶的惨叫声使所有站在旁边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我也不愿叙述那样的全部情景：他的一个奴隶由于某些轻微的过失，就被他用脚在胸部乱踩乱踹直到死亡。”

① 刚果人是指被美国军舰安置在利比里亚的获释奴隶。许多并非来自刚果地区的奴隶也被称为刚果人。

最后，安德森按照自己的计划动身前往附近的博波卢城，它看来是这一地区的首府。他同当地的曼丁哥人（他们同利比亚和塞拉勒窝内各地的曼丁哥人一样，都是重要的商人）、阿訇、教师和文官交了朋友。这些曼丁哥人要安德森忍耐一下，他们设法通过外交途径把他被劫的物品找回来。“但是这种劝说被我断然拒绝了，”他在《纪实》中写道，“除了诉诸军队、大炮、焚烧贝萨城以及其他猛烈的东西外，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显然，安德森是在以他的暴躁行为开玩笑。最后，就象在非洲经常发生的那样，武力威胁归于失败的地方，外交压力终于获得了胜利。可恶的贝萨王归还了他所劫去的物品和现在变得更听话的挑夫。这时，安德森才有可能去研究康多人的风俗习惯，并了解他们的可爱的马莫腊王。

当时，这个王国由于受到更加远在内陆的布济人和巴莱因人之间的贸易战的影响，处于极端穷困状态。马莫腊王感到恼火的是，蒙罗维亚新的政府当局至今还没有给他送“书”，即问候信，而且也没有试图来平定这场贸易战，因而又使他肩负起居间调解的任务。他以盐作为礼品分送布济

人和巴莱因人，借以取得双方的友谊，假如其中有一方确实顽固偏执，那末最后他只能进行干涉。对此，安德森为他的利比里亚同胞感到羞耻：

我们把内陆所发生的各种纠葛留给一个毫无教养的野蛮民族去平息和解决，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一无所知。……但事实是，这个高贵的野蛮民族没有收入，也没有任何值得我们覬觐的资源，由于它采取了干涉一切内陆事务的政策，因而从博波卢到木萨杜以至更远一些的地方，它的名声比文明的利比里亚共和国更大、影响也更大。它所采取的干涉形式，无非就是馈送几块盐，再附带一份表示友好的请求书或则一份带有威胁性的命令。

康多人非常尊敬德鲁-考（他们对蒙罗维亚的称呼）而且还模仿沿海地区的某些生活方式。马莫腊王有一座木房，房屋四周围着游廊，还有椅子、卧榻、床架、镜子、香皂和香水。他对安德森的测量仪器很感兴趣，尤其是对那只双镜头照相机更是爱不释手，最后安德森送了给他。马莫腊王在审判本国人民的诉讼时，他的耐心和精辟的判断力，使安德森赞赏不已：

但是国王在公务繁忙之余有时也消遣作乐，这时他往

往先喝一杯杜松子酒或威士忌，借以增添假日的乐趣，然后，在他的属下的陪伴下，有说有笑地在城里到处漫步。偶尔，他也任性，但是这种任性是纯洁的，犹如在严肃时刻他的性格是高尚的一样，因为他不伤害任何人，只是一家家的串门子，同他的朋友们开开玩笑，并从他的朋友那里接受少量礼物。有时他试图跳跳舞，甚至还想练练武艺，但是由于年老和身体稍胖，总是搞不成。有一天，他坚决要把武艺练好，结果使自己狼狈不堪。他登上一座小土山，两手各执一把长矛，以便作出打仗时从山上向下冲刺的动作。他在开始冲刺时用力过猛，因而扑倒在地，这一跤摔得好厉害，长矛刺伤了他的高贵的胸膛，弄得大失体统。

尽管安德森非常喜爱他在曼丁哥族地区所结识的马莫腊王和其他朋友，但他还是急于启程前往木萨杜。在解决了向导和挑夫问题上一些常见的麻烦以后，安德森到了泽勒基。他在那里遇到的唯一讨人喜欢的人，就是马莫腊王的女儿，她有着同她父亲相似的开朗性格。当安德森离开那个村庄时，“她模仿上次同她父亲一起在蒙罗维亚所见军人操练的姿势，扛着我的枪在我面前正步前进”。在达拉济阿赫，那些整整齐齐精心培育的稻田、玉米田、烟草田和棉花田，给安德森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而那里的布济人，在谣传中被称为凶恶而倔强的人，事实却证明他们是好客的而且是讲究礼貌的。他们对一个“威吉”（即美国人）能够远道而来访问他们，既感到吃惊，又欣喜若狂，他们要求安德森穿上自己的外国服装。“为了使他们高兴，我照办了，”安德森写道。“我已有三个月没修面了，当我用美国式服装打扮起来后，再加上一张没有刮过胡须的脸，妇女和孩子们一见我这个满面胡须的可怕的美国人，便纷纷向四面八方逃开了。”

有些胆子比较大的人还留着。不久，有十二个姑娘唱着小夜曲歌颂安德森，先歌颂他慷慨大方，之后又斥责他为人吝啬：

吝啬的小家伙们应当记住，正是由于我的慷慨大方，才使她们得到了非常精美的铜钮扣，可以挂在脖子上到藻藻市场上去。当我宣布我已经用利比亚军队的钮扣作为标志，把几乎所有布济族地区的漂亮的妇女，都标明为利比亚共和国的财产时，无论如何，我希望这将表明我已为我们的国家作出了贡献。

其他布济人更为有礼，甚至有些过分了，他们常常

热情地同你握手，握得指节卡搭作响。^①

即使很微小的好意，他们都报之以“埃默莫”（Emm-amow）——谢谢你。如果你跳一次舞，或者做任何逗人喜欢的娱乐，你就会受到“埃默莫”。不管你是在为自己或者在为别人从事任何劳动或工作，你同样会受到那些毫无关系的人们的衷心“感谢”，他们把这些事看作是为他们做的一样。……我所雇佣的刚果挑夫，他们已经被沉重的担子压得几乎精疲力尽了，他们往往对这种充满着感谢而毫无帮助的礼貌，感到恼火，因此，布济人的“埃默莫”所换得的常常是刚果挑夫的“科纳彭博”（konapembo）——见鬼去。这种训诫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礼貌延长了挑夫们的痛苦：一个挑夫，弯着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压得背都快断了，却不得不停下步来，接受谢意，六次握手，直握得指节卡搭作响。

布济族地区土地肥沃，几乎遍地都是稻田，这使安德森感到十分惊讶。一天清晨，他站在一座小山上向西眺望，只见那边长满稻子的山冈笼罩在阵雨之中；“毗连而下，是山坡上的稻田，有一部

① 握手时指节被握得卡搭作响，这种习惯至今在利比里亚仍十分流行，甚至在蒙罗维亚比较世故的人士中间也是这样。这种形式的握手在西非的其他地方则很少见到。

分掩盖在迷漫的烟雾里了；而山坡之下，又可以看到耀眼的阳光普照着下面平原上正在成熟的棕色稻田”。安德森笔下的布济的男子，既整洁又健壮有力，可以一只手拿起上了刺刀的美国滑膛枪平举手臂向前伸直。布济的妇女——这是安德森常常喜欢谈论的主题——惯于把她们的眉毛和睫毛拔掉一部分，虽然安德森对子这种习惯很不以为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安德森对布济的妇女是很喜欢的。安德森有趣地发现，许多布济人看起来很象蒙罗维亚人：“我国大多数人都爱自称是曼丁哥人的后裔。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布济人式的形貌相似，却无法证实他们的出身是高贵的和值得自慰的。”

安德森在同他那个不老实的曼丁哥向导比阿赫争吵后，便独个儿前往木萨杜，他决定通过问询和凭他的直觉寻找去木萨杜的道路。一路十分顺利，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路旁做小生意的妇女向他和他的挑夫兜售许多花生。“一路上，我们吃花生、行握手礼和交朋友，有时我们还咒骂比阿赫，巴望他遭到厄运。”

博卡萨赫是一个拥有约计七千居民的城镇，

以布匹交易著称。安德森在那里穿的是曼丁哥礼服，似乎因此而交了不少朋友：

我们把时间消磨于谈心和唱歌，我以悠美动听的“爵士音乐”款待我的几位曼丁哥朋友。音乐结束后，我们就做祈祷，他们反复念伊斯兰教的祷文，我则反复念主祷文。一位年轻的女士恳求我把这段主祷文写给她，以便她在头痛时，可以把它围在自己的脖子上，还可以把它做成带子将自己的太阳穴扎起来。

安德森从博卡萨赫出发前往济加赫-波腊赫-祖埃，当地的酋长被人认为是一个吃人魔王，但事实证明他对于异国人既肯帮助又有礼貌。在佩拉扎鲁赫附近，安德森来到一个平坦的铁矿区，这里的矿石是如此纯粹，因而那条穿越矿区的路，也成了一条被旅行者的脚步磨得闪闪发光的金属小道。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旅程后，安德森终于抵达曼丁哥人居住的比较干燥的大草原。

这个地方的特征在几哩外就看得出来了。城镇和村庄均座落子平原上，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步行的和骑马的居民，同布济族地区的许多地方相比，这里有更多的光明、生气和活力，因为在那里，这些东西都被幽暗而广阔的森林遮掩掉了。

最后，安德森终于到达了位于曼丁哥族地区境内的木萨杜。

承蒙许多曼丁哥族朋友的介绍，这位来自蒙罗维亚的访问者在木萨杜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并被授予该城最高的荣誉。额手礼和握手礼多得无法应接。一位歌手在竖琴的伴奏下，歌唱安德森的许多优点：他的勇气、他的富裕和慷慨；“在唱到后面两点时，这位歌手放慢速度、大声地反复唱了好几遍”。干燥的空气使安德森的精神为之一振——对他的表也有效验，他的表因受沿海含有盐份的潮气的影响，已停止走动，现在又开始发出清晰而响亮的滴嗒滴嗒的转动声。安德森检阅了骑兵和步兵的分列式；他相当谨慎地参与了当地的一次商业争论；又以爱慕的心情研究了女士们的金耳环，这种金耳环大得必须用一根皮带才能托住。那些曼丁哥人对于安德森没有携带商品感到失望，但是当他们听到安德森保证不久还会有其他人从蒙罗维亚来，便又高兴起来了。安德森确信，只要修建四个堡垒，一条商路的安全就会有保证了：两个堡垒分设于布济族地区和巴莱因族地区，以便收购土布、原棉、赤色染料木、棕榈油和大

米；另外两个堡垒设于曼丁哥族地区境内，在那里购买黄金、公牛、马和土布，价钱很便宜，足以补偿高昂的运输费。安德森又补充说，这些堡垒也能保护传教士的工作；但是我猜想，他这样写是为了博取他的虔诚的赞助人的欢心。具有人道主义者气质的安德森，经常注意不去触犯曼丁哥人的穆斯林教规，但是他的几个刚果挑夫中有一个却使他感到很烦恼，这个挑夫是一个浸礼会教徒，每天早晨总是拉开嗓门象叫喊一样地祷告。

安德森是很想留在木萨杜的，但是又感到非返回沿海地区和回家不可。在踏上归途前，木萨杜的居民把他在沿途将要遇到的那些野蛮部落告诉了他，叫他小心提防；不过现在安德森已经懂得对这些故事不可妄加置信了，他知道，只要他能证明自己是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就没有什么人会来袭击他了。所以：

我变成了一个流动军械库。当我徒步穿越布济族地区时，我的步枪插上了刺刀，我的几把左轮手枪佩带在显眼的地方，使人望而生畏，我的剑在身边摇摇摆摆地叮咣作响。当有人要求我开枪来证明我的武威势时，我一定拨动机钮，几根枪管几乎同时把子弹

发射出去——这当然是严重的错误，但是我的朋友们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安德森觉察到，大多数叙述嗜血成性的残暴的酋长的故事，都是酋长们自己传播出来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激发别人敬畏他们，使外人不去接近他们的领土。类似贝萨王那种真正的坏酋长，又当别论。大多数白人探险家，把他们所听到的关于黑人的不可思议的魔力、黑人的残酷和黑人嗜食人肉等等谣言，都一一加以发表；在这方面，黑人安德森显然要比他们通情达理得多。也许安德森路过的各部落都是异乎寻常的爱好和平而彬彬有礼的，不过我也怀疑安德森这位亲切而老练的人，能否几乎以同样的安全和自由自在在黑非洲的任何地方旅行。即使是少数白人旅行家如利文斯敦、玛丽·金斯利和萨沃尔尼昂·德·布拉扎等，当他们独个儿或者同几个伙伴一起在丛林地区旅行时，也受到过一般礼节的接待。象斯坦利那些遭到敌视的人，都是一些触怒了对方并预料会受到敌视的人。

安德森的《纪实》并未使他出名。读者所期待的介绍非洲的书籍，不是流血的、嗜食人肉的和有

魔法的恐怖故事，便是有黑人的孩子仰望着耶稣之类能作为说教材料的故事。读者爱读斯坦利或利文斯敦的作品。他们不欢迎这一本平淡和没有戏剧性的书——更何况作者又是一个黑人——他在“野蛮的”非洲所作的旅行竟是如此的快乐和安全。安德森于1874年又作了一次深入利比里亚腹地的旅行，但是再度在罗伯茨总统领导下的利比里亚政府，对他既不给予支持又不加以鼓励。利比里亚把安德森在腹地的朋友们丢在一边置之不理，却听任曼了哥族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木萨杜地区在内，被法国人所侵占。

第二章

我们犹如那些名为“长寿”的植物——我不知道它们的学名叫什么——如果把这种植物的叶子从梗上摘下来，它们即使脱离了整个植物的本体，同根或枝毫无连系，也照样能够活下去。也可以把这些叶子钉在墙上或其他任何地方，它们仍然是绿油油的。

(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论利比亚人)

1860年春的一个早晨，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收到一封自蒙罗维亚寄来的信，这件事一定使他感到吃惊。而这封信的内容一定使他吃惊得更厉害。发信人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首先表示歉意地说，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住在遥远的尚未开化的海边，属于一个受压迫和受歧视的种族”，不得已而来打扰如此杰出的一位政治家的耐心和时间。接着，他作了自我介绍：“我

是一个竭力想获得教育的青年人。我的兴趣和爱好——这样的爱好竟出于一个处于象我这样环境的人，也许会使人感到奇怪——是古典文学。对语言的喜爱就是我最主要的爱好。”他这种爱好为信中所引用的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的格言所证实。该信赞扬格莱斯顿的反对奴隶制度、1857年在议会讨论离婚法案时所采取的立场，尤其是对他最近的《预算》更为赞赏。这位处于世界上最默默无闻的地区之一的人写道：“你的《预算》已向世界表明，文学家能够成为有才干的理财家，不管通常的见解如何适得其反。”接着他又恳切地向这位精通古典文学艺术的学者格莱斯顿请教治学方法：“您阅读哪些著作，阅读时的先后次序如何？阅读维吉尔作品时一次读几行？阅读荷马作品时一次又读几行？”该信结尾时请求格莱斯顿一定寄给他一套由十二本书组成的“小文库”；在所附的书目中，他机灵地把格莱斯顿的近作《预算》及其《荷马研究》列于首位。

在利比里亚领事证实布莱登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年轻人后，格莱斯顿便给他的非洲崇拜者写了一封客气的回信。格莱斯顿的同僚布鲁厄姆勋爵，

在一场奴隶买卖的辩论中曾引用布莱登的信作为黑人才能的例证——也是一篇对自由党的《预算》的颂辞。他们对布莱登的推崇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位当时只有二十八岁的黑人校长后来就成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和作家，十九世纪黑种人的最伟大的战士，而且又是一位对西非命运有影响的政治家。一个具有象布莱登那样才干的人，在任何国家都会成为著名的显要人物。在蒙罗维亚这样一个村庄里，他的才华发出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异彩。布莱登的一生及其工作，就是利比里亚从1860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历史的缩影。

1832年，布莱登出生于当时丹麦属地圣托马斯岛，该岛是维尔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当时虽然奴隶制度依然存在，但布莱登的双亲都是自由民。他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裁缝，他自己也学过五年裁缝。他的家住在首都的犹太人居民区——夏洛特-阿马利亚——他年幼时经常在西讷戈格山上玩。大约十三岁时，他很幸运地认识了一对虔诚的美国白人夫妇，约翰·P·诺克斯牧师及其夫人，他们激发了他的求知欲。十八岁时，他

已是一个够格的裁缝,不过他希望成为牧师,并且想进拉特格斯神学院学习,诺克斯的学位就是在该学院取得的。拉特格斯神学院以及另外两个在美国的学院,都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因为他是一个黑人。这些种族侮辱刺痛了布莱登,而且也使他吃惊,觉得在《缉捕逃亡奴隶法》正在实施的情况下,象他这样一个外国黑人待在美国乃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这条法律是在布莱登访美期间批准的,它授予联邦政府官员以逮捕逃亡奴隶和无法出示自由身份证件的自由黑人的广泛权力。无论留在美国或者回到圣托马斯岛,反正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他就在1851年初航行到了利比里亚。

在蒙罗维亚,居民都是买现成衣服穿的,因此裁缝就无法找到工作,但是布莱登设法以担任职员、报纸通讯员和当兵来维持生活。他进入亚历山大高级中学学习时,是一个选读生,后来成为正式生,以后又担任教师,最后成为该校校长,这也就是他首次写信给格莱斯顿时所担任的职务。他在二十四岁时就已学过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法语和德语,而且还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书

《流血中的非洲的呼声》。在这篇早期的然而非常精辟的论文里，布莱登提出了他后来为此而争论了将近六十年的主张——黑人能够并且应该为自己的种族的历史和成就而自豪。他断言大多数白人奴隶主比不上许多著名黑人的“伟大才智和德行”，他还列举了一些黑人英雄人物。海地的解放者杜桑·卢维杜尔是布莱登在当时和以后一直仰慕的英雄，原因之一是这位英雄属于纯粹黑人血统。但是在布莱登所仰慕的“非洲的天才”中间，也包括一些肤色非常苍白的混血儿，如小说家大仲马，以及“皇帝与臣民共同宠爱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如影随形，黑种民族的那种带有嫉妒心的骄傲，引起了利比里亚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蒙罗维亚各报，由于刊载了布莱登所写的勉励公民们担当起应尽的职责的气势汹汹的文章，立刻活跃起来了。这些文章触怒了许多利比里亚人，如同五十年后他们的孙子和曾孙们把布莱登看作一个讨厌的老人一样，他们把他看作一个讨厌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一个先知在自己国家中享有的荣誉是比他还要少的。

1861年，布莱登受利比里亚政府的派遣，设

法向英国和美国的慈善家筹募利比里亚的教育经费。这一年3月,布莱登乘船赴英前,蒙罗维亚的青年托他把一根镶着黑檀和黄金的黑檀木手杖送给布鲁厄姆勋爵,借以答谢布鲁厄姆勋爵对非洲和黑种人的贡献。在英国期间,布莱登不得不谢绝了格莱斯顿为他提供的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委予布莱登的任务是如此繁重,他写道:“所以我不能把这些任务置之不顾而留在英国研究文学艺术”。不过,他俩之间的书信往来从未间断,布莱登曾把南北战争期间关于北美各州动人心弦的报告送给格莱斯顿。他在报告中写道,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是愿意解放黑人的。

对黑人的压迫日益加剧。虽然国会所颁布的一条法令已把哥伦比亚地区“解放”,但那里仍在积极推行《缉捕逃亡奴隶法》。虽然国会已经承认利比里亚独立,但是我作为一个利比里亚公民,在众议院开会期间却被拒于门外,因为我是一个黑人。而且我必须有一位白人证明我是一个自由人,然后我才能离开这高贵的城市。

布莱登为《利比里亚先驱报》所写的一篇辛辣的文章中,描述了黑人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并宣称他

“宁愿忍受马莫腊王所住城镇^①的一切不利条件，做该城镇的一个公民，而决不做一个被迫住在美国的黑人”。殖民运动的热忱信徒布莱登感到苦恼的是，他发现大多数北方黑人对非洲没有什么兴趣。作为一个招募新移民的官员，他在西印度群岛取得了比在北方大得多的成绩，那里有许多有资格的人急于到利比里亚去。

由于布莱登才干出众和工作勤恳，1864年他被任命为国务卿，这是一个履行副总统职责的职位。虽然布莱登担任此职为期不长，却引起了他对利比里亚所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兴趣，特别是关于开发内陆的问题。在《流血中的非洲的呼声》一书中，布莱登曾附和了沿海地区黑人基督教徒的偏见。这些黑人基督教徒把他们的移民区看作“象一条绵亘于蒙昧无知的海边的光明之链，将它的文明和复兴的影响散布于周围堕落和野蛮的地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布莱登的态度改变了。随着他对内陆穆斯林的见闻日益增多，他也愈来愈爱慕他们，认为他们是忠实的、正派的非洲人。他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阿拉伯语。他去黎巴嫩

^① 本杰明·安德森对该城镇所作的访问已于前一章有所描述。

作了一次长期访问，不久，他就成了一个精通阿拉伯语的学者。虽然布莱登从未成为一个穆斯林，但是他崇拜这一宗教，认为它非常适合于非洲。跟基督教的各教派不同，伊斯兰教从不推行任何种族歧视。的确，黑人穆斯林在殖民运动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业绩在所有阿拉伯人的巨著中都得到了肯定，即使《古兰经》也不例外。在这一圣书中有一章是记载一位黑人的，该章对这位黑人的智慧和虔诚作了特别详尽的描述并把它们看作是真主的直接恩赐。”布莱登逐渐发展了他的理论，认为非洲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内陆的穆斯林身上，而不在于沿海已经西方化的基督教徒身上。黑人民族主义者布莱登和白人霸权主义者伯顿，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真的，他们两人还相互阅读和赞赏彼此的著作。不过，伯顿把伊斯兰教当作用以驾驭邪恶和懒惰的非洲人的一根鞭子，而布莱登则把伊斯兰教看作给非洲人知识和尊严的一位教师。

布莱登对内陆人民的支持，也助长了黑人反对混血儿的势力。他自己就是“黑檀色”的，并自称是纯黑种伊博人的后裔。西印度人对于肤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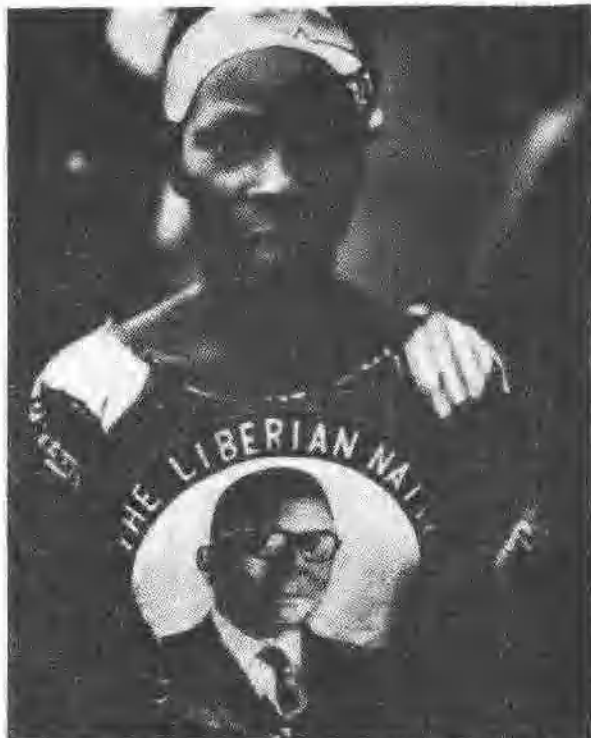
差别往往较美国北方的黑人更为敏感，而且有时在肤色深浅不同的黑人之间还有相互敌视的情况。如同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见到的那样，由于肤色深浅的不同，在利比里亚还导致了政治上的争吵。布莱登完全站在黑人一边，同以前总统罗伯茨为代表的混血儿相对立。在这两个有色人的集团之间，有好几个争端。黑人希望有更多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混血儿则生怕受过教育的新移民危及他们所独霸的权力，因而希望从美国南方迁来移民。黑人赞成开发内陆，希望政府协助查勘。为本杰明·安德森的木萨杜之行找到美国支持者的，正是布莱登。正如安德森在一次神秘的插话中提到的那样，这些混血儿感到新商路的建立可能动摇他们所把持的国家贸易，因此反对他的旅行。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引起了一场关于选择利比里亚学院院址的长期争论。以布莱登为首的黑人想在较近的内陆设立一所学院，而混血儿则要把它设在蒙罗维亚。蒙罗维亚学院院长、前总统罗伯茨，反对布莱登提出的必须教授阿拉伯语的建议，随后，布莱登便谴责罗伯茨阻止纯粹的黑人学生入学。下列事实更使布莱登的偏见如

火上加油：他对他的妻子也感到不能忍受；他的妻子是一位文化很低的妇女，更糟糕的是，她是一位肤色苍白的混血儿。布莱登确信混血儿的贵族们正在策划阴谋陷害他，因此他现在担心他们在他的卧室之内也布置了一个奸细。

黑人和混血儿之间的敌意，导致了在1871年爆发的革命。这次革命最后以总统的暴死和布莱登的被迫流亡而告终。这场危机于1870年爱德华·詹姆士·罗伊就任总统时即已开始。罗伊是一位伊博人血统的纯黑种人，同布莱登有私交，而且是政友。罗伊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为国家的未来提出了大胆的计划。这些计划中包括：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开展群众教育，兴建铁路，与邻近的部族合并，并与位于远僻地区的部族（例如安德森一年前在其旅途中所遇到的那些部族）缔结友好同盟。为了筹措实施这些计划所需的经费，罗伊求得了一笔十万英镑的英国借款，这笔借款的条件使利比里亚及其本人的政治前途受害极大。利比里亚驻伦敦的总领事是一个英国人，他通过一家由他担任代理人的银行经办这笔借款。虽然利比里亚人把他们未来的关税收入作为

右图：“利比里亚的未来将会永远欢乐，只要杜伯曼总统干得称心。”

下图：费尔斯通公司引入利比里亚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残迹。





左图：为庆祝 1961 年塞拉勒窝内获得独立而发行的纪念邮票。

下图：现代的那里敦。



担保，那些银行家还是坚持要先扣下三万英镑作为预付利息，其余借款则须于十五年内归还，并按高得惊人的 7% 的利率计息。罗伊在蒙罗维亚的敌人，都把他接受这笔借款叫做财政上的蠢事。

黑人和混血儿之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罗伊的任期上。国会于 1869 年同意就总统任期是否要从二年增为四年进行一次公民投票，混血儿拥护这种改变，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候选人佩恩的当权年限将随之而延长。选民投票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但同时也投票通过了罗伊提出的、他现在也有任职四年的权利的主张。黑人占优势的众议院同意宪法作此修改，但是为混血儿所控制的参议院，却否决了公民投票的结果。《非洲时报》的一位驻蒙罗维亚记者于 1870 年 12 月写道：“此间事态非常严重。全国为之大哗。”

对布莱登来说，1870 年是充满着希望和精神振奋的一年，在他后来的生活中，追忆及此，总感到兴奋鼓舞。在罗伊总统的鼓励下，他拜访了本杰明·安德森的朋友博波卢的马莫腊王，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学校，由一位从蒙罗维亚来的人担任教师。回到沿海地区后，他发挥他的新闻记者

的才能，来捍卫罗伊总统，反击“堕落的混血儿”。他在支持罗伊总统时，几次三番称赞罗伊与一位黑人妇女结婚，他还宣称罗伊夫人是第一个黑色人种的“第一夫人”。他爱慕罗伊夫人，经常去访问她，甚至在罗伊出国期间也从不间断，这就引起了混血儿的流言蜚语，隐隐约约的说他们通奸。不久，这些流言蜚语发展成为谴责和威胁，到了1871年5月的某一天，一群暴徒，“四十个穷极无聊的无知黑人”，抓住了布莱登，用一根绳子缚住他的脖子，拖着他在蒙罗维亚游街。布莱登的一位朋友出来干涉并阻止了这场暴行，于是布莱登便逃往塞拉勒窝内。罗伊总统对布莱登被迫流亡这件事不予追究，大概是想借此转移对他自己的憎恨，但他自己也同样在可悲的和非常滑稽的情况下下了台。前总统罗伯茨举行了一次秘密选举，宣布自己再度出任总统，并于1871年10月22日回到蒙罗维亚强行就职。10月26日参、众两院集会宣布罢免罗伊并把他逮捕入狱。

这个故事的结局如何，还没有搞清楚。利比里亚的混血儿和大多数历史学家说，罗伊越了狱，在该城周围扔了好些手榴弹，企图在混乱中乘船逃

往弗里敦，但由于身上缚着窃取而来的黄金分量过重，溺死于激浪之中。这个海外奇谈式的传说有不少漏洞。首先，新政府把罗伊关进监牢而又容许他保存黄金，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次，只有最蠢的鲁莽汉才会在逃命的时候被一包包金块拖累得遭了没顶之灾。最后，罗伊是一位非常有钱的商人，在英国银行里有大量存款，因此根本不需要国家的公款。布莱登报导说，罗伊越狱后就去等船逃走，这时一个混血儿开枪打死了他，后来就捏造出淹死一说。也许，罗伊是在狱中被谋杀的。那时，国家正处于动乱状态，许多人被愤怒的混血儿所杀害。

在政治流亡中，布莱登不是那种意气消沉的人，塞拉勒窝内为他发挥智慧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在塞拉勒窝内，他能象在利比里亚一样方便地研究内陆的穆斯林，进行非洲人的教育实验，而且还可通过根纸宣传他关于黑种人的观点。他一生的余年大部分是在塞拉勒窝内度过的，虽则他仍然是一位忠诚的利比里亚人，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比较喜欢英国殖民地。作为一个热情崇拜英国的人，他欢迎英国在西非的政权和影响。此外，他认为

英国与利比里亚不同，英国具有开发内陆的财力和人力。在他流亡国外的头几年，他制定的专门计划有：派遣探险家深入腹地，建立一个独立的非洲教会和一所非教会大学。他建议塞拉勒窝内政府应雇佣本杰明·安德森担任探险家这件事，被白厅描述为“很有意思”；但可悲的是，当人们想到安德森可能写出一本什么样的书来时，这个探险计划不是被拒绝就是被遗忘了。布莱登为建立一个独立的非洲教会所做的努力，由于其他原因而失败。他离开利比里亚后不久，就应英国行教会之聘，在福拉湾学院教阿拉伯语。他在非洲牧师中间颇有名望，不过塞拉勒窝内的白人主教却因他为伊斯兰教辩护而恼火，并且把通奸的流言蜚语信以为真。他在福拉湾学院的职务，同他的充满了争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职务一样，没几个月就被辞退了。

布莱登在受到英国传教士的排斥之后，又致力于建立一所非教会大学的计划。布莱登发觉，1872年2月来塞拉勒窝内出任总督的约翰·波普-亨尼西，是一位出乎意外的支持者。约翰·波普-亨尼西是一位不尊重任何权威的激进分子，一

位对英国人的自负抱有反感的爱尔兰人，同时又是一位厌恶英国国教的天主教徒。他怀着颇有同感的兴味，倾听了布莱登的计划。然而，布莱登所建议创办的那种大学，他坚决主张“应由非洲人自己来办。鉴于在塞拉勒窝内慈善事业失败的先例为数很多，因此英国政府把创办这样一所学校视为畏途”。布莱登答道：“把开创非洲人所需要的教育事业留给非洲人自己去搞，必然会使这项事业的开展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黑人都忍受着一种奴隶制度的迫害，而这种制度在许多方面都破坏了黑种人的真正幸福，其程度之严重，远远超过古代的肉体上的桎梏。”波普-亨尼西对布莱登办学计划所抱的热忱终于减弱下来了，因为他发觉经费缺少，殖民大臣对此不感兴趣，塞拉勒窝内的大多数白人又都厌恶布莱登。一年以后，总督波普-亨尼西调任他职，而殖民大臣德比勋爵又认为非洲人不宜担任公职，公开宣布“我们不再雇佣黑人”，这时，建立一所非教会大学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了。

布莱登的建议被拒绝后，他又将其热中于政革的精力转向报刊上的论战。一批富裕的克里奥

尔人支持他创办《尼格罗人报》，该报象所有布莱登曾为之撰稿的报纸一样，立刻就获得了一批热心的读者。布莱登所撰写的文章中，最突出的论题就是黑种人的独立的前途和独立的地位。他赞扬欧洲民族主义者如马志尼、费希特和黑格尔，相信黑人总有一天也会在一个国家里团结起来。他与伯顿不论在性格上和思想上都很相似，他同伯顿一样，接受了某些关于各个种族间体质不同的伪学说。虽然他是黑种人的同族，但是他在赞扬其他民族，特别是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时，却显得气度很大。他非常喜欢犹太人，所以他建议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其把他们的以色列国家建立在巴勒斯坦还不如建立在东非。他的这一建议是在英国提出同样建议的五年以前提出来的。

布莱登曾数次到塞拉勒窝内的腹地去旅行，也与弗里敦的穆斯林交朋友。他对伊斯兰教了解得愈多，就愈赞扬它在非洲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它坚持教育这一点尤为赞赏。“现在，人们可以作穿越大陆的旅行，从塞拉勒窝内到开罗，或者朝另一个方向，从拉各斯到的黎波里，除了撒哈拉沙漠外，每晚都能在一个村庄留宿，而且每到一个村庄

都能见到一所学校。”

布莱登赞扬非洲穆斯林传教士虔诚的信仰。“他们拿着他们的席子或皮垫，以及他们的手抄本，后面跟随着他们的学生，在每一个新的异教徒的城镇，他们成了一所学校和会众的核心。这些传教士是受益者而不是施舍者。”这句话显然是谴责基督教传教士，特别是谴责布莱登在英国行教会的敌人的。布莱登谴责这些基督教传教士变成了他们的信徒们的恩人。他有点喜欢天主教，因为天主教造就了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杜桑·卢维杜尔。然而他嘲笑新教徒的成绩。他指出，信教的虔诚几乎只限于城市居民，从未有过整个部族改信基督教的现象。“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的土著——泰姆奈人、苏苏人、门迪人、瓦依人、戈拉人、巴萨人、克鲁人，等等——至今尚未受到福音的影响。……这些移民区的所有黑人居民，他们在基督教文明方面所取得的任何进步，也都是从外边输入的——如塞拉勒窝内的进步是来自非洲的其他地方，又如利比里亚的进步则是来自美国。”

布莱登的有些随笔和短论出了小册子或小

书，这使他很快地出了名^①。1887年，布莱登的选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黑种人》出版了。大多数评论家都赞赏此书，并因此书是黑人所著而大为惊讶。《泰晤士报》评论员说：“作为正直的英国人，对于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方，我们都应该欢迎。我肯定，人们恐怕还没有认识到布莱登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当代论述规模巨大的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最伟大的作品。”读者无不赞扬布莱登的文风；芝加哥的《内地》评述道，“他的英语简明、生动而纯粹，其造诣之深不亚于麦考利。”不过，某些英国国教的刊物，特别是《英国行教会通讯》，却对于布莱登之赞扬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表示反对。

布莱登在国外流亡两年后，设法和利比里亚政府重新言归于好，1873年，他回到了利比里亚。这时，他的主要政敌约瑟夫·詹金斯·罗伯茨又再次出任总统，罗伯茨让他仍任原国务卿之职，但他没有接受，却在圣保罗河畔开办了一所学校。他对混血儿的惧怕和憎恨，现在发展成了被迫害颠狂症。

① 布莱登的名气至今不衰，因为近在1960年，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就失窃了两卷布莱登著作的珍本。

我生活于一个毫无同情心的民族中间（他于1875年写道）——而且，很遗憾，生活于一个毫无同情的家庭中间。看来我的妻子是根本无法改好的了。她的见解和性格同她周围的人一模一样——有时，当我从各方面而受到围攻时，我真想逃往内陆，使自己从此默默无闻。就家庭来说，这样的生活已有好多年了。我的局促不安和明显的烦躁，主要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我在外界受迫害，但更多的迫害还是在内部。情不相投、意不相合、更无同情可言，我的妻子成了我一生的既伤心又沉重的包袱。

人们可以从这份悲痛的遗嘱作出这样的猜测：居住在蒙罗维亚的、布莱登的信奉基督教的混血儿妻子，可能部分地促成了他在腹地建立一个纯黑种人的穆斯林利比里亚的政策。

当利比里亚首任总统、四十余年来利比里亚最有名的政治家约瑟夫·詹金斯·罗伯茨于1876年逝世时，布莱登反复念着一份非官方的讣告：

据说，罗伯茨已经去世。

他最爱的是金子。

他若去天堂，天使们千万要当心，

你们也许会失掉一架金竖琴。

詹姆斯·S·佩恩继罗伯茨之后出任总统，

他也属于混血儿派；但是，他仍聘请布莱登担任驻英国宫廷特使这样高贵的职位，虽然这是没有官俸的。布莱登在伦敦一年半期间，虽说未取得很大成绩，但也确实为增进利比里亚的利益作了巨大努力。他的三项主要工作是：解决与塞拉勒窝内的边界争端；向利比里亚的债权人保证，利比里亚决不拖欠罗伊时期的借款；为建立一条通往内陆的铁路而引入外国资本。这些目的都达到了——不过是在许多年以后。与此同时，布莱登特使又在伦敦获得了社交上的成功。因为在这次访问前他已六次访英，他认识很多政界领袖、牧师和作家。他又一次成为他的老友布鲁厄姆和格莱斯顿的客人；他打动了保守党人德比；他与英国女王叙谈过，并且加入了文艺协会。当然，布莱登这位黑人特使本身就具有引起好奇心的效力，但是毫无疑问，那时许多有才华的英国人对非洲和非洲人确实都怀有一种真诚的、友好的兴趣。布莱登自己很快就发现黑人可能遇到的欧洲人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职业慈善家。这类人一看到黑人，那种“亲兄弟”的感情就达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他们宁愿

忍受各种各样麻烦，借以向这个人类不幸的种族证明：他们坚信上帝以同一种血创造了人类的一切民族；而第二种类型，包括那些一看到黑人仿佛就触发了他们的一切恶感、憎恨和冷酷的人，他们利用一切办法和一切机会，来显示他们的猛烈的敌对情绪。第三种类型的人，以轻蔑的冷淡态度对待他，无论是他的优点还是缺点，他们既不表示赞赏也不表示厌恶。第四种类型包括那样一些人，他们对他象对待一位在文化和德行上与他处于同等程度的白人一样，他们的这种态度，全然是以人的智慧和德行为依据的。

象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布莱登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并无多大才能，但他又不肯承认这一弱点。他于 1880 年回到利比里亚，并接受了两项与他的特殊爱好非常吻合的职务：利比里亚学院院长和专门负责处理腹地事务的内政部部长。布莱登出任院长时，这个学院正处子奄奄一息的状态。它在约瑟夫·詹金斯·罗伯茨软弱无力的、几乎是老糊涂的管理下，简直不象一个学习的场所，却成了黑人和混血儿争吵的战场。在布莱登的主持下，这个学院又燃起了知识的火焰，它的声誉和它所引起的争论，影响所及远至美国；不过最后它所

取得的成就却小得可怜。由于布莱登不理解别人没有象他那样的智力，因此在该院所规定的课程表中除数学、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有阿拉伯语和本地的历史。当时，他感叹道：

我们有不少年轻人，他们是外国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专家；他们讲起伦敦、柏林、巴黎和华盛顿来滔滔不绝，对于格莱斯顿、俾斯麦、甘必大和海斯也是无所不知；但是有谁知道关于木萨杜、麦地那、坎坎或塞果的情况呢？——这些地方离我们仅几百哩。谁又能讲一些凡菲-德里赫、易卜拉欣·西西、法赫奎赫-奎赫、或博波卢的西莫罗的政策或他们所做事情呢？——这些人离我们只有几步路。

这问题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许多利比里亚人表示怀疑，理由是：布莱登是把这些学科作为他那反对基督教徒和混血儿的老运动的组成部分而硬塞进课程表的。这些忧虑终于被下列事实所证实：布莱登把八个职位全部给予纯血统的黑人学生，然后设法把混血儿从校董会中排挤出去。布莱登作为学院的院长，并不只是脾气不好，而且经常不在学校办公，却忙于他所兼任的内政部长的职务。内政部负责同塞拉勒窝内谈判疆界问题；

恰好在布莱登任职期间，这个长期来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发展到了严重关头。1882年3月，英国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打算并吞马弗河以西的土地；他们还派出四艘炮艇来强调他们的意图。布莱登和那位曾被派到弗里敦去与英国总督办过交涉的首席检察官，慑于英帝国的威胁而勉强屈服了。然而，布莱登在利比里亚的许多敌人乘机控告他，说他已被英国收买。布莱登失去了部长职位，还面临着被袭击的危险，于是他逃亡到帕尔马斯角。他辞去学院院长后不久，人们才看到：在他任职期间，学院虽然显得激昂振奋，却没有一个学生毕业。

布莱登的最后的也是最可笑的政治冒险，就是他妄想1884年大选时当选为利比里亚总统。这一企图的奇妙之处在于布莱登成了共和党——蒙罗维亚混血儿的喉舌——的总统候选人。显然，共和党的领袖们认为，让布莱登作为他们一党的候选人并采纳布莱登的某些观点，他们就可以在保有混血儿忠于该党的情况下赢得布莱登派黑人的选票。当布莱登确实认为党派的标记无关紧要之后，便积极参加竞选活动，结果以二比一的比数

被对方击败^①。

布莱登从 1884 年起到 1912 年去世时为止，呆在利比里亚的时间很少。他又两次出任利比里亚驻外使节，先是在伦敦，然后在巴黎，在这两次驻外期间他都成了社会上的一位红人，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弗里敦，其间曾多次访问西非的其他地区。布莱登为了把一位可爱的纯种黑人作为情妇，现在已把他的妻子遗弃了，但是由于婚姻问题而引起的那种东跑西跑的冲动，却支配了他的一生。他多次去美国游历，并在那里为殖民运动的利益发表演说。布莱登终于取得了和杰斐逊一致的看法，即黑人和白人永远不能和睦相处。根据这一残酷的逻辑，他欢迎对黑人的各种歧视，因为这样就可以把黑人赶到非洲去避难。从此以后，即使他被旅馆或餐厅驱逐出来，他也不再抱怨了。他赞成那个给种族隔离以有力支持的 1875 年《民权法案》。他想以法律来制止白人与黑人通婚。他发表演说反对黑人受高等教育，反对任命黑人为外交官。难怪南方各州的白人告诉布莱登说，

^① 选票计数是：H·R·W·约翰逊 1438 票；布莱登 873 票。后来布莱登说，利比里亚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投了他的票。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所面临的种族问题得到如此英明、合理和满意的解决”。他在白人中的声誉并不能使他在黑人中也得人心，反而破坏了他为利比里亚招募新移民的工作。他坚决主张移民一定得通过美国殖民协会。美国殖民协会赞同布莱登对混血儿所抱的成见，企图不让混血儿进入利比里亚。因此，他的这种主张就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称得上纯血统的黑人才能获得移往利比里亚的机会。

布莱登并未因年老而变得圆通起来。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就是在同新教的传教士、顽固的政府以及鲁莽的混血儿进行持续不断的、得到满足的争论中度过的。十九世纪末，拉各斯的兴起又为布莱登提供了一个进行争论和政治活动的新的有趣的场所。尼日尔河传教团中一群白人牧师站在某些类似种族主义者的立场上，把几个非洲牧师停职或开除了。这些非洲人请求布莱登予以帮助，后来，当布莱登于1890年抵达那里时，他们选取那些绚烂的字句，写了欢迎辞，向他致敬：

非洲的命运隐藏在漫漫黑夜中，
上帝说：“让布莱登出来吧”，

于是到处是一片光明。

结果证明，布莱登所发的光，还跟通常一样，是不大靠得住的。的确，他极力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非洲教会，而且还批评了欧洲传教士的傲慢。不过，当他接待了著名的穆斯林，并在约鲁巴人的集会上作了关于伊斯兰教德行的演说时，他的许多基督教教友无不感到愤慨。他对一夫多妻制的赞扬，触怒了更多的人，因为他搞了个情妇的事在沿海地区已尽人皆知。布莱登欣赏自己的刚愎自用。虽然他大张旗鼓地发动大家穿非洲人的服装和用非洲人的姓，但是他自己却始终穿着他的整洁的英国服装，并给自己取名为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

布莱登在国外讲演和写作时赞扬利比里亚，但在向本国的同胞们演说时则既坦率而又好批评。他指责利比里亚人

企图依靠一种外来的制度统治数百万人民，统治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但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一制度也只受过不完全的训练。无论是对于他们所要统治的人民的社
会、经济还是宗教等的历史状况，他们还知之甚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从大洋彼岸引入的宗

教和社会方面的理论一定会适应他们国内同胞的一切需要。

他指责利比里亚人象美国人一样思考，生搬硬套美国关于法律和土地所有权的概念，“想按照我们在美国所学到的制度，由奴隶、囚犯等来集体耕种土地”。布莱登断言，“我们白费力气，我们成了怜悯的对象和外国人的笑柄。”他又把他的国家概括为“有点儿象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也就是说有点儿这些州里那种受排斥、受迫害、受遏止的因素——一个强加于西非洲的、最不适宜的杂拌儿，这样的国家，是毫无合乎情理的成功指望的”。

布莱登意识到他的祖国成功的希望是如此渺茫，所以，他主张把它交给外国列强来管理。他钦佩“令人惊服的”欧洲人种，而且对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里的“争夺非洲”表示欢迎。在一次访问象牙海岸时，他为“当地土著的生活和前途在法国人管理下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对非洲帝国主义来说，德国人是新的来客，布莱登把他们称为早已控制了形势的、有希望的学生，但是英国仍然是他所偏爱的强国，他对一批利物浦商

人说：

利比里亚除了它的国旗以外，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英国殖民地。凡是英国国旗象征的东西，我们都有了，就是没有它的经济上的重大意义。而这正是现在我们请求你们帮助我们去获得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非常光荣地说：“我们讲的语言，就是莎士比亚讲的语言，”即使就全体居民而言，我们不能再补充一句：“我们遵循的真理和道德，就是弥尔顿^①所遵循的真理和道德。”

这时，即 1905 年，利比里亚正处于严重的财政和外交困境，也许是这种情况促使布莱登求援于充当某种形式的保护国。布莱登的传记作者霍利斯·R·林奇说，布莱登“可能向人们解释道，利比里亚反正已面临着丧失主权的危险，这个主权如果是被武力夺走而不是主动出让的话，那就不可能失而复得了”。

布莱登对黑种人的支持，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消极和悲观。他在美国接受了种族歧视，作为驱使黑人回到非洲去的一种手段；现在他又在非洲接受种族歧视，作为换取文明的代价。对于

^①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译者

黑人医生之被西非医疗队赶走，西非人不加反对的极少，而布莱登却是其中之一。他对非洲人在南非所受到的越来越多的不公平待遇，不闻不问。他所害怕的不是欧洲人的傲慢，而是欧洲人的无知。他对待白人，不管他们对非洲人的态度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种族主义的，只要他们企图改变和破坏非洲社会的结构，他就不予信任。玛丽·金斯利曾承认她相信非洲人是低人一等的，因而变成了这位黑人哲学家心目中的英雄。“我同她相识虽然是短暂的，”布莱登在一次集会上说，“但是我感到她天生有一种愿为非洲和非洲人服务的精神。……正如欧洲更了解非洲时也将担心的那样，她担心人们犯下破坏土著的社会制度的罪过，这样一搞，即使实际上并没有毁灭当地的人民，也会因此而有损当地人民与他们的外国开拓者进行有效合作的力量。”

布莱登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了他的晚年。年轻的非洲人不赞成他的亲英思想。他的老友和同僚，以及他在这方面的许多政敌，大多数都死了。只剩下几个英国人仍旧佩服这个老头儿，英国政府给了他一笔养老金。布莱登从利比里亚和塞拉

勒窝内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后，又把自己的命运同古典哲学家的命运去作比较。“历史反复重演；人民杀死了先知：西塞罗、德摩斯梯尼、苏格拉底只得滚蛋，假如那些无耻的煽动家硬要这么办的话。”布莱登死于1912年2月7日，离他八十寿辰仅几个月。

布莱登一定会为自己的葬礼而高兴，弗里敦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送葬的行列里争了起来，双方都自称布莱登的灵魂是属于他们的。葬礼由布莱登的一位基督教徒朋友主持，但他的棺材则由穆斯林抬往赛马场墓地，在出殡时，城内每一所穆斯林学校的儿童都加入了送殡行列。布莱登在五年前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作过这样一段奇妙的预言：“非洲人是不会建立纪念像的。假如他们的伟人享有这种荣誉的话，那一定是外国人为他建立的。”布莱登死后，弗里敦的一群英国居民承担了布莱登半身像的费用，这个半身像至今还矗立于沃特街。在利比里亚，却没有给他立像留念。

第三章

利比里亚人没有钱，移民的速度是缓慢的，他们又不与土著通婚，因此人口也在逐渐减少；他们承认自己的前景是极其暗淡的。除非这个国家门户开放、允许欧洲商人和塞拉勒窝内的黑人移民自由进入利比里亚，换句话说，也就是允许资本和劳动力自由进入利比里亚，否则就不能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引自W·温伍德·里德：《非洲札记》，1873)

十九世纪末的西非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是非常清楚的。现代的人们例如布莱登，把帝国主义的出现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利比里亚的衰落，看做种族的或政治的现象。人们把利比里亚人开发内陆的失败，归咎于混血儿领袖们的愚蠢无能，至少布莱登是这样看的。实际上，如同里德早在1873年就指出的那样，失败的原因是在于

缺少劳动力和资本。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起，欧洲对非洲热带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运费低廉的欧洲航运公司便应运而生。它们很快就排挤了利比里亚的商船队，这种商船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拥有商船约五十艘。人造奶油、肥皂或咖啡的大制造商，往往喜欢向他们本国的商人进货，因而助长了欧洲人大胆进入利比里亚市场同利比里亚商人竞争。廉价的运输也使非洲的出口商品如象牙、棕榈仁和棕榈油的价格下降。一直是利比里亚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利比里亚咖啡，遇到了巴西人的竞争，因为巴西人已经引进并种植了利比里亚的咖啡豆。到1900年，利比里亚咖啡已由每磅0.24美元跌至0.04美元，出口额下降了50%。十九世纪末叶，欧洲的保护贸易对利比里亚农民和商人的打击更为沉重。在政府的巨额贴补下，甜菜糖源源输入欧洲，这使利比里亚蔗糖的出口，遭受了如同它的咖啡贸易遇到巴西的竞争那样的灾难。阻碍利比里亚修建铁路的原因，与其说是不感兴趣，还不如说是缺少资本。阻碍它占有富饶的北方草原的原因，不在于缺少雄心壮志，而在于缺少军队，就在这一时期，这片草原落入法国之

手。的确，利比里亚是太弱了，只是靠列强之间的对峙才能使自己不致被某一强国所并吞。

利比里亚统治阶级害怕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但是又深感只有外国资本主义才是开发内陆的唯一手段。在二十世纪初，利比里亚政府授与联合矿业公司一项特权。该公司的股东大都是英国人。1904年，另一个英国的辛迪加创办了利比里亚橡胶公司，由哈里·约翰斯顿爵士负责经营。哈里爵士是一位学者兼冒险家，英属尼亚萨兰和乌干达殖民地就是他开辟的。事实证明，哈里爵士是一个蹩脚的商人，有人猜测，他挑选这个职业与其说是为了想发财，不如说是为了想在非洲工作。这个公司经营得并不好，但是哈里爵士在利比里亚的经历，却为他所写的名著利比里亚历史提供了资料。他的某些仇人把他所写的《利比里亚》贬低为利比里亚橡胶公司骗人的创业史。但是正如罗兰·奥利弗在其所著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的精致传记中所指出的，

创业史的篇幅一般不会有一千二百页之多。……人们认为，天才的创业史作者，恐怕不会累赘地从迦太基的汉诺时代开始详述西非海岸的历史，恐怕也不会去

印刷瓦依文手写本的精细复制品，恐怕也不会毫不留情地麻烦那些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权威去鉴定他所搜集的利比里亚的蝎子和蜘蛛了。

哈里爵士所著史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动人的利比里亚在本世纪初的生活图景。他发现利比里亚的居民既彬彬有礼又奉公守法，他们的文化程度至少与普通的英国农民不相上下，而且他们手艺灵巧，足以装配和修理电话机。哈里爵士断言，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爱作空洞的辩论，热中于拘泥小节的政见之争，以及纵酒过度和宗教狂热。即便是今天去利比里亚访问的人，也一定会与哈里爵士的不满怀有同感，即利比里亚人“已把《圣经》奉为一种物神”。他虽然认为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不适合于利比里亚学院，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又同意布莱登对利比里亚的批评：

假如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利比里亚人的话，那么他每做一件事就会尽可能（在合乎情理的范围）使之与欧洲、亚洲或美国的做法有所不同。他将设法保持自己原有的特点。例如，如果他是利比里亚学院院长，他就会果断地除掉学生头上的“方顶帽”，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不相称的头饰，而且还在于它是英、美所采用

的式样。他将设法发展一种特殊的非洲建筑，一种非洲画派。他一定会研究和发发展许多利比里亚土著所显示的天赋音乐才能。他将设法驯养红毛野猪而不是引入伯克郡种猪；驯养红毛水牛而不是引入英国短角菜牛；培育阿杰拉斯特斯几内亚鸡而不是引入交趾支那鸡。

利比里亚由于努力偿付罗伊时期的借款而深陷于债务之中，到 1900 年，负债额已接近一百万美元。利比里亚政府曾试图通过征收人头税、土地税、专利税和学校税来重新获得偿付债务的能力，可是入库的税款为数甚微。1906 年，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经营的另一家企业利比里亚开发公司，又为利比里亚筹措了另一笔十万英镑的借款。这笔借款部分地用于偿付急待偿还的债务，其余则用于修筑公路和筹建一家银行。作为这笔借款的担保，英国获得了对关税收入的最高监督权，并任命了一个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塞拉勒窝内边防军的士兵，在一名英国军官的率领下，被派往利比里亚内地，监督捐税的征收。作为借款交易中的部分协议，利比里亚开发公司获得了一项种植橡胶和开发矿山的特权。该公司的开发资金大

部分用于修建一条短距离公路和购进两辆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后来，利比里亚政府抱怨道，出卖了一部分主权，到手的只是三万英镑。

这笔英国借款和英国边防军，在利比里亚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致利比里亚政府不得不转而乞求它的第一保护人和友邦——美国的帮助。1909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改编了边防军，把它置于美军黑人军官的领导之下，国家财政则由美国白人管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债上加债，终于在1911年面临真正的经济崩溃的威胁。美国人邀请了在利比里亚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法国、英国、德国，要他们各自委派清算管理人。利比里亚从进出口贸易中所得的一切收入，以及橡胶税和人头税的全部收入，都抵押给了这些外国的清算管理人，实际上这些管理人就是利比里亚经济的指挥者。利比里亚差不多成了美国的殖民地，不过它所受美国奴役的严重程度稍逊于海地、尼加拉瓜和古巴，因为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派出了海军陆战队和税务人员到那些国家去，以保护其侨民和投资。即使英国驻蒙罗维亚的领事也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所指挥的边防军，较之塞拉勒窝内的

士兵得人心一些。

在美国的压力下，利比里亚于1917年8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稍后就派出一部分军队在法国作战。1918年，一艘德国潜水艇炮轰蒙罗维亚，击沉了利比里亚海军的唯一的军舰，即英国于1848年赠与的“云雀号”。从经济上说，战争是一种灾难。德国曾经是利比里亚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利比里亚的大多数货物都是由德国船舶装运的，它的钱财也是存在德国-利比里亚银行的。与德国绝交后，利比里亚进一步受到美国的控制，在较小程度上也受到英国的控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为止，尽管其他列强企图在利比里亚获得开拓殖民地的权力，但是美国一直是这个名义上独立国家的众所公认的保护人、财东和友邦。英国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玩弄过对利比里亚实行保护的计划。法国人则时时在利比里亚北部边疆进行威胁。德国人曾经有一次或两次暗示，可把利比里亚割让给他们，借以补偿以前属于他们的一些殖民地。连那些对骚乱不安的本国也始终无法治理好的波兰人，竟然也渴望着要承担管理利比里亚的工作。

命运注定利比里亚不是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而是成为一家美国企业费尔斯通橡胶公司的殖民地。美国是发展和制造汽车的先驱，不过它用于制造轮胎的橡胶却仍须依靠进口。主要汽车制造商哈维·费尔斯通说：“世界上85%的汽车属于我们所有。世界橡胶产量的3/4是被我们用掉的，而在我们所消耗的橡胶中有80%左右是用于制造汽车轮胎的。我国所产橡胶为数甚微，仅占世界橡胶总产量的1%。”更糟糕的是，橡胶的主要生产者英国人，正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橡胶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时，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主声称他们的投资已无利可图，因此要求当时的殖民大臣温斯顿·邱吉尔提出一条限制橡胶生产的议案。邱吉尔与另一个橡胶生产巨头荷兰商议后，批准了《限制橡胶生产法案》（1922年）。这个法案削减了橡胶生产，抬高了橡胶价格，所以，正如邱吉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法案帮助了英国偿还它所欠美国的战债。1922年，美国的轮胎制造商，例如费尔斯通，购买一磅橡胶仅需付0.15美元；而在1925年，购买一磅橡胶所付代价竟高达1.23美元。当然，他们对英国利用它的橡

胶生产垄断权感到恼火。费尔斯通把《限制橡胶生产法案》称为：

一个恶毒的计划，它将使美国人为他们的汽车轮胎付出过高的代价。……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面临着真正缺乏橡胶的威胁。……由于我们的汽车生产规模宏大，产品供应世界各地，因此除非种植更多的橡胶，不然橡胶的供应必将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一辆汽车没有轮胎便毫无用处，犹如一只轮胎离了汽车变得毫无用处一样。可是这两大工业的生存却完全取决于外国的意愿。它们离不开橡胶，可是美国不种橡胶。橡胶对任何其他国家来说并不怎么重要，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国家的生活象我们那样依赖于汽车的了。

由于英国人毫无妥协的表示，费尔斯通决定至少由自己来种植和生产自己需要的一部分橡胶。公司的董事们被派往气候适宜于种植橡胶的各个国家去。在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劳动力不足。菲律宾虽然是一个美属殖民地，却遭到了独立运动的骚扰。危地马拉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在墨西哥南部，费尔斯通的儿子被一群革命党人赶了出来，他是到该地区去查勘一些可能有橡胶树的丛林的。利比里亚似乎没有上述缺点。正如费尔

斯通后来写道：“利比里亚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自然条件。劳动力可以就地解决，而且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该国政府对我们的建议表示欢迎，并为我们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利比里亚人多少有点把自己的国家看作美国的保护国，希望由美国资本来开发他们的国家。”

1926年12月，费尔斯通和利比里亚政府的代表拟订了一项协定，按照协定的条款，利比里亚政府把已倒闭的约翰斯通公司的橡胶种植园划归美国费尔斯通公司所有，还把一百万亩的森林租借给该公司，租期九十九年，该公司并获得港口建设和利比里亚一切财政收入的实际控制权。虽然利比里亚内阁中有些阁员争辩道，一旦接受这些条款，他们就会“刚从法国这把剑下逃生，又被美国这把刺刀刺中”，但大多数阁员赞成与美国联盟。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根据1912年贷款协定的条文而行使的一些职权，也都移交给美国人。费尔斯通财团的经纪人纽约花旗银行，通过其分支机构蒙罗维亚市银行，掌握了利比里亚的财政大权。费尔斯通公司雇佣了一万二千名利比里亚人，并将奇妙的现代技术介绍给他们，例如从大西洋

彼岸发来的第一份无线电报。费尔斯通公司好吹牛的宣传家描述 1928 年圣诞节的无线电联系时写道：

这是一个只有在非洲才能领略到的月光如水的夜晚。繁星的华盖遮满了苍穹。从密林中传来了青蛙的阁阁鸣声，以及闹成一片的夜晚特有的各种喧声。……这时候，清晰地传来了音乐声，接着就是费尔斯通先生的讲话声，他从座落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的冬季寓所，通过无线电传来了他的新年贺辞。……他的话声刚起，有些妇女和男人中的胆小鬼便逃跑了，其中有几个人甚至再劝也劝不回来。其余的人爬到桌子下面去看个究竟：是否有人躲在那里通过喇叭讲话。最勇敢的人则迈开脚步向广播器走去，向这种新的妖魔挑战……

费尔斯通公司与利比里亚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是象费尔斯通的宣传员们所吹嘘的那样友好亲善的。1926 年 9 月 11 日，英国驻利比里亚领事毫不掩饰其内心喜悦地报告道：

近来，协商似乎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可是上星期六，与哈维·费尔斯通先生一起在这里的奇克先生，却对他们的汽车司机大发脾气，甚至还打司机的耳光。……这个年轻的司机当即发誓要控告奇克先

生(以及一位干预其事的医生),警察直接来到这所屋子,并入内搜查,最后,在一片咒骂声中把这两名罪犯押往法院。

某些左翼作家对费尔斯通所订的协定进行了抨击。巡回讲学的学者雷蒙德·布埃耳说,这个计划具有“大种植园制度关于土著劳动力方面的一切令人讨厌的特征”;年轻的尼日利亚作家、后来担任尼日利亚总统的纳姆迪·阿齐克韦则指出,英国资本家累佛休姆勋爵曾想为他的棕榈仁和棕榈油种植园取得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权,但被英国政府所拒绝。显然,自从费尔斯通协定签订以来,利比里亚政府的实权已落入费尔斯通橡胶公司手中。利比里亚经济史学家乔治·W·布朗写道:“虽然政府官员和那些执掌财政大权的人们能友好相处,但是非常清楚,费尔斯通种植园的总管、蒙罗维亚银行的经理以及财政顾问是掌握实权的政治三巨头。”

第四章

在我心眼里，非洲是什么样？
红艳艳的海呢，还是黄橙橙的太阳？
是丛林星星呢，还是丛林小径？
古铜似的铁汉呢，还是华贵的黑妇女？
我就是她生的儿子，她是我娘亲，
那时节，伊甸园里一片嘤嘤鸟语。
远离肉桂树、香林丛的芬芳，
我祖祖辈辈热爱的地方，
时间车轮滚过了漫长的三百年，
在我心坎里，非洲是什么呢？

（引自康提·卡伦^①的诗《遗产》）

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殖民协会仍不断地把移民送往利比里亚。少数卓越的黑人，如布莱登，

^① 康提·卡伦(1903—1946)美国黑人诗人，著有诗集《我站在这些立场上》(1925)，《遗产》即系该诗集中的一首，此外还著有《色彩》(1925)，《棕色姑娘的歌谣》(1927)，《去天国的道路》(1932)，《失去的动物园》(1940)等诗集。——译者

继续鼓吹黑人复国运动即“回到非洲去”运动。这一运动，在南北战争后曾消沉一时，但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白人在南方重新得势，又再次兴起。斗争性强的黑人，特别是那些北方的黑人，不信任“回到非洲去”运动，情愿留在美国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但即使是这些人也都是为利比里亚而自豪的。有些黑种美国人很关心南非，特别是当他们听到在德兰士瓦和金伯利发现黄金和钻石的消息后，就更为关心了。一个埃塞俄比亚教会建立起来了，它的牧师和会众分布于美国和开普殖民地的非洲人城镇。一个黑人海轮船长哈里·迪安把他的船驶至开普敦，他在那里的埃塞俄比亚教会讲述了一些荒诞的故事，如钻石贸易，在庞多兰开辟了一个黑人移民区，只花五万美元的代价就买下了莫三鼻给等，博取了教友们的欢心。英国当局未为所动，要他离开开普敦。

黑人渴望摆脱流浪生活返回非洲的旧梦，在二十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先导下，不但复苏而且得到了鼓舞。新的“回到非洲去”运动的倡导者、领袖和殉道者是一位牙买加新闻记者，名叫马克斯·加维，他最先唤起美国黑人开展群众性政

治斗争。加维运动尽管有种种荒谬可笑之处，但它毕竟还是“黑人权力”运动的先驱，是黑人穆斯林、黑豹党人的先驱，是马尔科姆·爱克斯^①、腊普·布朗、斯托克利·卡迈克尔^②、埃尔德里奇·克利弗^③的先驱，以及所有深信美国黑人具有独立的前途的集团和个人的先驱。由于加维运动也重新唤起了黑人渴望向利比里亚大规模移民的旧梦，因此它对利比里亚历史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从而对本文来说也有重大意义。

象许多美国黑人领袖一样，加维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并在那里长大。他的父母都是纯黑种人，这在加维的一生经历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牙买加的黑人与混血儿经常处于对抗状态。加维的父亲自称是马隆人的后裔。他为人顽强而严厉，因此在加维所写的童年回忆录中，毫无牙买加人

① 马尔科姆·爱克斯是美国黑人领袖，“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创始人，于1965年2月21日在一次黑人集会上被谋杀。——译者

② 腊普·布朗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曾先后担任过美国黑人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1969年起改名为“学生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主张“黑人权力”。——译者

③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1971年2月黑豹党公开分裂前原为该党的宣传部长。最近克利弗有攻击我国的言论。——译者

的那种热情和诙谐。1901年，加维十四岁时，他幼年时代的朋友和同伴，一个和他同年的白人女孩子被送到苏格兰去念书了，据加维自己说，她的父母还告诉她，“绝对不许她和我通信或试图和我联系，因为我是一个‘黑鬼’”。加维成了一家印刷所的学徒，满师后，他就离开在北方某城的家，到首都金斯敦去谋生了。

加维晋升为印刷师傅和领班，但是他却愈来愈被编辑工作所吸引。1907年，他领导了一次罢工，不过当他的大多数伙伴复工时，他却从工会斗争转而考虑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来取得黑人权力的问题了。他时常发表公开演说和写文章。他去美国中部和南部旅行；又去英国研究法律和政治。如同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加维从未受过正规的或严格的教育，不过，他确实也学到了用一种简明的思想来说服人的力量。“一个上帝！一个目标！一个命运！”这就是加维于1914年创立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纲领，它的目的是要“振作种族的精神，增进自豪和慈爱的精神，拯救黑人中堕落的人，救济穷苦的人们，帮助开化非洲各落后部族，加强非洲各独立国家的帝国主义”。

这时，加维受到了美国黑人领袖布克·托·华盛顿的改良和审慎的思想的影响。他于1916年首次访问美国，为的是考察布克·托·华盛顿所创办的各黑人学院。可是当加维抵达哈莱姆时，布克·托·华盛顿已经死了；那个旧的黑人社会也随着他的逝世而解体了。在1910年以后的十年里，特别是在1917—1918年战争年代里，美国的黑人社会经历了一场经济、社会和精神方面的变革，这就为加维提供了获得权势和荣誉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早在美国参战前，引起了北方各州的工业繁荣，从1916年到1918年迁往北方各州的黑人共计有五十万人。单是芝加哥一地的黑人总数，就从1910年的四万四千增至1920年的十一万。北方的实业家把乘火车的免费乘车证发给南方有可能来应募的人，这些人无论如何早就被高工资和种族平等的传说所吸引了。1915年，棉花种植园遭到了棉子象鼻虫灾的破坏，因而进一步促成了大规模的移民，这次移民造成的最出名的后果，就是波及全国的爵士音乐狂。伟大的黑人音乐家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走出孟菲斯、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的低级娱乐场而进

入舞厅演出,后来又在哈莱姆、底特律和芝加哥的秘密酒店中演出。

即使在战争时期的富裕年代,黑人移民的社会仍然是动荡不安的。在许给黑人以自由的芝加哥,黑人住贫民窟和黑人受歧视的现象,较之人所共知的暴虐的南方更难于忍受。在北方,虽然在繁荣时期黑人劳动力是受欢迎的,但是一旦社会经济稍有衰退的迹象,最先被解雇的就是黑人。激进的黑人报纸如芝加哥的《保卫者报》,鼓励城市中的黑人群众起来为争取权利而斗争。战时的服役也在四十万黑人士兵中引起了一种革命情绪,他们感到他们所保卫的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他们公正的待遇。驻在法国的黑人士兵感到那里的白人对他们很好,因而就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内的情况却截然不同。黑人们日益强烈的信心和渴望,使许多美国白人为之恐惧不安。三K党于1915年又复活;在战时和战争刚结束不久,就有许多黑人士兵遭到私刑的迫害;仇恨,又伴随着经济衰退,终于在1919年的“血腥的夏天”爆发了二十六起黑人暴动,其中一起是芝加哥的暴动,有三十八人被杀害。这就是美国黑人社会

的情绪，加维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针对这种情绪阐述了他的论点。

加维的说法是新鲜而有魅力的。他传布一种以黑色为荣的思想——黑色皮肤，黑色权力，甚至在天堂里还有一个黑色上帝统治着——对混血儿的身份则加以蔑视。有些评论家辩论道，在美国，黑人和混血儿之间并不怎么对立，加维把西印度人的偏见搬到美国来，这是他犯下的一个错误。事实上，在加维以前，没有一个黑人领袖曾得到过那些肤色较深、比较贫穷、又受不到教育的黑人人们的响应。传统的黑人政治家中有许多是混血儿，他们只希望在白人的美国得到自由和正义。加维是第一个提出一个由黑人掌权的黑人国家这种想法的人。他嘲笑某些黑人竟把希望寄托于祈求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好心肠或保护；的确，如同近代战斗的黑人们一样，他也主张欢迎三K党。“就黑人来说，我把三K党、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和那些白人美国协会，看作是比所有其他伪善的白人团体加在一起还要亲切的黑种人的朋友。”加维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嫉妒和厌恶犹太人的黑人领袖。

1917年，加维的讲演吸引了广大群众。次年，他创办了《黑人世界》周刊，这是一份具有迷惑力的刊物，内容兼收并蓄，包括修辞学、格言、黑人英雄人物的特写和各种使人半信半疑的新闻。《黑人世界》出版后立刻在美国、拉丁美洲和对此刊物尚未禁售的非洲各国发售^①。加维喜欢以黑人的的人数自夸——“四亿黑人大声疾呼，要求……正义。”黑人的总数实际上从未到过加维所说人数的一半，但是他对正确性却很少考虑。这种不可压制的人口数量观念，鼓舞了佐治亚州、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南非和拥有《黑人世界》读者的各地遭受蹂躏的工人们。尽管加维拒绝刊登诸如“白肤直发剂”之类有利可图的带有“种族侮辱”性的商品广告，该刊的收入仍急速增加。成千成万的《黑人世界》的读者还交纳世界黑人进步协会会费。该协会在哈莱姆购置了一所大会堂。1920年8月，加维在哈莱姆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使他的名气响遍白人和黑人世界。

加维深知官衔、雄壮的行列和制服的魅力。他

^① 塞拉勒窝内代理总督于1923年呈报殖民部：《黑人世界》“虽非绝对禁售，但已严格控制，只有极少几份准许流通”。

作为世界黑人进步协会主席所穿的正式服装是一顶方顶帽和一件学究式的披肩——加维渴望已久的学者的标记。1920年的大会唤起了处于无权和悲惨境地的种族取得权力的幻想。成千成万的哈莱姆市民观看了非洲军团团员的盛大游行。团员们身穿深蓝色制服，裤子上有红色条纹；队伍中有两百个世界黑十字护士队的姑娘，还有非洲汽车兵团和黑鹰飞行团。在这值得骄傲的时刻，群众中也没有什么人停下来询问：黑鹰们是否懂得飞行技术，黑十字护士队的护士们有无护理经验。黑人中的知名人士，原应是更明白事理的，却也参与了这种荒谬可笑的、令人不解的行动。有些人还获得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勋章，例如尼罗河爵士勋章，或埃塞俄比亚特殊功勋勋章；另外一些人则获得了飞黄腾达的高官厚禄，在假定的非洲总统马克斯·加维手下分任一个尚未诞生的国家的部长，其薪金竟高达三千至一万二千美元。许多年之后，加维写道，“所有被选任的官员，除了被选为总主教的乔治·亚历山大·麦奎尔主教和一直忠于自己的誓言和这个组织的亨里埃塔·文顿·戴维斯夫人外，都只能作为侍者或仆役，够不上拿一

千二百美元年薪。”事实上，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几个人能拿到一千二百美元年薪的，因为没有一笔经费来支付他们的薪金。塞拉勒窝内的一位具有该国人民好讼习气的“有权势的人”，后来试图为补发欠薪提出诉讼；但是那时大多数官员却无不为他们所得的头衔而飘飘然。蒙罗维亚市长加布里埃尔·约翰逊因为得到了“当权者陛下”这样的称号，高兴得把自己当作“世界第一黑人”，这使利比里亚真正的总统——金总统大为生气。

1920年召开的那次大会，要求拼写黑人(Negro)这个字时，第一个字母一定要大写^①。大会还制定了“回到非洲去”运动的红、黑、绿三色旗帜：红色代表黑种人的血，黑色代表黑种人的皮肤，绿色代表非洲新生活的希望^②。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加维第一次明确宣布了他所领导的“回到

① Negro (黑人)的第一个字母“N”要大写的意见，立刻为各报所采用，包括1930年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内，借以使它们的有肤色的读者高兴。用大写字母“N”，现已成为必须照办的惯例。

② “在南越的拥护‘黑人权力’运动的士兵*，有一面红、黑、绿三色旗，红色代表他们流的血，黑色代表黑人文化的面貌，绿色代表青年和新思想。”(《时代》周刊，1969年9月19日)

* 指侵越美军中拥护“黑人权力”运动的黑人士兵。——译者

非洲去”运动的纲领：

现在我们要把世界上四亿黑人组织到一个巨大的机构中来，以便在伟大的非洲大陆上竖起自由的旗帜。……如果说欧洲是属于欧洲人的，那么非洲就应属于全世界的黑人。……我们决定回到非洲老家去，把非洲建设成为宏伟的黑人共和国。……我们告诉那些至今还统治着非洲的白人，还是现在就离开非洲为好，因为我们这次回到非洲来的不再象祖先亚伯拉罕时代那样是二十万人，而是四万万人，我们要夺回根据天赐的权利属于我们所有的一千二百万平方哩非洲领土的每一平方哩土地。

英国政府和其他殖民地政府对于这些誓言，如同对于加维支持爱尔兰革命党人的各种文告一样，深感不安地进行了研究。白宫也不例外，它怀疑加维背后有象美国共产党这样的社会主义团体的积极支持，虽然加维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还算不上一个激进分子。

一首哈莱姆小调这样取笑“回到非洲去”运动：

加维，加维是个伟大人物，
想把他的同胞带往猴子之国。

如果他当真把他们带到那里，
管保我就同“山姆大叔”留在这里。

有些黑人对这一运动不仅怀疑而且敌视，从罗伯特·W·巴格纳尔对加维的描述中就不难看出这种态度：

一个纯黑种的牙买加人，矮胖、壮实、肥硕，皮肤光滑，嘴巴突出，下颚巨大，小而机灵的猪眼睛，哈叭狗一样的脸。为人浮夸，自私，残暴，偏狭，阴险，多变，圆滑而殷勤，贪婪；具有天赋的自我标榜的才能；自我吹嘘而不以为耻……根本不重视诚实可靠，喜欢华丽的队列、俗气的服饰和奢侈的排场。

加维则对主张融合的人和“汤姆叔叔们”，对黑人血统只占八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混血儿以及直头发和白面孔的人，报之以更为恶毒的谩骂，以示回击。

威·爱·伯格哈特·杜波依斯是加维最恨的人，因为他同时也是加维最怕的人。杜波依斯在他年近百岁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为促进黑种人的进步而工作的。他的出身和经历正好与加维的相反。他生于1868年，是法国、荷兰和非洲血统的混血儿，肤色淡，钩鼻，部分地由于他的范

戴克式的胡子，他看起来不象一个黑人，倒很象雪茄烟广告上的一个荷兰人。他受过高等教育，先后在菲斯克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后来又转而研究社会学。他决定支持黑人事业，但是他对于黑种人又怀有矛盾的心情，所以虽然他研究黑人贫民窟问题，但在研究时却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最初他鼓励黑人商人，后来又转向社会民主，最后在其晚年又转变为崇拜苏联。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办人和该会少数黑人领袖之一。由于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因而他获得了名誉和地位。他机智、宽容、懂道理、学识渊博，这些特点，加维恰恰全都没有，因而使他一直为此感到恼火。杜波依斯的《危机》杂志，读者始终没有加维的《黑人世界》那么多，对黑人群众的影响也无法与《黑人世界》相比。但是自学出身的、戴着方顶帽、穿着大学礼服、装出一副学者姿态照相的加维，对哈佛大学毕业生这种学历是很羡慕的。或许由于杜波依斯的论据充分，以致他的争辩使加维更加难于忍受。杜波依斯对加维的诚意表示赞扬，但是他的这种赞扬和他的怜惜同样地使加维愤怒。“他的一生，”杜波依斯谈论加维时说，“白人嘲笑他，讥

讽他，刺伤他的心。他在一生中始终憎恨一半是白人血统的混血儿，因为这些人不承认自己的黑人血统，对自己苍白的肤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些巧妙的攻击果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使得加维大为恼火：“难怪杜波依斯喜欢与白人交往，因为他嫌黑人太丑。他之所以如此喜欢与白人跳舞，与白人一起就餐，甚至有时同白人睡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在他心目中，凡是黑的东西都是丑的，凡是白的东西都是美的。”

加维由于企图创办各种黑人实业，特别是创办黑星轮船公司而垮了台。加维把他所创办的各个公司在组织法规比较松的特拉华州登记注册，因而他仅以少量现金就创立了许多巨大的企业。然后他又以《黑人世界》为宣传工具，将成千成万美元的股票售与他的支持者。黑星轮船公司购进了几条船，这些船不仅陈旧、价格昂贵，而且往往是经不起出海航行的。“卡诺瓦号”是由一艘富翁的游艇改装而成的，在其航行十八个月期间仅收入一千美元，而所耗成本却超过十万美元。“雅茅斯号”是一艘古老的货船，当这艘船装着一批托运的威士忌停泊于哈瓦那时，发现船上的水手曾大

量地喝过这批酒。该公司又发觉，黑人海运顾问以及公司中最不可靠的船长之一，都被卖船给公司的那些卖主收买了。该公司的会计，以前是铁路上的职员，只是稍微懂得一点簿记而已。该公司的大多数高级职员，包括少数正直的或者能干的职员在内，不久就同暴躁的加维争吵起来，而那时候加维已经同几家报纸、他的妻子和许多政敌在进行诉讼了。加维对待困难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夸大妄想狂：他把公司资本重估为一千万美元。正如杜波依斯那样的评论家们经常试图向他指出的那样，把资本估得这么大，只不过意味着支付一笔额外费用，丝毫也不会使公司的偿付能力骤然有所增加。

那时，即使加维的敌人也并没有指责他本人贪污了黑星轮船公司和他所经营的其他事业的公款。他只拿自己薪金的一部分，个人花费是有节制的。加维，同他的股票持有人一样，是把他的金钱献给“黑人权力”的精神的。徒有虚名的黑星轮船公司的那些怪模怪样的、航行起来东倒西歪的船只，对加维和成千成万的黑人来说，正是事业的象征，正是黑种人的希望。但是加维的债权人

和法官们对于黑人的这些梦想却无动于中。1922年1月，加维被捕，并被控告犯有在邮售股票中使用“欺诈的说法”和“骗人的诡计”的罪行。在审判过程中，人们提供了许多用以证明经营不善的证据，唯独没有用以证明出于犯罪意图的证据。正如一位加维传记的作者所描写的，真正的骗子不是黑星轮船公司的董事们，而恰恰是那些把破烂船只卖给黑星轮船公司的人们。在受审时，加维又犯了个和他个性有关的独特错误，他常常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用冗长、咆哮的讲话进行申辩。“加维不过是一个人。加维不过是一个有人性的人。但是加维一定得毁灭，不过你们在毁灭加维的肉体的时候，你们不能毁灭他的灵魂。我认为，先生们，除了正义、真理驱使你们去做的事情外，你们任何事情也不能做；法律也是这样。”加维的冗长的申辩，使陪审团的先生们不得不比往常多坐了一倍的时间。他们判定加维有罪。法官宣判处以罚款一千美元和徒刑五年。

当加维保释在外并等待对自己的判决进行上诉的这一期间，他以他旺盛的精力和益发巨大的影响，转而致力于“回到非洲去”运动。早在1920

年，他就开始同利比里亚政府谈判，并曾委派一位同事埃利·加西亚作为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代表。与此同时，加维则在美国筹集一笔重建利比里亚的基金。毫无疑问，利比里亚政府是急于想得到这笔钱的，它为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提供了“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方便，使协会的工业、农业和商业计划得以在利比里亚实现。”

加维与利比里亚人表面上似乎融洽。但加西亚于1920年访问利比里亚归来时交给加维一份秘密报告，对利比里亚的领导却没有一句好话。

利比里亚（报告一开始就说）虽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却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地方，人民确实正面临着饥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由于利比里亚人对任何一种工作都抱有强烈的反感。在这个共和国里没有耕种过的土地，连大米这种民族食粮，虽然该国完全可以大量生产，却也要从英国和其他地方进口，其售价之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加西亚眼中，美裔利比里亚人是一个依靠政府贪污过活的卑鄙集团，而且害怕新移民的竞争。“这件事非常重要，”加西亚警告说，“我建议，对每一个为了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利益而前往利比里

亚的人，必须事前同他讲清楚，决不容许我们这方面抱有参与利比里亚的政治活动的意图。”世界黑人进步协会也不能将其改善利比里亚土著生活的计划透露出去，因为

在那里，事实上，美裔利比里亚人把土著当作奴隶使用，仍然存在着把人作为活的财产的奴隶制度。他们购进男人或女人来帮他们干活，甚至最不足道的美裔利比里亚人也有半打男仆伺候他——因为他在街上连自己的伞也不愿携带，他的东西非得由一个男仆替他拿着不可，即使极小的一包东西也不例外。在蒙罗维亚时，我到一家商店买了七码卡其布，打算做西条裤干。那位商人把卡其布包好后交给我。正当我要走出那家商店时，我的同伴（一位美裔利比里亚人）对我说：“为什么我没想到你会自己拎这包东西呢？”“为什么不自己拎？”我说，“这是很小一包东西呀。”他回答说，绅士手中拎个包，这不是利比里亚的习惯，因此，占有奴隶是大有用处的。

看来利比里亚政府对加西亚那份极尽辱骂之能事的报告毫无所知达数年之久。总统查尔斯·邓巴·伯吉斯·金和国务卿埃德温·巴克利对加

维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友好的。他们俩都是西印度血统的纯黑种人，毫无肤色较淡的美裔利比里亚人的那种偏见。直到 1923 年，当加维派出一个专家组在利比里亚马里兰省开展建设工作时，他们都甚为高兴。首批移民三万人打算于 1924 年 8 月自美国遣送出发——乘黑星轮船公司的轮船——在那些专家为他们准备好的各城镇安家。代理总统巴克利对加维的计划再次表示欢迎，并指派高等法院院长詹姆斯·D·多森协助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和政府进行这项工作。直到 1924 年 5 月 2 日，多森给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欣悉你们正在为实现我们的计划而紧张地工作，而且你们还希望于 9 月份就遣送出你们的首批移民。我们这方面一定同你们很好配合，使这项事业得以顺利完成。我们深信，照此方针去做，你们必将在促进利比里亚共和国的成长和工业的发展方面，以及为现在正处于外国统治下的几百万黑人求得自由、独立和保障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加维的计划不到两个月就被扼杀了。有一些为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移民区运送物资的船只因为债务关系，被加维的债权人扣留下来了。1924

年 6 月 30 日，利比里亚政府突然警告所有轮船公司，“被称为加维运动的任何成员”均不得上岸，各轮船公司应负责把他们送走。接着，利比里亚政府又把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所派出的专家组驱逐出境，尽管这些专家为了拖欠工资的问题正在同协会争吵。加维向利比里亚参议院和众议院提出呼吁，但是毫无效果。1924 年 8 月，埃德温·巴克利签发了一份利比里亚政府的备忘录，宣布该国政府“在道义上和实际上坚决反对以马克斯·加维为首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煽动性政策，这种政策……看来不怀好意，而且相反地还有破坏利比里亚共和国与其毗邻友邦的友好关系的倾向”。

足以说明这种政策上的突然改变的最恰当的解释是：加西亚于 1920 年评述利比里亚的粗暴的报告，被利比里亚政府的官员们看到了。这份报告的副本可能是被某些反对加维的美国通讯社泄漏给利比里亚政府的。另外一些加维分子，很注意巴克利于 1924 年 8 月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意见，认为金总统已受到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影响。英国人是肯定怀疑加维主义、害怕《黑人世界》并反对“回到非洲去”运动的。法国参议员、关于非洲

事务的非官方发言人，塞内加尔人布莱斯·迪阿涅曾警告加维：别想取得法属非洲地区土著的支持。金总统于1925年1月访问弗里敦时，总督亚历山大·兰斯福德·斯莱特爵士祝贺他“以紧闭大门对待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假爱国者”；法国人则授与金总统一枚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示感谢。加维把责任推在他的死对头杜波依斯身上，因为杜波依斯曾于1925年1月被美国派赴利比里亚，作为出席利比里亚总统就职典礼的代表。杜波依斯虽然批评过“回到非洲去”运动，但他认为：对于利比里亚在他到达前半年所作出的决定他不能承担责任。

加维的回到非洲去的计划，如同他的黑星轮船公司计划一样，因野心过大而失败。只有几百人打算回到非洲去，而他却说成有几百万人。正如犹太人支持那些以色列的创始人一样，美国黑人对“回到非洲去”运动愿意出钱也愿意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或犹太人准备离开美国去过拓荒者的那种陌生而艰苦的生活。加维把移民的规模吹嘘得过于庞大，因而得罪了利比里亚人，他们所欢迎的只是少数能

派用场的移民，却害怕几千或几百万的移民一起到来。一种规模较小的、更为慎重的“回到非洲去”运动，对利比里亚也许是有利的，同时也许能使散居于世界各地的黑人对自己的非洲老家感到骄傲和关心。可是，小规模和慎重，与加维的性格适得其反；他用大写字母和惊叹号来考虑问题；他的每一个计划无不被他的夸大妄想狂所破坏。

1925年初，加维对被指控邮件欺诈罪的上诉，遭到驳回，并在亚特兰大被逮捕入狱。他以殉道者的口吻写道：“我死后，要用红、黑、绿三色的斗篷把我裹起来，因为在新的生活里，蒙上帝恩惠，我将高举起你们一看就会知道的旗帜，带领千百万人民登上胜利的高峰……”。1927年，他因减刑而获释，并被押送回乡。在牙买加，他重振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不过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争吵和传票，这里包括一次为期较短的监禁和越来越多的辛酸。1935年，他把总部迁往伦敦，在那里，他没有一个朋友，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他死于1940年。他逝世的消息在他死前几天就被错误地发布出去了，所以这位为自己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感到骄傲的加维，他

生命中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阅读报上为他的死亡而发表的消息中度过的，而这些消息则描绘了他怎样落得了——一个被世人遗忘的结局。

据反映芝加哥黑人区概况的《黑人都市》的记载，在1938年，“只有极少数”信仰坚定的加维分子，仍旧在他们那所破破烂烂的自由会堂集会。该书的作者们还摘引了一个家仆议论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讲话：“我所知道的加维，只是他想把有色人组成某种类型的团体，而且我们要全部回到非洲去，组成我们自己的国家。那是一个好主意。”不过一位救济工作者问道：“为什么有色人一定要回到非洲去？那里又没有工作给他们做。”一位商人谴责加维分子逃避他们自己国家中即将来临的战斗。一位在理发店闲逛的人议论“回到非洲去”运动时说：“在非洲又没有宽敞的马路。”

“回到非洲去”的梦想仍盘旋于人们的脑际。极端反对加维分子的杜波依斯，就是一位奇妙地改为信仰“回到非洲去”的思想的人。他在访问利比亚期间爱上了非洲。他激动地说：“非洲的魅力抓住了我。它那种医学上的古老魔法，燃烧着我昏沉沉的、象在梦境中一样的血液。……这里有

照耀在迷蒙中的阳光，有那种柔软的、带有浓郁香味的热，它象一件外套似的裹在你身上。还有懒惰；而神圣的、永恒的慵倦，就是真、美、善。”杜波依斯如此推崇的懒惰，表现在蒙罗维亚的先生们身上的，或许要比表现在他们所雇佣的奴隶和工人们的身上的，更为显著。杜波依斯在其晚年仍然眷恋非洲，不过又掺合了一些非浪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已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他迁往恩克鲁玛的加纳居住，最后死在那里。

直到最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一批黑人穆斯林来到利比里亚定居，现在他们在首都经营着一家冷饮店，这是首都最好的冷饮店之一。大多数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关心“回到非洲去”运动的黑人，已将其兴趣从利比里亚转向于更好战的国家。本世纪三十年代，腊斯·塔法里即海尔·塞拉西皇帝抗击意大利军队的斗争，激起了腊斯塔法里派——一种加勒比人教派——的非洲民族统一主义的泛音。有些“黑人权力”运动的领袖^①

① 这些领袖中有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加维的儿子在西印度群岛也是一位战斗的黑人。

到几内亚去了，几内亚是一个激进的国家，也是克瓦米·恩克鲁玛的避难所。有一次恩克鲁玛表白道：“我所读过的书籍中最使我感动的就是《马克斯·加维的哲学和主张》。……”

美国的黑人问题同加维在世时的情况一样，既困难又严重。围绕黑人的命运问题所展开的各种与过去相同的争论，激烈地进行着。这里，有些是属于杜波依斯传统的、主张融合的人，有些是象加维一样主张黑人权力的人。马克斯·加维虽然愚蠢，但也懂得了一条重要的真理，他在二十年代初这样写道：“白种人对黑种人抱有偏见，其原因与其说在于肤色，还不如说在于黑种人的处境；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因为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存在是依附于白种人的。”美国的黑人依然处于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的状态，所以至今仍念念不忘“回到非洲去”的梦想。



第五部分

第一章

开往博城的火车，
它不愿意走了。
车头已经跑得很累，
因为缺乏足够的燃料。
开往博城的火车，
它不愿意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缅甸服役的塞拉勒窝内士兵，都唱这一支带有乡愁的歌；后来这支歌在盟军的其他部队中也流行起来了，尽管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博城这个地方，事实上他们可能连塞拉勒窝内也没有听到过。）

经过盛产棕榈油地区的、从弗里敦到博城的铁路一通车，塞拉勒窝内的经济命脉就落入了英国大商人的手中。铁路线每通车一段，运输的数量和价值也就跟着增加；因为在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棕榈产品的需要是很大的。制造火药的甘

油是从棕榈油中提炼出来的；人造奶油是棕榈仁做的；莱佛肥皂公司也叫喊着要求更多的供应。正如上面这支小调所说明的，窄轨铁路的安全谨慎一向是出名的，在速度上却不怎么行。但它对殖民地贸易的推进作用，可以从1900年以来的出口数字的直线上升中看得出来。

直到1898年“茅屋税战争”时为止，对内陆的贸易都控制在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手中，他们的专门技能是白人所及不上的。铁路的通车，给英国人提供了把克里奥尔人排挤出去的机会。T·J·奥尔里奇在1910年写道：“除了极少的例外以外，欧洲人的呼声是‘贸易，贸易，贸易！给我们棕榈油和棕榈仁’。”英国的大公司（如莱佛公司）现在都派年轻的英国人到内陆去当收购员了。由于他们有雄厚的资金，他们可以给当地酋长预付货款，取得这一地区的独占权；他们可以大批购进和低价出售，来排挤较小的竞争者；而且他们还相信，内陆的官吏会站在他们一边来反对克里奥尔商人。由利物浦回来的船只，带来了销往内陆的廉价商品。“随着所谓文明的向前发展，”奥尔里奇接下去写道，“也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是要求

土著生产棉花供应英国的市场；另一方面，英国制造商又将自己生产的各种颜色的棉纱，作为商品销售给土著，来代替他们当地自产的土纱，而种棉花和纺纱是他们在历史上早就在进行的了。”劣质的衬衫和裤子代替了腹地的庄严的长袍，洋铁盘换走了陶器的盆碗，在兰开夏装瓶的啤酒，比棕榈酒更受人欢迎。

内陆贸易的扩展，对克里奥尔中间商特别不利。向非洲销货的英国大公司，也采取了当时在英国普遍的做法，即不但经营批发，同时也经营零售业务。过去它们出售烟草，是以大桶为成交单位的，现在却是装成小包论磅在柜台上发售了。殖民地里比较富裕的人，现在可以直接打电报去伦敦定货，甚至贫穷的人们，也可以按照诱人而名目繁多的货品价目单，用邮购的方式来买东西。一切似乎都在跟克里奥尔商人作对。他们过去和草原地区的曼丁哥人进行着很好的交易，这些曼丁哥人带着象牙、金子、阉牛和绵羊南下来到弗里敦，克里奥尔人就招待他们，和他们讲价钱，可能的话，甚至还会诈骗他们。可是，在本世纪初，曼丁哥地区以南的那段同法国属地接壤的边境，被

封闭了，因此大部分曼丁哥人都到科纳克里去做买卖了。

对克里奥尔商人最大的威胁，来自叙利亚人的竞争。这些叙利亚人是在本世纪开头的前后几年漂流到弗里敦来的。他们大部分来自现在的黎巴嫩，也就是现在一般所称的黎巴嫩人，尽管这里面也有一些是来自叙利亚本部、约旦和巴勒斯坦的。正如他们的祖先腓尼基人一样，这些叙利亚人是十足的商人，为了百分之几的利润，他们就不惜冒险深入荒野。腓尼基人曾经和康沃耳的野蛮人交易，购买他们的锡；而叙利亚人则在十九世纪开发了野蛮的西非。到1910年时，单是在弗里敦就有将近两百个叙利亚商人。另一个比较不太可靠的报告说：1916年时，在这个首都和它的周围有三千个叙利亚人。他们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些叙利亚人开头都是沿街叫卖或设摊营业，他们工作时间长，售价便宜，为了做成一桩交易，不辞长途跋涉之劳。

作为商人，叙利亚人怎样取代了克里奥尔人以及为什么取代了克里奥尔人，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归咎于这样一种倾向，即有知识的

克里奥尔人希望到政府机关工作或找个自由职业。不过，这既可能是他们在经济上失败的原因，也可能是这种失败的后果。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法伊夫却指出，正如过去那些沿街叫卖的获释奴隶一样，叙利亚人能够联合起来夺取市场，而克里奥尔人却在自己人中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一说明，算是给克里奥尔人从商业中被排挤出去争回了一点面子。当时大部分英国人，都把叙利亚商人的兴起，归咎于克里奥尔人的懒惰。奥尔里奇是有一些夸奖叙利亚人的，他写道：

叙利亚人吃的是乡下的伙食，不论男女都是拚命工作。对他们来说，一切就是为着工作和金钱。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喝酒。……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塞拉勒窝内商人百思不得其解。塞拉勒窝内的男人和女人（特别是女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但使他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为什么这些叙利亚人获得成功，而他们却只是勉强糊口；因为他们总是这样觉得：如果世界上有人会做生意的话，那就数他们了。叙利亚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竞争者；但如果塞拉勒窝内人聪明一些，他们就可以理会到，只要他们愿意从中吸取教训，他们的对手倒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具体例子。叙利亚人经常储蓄，而塞拉勒窝内

人只知道浪费。叙利亚人不夸口，不招摇，一心一意地做生意。他们不会通过邮寄包裹给自己买一件最时髦的但是不适宜于当地气候的衣服，而这却正是他们的塞拉勒窝内邻人最大的欲望。

叙利亚人积蓄下来的钱，大部分都寄到地中海东岸各国去支付一个得来不易的退隐之所。他们对塞拉勒窝内的经济很少贡献，因而也是社会上埋怨的对象。他们受到非洲人的嫉妒和怨恨，受到欧洲人的藐视和冷落；就象和他们很相似的犹太人一样，他们退而过着那种犹太小街上的生活；可以作为他们的安慰的，只是刻苦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肥胖的叙利亚妻子，以及他们经常在做着的美梦：在杉树林里或远在地中海边有一所别墅。

白人和克里奥尔人都怨恨新来的叙利亚人。但他们之间也有分道扬镳的趋向。疟疾是由疟蚊传染的这一发现，推动着欧洲人搬到蚊子很少的高地去居住；但，促使他们建设一个山上住宅区的，除了卫生方面的动机之外，还有种族关系上的动机。住宅区位于威尔伯福斯山上高八百呎的地方。到 1910 年时，白人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迁

到这个建筑了有凉台的平房的殖民地里去居住。这是一个对克里奥尔人和叙利亚居民显然都不开放的地方。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过去常常把积蓄投资在地产上，现在英国房客一走，他们的房租收入也就完蛋了。正如通往博城的铁路是克里奥尔人经济衰落的象征一样，在1904年通车的山上住宅区铁路，也标志着他们的社会权利的终结。每天早晨8时30分，火车从山上住宅区开出；火车上，前面是总督和他的高级僚属，其余的白人官吏和商人则按照地位高低尾随于后。他们每天下午3时30分，又从镇上回到适意而凉快的山上去。铁路的终点站就建立在镇上那棵巨大的棉树旁边，一百多年以前，来自新斯科舍的移民，就是在这棉树荫下宣告他们的独立的。

由于这个殖民地发展得更健全了，因此就有更多的欧洲人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带来，和他们一起住在山上住宅区。正如在英属印度的情形一样，这些妇女比男人更不愿意在社会上和土著交往。尽管已经有了一条五哩长的铁路把双方分隔开来，但欧洲人却还要设法扩大对有色人种的隔离程度。他们设立了一所专供欧洲人用的医院。

他们的俱乐部和唯一的一家旅馆是不欢迎克里奥尔人的。奥尔里奇写文章赞扬那家新的“欧洲制冰公司”，在他的心目中，仿佛只有欧洲人才希望吃到新鲜的食物和冷饮似的。在讲到或写到克里奥尔人时，欧洲人的语调中增添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塞拉勒窝内的主教在1911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福拉湾〔学院〕这个学期的情况很好，我很喜欢这些人的外貌。星期六我参加他们一边打木板球，对方是海关人员——土著。在结束时发生了一点小纠纷，因而我不得不插手干预。他们真象是小孩子，他们是很顺从的。最后他们输了两分，却输得很高兴。纠纷实际上是裁判员和对方之间的问题。”

二十世纪的总督们都继承了卡迪尤的政策，政府中比较负责的工作，都不派克里奥尔人而派白人担任。特别是在保护地范围内，这种政策执行得更其严格；在那里，克里奥尔人老是受到怀疑，因此不论他们有多么动人的资历，最多也只能得到一个办事员之类的工作而已。即使是在弗里敦，相当低级的职位如海关的副稽查等，也都派给了欧洲人，而这些工作过去一向都是由克里奥尔

人担任的。有一个名叫菲利普·伦伯格的欧洲人，曾在1900年和1907年两次当选为弗里敦的市长，尽管他也受到一些克里奥尔选民的欢迎，但他的当选，却是当时那种倾向的典型。

有时候英国人为自己这种种族歧视辩解，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克里奥尔人适于担任这些工作。但他们偶尔也会暴露出明明白白的种族偏见。例如在1909年，殖民大臣就曾规定：在最近成立的西非医疗队中不准有有色人种的医生参加工作。提出这项建议的委员会不相信

西非土著医生的业务能力是能够和欧洲人医生匹敌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也不相信他们能够获得沿海一带的欧洲病员的信任。由于社会情况的关系——特别象在尼日利亚南部，那里的欧洲人官员都是住在一起，在“会食”制度下吃同样的伙食的；还有在尼日利亚北部，那里的欧洲人官员大部分都是正规军的军官——由于这些关系，要在保护地里用土人作医官，那是极不受人欢迎的。

把话说得露骨一些，就是英国的官员拒绝“该死的黑鬼来参加他们一伙。”

克里奥尔人感到非常愤怒，而这种愤怒是有

道理的。在十九世纪，有二十个克里奥尔人是从英国的医学院毕业的。克里奥尔人詹姆斯·艾弗里卡纳斯·霍顿医生，不但在军队中当过二十年军医，而且还就怎样在非洲保持健康的问题写过一本书，这是早期出版的最好的作品之一。西印度军队中一位有色人种的医生，甚至还在这个殖民地上担任过一年总督，得到了白人的普遍赞扬。在1909年，克里奥尔人已经懂得，在禁止有色人医生这一决定的背后，实际上是种族偏见在作祟。他们正确地将这一情况，同对于克里奥尔律师以及公务人员中的克里奥尔毕业生的日益增长的敌意，作了比较。

难道这不是非常可悲的事吗〔《塞拉勒窝内新闻周刊》这样痛哭流涕地写道〕：在所有的统治者中，偏偏就是英国的统治者要在西非洲创立这种压制土著的政策，而他们对这种政策又找不到有说服力的、充分的、合理的理由，除了可能有下面这样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就是说，作为主人，只有他们才能够享受这个国家里的从来不是由他们所创造的好东西。……我们不愿意听到：白人就是要用目前这种态度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不得不如此，我们将感到极为伤心。

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采取了公正的做法，我们的祖先获得了一种信念；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古老的信念——这就是：白人，不，英国人体现了最好的良心，体现了正义，体现了怜悯、公正和仁慈。时代在改变，由于生活的紧迫，如此的咄咄逼人，我们不准备为白人的一些不太仁慈的表现而和他们争吵。可是，对英国人来说，如果正义不是不能实现的话，难道正义竟然是越来越难于实现了吗？

在商业和职业上受到了挫败之后，许多克里奥尔人参加了类似政党的组织——纳税人协会。为了保护克里奥尔人在职业中的利益，还组织了公务人员协会和律师协会。十九世纪时，克里奥尔人上层社会的名流是由商人来充当领导的，但自从“茅屋税战争”以及英国大商业的入侵以后，克里奥尔人所从事的事业就转到法律界和政府方面去了。他们的政党不是反政府的，当然也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而是一种反抗种族歧视的“压力集团”。

克里斯托弗·法伊夫曾经作过这样的估计：1892年，在政府的大约四十个高级职位中，克里奥尔人占有十八个；但是到了1912年，在九十二

个高级职位中只占了十五个。对克里奥尔人的歧视，在保护地中表现得甚至更为明显；在那里，英国人宁愿雇佣比较驯服而文化程度不太高的部落社会中的人。即使是在弗里敦的警察中，从保护地招募来的人也在不断地增加。克里奥尔人的报纸谴责英国人是在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在挑拨保护地来反对殖民地。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许多白人行政官眼中，野蛮的、好战的部落居民比爱找麻烦的、喜欢挑剔的城镇居民更好，这种情况不仅是在非洲，而且在英属的亚洲领土中也是一样的。英国的官员们敬重“巴丹人，头等的家伙”，而藐视孟买、加尔各答或弗里敦的政治家和“打字员”。这种态度就表现于卢加德对尼日利亚所实行的通过酋长来“间接统治”的政策中。英国人怂恿北方的酋长和王子们让自己的部落居民保持那种传统的封建的无知状态；而南方的伊博人和约鲁巴人，在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却热心地要学白人的那一套。英国人的这种挑拨南北关系同时又硬要把他们结合成为一个联邦的政策，结果终于造成了那次可怕的悲剧——“比夫拉战争”。

“间接统治”的理论在创办博城学校的《发起书》中表达得非常坦率。这所学校是为了教育保护地酋长们的儿子和继承人，由普罗宾总督于1905年创立的。那位傲慢的首任校长詹姆斯·普劳德富特这样写道：“把这所学校设在保护地里，可使学生们离原来的环境不致太远，从而防止严重和有害的影响。”他接下去说明，这种“有害的”影响，就是指克里奥尔人的习惯和榜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弗里敦受教育的学生回到家乡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对他们老家的城镇、甚至对他们最亲近的亲属，都抱着一种藐视的心情。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要求所有的土著教员和学生都要穿乡间的衣服；除了在学校里上课的时间以外，他们必须在小镇上过生活，这种小镇的政府应该按照土著通常所采用的方式来管理。”

博城学校的教育重点，是以耕种为主的实用技术和理论科目，两者并重。它教给学生们说，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在拼写“劳动”一词时，必须以大写的“L”开头^①。过去充当传教士的普劳德

^① 英语“劳动”一词的拼法是“labour”，如果不是位于一句中的第一个字，开头的字母不必大写。——译者

富特在他所草拟的《发起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有关道德品质的教育，诸如习惯、诚实、工作、自我克制等等，还说明了懒惰、诽谤以及缺乏自我克制的危险性。《发起书》中指明了这所学校准备造就的是哪一种样子的人：他应该勤快，高贵，朴实，刻苦工作；不卖弄聪明，衷心地尊敬自己的部落和乡土。《发起书》中还指明这所学校不希望把学生教育成这样一种人：懒惰，喜爱穿戴，忘恩负义，说谎，诽谤别人，不喜欢农业——一句话，这就是伯顿、里德以及他们后来的许多弟子所作的讽刺画中表现出来的克里奥尔人。因为克里奥尔人是效颦英国人的，所以必须教导博城学校中的孩子们为自己的非洲部落的传统而感到自豪。《发起书》中说：“对门迪学生必须进行这样的教育，即要让他们感到门迪族的乡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对学校里来自泰姆奈族或其他各种部落的学生，也将同样地进行这种教育。”这种理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终于实现了：独立的塞拉勒窝内的政治家们（很多是博城学校教育出来的）各自为门迪族或泰姆奈族去抢夺政府中的职位，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对于非洲这种分裂的情况，

最近以来英国政府曾如此一本正经地表示慨叹；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大部分都是“间接统治”和愚蠢地鼓励部族主义的产物。

博城学校里的孩子们得到允许，可以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但普罗宾总督知道这些学生多数来自穆斯林家庭，因而坚持要增加一些专门的课程来培养他们对妇女的尊敬。《发起书》中设计了一套幻灯课程，专门解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①、伊丽莎白·弗赖伊^②以及故维多利亚女王等的生平主要事迹。在弗里敦一次集会上决定的一份请愿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建议，主张这些学生应该学习赫蒂彻^③、法蒂玛^④、圣母玛利亚^⑤和法老的妻子阿西亚^⑥的生平事迹，这是穆罕默德指名的四位女性完人。

①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1860年在伦敦创办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译者

② 伊丽莎白·弗赖伊(1780—1845)，英国教友派教徒，提倡“改良监狱”。——译者

③ 穆罕默德的妻子。——译者

④ 穆罕默德心爱的女儿。——译者

⑤ 即耶稣的母亲。——译者

⑥ 据《古兰经》所载，是愿意脱离法老而信奉真主的一位女性。——译者

克里奥尔人的尊严受到伤害时，也没有从爱德华·布莱登那里得到安慰。布莱登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是在这个殖民地上度过的；他的固执和坏脾气一如既往，他嘲笑克里奥尔人把自己假装作英国人，他还慨叹外国文化在非洲人身上产生的影响——人们禁不住要想，他是把自己除外的。布莱登死于1912年，在这之前的五年，他在《塞拉勒窝内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连串文章。克里奥尔人在这些文章中发现，这次嘲笑他们的不是伯顿、里德或一些无礼的英国新闻记者，而是非洲最伟大的作家。

塞拉勒窝内抱着爱国热情迎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参战之前的几天里，保护地的四周流传着有关“战争谈判”的谣言，许多后备兵都跑到达律的司令部去了。皇家西非边防部队的塞拉勒窝内营，没有赶上参加闪电般的多哥战役，只是帮助把德国人从喀麦隆赶了出去。失业和对军事的热心，说明了为什么有数以千计的塞拉勒窝内人到东非和中东去当搬运夫。在战争的年头里，弗里敦成了重要的海军基地，酒的销售量增加了一倍，其他方面的经济则受到了损害。过去，殖民

地的大部分出口和几乎全部棕榈仁的出口，都是供应德国市场的；而现在，这方面的贸易当然是被切断了。战时海运的缺乏和危险，抬高了航运的费用，造成了通货膨胀。曼彻斯特棉花价格飞涨，以致保护地的妇女们都重新改穿土布衣服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进一步增强了殖民地里英国大公司的力量。由于德国船只的退出，埃尔德一登普斯特轮船公司获得了航运的独占地位，并且由此而获得了对产品的独占地位。商会对本地的棕榈仁和棕榈油规定了收购价格，但是尽管在理论上别人有自由可以提出比独占价格更高的收购价格，但那些掌握着独占地位的人们仍旧可以唆使码头工人对别人的货物进行敲诈，或使用其他更蛮横的办法来制服一个敢于较量的对手。由于没有外国的竞争者，英国的批发商就利用战争的机会变本加厉地压榨非洲的中间商。他们停止按批发价格对克里奥尔人发货，还雇佣了自己的“售货女郎”，以更低的售价去和对手竞争。非洲人被赶出了一个世纪多以来曾经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商业圈子，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愤怒针对着罪恶的英国人，而是去向软弱的、比他们更脆弱的叙利

亚人发泄。1919年发生了野蛮的暴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塞拉勒窝内是一个不幸的、被遗忘了的殖民地。英国的资本和才智出众的人士都被吸引到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去了。塞拉勒窝内太小了，不能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只得仍旧依靠农产品以及后来的铁矿石和钻石的出口。当然，进步的迹象也是有一些的。1924年颁布了新的宪法，使这块殖民地走上了自治以至终于独立的道路。1927年，弗里敦的街道和屋子里有了电灯。殖民地里有了一个由政府雇用的专职的童子军团团长。在三十年代里，弗里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和一条经过冈比亚通达大不列颠的航空线，同世界各地连接起来。汽车的普遍使用，使得山上住宅区的铁路交通也在1929年停止了；这条铁路已经使用了二十五年，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尽管如此，外界的人们对这个殖民地还是有批评的。一个调查弗里敦市政的调查委员会，在1926年的报告中说：“市议会对这个城市提供的服务甚至缺乏中等的效率。”它把市场和屠宰场归入了令人极为不满的一类；公共墓地没有很好管理，消防队并不能真正防范火灾。美国作家雷蒙

德·布埃耳认为塞拉勒窝内还不如利比里亚。“不管利比里亚的行政有怎样的缺点，可是人们在那里找不到象塞拉勒窝内那样的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隔开来的鸿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克里奥尔人对英国人以及保护地酋长们，进行了一场顽强的但是失败的斗争。在1924年的宪法问题上，他们进行了第一次顽强的对抗。这个宪法使保护地的议员在立法会议中获得了与克里奥尔议员同等的发言权。克里奥尔人声称：作为受过教育而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人，他们能够为落后的、无知的土人的利益而制定法律。但来自保护地的政治领袖们则希望在立法会议中有自己的发言权，以便反映他们那些不发达地区的要求。他们声辩说，既然保护地人民一样付税，那末，作为代表的酋长们应该对这些钱的使用有发言权，这才是公平的事情。

克里奥尔人为自己的争辩是典型的迂腐拘泥之谈。他们声称：保护地的人民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来为英国人制定法律。有一个克里奥尔人的发言人肖伦凯赫-索耶建议这样来解决问题：即让这些外国人都变成英国的臣民，于是

(至少他私下是这样想的)，就可以把整个保护地置于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的手掌之中了。他和其他的克里奥尔人领袖们，在讲到保护地的人民时，都带有一种轻蔑的口吻。当 1923 年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把歇尔布罗岛上的克里奥尔人警察调到东南地区去时，肖伦凯赫-索耶就抱怨说，让这些新的法警来代替克里奥尔人法警去逮捕人，那是对“高尚的人”和“有地位的人”的侮辱。这些优越感刺伤了来自保护地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人，他们指责：克里奥尔人是想使他们永久处于落后的状态。

为什么对保护地土著的全面教育受到了忽视？〔保护地的一个政党在它的一份宣言中这样问〕。如果殖民地的非洲人，真的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同宗弟兄，而且还期望他们在有关整个塞拉勒窝内幸福的事业中和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话……只有等这些都已完成之后，等到保护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和殖民地同步前进时，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塞拉勒窝内才会出现新时代的曙光。

尽管克里奥尔人埋怨他们在政府中的权力日益缩小，但如果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非洲人比较起来，他们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在当时的肯尼亚，

由于议会中要吸收一名印度人，竟引起了白人居民的暴乱；黑人政治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克里奥尔人的权力，比当时的、甚至现在的罗得西亚的非洲人还要大得多。他们的痛苦是一个自负的人突然被迫降于从属地位的那种痛苦。

然后你必将体会到吃人家的面包
心里是如何辛酸，在人家的楼梯上
上去下来，走的时候是多么艰难。①

塞拉勒窝内的代表在英属西非国民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机构建立于1920年，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权力，并反对欧洲各帝国瓜分非洲。他们的第一份请愿书是十足的效忠书，它纪录了“他们对英王皇帝陛下本人和王权的真挚的忠诚”，并宣告他们希望“永远保持……英属西非各保护地和英帝国的联系”。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看到的那样，当大部分西非洲人渴求独立时，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却证明他们是效忠英国的。可是，到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们却又玩弄起激进的概念来了。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见但丁《神曲·天堂篇》第17歌。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中译本。——译者

绝大部分克里奥尔人，尽管他们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却支持了1926年铁路工人的罢工。一个受惊的英国官员，对这种“不应有的行为”感到十分不快，竟要把这些被选出来的克里奥尔分子从立法会议中开除出去。可是总督却认为这有点儿太过份了。

据我看来〔他在给殖民大臣的报告中写道〕，他们是立法会议成员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减弱而不是加重象班科耳-布赖特博士和贝澳库-贝茨先生那一类煽动家所能够造成而且无疑地在实际上已经造成的损害。确实，他们作为一个议员的责任心是低得令人苦恼的，可是难得也还有所表现。……据我判断，把不到两年前才由人民选出来的议员从立法会议中撵出去，这正足以造成他们作为牺牲者的地位，反而增加了他们作乱的力量，远不如继续忍受一下，让他们留在立法会议里的好。……这势必将使不幸地经常存在于塞拉勒窝内殖民地的违法捣乱分子转入地下，因而严重地增强了这些分子的危险性。……同时……前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也为政府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大大地放慢行政工作非洲人化的步伐。

这个惩罚是无情的，同时也是愚蠢的。在克

里奥尔人一度掌权的政府里歧视克里奥尔人，这只会引起他们的怨恨；这种怨恨曾经驱使他们去支持工人罢工。更多的歧视也只会造成他们更大的怨恨。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里，很多克里奥尔人都支持一个头脑发热的青年新闻记者，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人民大学读过书。艾萨克·西奥菲勒斯·阿库纳·沃利斯-约翰逊(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一个克里奥尔人)创建了一个“西非青年联盟”，支持这个组织的都是弗里敦的工人。1938年，他被选进了立法会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18B 条例”他被捕入狱。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和保护地的土著之间，很少有明显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找工作，或者为好奇心所驱使，从保护地到弗里敦来。清真寺建立起来了，也不再有人嘲笑穿着内陆服装的穆斯林了。双方受过教育的人互通婚姻，有时还为了促进在思想上的相互了解而努力。在十九世纪时，保护地的人民曾给自己起了克里奥尔人的名字（往往都是双重的姓）；而现在，克里奥尔人有时也给自己换个非洲人的名字，以此来表明自己和土著的

同胞之谊。但更为普遍的是保护地的人民模仿克里奥尔人讲话的方法和风度；一旦熟练以后，他们往往就把自己称作克里奥尔人。在1924年宪法诞生前进行辩论时，人们纷纷预言，认为克里奥尔人和内陆酋长之间的争吵，将会破坏议会大厅的平静的礼仪。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月里，这种危险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克里奥尔人对他们的自己人倒确实使用了粗暴的语言。例如，保守党的班科耳-布赖特在提到社会主义者沃利斯-约翰逊的信徒时，就把他们说成是“无赖”和“乌合之众”。

克里奥尔人最初把自己的逐渐衰落归罪于叙利亚人的竞争，他们对英国人仍旧是信任的。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种信任就已开始减退了。他们开始把自己权力的衰落不但归罪于英国官员的贪婪，而且归罪于英国大商家在经济上的竞争。律师E·S·贝澳库-贝茨谴责英国政府从种族歧视出发，关闭了克里奥尔人的工厂。他谈到了这样一个案件：“已故的D·B·柯里是制造各种本地食品的，他也冒着风险制造巧克力，以每块一便士的价格在本地出售。这件事竟然也惊动了象凯

德伯里那样的一家英国大公司。它派了一些代表到这里来调查柯里在做什么，然后根据代表们的报告也开始制造巧克力，并以每块半便士的价格投入这里的市场出售。我们怎么能和百万资财的大商家竞争呀？”巧克力、肥皂、人造奶油以及棉织品的服装，都是以西非出产的原料制造的；可是几乎在这海岸上的任何地方，人们都是从英国厂家购买这些成品的。贝澳库-贝茨以及其他克里奥尔人的领袖们对英国人感到愤怒，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第二次的通货膨胀和贸易衰落。由于塞拉勒窝内位于非洲最靠近南美洲的地方，因而它的近海地区也就成了德国潜艇横行的范围，它们企图击沉那些来往于大西洋南部与北部之间的盟国船舰。英国海军担心德国可能派遣间谍到弗里敦来，把船舰的活动情况报告给潜水艇的舰长，因而英国的反间谍机关“M.I.S.”也选派了一个临时谍报人员到弗里敦来负责这个殖民地的安全工作。这一段时期，也就是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问题的中心》的背景。这无疑是一本有关塞拉勒窝内的最好的作品，也是我所知

道的以非洲为背景的一部最好的长篇小说^①。格林曾于1934年在弗里敦稍事逗留，为他到利比里亚北部的长途旅行补充一些粮食和雇用几个挑夫，他在《不带地图的旅行》这本游记中记载的也就是这次旅行。他对战前的弗里敦的描写是挖苦性的，而且带有伯顿那种旧偏见的痕迹。正如每一个访问者一样，他对那些盖满树木的小山所构成的背景也表示赞美，但他却又认为这

并不能掩盖市镇本身的破烂面貌。……弗里敦有一种布雷特·哈特^②的作品里所描写的气氛，只是缺少了刺激，酒吧，左轮的枪声或马匹。……这是一个英国式的都城。英国人建立了这个城市，留下一些铁皮小屋和停战纪念日的招贴，自己却退居到山上那些有凉台的漂亮平房里去了，那里有的是宽敞的窗户、电扇和齐全的设备。……他们移殖了他们那种破烂的文化，然后自己则尽量地远而避之。在弗里敦，一切丑恶的东西都是欧洲式的。……

① 康拉德*的杰作《黑暗的中心》，实际上只是一篇较长的短篇小说。

* 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译者

② 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作品颇多描写美国西部的早期生活。——译者

格林以带着怜悯心的幽默感来看待克里奥尔人——包括他们的华丽的语言，他们的制服，他们的双重的姓，“他们的选票和市议会，他们那幻影一般的所谓自治。上级要他们象白人一样起作用，可是他们越是模仿白人，在上级的眼睛里就越觉得好笑”。

格林虽然了解克里奥尔人“已经受到教训，知道自己是怎样受骗的”，但他并不了解克里奥尔人在被骗以前，即当他们不仅仅是只有“幻影一般的所谓自治”的时候，英国人并不是都把他們看作荒唐可笑的。格林对克里奥尔人的一些评论是卑俗的，甚至是陈腐的，不合他的一贯作风。他写道：“如果这都是不真实的，只是对英国人的殖民方式的一种虚构的讽刺的话，那就更有趣了。可是日子一长，人们就不会觉得克里奥尔人那种竭力想模仿白人的企图是好笑的了，这有些象是猩猩的茶会，笑话全出在一边。”克里奥尔作家戴维森·尼科尔对格林这种反克里奥尔人的评论，曾经作过有意义的深刻观察：

格林在他的小说和笔记中对有教养的非洲人并无特别的感情。但他在欧洲时的个人生活中却并不如此，

他是善于和人结交出名的，不论对方是什么种族和肤色，他都能愉快地相处。这一事实表现在象他这样一个造诣很深而又诚实的作家身上，那就足以使人怀疑：那些进步的非洲人或有教养的非洲人是否确实是不可爱的人。我的公平的意见是，他可能还是不脱殖民主义的窠臼。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在欧洲人面前是靠不住的，而欧洲人又促使他变得更加不可靠。他的反应不正常，就象是一个受了惊的人一样。他的表现是，要么卑屈，要么轻率；不是虚伪，就是油滑。他自己知道，由于他所穿的衬衫、打的领带，由于他那烫过的裤子、廉价的鞋子，由于他的自来水笔以至他那神经质的汗水的臭味，不等他开口，就已受到人们的谴责了。

格林在1946年为《不带地图的旅行》写第二版序言的时候，就曾带着遗憾的心情回忆到过去对弗里敦使用过的一些不好的字眼；因为弗里敦现在已是他的住家之一，他一年四季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在塞拉勒窝内住了一年之后，他已经渐渐看出了，在他自己身上就有着他过去指责别人的那种惰性。格林在1946年说：“如果我现在要写弗里敦的话，这将是一幅多么不自然的玫瑰色的图画，因为我开始回忆到的主要是日落西山

时的景象：红土的小路上突然有几分钟变成了玫瑰的颜色；那座古老的奴隶贩子的堡垒和大炮一起躺在青草里，废弃的铁路线上空荡荡的小车站，小鸡就在那里进进出出地啄食，还有在六点钟时尝到的第一杯淡红色的杜松子酒的滋味。”

就在写那篇序言差不多的时候，格林已经开始在写《问题的中心》了。这本书决不是弗里敦的“玫瑰色的图画”。格林有许多书是以诸如西贡、哈瓦那、太子港等惨淡的、肮脏的城市作背景的。批评家开玩笑地把这些地方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总称为“格林兰”。《问题的中心》中所描写的弗里敦甚至比“格林兰”还可怕得多。

在《问题的中心》里，对弗里敦的描写，就象一些早期的游记里所描写的那样，一句好话也没有。格林已被弗里敦的自然生活吸引到了着迷的地步。“这儿只有兀鹰——麇集在路边一只死鸡的周围，把瘦长的项颈朝着尸体俯伸过去，它们的翅膀就象破雨伞似的，羽毛东戳出一根西戳出一根……”，“他们呆坐在空洞洞的屋子里，听着兀鹰在铁皮屋顶上爬来爬去”；“……惊动了一只耗子，它原来蹲在冰冷的浴缸边上，就象蹲在墓碑上的一

只猫……”；“一只死了的野狗躺在水沟里，雨水冲刷着它那胀大了的白色的肚子……”；“墙上，蜥蜴猛扑过去，它那小爪抓紧了一只飞蛾。有什么东西在门外扒扒——一只野狗？”“……一只耗子在浴室里走动，每当一只迟回来的兀鹰落在房顶上过夜，铁皮的屋顶就往下凹陷一次。”

小说的主人翁斯科比是“土里土气的殖民地里的一个微贱的警察”，他想升级而没有被批准，因为传说他曾和黑人姑娘睡觉，并从叙利亚人那里收受过贿赂。除了这个和善、聪明的斯科比之外，小说中的白人多数是极不可爱的。威尔逊是一个特务，他正在监视侦查斯科比，还想勾引他的妻子；他是一个心怀嫉妒的势利小人，不敢对人讲他爱诗，因为害怕人家会把他看作自高自大。白人的社会已经由于种族优越感而非常孤立，再加上相互之间的嫉妒和谗谤，又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些白人厌烦，思家，孤独，酗酒；他们痛恨这个城市，痛恨非洲，痛恨非洲人。只有斯科比是喜欢这个国家的，可是他最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觉得“它的傍晚是美丽的。”

小说中出现的非洲人绝大部分都是警察和告

状的人——前者收受贿赂，后者喜欢争吵。特别是那些妇女，“她们竟会在白人的后院里静静地坐上一整天，为的是要乞讨一些白人所无权同意给予的东西；她们有时又会在一家店铺里为了和邻居争先买东西而尖叫，殴打，辱骂。”只有斯科比的僮仆（一个门迪人）是真正忠心和诚实的，但也正由于如此，按照悲剧的逻辑，他遭到了暗杀。

在格林早期的作品中被讥讽挖苦的克里奥尔人，在这一本小说里却只略略提了一下，后来就把他们说成是西印度人了。“‘他们不是真正的黑鬼’，”有一个英国人这样说，“‘不过是西印度人罢了，而他们竟来管理这海岸。商店和市议会里的职员，法官，律师——我的老天爷！如果是在保护地里，那也就算了。我对真正的黑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些人——我的老天爷！英国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害怕他们……’。”格林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克里奥尔人，但是他们在这本书里充当的角色是无论如何不能和他们在弗里敦实际充当的角色相比的。

塞拉勒窝内人对格林居然能为他们的国家写一本书是感到骄傲的，但对这本书的效果却并不

感到太高兴。普遍的意见是，格林把可怕的事情描写得过火了；味道是对路的，但是把酒酿制得太强烈了。当格林前来协助摄制电影时，有些见到过他的英国人都感到疑惑不解：这样糟糕的一本书的作者，竟会是一个如此和蔼可亲的人；用一个收税官的原话来说：他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在喝酒时说说笑笑而已”。显然，塞拉勒窝内决不象《问题的中心》所说的那样丑恶不堪。非洲的女人不但爱闲谈，而且也爱笑和唱歌；白人并不完全是那样互相谗谤，叙利亚人也不见得如此贪婪；除了耗子、野狗、兀鹰和蟑螂之外，其他动物也有的是。小说的主人翁斯科比有过这样一段冥想，它说明了格林何以如此强调邪恶和下贱的东西：“他一边把车子绕过一条死了的野狗，一边在心里想：我为什么这么喜爱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因为人类的天性在这里还没有来得及伪装自己呢？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谈谈地球上的天堂。天堂严格地存在于原来的地方——一个人死后所去的地方。在我们这里，盛行的是不义，残酷，下贱，而所有这些，别处的人们都是聪明地把它们遮掩起来的。”道学家格林已被这样一部分世界吸引住了，

这部分世界，最清楚地反映了他对人类的现状的悲观思想。正如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一样，《问题的中心》把一场个人的悲剧安置在一个悲惨的、痛苦的大陆的背景里，这种情调以至这本书的书名，都表明了作者对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的共鸣。格林懂得康拉德所说的“丑恶的魅力”是怎么回事。

塞拉勒窝内有些政治家现在在谈论他们的独立“斗争”。事实上，走向自治的首要的动力是来自伦敦而不是来自弗里敦。1945年选出来的工党政府相信：当时还很庞大的英帝国的属地走向独立是有利的。1947年强行通过的塞拉勒窝内新宪法并没有在殖民地引起任何激动。当时保护地里的政治觉悟还很低，而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却害怕独立之后会使自己受到保护地酋长们的控制。有一批克里奥尔人于1948年向伦敦递送了一份请愿书，抗议在新宪法中把新的权力交给了“外国人”（指保护地人民）。在1950年的另一份请愿书中，又重申了克里奥尔人对英国的决死的忠诚：

在塞拉勒窝内国民议会保护下的塞拉勒窝内殖民地

居民谨以此请愿书表明：

陛下 的请愿人乃是英国的臣民，乃是早期移民、新斯科舍人、马隆人以及获释非洲人的子孙；正是为了他们，才于 1788 年建立了本殖民地（下称议会）；

2 议会谨借此机会表示他们对陛下本人和王权的忠心、热诚和从属关系。

3 作为西非洲各殖民地的母亲，塞拉勒窝内地非常可贵的大西洋海岸，它的历史具有其他殖民地所无法比拟的传奇性；自从它的编年史上最初始的日子开始，它经历了许多的兴衰和不幸的官方措施……

当时英国政府正面临着动荡的帝国各处纷纷传来的独立要求，因而在看到克里奥尔人这种希望继续做英国臣民的愿望时，当然是会受到感动和安慰的。可是历史却和这些请愿人作对。保护地里的政治家们对克里奥尔人的这种骄傲表示藐视；他们的领袖米尔顿·马尔盖博士有一次勃然大怒地说：“我们的祖先竟会收留这一小撮外国人”，他感到十分遗憾。在 1950 年的晚些时候，一个克里奥尔发言人奥托·杜林，在一篇使对方感到难受的演讲中对此作了回答：

我对一个口称我们要互相合作的人在议会中发表的这篇演说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他还说，我们殖民地

是在仿效西方的文明。……我们的祖先从非洲的这块土地上被带走后，度过了许许多多年的奴隶生活；他们在这种奴隶生活中接触了西方文明，并把它传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不遵守祖先传给我们的遗教，那末，我们就倒霉了。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联合王国去接受教育，而他们回来后，却仍旧蹲在地上用肮脏的手指从钵和瓢中取食，周围还有一群女人在看着他们，那末，我们就倒霉了。

对保护地生活方式的诸如此类的恶意的讽刺，总是和对已往历史的大事标榜交替进行的。克里奥尔人班科耳-布赖特在 1952 年说：塞拉勒窝内政府

以自己的行动在这个殖民地和这个保护地的人民之间造成了一条裂痕。它取消了制约着英国法律和秩序的道德原则，而企图通过立法的道路来设立一个违反宪法的、由保护地人民的多数来控制的行政立法会议。这些保护地人民并非英国的臣民，他们对 1788 年这一殖民地建立时所奠定的基本原则是抱有敌意的……

代表博城的议员、尊敬的 R·B·S·科克尔，对这一论点作了讥讽性的回答：“1788 年的条约或协定里载明，自由的移民将接受纳因巴纳王的保

护；如果他们希望由自己来管理自己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现在处于保护之下居住着的土地交还给它原来的主人。然后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到甘蔗种植园里去寻求庇护。……”这些提醒克里奥尔人，指出他们是奴隶的子孙的话，在保护地里很受欢迎；那里的奴隶，在传统上都是犯罪分子，是受到蔑视的。

在 1961 年塞拉勒窝内获得独立之前的年月里，米尔顿·马尔盖爵士的塞拉勒窝内人民党常常流露出反克里奥尔人的情绪，想借此来争取保护地的支持。可是，在殖民地里，塞拉勒窝内人民党却是呼吁团结的，甚至它的候选人一般也是从克里奥尔人中挑选的。自从上面提到的那次反克里奥尔人的勃然大怒以后，米尔顿·马尔盖爵士本人常常渴望使克里奥尔人的恐惧平静下去，以便求得协调。同如此软弱的对手进行和解，他也是能够做到的。各个部落的非洲土著，在人数上以一百对一的比例胜过了二万五千克里奥尔人，何况克里奥尔人内部又因政治见解不同而发生了分裂。象班科耳-布赖特这样的保守派是主张向伦敦请愿并对 1788 年条约有所议论的；而许多比

较年轻的克里奥尔人，却希望和保护地人民协调一致。他们中有些人加入了塞拉勒窝内人民党，给自己起了非洲人的名字；因此克里奥尔人和保护地知名人士也就越来越难以区别了。他们一起在福拉湾学院读书，居住在弗里敦的同一个地区，一起工作而且还互相通婚。克里奥尔人的新一代对古老的移民神话感到厌烦了，宁可参加当时以恩克鲁玛的加纳为象征的新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正如大多数的西非洲人民一样，克里奥尔人尽管对英国仍旧表示同情和好意，但是已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英国的移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曾经使克里奥尔人出了名的对基督教的虔诚也衰退了。克里奥尔人的自负心不但令人为难而且也是不恰当的了。现在最重大的问题也就是其他西非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诸如酋长和新的上层分子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问题，农民流入城市的问题，失业以及政府贪污的问题等等。1961年独立以后，新宪法完全结束了以克里奥尔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实体的状况，从而使殖民地和保护地之间的旧的差别一扫而光。各个政党都分别集中到门迪族和泰姆奈族的周围，而克里奥尔人

则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旁观态度。

塞拉勒窝内，这个“白人坟”，曾经一度吸引人们为它花费过多少笔墨，对它进行了讨论、赞扬以至谩骂；而现在，它终于衰落到默默无闻了。1967年的风波使它的声誉又闪烁出一瞬的火花，当时，军人和政治家们（多数是有着双重姓的）进行了一场含糊不清和可笑的争论。可是，乘着飞机在非洲到处来往的外国生意人，却很少有人想在塞拉勒窝内停留一下，也很少有作家或新闻记者觉得它是值得他们注意的地方。伊恩·弗莱明曾试图借助于钻石走私者来激动人心，可是他的企图也毫无效果。埃尔斯佩思·赫克斯利曾把塞拉勒窝内包括在他所写的一本西非旅行记中，当然，他对这里的风景表示赞赏，对农业的缺乏则表示遗憾。有一张照片拍了一个坐在网轿里的人，标题却几乎完全是伯顿的笔法：“塞拉勒窝内最得意的姿态”。

第二章

在整个非洲，
杜伯曼是一颗闪亮的明星。
利比里亚的未来将会永远欢乐，
只要杜伯曼总统干得称心。

(引自1967年利比里亚电台播送的一段
即兴诗)

欧洲的殖民国家不喜欢利比里亚和费尔斯通订立的协定。这个协定不但使美国挤进了一向被欧洲人视为禁脔的大陆，而且，让一家美国公司来生产橡胶，就是对欧洲人的独占利益的一个打击。在这一出可悲的、也有些喜剧性的丑剧中，帝国主义的嫉妒心起了一部分的作用，丑剧震撼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利比里亚。从1929年直到1934年，这个由获释奴隶建立起来的利比里亚受到了国际联盟以及世界报刊和公众舆论的谴责，说它在国内容忍奴隶制度并将年轻人卖到外国去进行

强迫劳动。这是利比里亚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新闻中；今天，没有一个利比里亚人希望这种新闻会再一次出现。

直到最近，西海岸的大部分市镇里还传说着内陆的奴隶制度。在非洲这一地区里，普遍存在着学徒制度以及更严重的抵押劳工；不论欧洲人是怎样看法，大部分非洲人是认为可以接受的。引起更为严重的谴责的另一情况是：从西非的某一地区招募年轻人，把他们送到海岸一带去做工。利比里亚一直就是这种劳工的主要来源，例如克鲁鲁人（通常称为克鲁曼）就是来自海岸上的这一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充当西非轮船公司的海员、甲板水手或搬运夫。有些克鲁人和来自其他利比里亚部落的邻人，都与人订立合同，到法属加蓬去当伐木工，或到黄金海岸去当可可采摘工，尤其突出的是到比夫拉湾里那个西班牙小岛斐南多波去做工。

斐南多波的名声极坏。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任英国驻斐南多波领事理查德·伯顿爵士，对于难以招募人员到那里去做工的问题评论说：“在克鲁曼的心目中，‘波奶奶’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他

们奉命在园子里和马路上工作，他们埋怨说：‘puoco comer mucho trabajo’^①——我后来发现这是说谎。其中有些人原来约定的时间是一年（不是两年），但是使他们的妈妈感到非常忧虑并使他们自己一直感到怨恨的是，竟把他们留在这里达三年之久——这是一般的时间。”不过，正如伯顿第一个提出的异议：斐南多波是个热病窝，许多非洲人也和白人一样，只在这里呆了一两年就死了。一个更有名望的历史学家说：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利比里亚工人在斐南多波传染上了肺病和花柳病，后来他们又把这些疾病在利比里亚传染开了。

有些充当西班牙领事的利比里亚人在招募这种劳工，他们每招募到一个劳工就抽取一笔佣金。这些劳工从斐南多波回来时，必须把一张载明他们的工资余额的凭单交给领事，而不老实的领事（毫无疑问，这种人是很多的）就会用种种编造出来的借口，把这些余额吃掉一部或全部。英国的临时代办于1923年从蒙罗维亚写回去的报告中说：“人们之所以不愿意到那里去，倒不是由于这

^① 西班牙语：吃得少，干得多。——译者

个岛上的劳动情况，而是由于对这些利比里亚劳工在离开之前和回去之后进行了欺骗。”1923年，在美国经济顾问的压力之下，利比里亚政府宣布禁止再招募年轻人到斐南多波去。但自从西班牙领事规定了一百五十英镑这样公道的价格，以此打通了利比里亚国会之后，这种交易便又复活了。

对奴隶制度的严厉谴责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开始的。有些旅行记者发表了他们从蒙罗维亚听来的第二手消息。后来，同样的传说（现在是第三手的材料了）又出现在西蒙夫人那本不太高明的研究著作《奴隶制度》中。她是英国内阁大臣约翰·西蒙爵士的妻子，夫家的姓氏和丈夫的显要职位，为她的这本书增添了一种正确可靠的气派，其实决非如此。西蒙夫人在重复了一番她从其他书籍以及报刊文章中所看到的有关奴隶制度的模糊的指责以后，就对利比里亚和它的统治阶级进行了攻击。为了证明他们的无能，她进一步提出：利比里亚的人口比塞拉勒窝内多一百万，而它的贸易额只及塞拉勒窝内的四分之一。对西蒙夫人的这些论据来说，不幸的是，这些贸易数字是不可靠的，而且利比里亚的人口，肯定还不到塞

拉勒窝内的一半。

对利比里亚政府的最严重的攻击，是由托马斯·J·福克纳发动的。福克纳是在1927年总统竞选中遭到失败的候选人，他和他的人民党感到不满是确实有理由的，因为那个当权的金总统和他的真正独立党，竟想方设法在一个经核定只有一万五千选民的地区里获得了二十四万三千张选票。落选的福克纳是一个美国黑人，开设着一家附有饮冰室的旅馆；他带着愤懑的心情渡海到了美国，在那里举行了一连串记者招待会，对利比里亚政府的成员进行公开抨击。他声称：他们实行强迫劳动，程度之严重，几乎同奴隶制度差不多；他们绑架了年轻人，送到斐南多波去当劳工；而对于人们控告政府官吏使用残酷的鞭挞之刑一事，竟拒绝进行调查。福克纳的这些责难，再加上西蒙夫人的那本书，引起了英国和美国国内很大的关心。1929年6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刘·史汀生写了一封信给利比里亚国务卿，提到了有关报告中“所谓劳工从利比里亚‘出口’到斐南多波去的事态，结果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很难区别于有组织的奴隶贸易的制度；而且在强制实行这种制度

时, 还曾不断地、有组织地使用了利比里亚边防军的力量以及某些政府高级官员的力量和影响。”

美国政府对于已经实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劳工出口问题突然表示关心起来, 这很可能一部分是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到斐南多波去的劳工, 大部分是从利比里亚的帕尔马斯角地区去的, 而这正好也就是费尔斯通公司招募工人的主要基地。1928年4月, 这家公司的经理到帕尔马斯角去时, “对那里是否有足够的劳工, 绝对不抱乐观的想法; 据说那里确实存在着劳工不足的现象。”

利比里亚的金总统不承认这些责难是事实, 因此他要求国际联盟(利比里亚是它的一个成员)派一个代表团到他的国家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国际联盟委派了一个英国人卡思伯特·克里斯蒂医生来主持这次调查工作。他是个牙科医生, 是个胆小而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人, 曾经在尼日利亚居住过, 显然, 派他做这一工作, 主要就是根据这个资历。不过, 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能干而没有偏见的调查者。他的助手有约翰逊博士, 是一个代表美国政府的黑人院士; 还有阿瑟·巴克利, 是利比里亚的前任总统。这个代表团在利

比里亚逗留的四个月中，曾经访问过二百五十名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五名是蒙罗维亚以外的人。这几个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曾数次顺着海岸南下，到帕尔马斯角地区访问，据说强迫劳工就是从这里送到加蓬和斐南多波去的。代表团承认，在材料的搜集上，遇到不少困难；如果考虑到时间匆促、助手缺乏以及交通不便等等因素，这当然也是毫不足怪的事情。那个苏格兰人和那个美国人工作得非常协调，但那个真正的利比里亚律师巴克利先生，却用大部分的精力来反对那些证据，理由是这些证据所接触到的都是委托范围以外的事情。后来成为尼日利亚第一任总统的非洲作家纳姆迪·阿齐克韦，于1934年抱怨说：代表团团员中，没有一个是文化人类学、非洲人种志或殖民地行政管理具有经验的人。不过，今天来读这份报告，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

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发表于1930年，它认为人们指控利比里亚人的大部分罪状，利比里亚人是无罪的。“反对奴隶制度公约”中有明确定义的那种奴隶制度，在利比里亚并不存在。政府的部长们并不占有家用奴隶，而且也不鼓励别人这样做。

普遍流行的是抵押劳工和在公共事业中乱用强迫劳动，如果这种情况需要批评的话，那末对西非各个地区都可以批评了。调查团的特殊而惊人的发现是，“绝大部分从利比里亚南部各州用船运往斐南多波和法属加蓬去的合同劳工，是用一种同携掠奴隶和买卖奴隶几乎无法区分的、犯罪性的强迫方法招募得来的，而且往往把真正的去处隐瞒起来。”这种情况的最恶劣的例子发生在利比里亚东南部的韦达博滩。调查团的报告中提到那里的情况时说：

副总统扬西和利比里亚政府中的其他高级官员以及各个州长官和区长官都曾批准在利比里亚边防军的协助下强迫招募劳工，用来修筑道路以利装船外运，或从事其他劳动。他们还容许人们利用这支边防军在筑路工作中进行肉体迫害，恐吓村民，侮辱酋长，囚禁居民以及把这些捕捉得来的土著运送到海岸边，并在装船外运前一直看守着他们。

副总统扬西和他的同伙们，从他们提供的每一个劳工身上抽取优厚的佣金，他们假托说，按照法律，韦达博的酋长们是有义务向利比里亚政府提供这种劳工的。扬西还坚持说，如果他们拒绝

这样做，每一个酋长必须对原来要求的六十名劳工中的缺额，按每名十英镑交付罚款。弗伦罗波的最高酋长布罗赫回答说，他的青年人不愿意到斐南多波去，因为几年前已经有三十个青年到那里去了，但至今一个都没有回来。此外，有几个他送出去给政府筑路的人，却被弄到费尔斯通种植园去了。布罗赫显然是出于对扬西的善意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一封信到蒙罗维亚去，询问金总统是否真的曾命令他送人到斐南多波去。金总统回答说他没有发过这样的命令。扬西因此就在州长官和两个充当他的律师的参议员的协助之下，逮捕了布罗赫，并在他的人民面前，把他鞭挞了一顿，以儆效尤。扬西接着又对这个酋长科以巨额罚款，并硬要他付给那两个政客律师每人一百美元的酬劳。

调查团把这种办法称作“罚金的压力”：

上述韦达博滩事件，为调查团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政府本身怎样使用一种土著所无法识别的方式来行使政府的权力。利用土著和他们的酋长之间的部落关系，是造成同意装船外运的假象的最有效办法，而且可以把沉重的压力加在酋长的身上。如果这些酋

长象上述情况那样拒绝服从的话，就设法把整个部落弄得逐渐沦于贫困，从而迫使他屈服。

无怪乎韦达博的妇女们都在唱这样的歌：

我们好好地住在这里，灾祸突然降临，
我们的亲人，遭到了罚款和监禁；
扬西来到我们的国家，为的是干这种事情——
他抓走了我们的丈夫和弟兄，
把他们向“波奶奶”那里装运，
在那里，他们送掉了性命（重唱句）。
告诉我们，
扬西，这是为什么（重唱句）。
韦达博的妇女没有了丈夫，
扬西，这是为什么？
韦达博的妇女没有了弟兄，
扬西，这是为什么？
一直等着回来，
母亲们，父亲们，儿子们都已送命；
扬西，这是为什么？

调查团谴责利比里亚政府在公私事务中使用强迫劳动，使用强迫手段招募劳工送往国外，对利比里亚边防军约束不严。调查团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特别有一条要将现任的区长官一律换成美国

人或欧洲人，还建议从美国移殖“非洲人后裔中最好的一种人”去加强利比里亚。

克里斯蒂调查团的报告于1930年9月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轰动。美国政府向利比里亚致送了严厉的备忘录。西蒙夫人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气愤，她的丈夫约翰爵士则和其他的政治家们一起策划，打算把利比里亚委托外国，最好是英国管理。在利比里亚，第一个反应是怎样来满足国际联盟的要求。金总统批评了这份报告的某些方面，但同意接受它的建议。利比里亚国会对扬西提出了弹劾；受到调查团报告指控的众院议员都被开除出众院；在韦达博滩事件中提到名字的律师都辞去了参议员的席位。虽然真正独立党的许多敌人从这个报告中捞到了资本，但蒙罗维亚和其他城市的群众却对国际联盟表示愤慨。扬西于1930年底辞职；尽管调查报告中并没有批评金总统，但他也在第二天跟着辞职了。国务卿埃德温·巴克利先生^①接任了总统。

^① 埃德温·巴克利的在职时期是从1930年至1944年。他是阿瑟·巴克利的侄子。阿瑟·巴克利被称为利比里亚的“格莱斯顿”，曾于1904年至1912年任利比里亚总统，是国际联盟调查团成员之一。

英国和美国都拒绝承认利比里亚的新政府。英国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要利比里亚去请求国际联盟派遣一个管理委员会，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托管。他指示英国驻蒙罗维亚代办通知利比里亚政府：“利比里亚方面如不提出要求〔派遣管理委员会〕，英王陛下的政府对此将表示严重关切，而且对于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难免产生最严重的反应。”讲得简单一些，就是英国命令利比里亚去要求取消自己的独立。英国还坚持利比里亚应该接受一笔由国际联盟监督的借款，以便把这个国家置于国际管理之下，并迫使它废弃费尔斯通协定。巴克利总统对这些损害他的国家主权的威胁，感到不高兴，但他原则上同意采纳克里斯蒂调查团的建议，并正式申请国际联盟来帮助解决利比里亚的财政问题。1931年3月，国际联盟的代表们在伦敦开会，指定了一个以法国人亨利·布律诺为首的三人委员会。

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持续着一场复杂的三角争吵：利比里亚对费尔斯通公司；英国和法国对费尔斯通公司；英国和法国对美国。三大强国，在英国领导之下硬要利比里亚同意接受国际联盟的

某种形式的控制和外国“顾问”的帮助。利比里亚人则要求保持他们的独立，并希望他们的财政有所改善。时间是对利比里亚有利的。1929—1931年不景气以后世界经济的回升，促进了橡胶的生产，从而也增加了利比里亚从费尔斯通种植园取得的收益。1932年，利比里亚军队屠杀克鲁人的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下子英国的托管主张就有了充足的理由。约翰·西蒙爵士不等看到情报就表示确信：“利比里亚边防军……在克鲁族地区的……残暴行动和高压手段达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他又毫无证据地暗示说：这次屠杀是对克鲁人的报复行为，因为克鲁人向克里斯蒂调查团提供了证据。可是，英国副领事从蒙罗维亚跑到克鲁族地区，却发现利比里亚人的声明是确实的。这次暴动导源于部落间的争吵，与克里斯蒂调查团毫无关系；虽然负责指挥的军官戴维斯上校曾经残酷地采取了高压手段，但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次屠杀是有计划的或经过商量的。批评英国立场的人立刻指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利比里亚的近邻塞拉勒窝内保护地内，也发生了一次同样严重的暴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外交部档案终于透露，正如当时的人们所怀疑到的，英国对利比里亚的政策，是受到了对费尔斯通公司的嫉妒的影响。英国驻蒙罗维亚代办 C·格雷厄姆先生在他发给伦敦的公文中，经常提到对费尔斯通借款和对费尔斯通种植园官员的不满，有时这种不满也是有理由的。他的这些论点得到了荷兰人莱特哈德先生的支持。莱特哈德是国际联盟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由于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验，他对橡胶有丰富知识。他于 1931 年 6 月访问了费尔斯通的种植园之后告诉格雷厄姆说：“费尔斯通在利比里亚的橡胶企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无疑地将是收获工作逐渐扩大以后的劳动力问题，也就是三年之后的劳动力问题。……”据他估计，在八十万或不到八十万的总人口中，费尔斯通需要的劳动力将为十五万至二十万人。国际联盟三人委员会的主席法国人布律诺先生还补充说：费尔斯通这个西非最大的农业企业，它的经营方式“对西非的情况是非常不适宜的”。莱特哈德先生告诉格雷厄姆说：“如果没有强迫劳工，费尔斯通企业在本地的负责人就无法进行工作，因而他确信，他们必

然会打算最后仍使用强迫劳工的。”

格雷厄姆相信这一点，并报告说：费尔斯通在本地的官员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利比里亚的福利，而是如何来保持他们自己的职位和薪金。他认为他们正在向美国驻利比里亚的公使 C·E·米切尔施加压力，企图由此而使那个非常顺从的政治家金总统卷土重来。外交部和格雷厄姆一样，但愿米切尔“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而不是个柔弱胆小的黑人。格雷厄姆虽然很喜欢米切尔——觉得他要比另外一个老朽得被看作是“精神上的低能儿”的外交家好得多——但又害怕他受到费尔斯通的影响。“不论是在人数、意志的力量（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此）以及种族的优越性上，费尔斯通的官员们都是处于有利的一边。……我确信，在阻止米切尔和我合作这件事上，费尔斯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格雷厄姆的看法，把英属西非银行撵出利比里亚这件事，责任就在费尔斯通方面的人身上——“经常在利比里亚借款这个帐户上不可思议地开出许多小额支票，有时甚至几个便士也开一张支票。”

英国的报纸和政治家们对利比里亚仍旧怀着

敌意，不过，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他们的蛮横是和无知相匹配的。1932年3月16日上院对利比里亚问题的辩论表现了真正惊人的昏庸愚昧。塞西尔子爵是曾经被斯诺登勋爵宣布为“对这些事情具有最精湛知识的”人，而且还在国际联盟为利比里亚问题而设立的一个委员会中担任过主席，他在向他的同辈们演说时是这样开始的：

阁下：利比里亚，正如各位阁下可能已经知道的那样，是在非洲西海岸上的一个国家。它的面积相当广大。根据我见到的统计数字可能作出的估计^①，它至少有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包含着一长条沿海的土地，居民主要是美裔利比里亚人——也就是说美国人，他们是在1845年或在此前后从美国遣送到那里去的。……几年以前，有一家叫作费尔斯通公司的美国公司出了个主意，要在那里创立一个大种植园——我想它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他们就这样做了。……

尼日利亚的缔造者卢加德勋爵的讲话，比塞西尔勋爵较有条理，可是他的判断却同样是刺耳的。他谴责利比里亚容忍奴隶制度，并声称有二百万土

^① 利比里亚的边界在三十年前即已确定，因此，它的以平方哩计算的面积，在任何地图或年鉴中都可找到。

著的生活被一小撮外国黑人弄得陷于悲惨的境地。

在西非有着利害关系的英国商人，对利比里亚特别吹毛求疵，表露了他们对费尔斯通公司的嫉妒和对利比里亚富源的贪心。这些态度都在1931年8月由埃尔德公司出版的杂志《埃尔德西非评论》的一组有关利比里亚的论文专辑中反映了出来。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殖民地政府官员的作者说，在非洲成立一个黑人共和国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他接下去又说：“英国当然毫无增加它在非洲的责任的愿望，不过它在利比里亚海岸的商业和航运业的利益是很大的。”另一个作者威廉·吉尔里爵士则声称，利比里亚的官员是外国人，他们对利比里亚是没有权利的。曾经当过英国总领事的R·C·F·莫姆，曾发表过一篇友好的文章《利比里亚共和国》，现在却又根据他在这个国家中的经验声称，利比里亚人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也没有能力管理他们的国家。大约在八十年前，由于一次可悲的错误判断，使这个国家陷入了腐败和无能的统治”。正如这个专辑的大部分作者一样，他要求国际联盟将利比里

亚交由英国托管。至今还掌握着英属西非绝大部分棕榈产品的联合非洲公司(尤尼莱佛的子公司)的一个董事长指出,绝大部分利比里亚人宁愿在托管之下生活;而另一个西海岸的大商人罗伯特·L·霍尔特则认为,利比里亚人希望托管于英国,乃是毫无疑问的。

即使在英国,也有为利比里亚辩护的人。左翼作家们觉察到了英国大商家对它的竞争对手费尔斯通公司的敌意。《西非》杂志把利比里亚的困境和巴尔干国家的情况作了比较。“巴尔干国家中,有一个是直接引发世界大战的地点。在其余的国家里,政治暗杀的普遍和卫生设施的不普遍正好成了对照。我们可想不起塞西尔勋爵什么时候鼓吹过要由‘某个文明的国家’去加以兼并。”即使是《国际联盟报告》的作者克里斯蒂医生,他对利比里亚的态度也是比较温和的,他对金总统的辞职表示惋惜。

英国政府想在利比里亚获得一个保护地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成功。到了1934年,美国国务院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利比里亚还是有自治的能力的;因此它派了一个曾驻蒙罗维亚的外交

官哈里·麦克布赖德上校，去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为利比里亚解决它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最迫切的是：利比里亚无力偿付向费尔斯通公司财团所借债款的利息。现在，由于橡胶的增产，国库收入也有了相应的增加，因而利比里亚已经开始偿付一些到期的利息了，于是费尔斯通和利比里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友好了。这些美国商人是懂得怎样以妥协来作成一笔交易的，而利比里亚的巴克利总统也是通情达理的、有耐心的。于是，在1934年，利比里亚政府再一次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两年之后，英国也承认了利比里亚政府，尽管是非常勉强的。

利比里亚在全世界而前受到了审判这一轰动报界的事件，渐渐淡漠下去了，现在已经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在所有的证据和判断都已公开的情况之下，来重新检查这一事件，人们感到震惊的倒不是被告的怎样邪恶，而是原告的多么无知和伪善。蓄养家奴、强迫劳动以及把劳动力强迫运往海外，这些在利比里亚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在欧洲列强的其他殖民地也都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些新闻记者，就已指出了这一点。1932年3月26日

一期的《西非》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它在回答那位攻击利比里亚的巴克斯顿勋爵时这样反问道：“……可是在上院发言的人们有没有读过利斯博士摘引的英属肯尼亚殖民地的劳工法律？这些发言者中间，特别是象巴克斯顿勋爵那样当过南非总督的人，是否天真地认为在南非的兰德金矿区的大量非洲劳动力都是自由的、自愿的、自主的？他们是否认为这种劳动力来到兰德矿区都是出于本人的意愿？”

在塞拉勒窝内的保护地里，家奴的蓄养不仅实有其事，而且实际上直到1928年为止都是为法律所允许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过保护地的一个奥地利旅行家报告说，抵押劳动在那里是很普遍的。在绝大部分的非洲殖民地里，公共工程中使用强迫劳工是很普通的事情。只是由于象安德烈·纪德这样有名的作家把许多鞭挞和杀害的事件报导出来以后，强迫劳动的严重弊害才为外界所知悉。所有的殖民强国都在使用某种压力征集工人到筑路队、可可种植园、矿山、牧场以及木材运输站去做工。葡萄牙人看到任何没有工作契约的非洲人，都会把他当作游民抓起来。英国人

和法国人则以征收必须现金交付的人头税或茅屋税的办法来强迫非洲人做工。斐南多波的工作条件，并不见得比法国和英国殖民地的劳工的工作条件更坏，几乎可以肯定是更好一些。在修建从布拉柴维尔到黑角的铁路时，正是有关利比里亚的争议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据估计，为了铺设八十五哩的铁轨，竟有一万七千名工人死亡。

在这块大陆的所有地区中，当时强迫劳动的情况最严重、雇主使用的手段最残酷、外来的少数民族对土著的剥削最苛刻的例子，就发生在西南非，而西南非却是一个托管于国际联盟的地区。

在巴克利总统执政的十四年中，利比里亚的名誉，由邪恶的转变成了可笑的。新闻记者往往在这里逗留两三天，为一篇文章搜集一些材料；也可能住上两三个星期，如果他们的计划是要写一本书的话。这些作品多数只是从《国际联盟报告》中找到一些现成的珍闻，再添油加酱掺进一些蒙罗维亚的可笑的生活细节，重新煮一煮，就当做新鲜的菜肴端出来了。罗兰·怀尔德和哈里·J·格林沃尔这两个记者，在访问巴克利时注意到：“这位总统的裤子晒在比悬挂共和国国旗更为显著的

地方。”他们批评那些年轻的官员来往都坐网轿，由满头大汗的强迫劳动者抬着；他们还声称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海军将军，是疯人院里的住院病人。他们在希特勒夺得政权以后出版的一本书里，都建议把利比里亚委托德国管理。

另一篇令人发笑但讥讽得不是那么厉害的故事是出于伊丽莎白·弗贝伊夫人的手笔。她的丈夫约翰是利比里亚学院的院长，他曾经有一次光穿一件衬衫就去工作，因而触犯了他的学生。根据弗贝伊夫人的说法，利比里亚似乎已经超过塞拉勒窝内而成了西非最爱打官司的国家。

如果我希望解雇一个仆人〔她写道〕，我只能提出“我不满意”这样一个理由。我绝对不能对一个厨子说他不会烧菜，也不能对任何家仆说他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因为根据美国-利比里亚法律，他们都可以到法庭里去控告我破坏了他们的名誉，使他们不能在别处找到工作。……我立刻感到奇怪，难道所有的美裔利比里亚人都是律师？我们在利比里亚的外国人，分手的时候都要说一句“我要去控告你！”^①

① 英国人习惯在分手时要讲一声“I'll be seeing you”，意思是“再见”；这里却把这句话说成了“I'll be suing you”，意思是“我要去控告你。”这是利用“seeing”和“suing”这两个字发音相近而造成的一句俏皮话。——译者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在写到利比里亚时有意不去理睬这种危险性，结果是他的《不带地图的旅行》一书受到了来自蒙罗维亚的禁止出售的命令。格林承认在蒙罗维亚身上是很容易开玩笑的，因而他以最严厉的态度来对待那里的欧洲人社会，包括他们在早饭后喝啤酒，清晨四点钟喝威士忌，以及整天地喝冰镇薄荷酒等习惯。“他们有一切理由可以喝酒；在这种足以使书籍霉烂的气候里，你也读不了许多书；你甚至也不能欺骗自己说，到这里来总有些好处，来统治土著；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土著在统治着你；就那些内阁大臣来说，他们还给你提供了一个令人大为扫兴的榜样：他们酒也不喝，一心工作。”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的堂妹巴巴拉·格林陪同到腹地去作长途跋涉的旅行的，巴巴拉也曾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一本书出版^①。他们一同会见了巴克利总统，巴巴拉描写总统的样子仿佛是刚才走出一家不高明的、五十先令的成衣铺。她对总统的“亲密的朋友”写得比较含蓄，仅仅提到巴克利曾使她的父亲成

^① 在蒙罗维亚招待格林兄妹的主人是英国代办 A·E·亚普。他猜想，“他们发现利比里亚的情况如此正常，因而感到失望。”

为一个法官。而另一方面，格雷厄姆·格林却把这个亲密的朋友说成是“我在利比里亚看到的最可爱的人”。这两个作家都觉得巴克利是一个和蔼可亲而又爱讲话的人，也玩一点笨拙演员般的、塔马尼派^①式的权术。不过格雷厄姆·格林认为巴克利是一个勇敢和有能力的人，他是“海岸上的新人物”。

即使是象格雷厄姆·格林这样试图公平对待利比里亚的作家，也暗示出这个国家一直在衰微下去，以至连巴克利这样一个人也成为“海岸上的新人物”了。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利比里亚最友好的描写，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利比里亚最有敌意的描写还要糟糕。在有罗伯茨、甚至阿瑟·巴克利（埃德温的叔父）这样人物的国家里，要把埃德温·巴克利说成是“海岸上的新人物”，那就不太公平了。这个曾经产生过布莱登的论文和安德森的《旅行纪实》的国家，现在却由一个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歪诗的总统来统治着：

冲吧！冲吧！冲吧！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
大海呀，你让浪花在我不平的海岸上疯狂地汹

^① 美国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动政治集团。——译者

涌。

你从傲慢的欧洲带来了它的罪恶和暴行，
可是你永远消灭不了活跃在我们心里的埃塞俄
比亚精神……

好好地唱一唱白人的负担吧！对，也要唱一唱他
的高兴！

一切高兴归他所有；而负担呢，却是别人的悔恨！
对呀，别人在用自己的鲜血满足他那肮脏的贪
心；

而他却生活得无忧无虑，对别人的需要漠不关
心……

利比里亚是可笑的——但并不是素来如此。

费尔斯通的财富以及通过它的贷款条件所发
生的影响，使利比里亚几乎成了美国的附属品。
“老太婆”硬币（因为上面有维多利亚头像而得名）
从流通中被收回了，代之以美国的金元和分币。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利比里亚和美国的关系更
加紧密。利比里亚在西非洲处于离美国最近的地
位，因而在美国与开罗之间筹建一系列航空站时，
它就是一个建立航空站的当然地点。曾经为利比
里亚解决经济问题的麦克布赖德上校，于1942年
重又来到利比里亚，谈判建立航空基地的问题。有

些利比里亚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飞机的轰炸记忆犹新，因而对于和美国订立协定还有些犹豫，特别是当时的情势还看不出美国是否会打赢。不过麦克布赖德终于说服了利比里亚人，作为同意建立一个航空基地的交换条件，他们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飞机场和一条很长的新公路，甚至还可以有一个相当大的海港。当时和后来的好挖苦的人，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新建的罗伯茨机场就建立在费尔斯通橡胶种植园的办事处的旁边，而离开它为之服务的首都，却有 25 哩之远。

我将以 1944 年 1 月威廉·瓦坎纳拉特·沙德拉奇·杜伯曼接任总统的时期来结束这一部利比里亚历史。杜伯曼原来是一个律师，当过最高法院法官，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还在总统任上。这位总统的国际信誉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远到甚至他大部分的朋友不愿意去回忆的时期；在韦达博滩事件中，他曾经是充当副总统扬西的律师的参议员之一。直到 1943 年，还有一个外国作家鸣不平说，奴隶制度是“利比里亚还在实行的法律——这个法律支持着最高法院法官威·瓦·沙·杜伯曼，他是奴隶贩子的合伙人和代言人”。

这一类粗暴的批评现在是看不到了，官方发表的总统传记中抹去了履历中任何不太体面的事情。那本手册《利比里亚。欢迎旅行和投资》中追叙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律师，杜伯曼“很快地赢得了‘穷人的朋友’的声誉，因为他替贫穷的诉讼人免费辩护，并在许多案件中为他们取得了胜利”。在下面有关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现状的最后一章中，我将论述在这个“穷人的朋友”杜伯曼的国家里有了些什么进步。

第三章

在这一本研究“回到非洲去”运动的著作中，对于这个运动的是否值得一搞的问题，我曾试图尽量地不要把自己可能形成的任何见解硬加进去。我把对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的估价，留给这两个小国家的一些居民和外来的访问者去做，这些人对两个国家的赞扬或者谩骂，向来是滔滔不绝的。在这最后的一章里，我将对塞拉勒窝内、利比里亚以及“回到非洲去”运动，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意见。

今天的弗里敦^① 同理查德·伯顿爵士笔下的那些讽刺画实在太相象了，要对它作一番描写，那是很难使人信以为真的。这个城市在精神以至物质方面的丑态，已经是很难再加以夸张了。在那些因泥土渗水面弄得肮脏脏脏的腐朽古老的房屋

① 我在那里的时候正好是不受欢迎的军事独裁时期。人们说，现在的弗里敦已经好得多了。

之间，现在又点缀了一些“南岸”式即“英国展览会”式的奇怪而僵直的办公大楼。大批兀鹰毫无偏袒地既栖息在窝棚的铅皮顶上，又栖息在办公大楼的水泥顶上。每条街道都有的排水阳沟里，在干旱的季节总是填满着垃圾；在弗里敦那种传奇式的雨季里，则是积满了污水，水里有淹死的野狗，有时还有淹死的小孩。每逢星期日，还是流行着那些赞美歌，克鲁镇路上那个“古今碾米磨粉器具陈列室”就是受这些赞美歌的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新斯科舍人曾聚集在它下面作过祈祷的那棵巨大的棉树，还是作为历史纪念物屹立在那里；但绝大部分由人们建造的纪念碑，则已经由于受潮、忽视或年深日久而糟蹋损坏了。“为了由英国的勇士和慈善家从奴隶制度中拯救出来的非洲人而设立的国王广场皇家医院和收容所”，仍旧保留着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可是就在它附近，由最伟大的总督麦卡锡建筑的那一排台阶，却已经开裂破碎，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而且几乎埋在由上面大楼里丢下来的臭烘烘的垃圾所堆成的陡坡下而了。圣乔治大教堂还保持着它历次修建时造成的不伦不类的样子，嵌在墙上的那些金属板上则记载着这

沿海一带天灾的记录：“纪念皇家海军军舰‘麻雀号’副舰长佩顿·布莱基斯顿先生，1865年12月21日患热病死于‘艾西斯号’船上，享年五十五岁，海葬。他的管事威廉·洛特，亦于同一天患热病死去。‘我们存活的时候，也离死不远。’^①”道路的尽头处，是爱德华·布莱登的雕像；他生前曾以纯黑色的皮肤自豪，但他的雕像却由于气候的某种作用，皮肤已经变成红矾土的颜色了。

弗里敦市旅馆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的象征。格雷厄姆·格林在这个殖民地逗留的时期，就住在这个旅馆里，他还给它改了个名字叫“贝德福德”。这座建筑从前是一个私人经营的疗养院，它过去为病人服务，现在又为酒鬼服务，在塞拉勒窝内，这两种人都是出名的。据有些老顾客告诉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驻防在这里的军官对这个旅馆很有好感，他们那高大的身躯挤满了这里的酒吧间，使那些比较温和的平民顾客不得其门而入。1961年独立以后，市旅馆走向衰落。在旅馆前院的大门外面，经常有一群乞丐、小偷、妓女、拉皮条的以及出租汽车的司机守在那里。

^① 基督教葬仪用语。见《公祷文·殡葬礼文》。——译者

由于潮气的不断侵蚀，这座建筑的正面已经变得非常肮脏，斑斑驳驳，满目创伤。直立在院子里的两棵棕榈树，成了食果蝙蝠在白天的栖身之所，一到傍晚，它们就从树干上飞下来，仿佛是从一段火烧的木头上落下来的片片灰烬。

上市旅馆去的欧洲人，绝大多数是老资格的“海岸人”；这种人已经在这里或冈比亚、加纳以及尼日利亚工作或经商了好多年，他们的皮肤已经变成淡黄色，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了。“我们都成了寓公啦，上面不叫我们到别处去，我们只好呆在塞拉勒窝内了，”有一个英国人就说过这样的玩笑话。对于“这个海岸”的肮脏、炎热、使人昏昏欲睡，以及那种瞬间的美妙景色，他们是既喜爱又厌恶。一些作短期逗留的人，例如定期两年的银行家、经济顾问和高级中学的教师们，都喜欢凉爽的山上住宅区和更远一些的欧洲人居住的郊区；但那些“海岸人”还是对弗里敦那种奇妙的魅力更有好感。薄暮时分，在市旅馆一楼的露台上喝几杯淡红色的杜松子酒，和一个非洲女士谈谈心；眺望着那色调愈来愈浓的深红色的大地，那港湾里的海水，那栖息着熟悉的兀鹰的发锈的铅

皮屋顶；这个“海岸人”会告诉你，如果有一天能埋葬在这“一片红矾土”下面，他就感到非常满足了。

市旅馆的经理名叫弗雷迪，是一个意大利血统的瑞士人，他在这里已经度过三十个年头了，他总是带着监狱牧师那种厌倦和宽恕的笑容，冷眼旁观着他的顾客们。他和顾客们不大谈起格林的著作，可是有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商人却曾这么说：“十分坦白地说，就文章而言，我并不喜欢它，我认为，这书写得平淡无奇。”

一天，有一个正在写一篇什么文章的美国女人，来看看格林住过的地方，却被一个喝醉了酒的白种商人痛骂了一顿。她倒一点也没有畏惧，回过头去又和一个喝得更醉的克里奥尔女人讲话；这个女人没有听到过格林的名字，但她还是接受了一杯黑啤酒，带着惊讶的表情，细细地看那个美国女人拿出来、她那些住在俄亥俄州的孩子们的照片。有一天，弗雷迪给我看一个顾客写的一部小说的原稿，这个顾客当过钻石矿工，也是一个冒险家。这是个短小的抒情故事，写的都是啤酒、汗水、开矿以及美丽的黑人姑娘之类的事情。一个认识这位作者的朋友说，这个故事写的是真实

的生活，“他是在干活的时候因为大动脉破裂而死的。不过，他所夸奖的姑娘实际上并不那么美丽。据我的看法，她的样子就象是一条半死的鳟鱼。”

上市旅馆去的塞拉勒窝内人，很多是克里奥尔人，或自称是克里奥尔人的人。有一个英国人讥讽说：“每一个人都是克里奥尔人，即使他们脸上满是部落土著的斑疤，他们也会告诉你：‘我懂克里奥尔话’。”这里和加纳以及尼日利亚正好是一个对照，即使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也讲那种令人讨厌的蹩脚英语，克里奥尔人自称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在一家成衣铺里遇到一个欧洲顾客，他那种熟练的语言才能，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给我做一套衣服；这样的，不要。要那样的，你从前给他做过的。为什么你塞给我垃圾货？……”还有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这个顾客肯定是在这个海岸上住过很久的人，可是那个裁缝后来告诉我：“他是从俄国大使馆来的，大人物，了不起啊。”真正的克里奥尔人，也就是说最早的移民、新斯科舍人、马隆人以及获释奴隶的后裔，今天已是一种相当可怜但又颇受欢迎的残存者了。他们那种暴躁和自傲的性格，曾经

遭到从伯顿直至格林等每一个访问者的无情挖苦,但在今天来看,这种性格似乎已不是令人讨厌而是让人可怜了。“看看那边那个黎巴嫩人吧,”一个年老的克里奥尔人在市旅馆里这样说,“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几乎完全是文盲。瞧,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欧洲人,因为他的英语讲得太坏,都在笑他哩。一点儿不错:‘一知半解是危险的事情’。”也就是这同一个人,他总爱回忆起那些伟大的克里奥尔政治家的时代;当时,他们的讽刺和雄辩,甚至使英国人对他们也敬畏有加。

“在立法会议中辩论卫生问题时,班科耳-布赖特说:‘我是唯一有资格谈这个问题的人。你们都是在无知的海洋中游泳。’有一次,他向殖民地秘书说:‘你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拿薪水的职员而已。’又有一次他向总督说:‘如果你要我离开这个国家,那咱们就搭下一班船走——咱俩一起走。’还有那个肖伦凯赫-索耶,他对在罢工中准备跳上到博城去的火车的总督说,他可以把总督逮捕起来。……沃利斯-约翰逊在弗里敦极受人们敬爱。在他的葬仪上,甚至有些欧洲人也哭了。据说,他那具棺材是老远从俄国运来的。”

当克里奥尔人不在近边的時候,那些“海岸

人”就会讲起克里奥尔人如此这般爱吵架的种种老话来。“上星期，我的一个工人向我吐唾沫，他想惹得我出手打他，这样他就可以到法院里去控告我啦。上回有个英国人被罚了五十英镑，就因为他轻轻地打了人家一巴掌。如果你准备跟这些家伙打交道，那你就得趁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狠狠地揍他一顿，然后就说他是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弗里敦可以说就象阿克拉、阿比让、达喀尔之类的地方一样，确实是一个爱吵架的地方。我几乎每天都听到克里奥尔人、更经常的是克里奥尔妇女在进行可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谈判。象“泼妇”、“长舌妇”、“滥污女人”这一类字眼，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日记和我的词汇中。在西非洲几乎处处可以感觉到礼貌和尊严，在弗里敦却是很少见到的——在蒙罗维亚更是少见。

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表现得很明显的是由于贫穷所引起的犯罪行为。正如格雷厄姆·格林在这里逗留的日子里那样，警察是不敢在黑暗中巡逻这里的街道的；尽管有时也会有一些强壮的女警察，穿着浆得笔挺的制服，撅着个大屁股巡逻而过。小偷们一个星期要闯进市旅馆好几次。在塞

拉勒窝内流转的许多铸造得很拙劣的伪分币，经常被用来在市旅馆的酒柜上买酒喝。有一天傍晚，我听到街上一阵骚乱，原来是有一群人把一个人踢得几乎要死了。一个自以为拥有白人特权的欧洲人，在旅馆里住着最好的宽大的房间；他也正在踢那个人的脑袋。这个被踢的人，名义上是英国行教会一个著名的传教士，他闯进一间赌场的办公室，用石匠的榔头猛击一个女事务员，但是没有能带着赃物逃走。几天以后，市旅馆的院子里还出现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和南朝鲜渔船船员们打群架的场面。

星期六上午是市旅馆里最热闹的时候，“海岸”的居民们，按照传统的习惯，都聚拢来喝一杯。一个穿着一套小丑衣服的加纳音乐师，弹着六弦琴歌唱着这一类流行歌曲：《我的邦尼躺在海洋上》、《我永远在吹泡泡》、《我们要把洗好的衣服挂在齐格菲防线上》，以及那支最受欧洲侨民欢迎的凄凉的哀歌《我要回家》。就在这上午的时间里，总有一个翻筋斗的人来表演一番。这是一个肌肉发达的杂技演员，他一只手端平一杯水，就在酒柜上来来回回地翻筋斗。每个人都要喝上很多啤酒，

坐在藤椅里，在慢慢转动的电扇下，习以为常地享受着这海岸上的星期六。有一天，几个德国人试图教那音乐师奏一曲纳粹的军歌《霍斯特·韦塞尔歌》。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全部歌词，但是那位音乐师还是拒绝把这首新歌收进他的节目单里去。

欧洲人往往会告诉你：弗里敦这个肮脏腐败的城市，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塞拉勒窝内。在欧洲人、特别是那些为期两年的人来说，他们享受着工作津贴，有房子，有汽车，还有其他开销供给；因而他们认为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应该是山上住宅区，以及离城市更远也更豪华的郊区，或者是内陆的“真正非洲”，即过去的保护地。固然，政权已经不再靠弗里敦来支持了。1967年军事政变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是从南部和东部的门迪族人那里取得支持的；在军人政府结束后重新掌权的政治家们，则得到了北部和西部的门迪族人的大力支持。但是，正如西非其他的首都一样，弗里敦还是吸引着成千来自内陆的失业者和抱有野心的人。一个德国工程师曾这样指出：“内陆要依靠外国人。”他的公司曾登广告招聘一个前往离弗里

敦一百哩以外的地方去工作的秘书，月薪八十英镑，供给一幢有冷气设备的附有凉台的平房，有使唤的仆人，可以使用游泳池，每隔一个星期还可以免费乘车到弗里敦去一趟。结果是一个姑娘也没有来应聘。即使是在弗里敦，也是年轻的美国和英国志愿人员承担着大部分的教学工作。当时在大学里担任副校长的戴维森·尼科尔博士曾警告他的塞拉勒窝内学生们，正如他所说的：

象我们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非洲人，不应该刚从学校毕业就把自己看成是特权阶级，就有享用汽车、家具齐备的宿舍、冰箱以及供使唤的仆人的权利。这些东西只能是挣来的。还有，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不能一直指望由充当“和平队”或“海外志愿服务队”的美国和英国年轻公民，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把这种不太有吸引力的工作继续做下去。

我所遇到的这种志愿队员，绝大多数都对他们受到的待遇提出严厉的批评，抱怨在他们进行这种“发展酋长国”（这是美国人用来描写在村子里当顾问的一句怪话）的工作时，还必须从他们菲薄的津贴中提出一大部分来“送人情”，也就是贿赂酋长。

有一对“和平队”的夫妇说，在这个国家里，最可怕的工作就是被派在某一个学校里充当“打人的老师”。这个学校里的第一足球队的全体队员，有一次由于在重要的比赛中输了球，受到了毒打。

此外，弗里敦的邪恶之风在内地也同样盛行。1967年为了检查前政权的违法渎职行为而设立的委员会，曾在门迪的钻石矿区发现了一个贪污腐化的秘密集团。酋长们转移财产，把钱存在瑞士的账户里；“矿业工人联合会”的职员们还对自己侵吞会费的事夸耀说：“我们把钱分来大吃大喝，花掉了。”那个著名的博城学校，现在也变得破烂不堪和非常可笑了。学生们被分成若干组，分别属于不同的“城”，也就是英国中学里所说的“舍”。领我参观的那个教员说：“这些城是曼彻斯特、利物浦、伦敦和巴黎。虽然可能有些人会说我们这种做法是时代的错误，但是对我们这些想到自己是老伦敦、老曼彻斯特或老巴黎的人来说，这却具有很深的感情上的意义。……一个博城学校的学生到全国任何地方去，他肯定会找到朋友的。”弗里敦的夜总会和娱乐场，是最有可能遇到老伦敦、老曼彻斯特或老巴黎的地方之一。如果

比起凯内马的学校来，博城学校还算是好的；那儿的学生，就因为校方不发足球队经费，最近还闹过事。那天晚上，有两个学生动手打破了裁判员家里的窗子。这个裁判员是本地议会中的一个官员，他从家里冲出来，用一只破啤酒瓶把两个学生打得只好送医院。

不管多么不愿意，人们还是迫不得已地看到：这个肮脏的、悲惨的、虔诚的、沉醉的、可怜的、爱打官司的、但也还是有着某些诱人之处的弗里敦城，也就是说，这个“老”的塞拉勒窝内，同穿着上过浆的白短裤的英国人的“新”塞拉勒窝内比较起来，同服装漂亮而行为卑鄙、专靠个人权术以及新闻发布或政治手腕来发财的酋长的儿子们的“新”塞拉勒窝内比较起来，还是那个“老”塞拉勒窝内保有更多的真实的本色。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乘船到加纳去的姑娘，她在弗里敦停留了一下，想对西非获得一个最初的印象。在约略地游历一番之后，她竟然掉下了眼泪。

和弗里敦相比，蒙罗维亚看来仿佛是一个在向前进的甚至是繁荣的城市，可是这只是到此访

问的最初几天中的错觉而已。在这种所谓进步中，虚饰的成分多于实质。这里有一些闪闪发光的大银行——可是银行里的钱大部分都流到国外去了。在第一批移民抗击不友好的土著的山头上，现在耸立着一座宏伟的旅馆——不过，这个旅馆里的职员，就是那些土著的后裔，他们今天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不友好。在那些以虔诚的拓荒者如阿什曼、格利、洛特·凯里等人的名字命名的闹区大街上，有的是夜总会，里面的黑人姑娘在黑暗中把衣服脱得精光。我遇见一个下了班一直在打喷嚏的女招待员，她抱怨说，工作时太冷了。“那些美国人总是要求把冷气放得冷一些，再冷一些。我两臂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除了‘小兔子衣裳’之外就不准我们再穿什么了。”这里有的是美观的政府大楼，可是没有一个象样的政府。这里有的是装着冷气设备的轿车，可是马路上那些窟窿，却几乎大得可以把轿车陷在里面。

绝大部分西非的城市，都有一些迷人之处可以补救它的贫穷的缺点；唯独蒙罗维亚却被肮脏下流淹没了一切。美裔利比亚人中的统治阶级（也就是那些被嫌恶地称作“A.L.”的人）的倾向是

爱好虚荣、自吹自擂和动不动就吵架。利比里亚统治阶级的贪财和极端无赖，是不能描写的；这倒不是由于找不到适当的例证，而是因为有那么一些善于敲诈勒索的利比里亚律师，他们就是专靠说谎和诽谤来陷害别人为生的。利比里亚的警察是这个大陆上的笑柄。他们可以用任何捏造的罪名来逮捕任何外国人，向他索取贿赂。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因为给一个警官照了相而遭到逮捕，过了一天，他又因为没有给这同一个警官照相再次遭到逮捕。警察经常把旗子一挥，拦住经过的汽车，登上车来，给人以“违章”的罪名，要人家拿出现金五美元作为罚款。有一次，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就带着上来逮捕我们的警察，把车子开到城外两哩的地方，然后撒了一个谎，对他说我们是杜伯曼总统私人邀请的客人，命令他下车，让他步行回去。有一个巡官由于没有得到我们所住小旅馆的贿赂，一天晚上竟然暴跳如雷地到旅馆里来，挥舞着手枪和警棍，宣称要枪毙这个旅馆的主人，弄得所有旅客都莫明其妙。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教授来到蒙罗维亚访问时，曾在总统的宫殿门前被捕，罪名是他试图打听这座建筑的情况。

蒙罗维亚警察的所作所为，由于可能被报刊揭露而受到一些限制。腹地根本没有报刊，因此统治阶级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掠夺和受贿。杜伯曼总统和他的新闻发布人员声称：已经消灭了最初的移民阶级（美裔利比里亚人）和内陆土著之间原有的差别。报纸经常赞扬杜伯曼的“内陆政策”英明。事实上，大权仍旧掌握在极少几个美裔利比里亚家族的手中，这里面包括巴克利家族、谢尔曼家族、托尔伯特家族、库珀家族，而现在以杜伯曼家族的权势最大。那些土著酋长一旦和这些海岸上的贵族结成了姻亲，便立刻学得了他们那种光怪陆离的“次美利坚”生活方式。美裔利比里亚人现在不但控制了国会、行政部门、司法部、教会、互济会，而且还掌握了土著部落的波罗会的领导权，因而在森林文化中又掺进了美国的低级下流的东西。

在利比里亚，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显著差别，给人的印象比黑非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刻。农民们要付茅屋税，说得委婉一些，叫“地产税”；可是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政府给予的任何福利。那些在学校里负担着沉重的

教学任务的“和平队”志愿人员，对于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提出了比他们在塞拉勒窝内的同事更加愤怒的控诉^①。全国绝大多数橡胶种植园给予工人人们的工资低到如此程度，以至许多利比里亚人即使挨饿也宁愿到蒙罗维亚去混日子，或者移居到沿海地区去。总统那种众所周知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一些战斗的工会领袖感到沮丧。不过，他也的确允许而且调解过一次罢工，那次罢工是由他的儿子、也就是副总统威廉·托尔伯特的女婿沙德·杜伯曼领导的。同加纳或象牙海岸形成的对照是，在利比里亚很少有种植粮食来出售的农民。有一批由国民党派来的中国专家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建立了一个种稻的农场，以此鼓励利比里亚人种植这种粮食。农场是成功的，可是那些农民似乎并不高兴。他们多少有些胆怯地抱怨说，他们送到海岸去的米，始终没有收到款子。那个承销人是一位非常显要的人物。

现在已不可能再坚持说利比里亚是美国的一

① 弗莱彻·克内贝尔曾以“和平队”的这种不满情绪作为主题写成一部小说《津津路》(艾伦书店1967年版)。小说里的“卡尔耶”就是影射利比里亚，“家族”则是指美裔利比里亚人。

个殖民地了。虽然费尔斯通还是最大的剥削者，它仍旧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但是，欧洲人已经插手进来了。在靠近几内亚边境的宁巴族地区开采铁矿的拉姆科财团（利比里亚—美国—瑞典矿业公司财团）是由瑞典人所控制的。他们在布坎南建立了一个海港，并从海边铺设了一条很好的快速铁路直通铁矿山。这家公司所建立的耶克帕市镇上，有瑞典人开设的店铺和售货的瑞典姑娘，有瑞典的银行家和银行，有瑞典学校，还有一个瑞典的美术中心，在那里展出的是瑞典儿童艺术家画的瑞典阿飞和瑞典无赖；我注意到，这里面没有一幅有关非洲的作品。公司在这里建设了一个很好的市镇，那里有诸如杜伯曼坡和威·瓦·沙·杜伯曼总统路等等华丽的大马路。公司也照顾工人们健康和幸福。据他们告诉我：“在这里，各个部族都混在一起了，因而也造成了一些问题，需要经常商谈。我们之所以要造两幢茅草圆顶的‘会谈室’，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工人们，这就是一个原因。这两幢房子是按照本地的样式建造的，但使用的水泥板等却都是文明人用的材料，而且还用钢管代替了木柱子。”不过，有关公司本身

的事情是不容许商谈的。1966年8月出版的《拉姆科新闻》上登载了一篇《工人向公司的道歉声明》，在这里面，利比里亚全国矿工协会副主席J·本杰明·邓肯，对一次非法的罢工深表遗憾，声明协会负责人在罢工问题上是无辜的，并提出他的希望说，劳工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将“永远存在于良好的气氛中”。这一声明信的副本，被送给了工商部长、地方长官，当然还送给了威·瓦·沙·杜伯曼总统。等到铁矿山开平以后，瑞典人就将撤离，可是很少非洲人会从他们那里学到技术。这不仅是因为绝大部分管理工作都是由瑞典人自己担任的，而且一些熟练的手工作业，也都由其他地区的非洲人担任。一个经理对我这样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优秀的木匠或泥水匠，你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几乎一定会说是几内亚、塞内加尔或塞拉勒窝内。有很多熟练的技工，是特地从加纳、尼日利亚和塞拉勒窝内招募来的，来担任操纵机动铲之类的技术工作。”

这个国家的建立，原来是为了要把文明带给非洲，但现在，它自己所需的技工也得依赖尼日利亚和加纳；而这两个国家，仅仅在一百年之前，还

是处于原始社会状态。这个曾经有布莱登这样的人在这里演讲和写作过的国家，现在在知识方面却是一片不毛之地。在报纸上，只有占星算命还有点趣味：“今天上半天，你会感到有些不舒服。这不是疟疾。而是由于月亮的反光射在你的星宿上造成的。爱情略有进展，时机稍纵即逝。找一位讲道者来为你解决宗教上的疑虑吧。”这就是1967年12月2日给我占卜算命的批词。就在这份报纸里，事实上在利比里亚的每一种报刊的每一期里，都塞满了对总统的阿谀奉承：

威廉氏的大盆^①是一个进步的源泉，
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财富和幸福。
更多地关心部落的福利，
纠正对部落人民的亏待，
就是从这只大盆里流出来的
关于内陆政策的主要原则。

现在是不会再有人记得了：正是对部落人民如此关心的“这只大盆”，曾经由于帮助把部落人民卖到斐南多波去当劳工，被国际联盟的调查困点了

① “大盆”的原文 Tub，指的是杜伯曼(Tubman)。这里是一语双关。——译者

名，因而不得不辞去了参议员的席位。

杜伯曼总统在他的乡间住宅里接见了。他是一个生气勃勃而有吸引力的人。他酷爱雪茄烟、女人和威士忌。他是一个笑脸迎人的、天真烂漫的、对政治狂热的哲学家，他那样子就象是一个在舞台上被丑化了的南方参议员——只是皮肤黑一些而已。他的精力是令人吃惊的。政府发出的支票，金额在一百元以上的都要由他副署，每天他还要接见几十个来客。当我们正在他的农场里和他谈话时，就有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律师来找他，还有一个穿着乡下服装的农民为了土地权问题到他这里来告状。他本性好动和好奇，喜欢不断地到利比里亚国内和世界各地去活动；可是，他害怕乘飞机，所以在他那艘总统游艇于一次相当神秘的事件中沉没之前，他总是走海路到处旅行的。总统在外国旅行时搜集了各种动物，他喜欢在自己那所私人动物园中闲逛。“这是什么？”他在一只笼子面前问道。“看上去象是一大袋羊毛。美洲驼？肯定是从博耳吉巴来的。替它把毛剪一下。”几乎和其他的任何东西一样，这只美洲驼又使总统想起了《圣经》。“《圣经》里面说……‘象羊

在剪毛的人手下’^①。……前些日子我在肯尼亚看到人们正在给羊剪毛，它们都是不张嘴的。《圣经》里面的古人一定见到过这种情形。”当我们提出请求，要为他照一张相时，这位总统微笑着同意，他说：“我是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②

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没有实现它们的创立者的愿望。毛病就出在“回到非洲去”这个概念。这个计划的第一个也是最重大的目的是失败了：它并没有改善英国和美国黑人的命运。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的“黑人问题”，是在随后的一百年中逐渐消失的；但这并不是建立了塞拉勒窝内的结果。离开英国到非洲去定居的黑人不过三百来人，也就是只占到估计总数的约百分之一。塞拉勒窝内成立殖民地很多年以后，在英国还是有大量的黑人。现在也无法断定这一批人是怎样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消失的。有些人可能是到加拿大或美国

① 《圣经》中的全文是：“他象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象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见《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译者

②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一语，见《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译者

去了，或是在奴隶制度废除后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也许有许多人病死或冻死了。我们只能猜测：大部分黑人同白人结了婚，他们的子孙又同白人通婚，他们的后裔终于不再被看作是黑人或有色人种，而只被看作是皮肤较黑的英国人。那些反对黑人的政论家预言英国要发生混血现象，繁殖出一种象葡萄牙人那样肤色微黑的人种，他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发生学和遗传性的作用。在任何一种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种不但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格外受到人们羡慕的话，那么，以后这个种族也势必将世世代代居于优势地位。葡萄牙人诚然具有把他们征服的穆斯林非洲人的浅黑肤色，可是，正如季尔贝托·弗雷勒博士指出的：葡萄牙人对他们的统治者的相貌已经产生了羡慕。在葡萄牙人的故事和传说中，“棕色的摩尔人姑娘被认为是美丽和性的魅力的至高无上的典型，摩尔人被认为比纯粹白种的葡萄牙人优秀，决不比他们逊色。”

美国有几十万黑人，但它向非洲移民的效果却更差。大凡有一个黑人迁移到利比里亚，就有十个乃至二十个黑人繁殖出来到南方各州的种植园去当奴隶。殖民运动远远没有减轻获得自由的

贫苦黑人的痛苦，只是更煽起了奴隶制度的拥护者和批评者的激烈情绪。马克斯·加维运动，使黑人对自己的非洲传统感到了新的骄傲，但在这个运动中，也只送了为数极少的黑人到非洲去。

把黑人从英国和美国移殖到非洲去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把文明带到非洲去，但是这也失败了。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始终没有深入扩展到西非的腹地。在二十世纪以前，移民们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越出沿海的城市和乡村。这个失败，同样也不能责怪殖民者。十九世纪时的利比里亚人和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既没有人力又没有资本去开发内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开化”非洲，实际上是在工商业公司的经济力量的支持之下，来建立军队，修筑铁路和设置成套的官员。在本世纪里，这些资本家甚至试图把一度在弗里敦和蒙罗维亚行使权力的移民们的势力都撵出去。夏普和美国殖民协会所指望的对非洲的拯救，必须等到尤尼莱佛、费尔斯通、利物浦市商会的时代成熟之后才能实现。

就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而言，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的黑人移民，在十九世纪中还是获得了

相当大的成就。弗里敦和蒙罗维亚都曾是繁荣的和治理得很好的城市。商业和各种行业都很兴旺。克里奥尔族的商人、传教士以及公务员，把文明生活带到了整个西非海岸。象布莱登、克劳瑟以及刘易斯这些人，如果考虑到他们原来都是奴隶或奴隶的后裔，他们的事业似乎就更加不平凡了。这两个殖民地在十九世纪时的情况，确实为那些愿意承认事实的人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黑色人种是有自治的能力的。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败落到今天这样糟糕的情况，其责任不在于它们的国民，而应归咎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不过，如果同美国南方各州的大部分地方比较，同纽约、芝加哥的黑人居住区比较，同巴西东北部的悲惨的黑人地区以及海地共和国比较，那末，今天的塞拉勒窝内，甚至利比里亚，也可以算是比较舒服的地方了。

犹太复国运动经过了两千年，一直到数百万犹太人死在希特勒的死亡营里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回到巴勒斯坦去的动力，就来自那些受尽了打击的残存者。美国的犹太人尽管向以色列提供了金钱，但他们很少有迁移的愿望。

如果——但愿不会如此——散处各地的黑人万一而成为一种绝灭种族政策的牺牲者，那末，他们的残存者也可能起来要求回到他们的故乡去。同时，回到非洲去，也并不能医治黑色人种的痛苦。福音派和殖民主义者，希望“回到非洲去”运动能对贩卖奴隶到美洲去的残酷行为，有所补偿。它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西方文明继续存在，白人对非洲所犯下的罪行是永远无法补偿的。

资料来源说明

这本书的资料来源大部分是第二手的。著书或写论文的学者们，对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的历史，大部分都已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们把各自的力量集中在每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段时期。对象我这样希望写一部解说性的历史的人们来说，要把这些前人耕耘过的土地从新犁一遍，那必须把毕生的精力投下去才能做到。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发现很少材料不是早已被象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这样的学者发现过了。在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利比里亚时，我研究了最近公开的外交部档案。同样地，我尽管在文件里找到了例证，但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改变我的命题的材料。这些文件仅仅足以证明我早已猜想到的事情：英国对利比里亚的政策，是由它对费尔斯通公司的嫉妒心所支配的。在这一本书中，我胆敢自称是原始的、惊人的一部分，乃是有关两百年前在英

国的黑人问题的部分。这一部分的例证，是来自第二手的然而被遗忘了的资料。下面我对每一章作了一些引用书目的说明。对于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书籍，我还补充了一个更详细一些的参考书目。凡是没有全部引证的书籍，都已详细列入参考书目中了。

第一部分。第一章

对于这一章以及其他各章中有关塞拉勒窝内直到本世纪的材料，我得完全感谢克里斯托弗·法伊夫的著作《塞拉勒窝内史》。作为塞拉勒窝内政府过去的一个临时档案保管员，法伊夫先生曾经在这一本不朽而又精致的历史书上，花费了不少岁月。他的参考书目以及说明，对进一步的研究和阅读，也是有价值的向导。对于有关塞拉勒窝内的创立的、财政部和海军部的文件，我曾经进行过全面的探究，希望对旅客中的白人妓女这一秘密，找到一些法伊夫先生可能遗漏的例证。但是，这一方面的探究并未获得成果。对 J·琼·赫克特所著《十八世纪英国的大陆与殖民地官员》一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上而列举的书又为我提

供了线索，使我看到了一些有关十八世纪有色人种问题的、很少为人知道的小册子和廉价的传奇小说。关于这一章的其他主要资料来源，还有格兰维尔·夏普以及他的传记作者普林斯·霍尔的著作。

第一部分。第二章

最近重印的安娜·福尔肯布里奇的《到塞拉勒窝内河的两次航行》一书很有趣，也相当可信。夏普写的东西也很重要。查塔姆和海军部的文件记录了移民和奴隶贩子之间的敌意。

第一部分。第三章

英国博物馆里有关克拉克森的文件，1927年5月号《塞拉勒窝内研究》上引用的他的日记摘要，都是有价值的材料。

第一部分。第四章

克努茨福特男爵夫人所著传记中引用的麦考利的笔记，为这个不愉快的人留下了引起人们兴趣的印象。原件现存洛杉矶。

第一部分。第六章

麦卡锡发送的那些急件公文，乏味得令人失望。但对于书籍、小册子和报章上的有关麦考利家族和他们的诽谤者之间的激烈争吵，却不能这样说。罗伯特·索普和肯尼思·麦考利在争论中是最最激烈的。

第二部分。第一章

查尔斯·亨利·胡布里希著《利比里亚的政治和立法史》是一部百科全书，但是索然寡味。而且这本书只写到十九世纪中叶。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的《利比里亚》写到本世纪。虽然他没有引用很多的有关资料，但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他的文风是赏心悦目的。有一本第一流的新书，即P·J·斯陶登劳斯著《非洲殖民运动，1816—1865》。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有学术价值的书，也是进一步阅读其他书籍的很好的指南。我广泛地阅读了有关十九世纪初美国黑人问题的书，以及当代政治家和传道师所写的书或有关他们的书。

第二部分。第二章

胡布里希引用的文件补充了米尔斯和培根的传记。我还翻阅了全部的《非洲宝库》，这是美国殖民协会的杂志：有宗派成见，但是能说明问题。

第二部分。第三章

阿什曼著《美国在利比里亚的殖民地史》和格利著《杰胡迪·阿什曼传》是这一章和第四章的主要资料。在《非洲宝库》和胡布里希及斯陶登劳斯的著作中还有更多的资料。

第二部分。第五章

加里森的著作以及有关加里森的著作，补充了斯陶登劳斯对殖民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之争的精辟分析。大西洋两岸就此题目出版了大量作品。

第二部分。第六章

胡布里希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利比里亚独立过程的宝贵资料。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的书则以友好的方式进行了批评。

第三部分。第一章

阿瑟·T·波特的《克里奥尔人之邦》对“黑人绅士”的盛衰兴亡作了很好的分析。J·D·哈格里夫斯的《塞缪尔·刘易斯爵士传》也极重要。杰西·佩奇的《黑人主教——塞缪尔·阿贾·克劳瑟》缺少了点批判。可惜詹姆斯·艾弗里卡纳斯·霍顿至今还连一本传记也没有，不过他本人的几本书都是很引人入胜的。

第三部分。第二章

十九世纪关于塞拉勒窝内的记载颇多，当地居民写的和游客写的都有。兰金的《白人坟》一书最可一读；普尔的《塞拉勒窝内和冈比亚的生活图景与风俗人情》，写来无意，却是最风趣的一部作品。

第三部分。第三章

伯顿、里德和金斯利的作品可无庸赘述。为伯顿写传记的两个作者，以法韦尔较布罗迪稍胜。两人都写得极好。

第三部分。第四章

N·A·考克斯-乔治的《西非洲的财政与发展》是一部研究塞拉勒窝内经济的优秀著作。比较概括的论述“争夺非洲”运动的重要著作，有玛丽·金斯利和E·D·莫雷尔的作品。此外，还可参看《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书。

第四部分。第一章

布朗的《利比里亚经济史》是重要的。本杰明·安德森的《木萨杜旅行纪实》将于1971年春由卡斯出版社(伦敦)再版。

第四部分。第二章

布莱登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黑种人》新近再版，并附有克里斯托弗·法伊夫的序言。有一本新出版的第一流传记，即霍利斯·R·林奇的《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传》。该书透彻地阐明了十九世纪时利比里亚的政治情况，特别是黑人与混血儿争论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第三章

要了解有关利比里亚的经济衰落过程，可参阅布朗的著作，也可参阅阿齐克韦的著作。阿齐克韦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优秀得多的历史学家。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对他本人在利比里亚的作用所作的描述是一般的；约翰斯顿传记的作者罗兰·奥利弗，在其所著《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和争夺非洲运动》一书中，对此作了较好的描述。哈维·费尔斯通及其传记作者的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橡胶种植园的创建过程。

第四部分。第四章

埃德蒙·戴维·克罗囊的《黑摩西》，对马克斯·加维作了既表同情而又公正、全面的研究。加维所著《哲学和主张》的内容，吹嘘多于说理。杜波依斯的有关著作要比目前已出版的论述加维的书写得好。

第五部分。第一章

马丁·基尔森的《一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变化》正确地叙述了本世纪的塞拉勒窝内的不太动人的历史。考克斯-乔治再次对经济发展作了说明。那

些美国社会学家的作品，语言深奥费解，使我摸不着头脑。几年以前，格雷厄姆·格林回到弗里敦住在市旅馆里度圣诞节。他的叙述发表在《周末电讯》杂志中。

第五部分。第二章

梅兰·弗伦克尔的《蒙罗维亚的部族和阶级》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但写得很好，观察也很深刻。R·厄尔·安德森在《利比里亚，美国的朋友》一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及战后的利比里亚作了很好的叙述。《英雄们疲乏了》是一篇印象主义的作品，它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

第五部分。第三章

这一章是根据我在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住了两个月的见闻写成的。

参 考 书 目

参 考 用 书

Abel, Annie Heloise and Frank J. Klingsbury, «A Sidelight 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39—1858» (New York, 1927)

艾贝尔, 安妮·赫洛伊斯和弗兰克·J·克林斯伯里合著:
《1839—1858年英美关系侧记》(纽约, 1927)

«Address to the Public on the Subject of the African School...»
(New York, 1816)

《关于非洲学校问题对公众的演说……》(纽约, 1816)

«Africa Redeemed» (London, 1851)

《得救的非洲》(伦敦, 1851)

Afzelius, Adam, «Journal», Ed. A. P. Kup (Upsala, 1967)

阿夫济留斯, 亚当:《日记》, A·P·库普编(乌普萨拉, 1967)

Alexander, James Edward, «Narrative of a Voyage ... »
(London, 1837)

亚历山大, 詹姆斯·爱德华:《……航海记》(伦敦, 1837)

Allridge, T. J., «A Transformed Colony» (London, 1910)

- 奥尔里奇, T. J.: 《一个变化了的殖民地》(伦敦, 1910)
——《The Sherbro and its Hinterland》(London, 1901)
《歇尔布罗岛及其腹地》(伦敦, 1901)
《An Answer to the Rev. Mr Clarkson's Essay》(London, 1789)
《对牧师克拉克森先生一文的答复》(伦敦, 1789)
Anderson, Benjamin,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Musardu》
(New York, 1870)
安德森, 本杰明: 《木萨杜旅行纪实》(纽约, 1870)
Anderson, R. Earle, 《Liberia, America's Friend》(New York,
1952)
安德森, R·厄尔: 《利比里亚, 美国的朋友》(纽约, 1952)
Andreski, Stanislav, 《The African Predicament》(London,
1968)
安德烈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 《非洲的困境》(伦敦, 1968)
Ashmun, Jehudi,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olony in Liberia》
(Washington, 1826)
阿什曼, 杰胡迪: 《美国在利比里亚的殖民地史》(华盛顿,
1826)
——《Memoir ... of the Rev. Samuel Bacon》(Washington,
1822)
《塞缪尔·培根牧师……传略》(华盛顿, 1822)
Azikiwe, Nnamdi, 《Liberia in World Politics》(London, 1934)
阿齐克韦, 纳姆迪: 《世界政治中的利比里亚》(伦敦, 1934)
Bacon, Leonard, 《A Discourse Preached at the Funeral of
Jehudi Ashmun》(1828)

- 培根, 伦纳德:《在杰胡迪·阿什曼葬礼上的演说》(1828)
- Baker, John, 《Diary》, Ed. Philip C. Yorke (London, 1931)
- 贝克, 约翰:《日记》, 菲利普·C·约克编(伦敦, 1931)
- Balandier, Georges, 《Afrique Ambigue》 (Paris, 1957)
- 巴朗迪埃, 乔治:《暧昧的非洲》(巴黎, 1957)
- Banbury, G. A. Lethbridge, 《Sierra Leone or the White Man's Grave》 (London, 1888)
- 班伯里, G. A. 莱思布里奇:《塞拉勒窝内——白人坟》(伦敦, 1888)
- Bancroft, Frederic, 《Colonization of American Negro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7)
- 班克罗夫特, 弗雷德里克:《美国黑人的移殖》(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 1957)
- Banton, M., 《West African City》 (London, 1957)
- 班顿, M.:《西非城市》(伦敦, 1957)
- Barnes, Gilbert Hobb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New York, 1933)
- 巴恩斯, 吉尔伯特·霍布斯:《1830—1844年的反对奴隶制度运动》(纽约, 1933)
- Beloff, Max, 《Thomas Jeffers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London, 1848)
- 贝洛夫, 马克斯:《托马斯·杰斐逊和美国民主》(伦敦, 1848)
- Blyden, Edward Wilmot, 《Africa and the Africans》 (London, 1903)
- 布莱登, 爱德华·威尔莫特:《非洲和非洲人》(伦敦, 1903)

-
- 《The African Problem》(London, 1890)
《非洲问题》(伦敦, 1890)
- 《Aims and Methods of a Liberal Education for Africans》
(Cambridge Mass., 1882)
《对非洲人进行高等普通教育的目的和方法》(马萨诸塞州, 坎
布里奇, 1882)
- 《The Arabic Bible in the Soudan》(London, 1910)
《苏丹的阿拉伯圣经》(伦敦, 1910)
- 《Christianity, Islam and the Negro Race》(Edinburgh,
1967)
《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黑种人》(爱丁堡, 1967)
- 《The Problems before Liberia》(London, 1909)
《利比里亚面临的问题》(伦敦, 1909)
- 《Proceedings at the Banquet in honour of Edward Wilmot
Blyden》(London, 1907)
《为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记录》
(伦敦, 1907)
- 《The Three Needs of Liberia》(London, 1908)
《利比里亚的三种需要》(伦敦, 1908)
- 《A Voice from Bleeding Africa》(Monrovia, 1856)
《流血中的非洲的呼声》(蒙罗维亚, 1856)
- 《West Africa before Europe》(London, 1905)
《欧洲前面的西非》(伦敦, 1905)
- 《The West African University》(Freetown, 1870)
《西非大学》(弗里敦, 1870)

- Bonner, Sir George, «An Assize in Sierra Leone» (Sierra Loene Studies, November 1933)
邦纳, 乔治爵士: 《塞拉勒窝内巡回审判记》(《塞拉勒窝内研究》, 1933年11月号)
- Booth, Charles, «Zachary Macaulay» (London, 1934)
布恩, 查尔斯: 《扎卡里·麦考利》(伦敦, 1934)
- Brawley, Benjami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gro» (New York, 1921)
布劳利, 本杰明: 《美国黑人社会史》(纽约, 1921)
- Bridge, Horatio, «Journal of an African Cruiser» (New York, 1853)
布里奇, 霍雷肖: 《非洲快船航海日记》(纽约, 1853)
- Broderick, Francis L., «W. E. B. Du Bois» (Stanford, 1959)
布罗德里克, 弗朗西斯·L.: 《威·爱·伯·杜波依斯》(斯坦福, 1959)
- Brodie, Fawn M., «The Devil Drives» (London, 1967)
布罗迪, 方恩·M.: 《魔鬼追来了》(伦敦, 1967)
- Brown, George W.,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iberia» (Washington, 1941)
布朗, 乔治·W.: 《利比里亚经济史》(华盛顿, 1941)
- Brown, Ina Corina,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Negro» (New York, 1936)
布朗, 艾娜·科琳娜: 《美国黑人的故事》(纽约, 1936)
- Brown, Isaac V., «Biography of the Rev. Robert Finley» (Philadelphia, 1857)

- 布朗, 艾萨克·V.: 《罗伯特·芬利牧师传》(费城, 1857)
- Buell, Raymond Leslie, 《A Century of Survival》(Philadelphia, 1947)
- 布埃耳, 雷蒙德·莱斯利: 《生存的百年》(费城, 1947)
-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New York, 1928)
- 《非洲土著问题》(纽约, 1928)
- Burns, Edward McNall, 《James Madis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38)
- 伯恩斯, 爱德华·麦克诺尔: 《詹姆斯·麦迪逊》(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 1938)
- Burton, R. F., 《Abeokuta and the Cameroons Mountains》(London, 1863)
- 伯顿, R. F.: 《阿贝奥库塔和喀麦隆山脉》(伦敦, 1863)
- with V. L. Cameron, 《To the Gold Coast for Gold》(London, 1883)
- 和 V. L. 卡梅伦合著: 《黄金海岸淘金记》(伦敦, 1883)
- 《Wanderings in West Africa》(London, 1863)
- 《西非漫游记》(伦敦, 1863)
- Butt-Thompson, F. W.,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ierra Leoneans》(Freetown, n.d.)
- 帕特-汤普森, F. W.: 《第一代塞拉勒窝内人》(弗里敦, 无出版日期)
- Campbell, Olwen, 《Mary Kingsley. A Victorian in the Jungle》(London, 1957)
- 坎贝尔, 奥尔温: 《玛丽·金斯利。丛林中的一个维多利亚时

- 代的人》(伦敦, 1957)
- Campbell-Maclachlan, A. N., «Memoir of Sir Neil Campbell»
坎贝尔-麦克拉伦, A. N.: 《尼尔·坎贝尔爵士传略》
- Carnes, J. A., «Journal of a Voyage from Boston...» (Boston, 1852)
卡恩斯, J. A.: 《从波士顿启航的航海日记……》(波士顿, 1852)
- Chamier, F., «The Life of a Sailor» (London, 1832)
查米尔, F.: 《一个水手的生涯》(伦敦, 1832)
- Church, R. J. Harrison, «West Africa» (London, 1961)
丘奇, R. J. 哈里森: 《西非洲》(伦敦, 1961)
- 'Church, Mary', «Sierra Leone or the Liberated Africans»
(London, 1835)
“丘奇, 玛丽”: 《塞拉勒窝内——解放了的非洲人》(伦敦, 1835)
- Claridge, W. Walton, «A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hanti» (London, 1915)
克拉里奇, W. 沃尔顿: 《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伦敦, 1915)
- Clarkson, John, «Extracts from Diary» (Sierra Leone Studies, March 1927)
克拉克森, 约翰: 《日记选录》(《塞拉勒窝内研究》, 1927年3月号)
- Clarkson, Thomas, «Essay on Slavery» (Dublin, 1786)
克拉克森, 托马斯: 《论奴隶制度》(都柏林, 1786)
- Clay, Henry, «Paper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1)

- 克莱, 亨利:《文集》(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61)
- Colton, Calvin, 《A Voice from America to England》(London, 1832)
- 科尔顿, 卡尔文:《美国向英国的呼吁》(伦敦, 1832)
- Conton, William, 《The African》(London, 1960)
- 康顿, 威廉:《非洲人》(伦敦, 1960)
- Corry, Joseph, 《Windward Coast of Africa》(London, 1807)
- 科里, 约瑟夫:《非洲向风海岸》(伦敦, 1807)
- Coupland, Reginald, 《Wilberforce》(London, 1945)
- 库普兰, 雷金纳德:《威尔伯福斯》(伦敦, 1945)
- Cox-George, N. A.,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West Africa》(London, 1961)
- 考克斯-乔治, N. A.:《西非洲的财政与发展》(伦敦, 1961)
- Cresson, W. P., 《James Monro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46)
- 克雷森, W. P.:《詹姆斯·门罗》(北卡罗来纳大学, 1946)
- Cronon, Edmund David, 《Black Moses》(Madison, 1955)
- 克罗囊, 埃德蒙·戴维:《黑摩西》(麦迪逊, 1955)
- Crouch, A. P., 《On a Surf-bound Coast》(London, 1887)
- 克劳奇, A. P.:《在碎浪拍击的海岸上》(伦敦, 1887)
- Dallas, R.C., 《History of the Maroons》(London, 1803)
- 达拉斯, R. C.:《马隆人的历史》(伦敦, 1803)
- Davidson, Basil, 《Africa in History》(London, 1968)
- 戴维森, 巴兹尔:《历史上的非洲》(伦敦, 1968)
- Davis, R. P. M., 《History of the Sierra Leone Battalion of

- the Royal 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 (Freetown, 1932)
戴维斯, R. P. M.: 《英国西非边防军塞拉勒窝内营史》(弗里敦, 1932)
- Davis, Stanley A., 《This is Liberia》(New York, 1953)
戴维斯, 斯坦利·A.: 《这就是利比里亚》(纽约, 1953)
- Drake, St Clair and Horace R.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New York, 1962)
德雷克, 圣克莱尔和霍勒斯·R·凯顿合著: 《黑人都市》(纽约, 1962)
- Du Bois, W. E. B., 《Black Folk》(New York, 1939)
杜波依斯, 威·爱·伯: 《黑人》(纽约, 1939)
——《Dusk of Dawn》(New York, 1940)
《黎明前的薄暗》(纽约, 1940)
——《The World and Africa》(New York, 1947)
《世界与非洲》(纽约, 1947)
- Duffy, James, 《Portugal in Africa》(London, 1962)
达菲, 詹姆斯: 《葡萄牙在非洲》(伦敦, 1962)
- Easmon, M. C. F., 《Paramount Chief Bai Kur, M.B.E.,
M.L.C.》(Sierra Leone Studies, June 1957)
伊斯芒, M. C. F.: 《英帝国五级勋章获得者、议会议员、最高酋长拜伊库尔》(《塞拉勒窝内研究》, 1957年6月号)
——《Sierra Leone Cloths》(Freetown, 1924)
《塞拉勒窝内的传教士》(弗里敦, 1924)
——《Sierra Leone's Connection with Royalty》(Sierra Leone
Studies, June 1962)

《塞拉勒窝内与王室的关系》(《塞拉勒窝内研究》, 1962年6月号)

Eaton, Clement, 《Henry Clay and the Art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1957)

伊顿, 克莱门特: 《亨利·克莱和美国政治艺术》(纽约, 1957)

Eberl-Elber, Ralph, 《Westafrika's Letztes Rätsel》(Salzburg, 1936)

埃贝尔-埃尔贝, 拉尔夫: 《西非洲的最后之谜》(萨尔斯堡, 1936)

《Eminent Sierra Leoneans》(Freetown, 1962)

《塞拉勒窝内名人录》(弗里敦, 1962)

Evans, Ifor L., 《The British in Tropical Africa》(Cambridge, 1929)

伊万斯, 艾弗·L.: 《英国人在热带非洲》(剑桥, 1929)

Falconbridge, A. M., 《Two Voyages to the Sierra Leone River》(London, 1967)

福尔肯布里奇, A. M.: 《到塞拉勒窝内河的两次航行》(伦敦, 1967)

Farwell, Byron, 《Burton》(London, 1963)

法韦尔, 拜伦: 《伯顿》(伦敦, 1963)

Figaniere e Morao, J. C. de, 《Descripcao de Serra-Leoa...》(Lisbon, 1822)

菲加尼埃里-莫拉奥, J. C. 德: 《塞拉勒窝内概况……》(里斯本, 1822)

Firestone, Harvey S., with Samuel Crowther, 《Men and

Rubber» (London, 1926)

费尔斯通, 哈维·S. 和塞缪尔·克劳瑟合著:《人和橡胶》(伦敦, 1926)

First, Ruth, «South West Africa» (London, 1963)

弗斯特, 鲁思:《西南非洲》(伦敦, 1963)

Fitch-Jones, B. W., «Hill Station» (Sierra Leone Studies, November 1932)

菲奇-琼斯, B. W.:《山上住宅区》(《塞拉勒窝内研究》, 1932年11月号)

Fleming, Ian, «The Diamond Smugglers» (London, 1957)

弗莱明, 伊恩:《钻石走私者》(伦敦, 1957)

Flickinger, D. K., «Ethiopia or Twenty Years of Missionary Life» (Dayton, 1877)

弗利金格, D. K.:《埃塞俄比亚——传教生活二十年》(戴顿, 1877)

——«Sketches in Africa» (Dayton, 1857)

《非洲见闻》(戴顿, 1857)

Flickinger, R. E., «The Flickinger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s Moines, 1927)

弗利金格, R. E.:《弗利金格家族在美国》(得梅因, 1927)

Floyd, Barry, «Eastern Nigeria» (London, 1969)

弗洛伊德, 巴里:《东尼日利亚》(伦敦, 1969)

Fowler-Lunn, Katharine, «The Gold Missus» (London, 1938)

福勒-伦恩, 凯瑟琳:《黄金夫人》(伦敦, 1938)

Fraenkel, Merran, «Tribe and Class in Monrovia» (London,

1964)

弗伦克尔, 梅兰:《蒙罗维亚的部族和阶级》(伦敦, 1964)

Franck, Frederick, «African Sketchbook» (London, 1962)

弗兰克, 弗雷德里克:《非洲札记》(伦敦, 1962)

Franklin, John Hope,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New York, 1956)

富兰克林, 约翰·霍普:《从奴隶到自由》(纽约, 1956)

«Freetown Vademecum», Compiled by Hans M. Zell (Freetown, 1966)

《弗里敦市一览》, 汉斯·M. 泽尔编(弗里敦, 1966)

Freyre, Gilberto, «New World in the Tropics» (New York, 1951)

弗雷勒, 季尔贝托:《热带的新世界》(纽约, 1951)

Fuess, Claude M., «Daniel Webster» (Boston, 1930)

菲斯, 克劳德·M.:《丹尼尔·韦伯斯特》(波士顿, 1930)

Furbay, Elizabeth Dearman, «Top hats and Tom-Toms» (London, 1946)

弗贝伊, 伊丽莎白·迪尔曼:《大礼帽和锣鼓》(伦敦, 1946)

Fyfe, Christopher,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London, 1962)

法伊夫, 克里斯托弗:《塞拉勒窝内史》(伦敦, 1962)

——«Obituary of Charles Rhodoway Morrison» (Sierra Leone Studies, December 1961)

《故查尔斯·罗多韦·莫里森略传》(《塞拉勒窝内研究》, 1961年12月号)

- 《The Sierra Leone Pr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ierra Leone Studies, January 1957)
《十九世纪塞拉勒窝内的报刊》(《塞拉勒窝内研究》，1957年
1月号)
- and E. D. Jones, 《Freetown》(London, 1968)
和 E·D·琼斯合著:《弗里敦》(伦敦, 1968)
- Fyfe, Christopher (ed.), 《Sierra Leone Inheritance》(London,
1964)
法伊夫, 克里斯托弗(编):《塞拉勒窝内遗产》(伦敦, 1964)
- Fyfe, C. H., 《Thomas Peters: History and Legend》(Sierra
Leone Studies, December 1953)
法伊夫, C. H.:《托马斯·彼得斯:历史和传说》(《塞拉勒窝
内研究》，1953年12月号)
- Garnier, Christine, 《Les Héros Sont Fatigués》(Paris, 1953)
加尼埃, 克里斯蒂娜:《英雄们疲乏了》(巴黎, 1953)
- Garrison, William Lloyd,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Bro-
adway Tabernacle, Boston》(1838)
加里森, 威廉·劳埃德:《在波士顿百老汇教堂的演说》(1838)
- 《An Address delivered ... in Philadelphia》(1831)
《在费城……的演说》(1831)
- Garrison, W. P. and F. J., 《William Lloyd Garrison》(New
York, 1885)
加里森, W. P. 和 F. J. 加里森合著:《威廉·劳埃德·加
里森》(纽约, 1885)
- Garvey, Marcus, 《Philosophy and Opinions》compiled by

- Amy Jacques Garvey (London, 1967)
加维, 马克斯: 《哲学和主张》, 艾米·雅克·加维编 (伦敦, 1967)
- George, Claude, 《The Rise of British West Africa》 (London, 1904)
乔治, 克劳德: 《英属西非洲的兴起》(伦敦, 1904)
- Green, Lawrence G., 《White Man's Grave》 (London, 1954)
格林, 劳伦斯·G.: 《白人坟》(伦敦, 1954)
- Greene, Barbara, 《Land Benighted》 (London, 1938)
格林, 巴巴拉: 《蒙昧之乡》(伦敦, 1938)
- Greene, Graham,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London, 1962)
格林, 格雷厄姆: 《问题的中心》(伦敦, 1962)
——《In Search of a Character》 (London, 1961)
《探索一种性格》(伦敦, 1961)
——《Journey Without Maps》(London, 1962)
《不带地图的旅行》(伦敦, 1962)
- Greenwall, Harry J. and Roland Wild, 《Unknown Liberia》 (London, 1936)
格林沃尔, 哈里·J. 和罗兰·怀尔德合著: 《神秘的利比里亚》(伦敦, 1936)
- Gunther, John, 《Inside Africa》 (London, 1955)
根室, 约翰: 《非洲内幕》(伦敦, 1955)
- Gurley, Ralph Randolph, 《On the Colo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of Africa》 (London, 1841)
格利, 拉尔夫·伦道夫: 《论非洲的移民和文明》(伦敦, 1841)

- 《Life of Jehudi Ashmun》(New York, 1835)
《杰胡迪·阿什曼传》(纽约, 1835)
- Gwynn, S., 《The Life of Mary Kingsley》(London, 1932)
格温, S.: 《玛丽·金斯利传》(伦敦, 1932)
- Halliburton, G., 《The Nova Scotian Settlers of 1792》(Sierra Leone Studies, December 1957)
哈利伯顿, G.: 《1792年的新斯科舍移民》(《塞拉勒窝内研究》, 1957年12月号)
- Hargreaves, J. D., 《African Colo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ierra Leone Studies, June 1962)
哈格里夫斯, J. D.: 《十九世纪非洲的殖民地化》(《塞拉勒窝内研究》, 1962年6月号)
- 《A Life of Sir Samuel Lewis》(London, 1958)
《塞缪尔·刘易斯爵士传》(伦敦, 1958)
- 《Prelude to the Partition of West Africa》(London, 1963)
《瓜分西非的序幕》(伦敦, 1963)
- 《Sir Samuel Lewis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ierra Leone Studies, December 1953)
《塞缪尔·刘易斯爵士和立法会议》(《塞拉勒窝内研究》, 1953年12月号)
- Ed., 《France and West Africa》(London, 1969)
编: 《法国和西非洲》(伦敦, 1969)
- Harris, John M., 《Annexations to Sierra Leone》(London, 1883)
哈里斯, 约翰·M.: 《塞拉勒窝内的兼并领土》(伦敦, 1883)

- Hayman, Arthur I., and Harold Preece, «Lighting up Liberia»
(New York, 1943)
海曼,阿瑟·I.和哈罗德·普里斯:《开化利比里亚》(纽约,
1943)
- Hecht, J. Jean, «Continental and Colonial Servant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Northampton Mass., 1954)
赫克特, J·琼:《十八世纪英国的大陆与殖民地官员》(马萨诸
塞州, 诺桑普敦, 1954)
- Henries, Doris B., «The Liberian Nation,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1954)
亨利斯, 多里斯·B.:《利比里亚民族简史》(纽约, 1954)
- ‘Hereditary Planter’, «Observations upon the Oligarchy...»
(London, 1816)
“世袭农场主”:《关于寡头政治的研究报告……》(伦敦, 1816)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60)
《美国的历史统计》(美国商务部, 1960)
- Hoare, Prince, «Memoirs of Granville Sharp Esq.» (London,
1820)
霍尔, 普林斯:《格兰维尔·夏普先生回忆录》(伦敦, 1820)
- Holman, James, «Travels in Madeira... etc.» (London, 1840)
霍尔曼, 詹姆斯:《马德拉……等地游记》(伦敦, 1840)
- Horton, James Africanus, «Physical and Medical Climate and
Meteorology of the West Coast of Africa» (London, 1867)
霍顿, 詹姆斯·艾弗里卡纳斯:《非洲西海岸的物理气候、医疗

- 气候和气象状态》(伦敦, 1867)
- 《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London, 1868)
- 《西非国家和人民》(伦敦, 1868)
- Huberich, Charles Henry,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of Liberia》(New York, 1947)
- 胡布里希, 查尔斯·亨利:《利比里亚的政治和立法史》(纽约, 1947)
- Hutchinson, Thomas, 《Diary and Letters》, Ed. Peter Orlando (London, 1886)
- 哈钦森, 托马斯:《日记书信集》, 彼得·奥兰多编(伦敦, 1886)
- Huxley, Elspeth, 《Four Guineas》(London, 1957)
- 赫克斯利, 埃尔斯佩思:《四个几内亚》(伦敦, 1957)
- 《Industrial Exhibition at Sierra Leone》(London, 1866)
- 《塞拉勒窝内实业展览会》(伦敦, 1866)
- Ingham, E. G., 《Sierra Leone. After a Hundred Years》(London, 1894)
- 英厄姆, E. G.:《塞拉勒窝内。一百年以后》(伦敦, 1894)
- Innes, William, 《Liberia》(Edinburgh, 1831)
- 英尼斯, 威廉:《利比里亚》(爱丁堡, 1831)
- Jackman, Isaac, 《The Divorce. A Farce》(London, 1781)
- 杰克曼, 艾萨克:《离婚。一出闹剧》(伦敦, 1781)
- Jaeger, Muriel, 《Before Victoria》(London, 1967)
- 耶格, 穆里尔:《维多利亚之前》(伦敦, 1967)
- Jay, William, 《Slavery in America》(London, 1835)
- 杰伊, 威廉:《美国的奴隶制度》(伦敦, 1835)

- Jefferson, Thomas, «Notes on Virginia» (1782)
杰斐逊, 托马斯:《弗吉尼亚札记》(1782)
- Johnson, L. G., «General T. Perronet Thompson» (London, 1957)
约翰逊, L.G.:《T·佩罗内特·汤普森将军》(伦敦, 1957)
- Johnson, Oliver,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nd his Times» (Boston, 1881)
约翰逊, 奥利弗:《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他的时代》(波士顿, 1881)
- Johnston, Harry H., «The Gay-Dombeys» (London, 1916)
约翰斯顿, 哈里·H.:《盖伊-当贝一家》(伦敦, 1916)
——«Liberia» (London, 1906)
《利比里亚》(伦敦, 1906)
- Kilham, Hannah, «Present State of the Colony of Sierra Leone» (London, 1832)
基勒姆, 汉纳:《塞拉勒窝内殖民地现状》(伦敦, 1832)
- Kilson, Martin, «Political Change in a West African State» (Harvard, 1966)
基尔森, 马丁:《一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变化》(哈佛, 1966)
- Kingsley, Mary, «Travels in West Africa» (London, 1897)
金斯利, 玛丽:《西非游记》(伦敦, 1897)
——«West African Studies» (London, 1901)
《西非调查》(伦敦, 1901)
- Kirk-Greene, Anthony, «David George. The Nova Scotian Experience» (Sierra Leone Studies, December 1960)

- 柯克-格林, 安东尼:《戴维·乔治。新斯科舍人的经历》(《塞拉勒窝内研究》, 1960年12月号)
- Knutsford, Baroness, 《Life and letters of Zachary Macaulay》(London, 1900)
- 克努茨福特男爵夫人:《扎卡里·麦考利的生平和书信》(伦敦, 1900)
- Kuczynski, R. R., 《Demographic Surve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Empire》(London, 1948)
- 库钦斯基, R. R.:《英殖民帝国的人口统计调查》(伦敦, 1948)
- Kup, A. P.,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1400—1787》(London, 1963)
- 库普, A. P.:《1400—1787年的塞拉勒窝内史》(伦敦, 1963)
- Lardner, H. H., 《The Agricultural Question》(London, 1880)
- 拉德纳, H. H.:《农业问题》(伦敦, 1880)
- Lascelles, Edward, 《Granville Sharp》(London, 1928)
- 拉塞尔斯, 爱德华:《格兰维尔·夏普》(伦敦, 1928)
- Latrobe, John H. B., 《Maryland in Liberia》(Baltimore, 1885)
- 拉特罗布, 约翰·H. B.:《利比里亚的马里兰》(巴尔的摩, 1885)
- Lawrence, A. W., 《Castles and Forts of West Africa》(London, 1963)
- 劳伦斯, A. W.:《西非洲的城堡和堡垒》(伦敦, 1963)
- 《League of Nations Document C. 658M. 272. Commission's Report》(Geneva, 1930)

- 《国际联盟文件 C. 658 M. 272. 委员会报告》(日内瓦, 1930)
- Legum, Colin, ed., 《Africa Handbook》 (London, 1961)
- 莱古姆, 科林编:《非洲手册》(伦敦, 1961)
- Leonard, Peter, 《Voyage to the Western Coast of Africa》
(Edinburgh, 1833)
- 伦纳德, 彼得:《非洲西海岸之行》(爱丁堡, 1833)
- Lethbridge, Alan, 《West Africa the Elusive》 (London, 1921)
- 莱思布里奇, 艾伦:《不可捉摸的西非洲》(伦敦, 1921)
- Lewis, Roy, 《Sierra Leone》 (London, 1958)
- 刘易斯, 罗伊:《塞拉勒窝内》(伦敦, 1958)
- 《Liberia. Open Door to Travel and Investment》 (Monrovia,
1967)
- 《利比里亚。欢迎旅行和投资》(蒙罗维亚, 1967)
- Lief, Alfred, 《Harvey Firestone. Free Man of Enterprise》
(New York, 1951)
- 利夫, 艾尔弗雷德:《哈维·费尔斯通。自由企业家》(纽约,
1951)
- Long, Edward, 《Candid Reflections...》 (London, 1772)
- 朗, 爱德华:《……率直意见》(伦敦, 1772)
- 《History of Jamaica》 (London, 1774)
- 《牙买加史》(伦敦, 1774)
- Lynch, Hollis R., 《Edward Wilmot Blyden》 (London, 1967)
- 林奇, 霍利斯·R.:《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传》(伦敦, 1967)
- Macaulay, Kenneth, 《The Colony of Sierra Leone Vindicated》
(London, 1968)

- 麦考利, 肯尼思:《为塞拉勒窝内殖民地辩护》(伦敦, 1968)
- Macaulay, Zachary, «A Letter to... the Duke of Gloucester»
(London, 1815)
- 麦考利, 扎卡里:《致格洛斯特公爵的信……》(伦敦, 1815)
- Mackay, Claude, «Harlem» (New York, 1940)
- 麦凯, 克劳德:《哈莱姆》(纽约, 1940)
- Mackenzie-Grieve, Averil, «The Great Achievement» (London,
1953)
- 麦肯齐-格里夫, 艾夫里尔:《巨大的成就》(伦敦, 1953)
- Marchais, Chevalier de, «Voyage en Guinée» (Paris, 1830)
- 马歇, 薛瓦利埃·德:《几内亚游记》(巴黎, 1830)
- Marteroy, P. H., «Freetown 1899—1938» (Sierra Leone
Studies, January 1939)
- 马特罗伊, P. H.:《1899—1938年的弗里敦》(《塞拉勒窝内研究》,
1939年1月号)
- Martinelli, Lawrence A., «The New Liberia» (London, 1964)
- 马蒂内利, 劳伦斯·A.:《新利比里亚》(伦敦, 1964)
- Matthews, John, «A Voyage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London, 1788)
- 马修斯, 约翰:《塞拉勒窝内河之行》(伦敦, 1788)
- Maugham, R. C. F.,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London, 1920)
- 莫姆, R. C. F.:《利比里亚共和国》(伦敦, 1920)
- «Memoir of the Rev. W. A. B. Johnson» (London, 1852)
- 《W. A. B. 约翰逊牧师言行录》(伦敦, 1852)
- «Memorials of John Bowen. Late Bishop of Sierra Leone»

- (London, 1862)
- 《塞拉勒窝内故主教约翰·鲍恩年谱》(伦敦, 1862)
- Merrill, Walter M., «Against Wind and Tide» (Harvard, 1963)
- 梅里尔, 沃尔特·M.: 《顶风逆潮》(哈佛, 1963)
- Metcalfe, G. E., «MacLean of the Gold Coast» (London, 1962)
- 梅特卡夫, G. E.: 《黄金海岸的麦克利恩》(伦敦, 1962)
- Mills, Samuel J. and Daniel Smith, «Report of a Missionary Tour» (Andover, 1815)
- 米尔斯, 塞缪尔·J. 和丹尼尔·史密斯合著: 《巡回传教报告》(安多佛, 1815)
- Milne, A. H., «Sir Alfred Lewis Jones» (Liverpool, 1914)
- 米尔恩, A. H.: 《艾尔弗雷德·刘易斯·琼斯爵士》(利物浦, 1914)
- Moore, Bai T., «Murder in the Cassava Patch» (Holland, 1968)
- 穆尔, 拜伊·T.: 《木薯地里的谋杀案》(荷兰, 1968)
- Morel, E. D., «Affairs of West Africa» (London, 1902)
- 莫雷尔, E. D.: 《西非洲的事务》(伦敦, 1902)
- 《The Black Man's Burden» (London, 1920)
- 《黑人的负担》(伦敦, 1920)
- Munford, Beverley B., «Virginia's Attitude towards Slavery and Secession» (New York, 1910)
- 芒福德, 贝弗利·B.: 《弗吉尼亚州对蓄奴和脱离联邦的态度》(纽约, 1910)
- Myrdal, Gunnar,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1944)

- 米尔达,冈纳:《美国的困境》(纽约,1944)
- 《The Negro Servant》(Edinburgh, 1804)
- 《黑种仆人》(爱丁堡,1804)
- Nembhard, Len S., 《Trials and Triumphs of Marcus Garvey》
(Kingston, 1940)
- 内布哈德, 莱恩·S.: 《马克斯·加维的受审及胜利》(金斯
顿, 1940)
- Newland, H. Osman, 《Sierra Leone》(London, 1916)
- 纽兰, H·奥斯曼: 《塞拉勒窝内》(伦敦, 1916)
- Nicol, Davidson, 《Africa—A Subjective View》(London, 1964)
- 尼科尔, 戴维森: 《非洲——一个主观的看法》(伦敦, 1964)
- Nye, Russel B.,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nd the Humanitarian Reformers》(Boston, 1955)
- 奈, 拉塞尔·B.: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人道主义改革家》(波士顿, 1955)
- Oliver, Roland, 《Sir Harry Johnston an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London, 1957)
- 奥利弗, 罗兰: 《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和争夺非洲运动》(伦敦, 1957)
-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African Colonization》(Washington, 1883)
- 《非洲殖民的起源和目的》(华盛顿, 1883)
- Page, Jesse, 《The Black Bishop. Samuel Adjai Crowther》(London, 1908)
- 佩奇, 杰西: 《黑人主教——塞缪尔·阿贾·克劳瑟》(伦敦, 1908)

- Pares, Richard, «A West Indian Fortune» (London, 1950)
佩尔斯, 理查德:《西印度的一笔财富》(伦敦, 1950)
- Parrish, John, «Remarks on the Slavery of the Black People»
(Philadelphia, 1806)
帕里什, 约翰:《评奴役黑人》(费城, 1806)
- Peterson, John, «Province of Freedom» (London, 1969)
彼得森, 约翰:《自由之乡》(伦敦, 1969)
- Pfeffer, Karl-Heinz, «Sierra Leone und Gambia» (Bonn, 1958)
普菲费尔, 卡尔-海因茨:《塞拉勒窝内和冈比亚》(波恩, 1958)
- Phillips, Hilton Alonzo, «Liberia's Place in the Sun» (New
York, 1946)
菲利普斯, 希尔顿·阿朗索:《利比里亚的广阔前途》(纽约,
1946)
- Poole, Thomas Eyre, «Life, Scenery and Customs in Sierra
Leone and the Gambia» (London, 1850)
普尔, 托马斯·艾尔:《塞拉勒窝内和冈比亚河的生活图景与
风俗人情》(伦敦, 1850)
- Pope-Hennessy, James, «Verandah» (London, 1964)
波普-亨尼西, 詹姆斯:《走廊》(伦敦, 1964)
- Porter, Arthur T., «Creoledom» (London, 1963)
波特, 阿瑟·T.:《克里奥尔人之邦》(伦敦, 1963)
- «President Tubman on African Unity» (Monrovia, n.d.)
《杜伯曼总统论非洲的统一》(蒙罗维亚, 无出版日期)
-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860)

- 《皇家地理学会会报》(伦敦, 1860)
- Rainy, William, 《The Censor Censured》(London, 1865)
- 雷尼, 威廉: 《非难者被非难》(伦敦, 1865)
- Rankin, F. Harrison, 《The White Man's Grave》(London, 1836)
- 兰金, F·哈里森: 《白人坟》(伦敦, 1836)
- Reade, W. Winwood, 《Savage Africa》(London, 1863)
- 里德, W·温伍德: 《野蛮的非洲》(伦敦, 1863)
- 《The African Sketch-Book》(London, 1873)
- 《非洲札记》(伦敦, 1873)
- Record, Wilson, 《The Negro and the Communist Party》(North Caroline, 1951)
- 雷科德, 威尔逊: 《黑人和共产党》(北加罗林, 1951)
- 《A Residence at Sierra Leone》, by 'A Lady' (London, 1849)
- 《塞拉勒窝内住宅》, “某夫人”著(伦敦, 1849)
- Ricketts, Major, 《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Sierra Leone》(London, 1831)
- 里基茨少校: 《塞拉勒窝内现状概观》(伦敦, 1831)
- Robinson, Ronald and John Gallagher with Alice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London, 1965)
- 鲁宾逊, 罗纳德和约翰·加拉格尔及艾丽斯·丹尼合著: 《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伦敦, 1965)
- Rosenthal, Eric, 《Stars and Stripes in Africa》(London, 1938)
- 罗森塔尔, 埃里克: 《星条旗在非洲》(伦敦, 1938)
- Rudwick, Elliott M., 《W. E. B. DuBois》(Philadelphia, 1960)

- 鲁德威克, 埃利奥特·M.: 《威·爱·伯·杜波依斯》(费城, 1960)
- Rydings, H. A., 《Prince Naimbana in England》(Sierra Leone Studies, June 1957)
- 赖丁斯, H. A.: 《纳因巴纳王子在英国》(《塞拉勒窝内研究》, 1957年6月号)
- Seddall, Henry, 《The Missionary History of Sierra Leone》(London, 1874)
- 塞达耳, 亨利: 《塞拉勒窝内传教史》(伦敦, 1874)
- Segal, Ronald, 《African Profiles》(London, 1963)
- 西格尔, 罗纳德: 《非洲素描》(伦敦, 1963)
- Seligman, C. G., 《Races of Africa》(London, 1957)
- 塞利格曼, C. G.: 《非洲各民族》(伦敦, 1957)
- Sharp, Granville, 《The Just Limitations of Slavery》(London, 1776)
- 夏普, 格兰维尔: 《奴隶制的正当界限》(伦敦, 1776)
- 《Short Sketch of Temporary Regulations》(London, 1786)
- 《临时条例摘要》(伦敦, 1786)
- Silliman, Benjamin, 《A Journal of Travels...》(New Haven, 1820)
- 西利曼, 本杰明: 《……旅行笔记》(纽黑文, 1820)
- Simon, Lady, 《Slavery》(London, 1929)
- 西蒙夫人: 《奴隶制度》(伦敦, 1929)
- Smeathman, Henry, 《Plan of a Settlement》(London, 1786)
- 斯米思曼, 亨利: 《一个殖民地的计划》(伦敦, 1786)

- «Speci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African Institution»
(London, 1815)
«非洲协会理事会专门报告»(伦敦, 1815)
- «Special Report of the Paris Anti-Slavery Conference»
(London, 1867)
«巴黎反对奴隶制度会议专门报告»(伦敦, 1867)
- Spilsbury, F. B., «A Voyage to the Western Coast of Africa»
(London, 1807)
斯皮耳斯伯里, F. B.: «非洲西海岸之行»(伦敦, 1807)
- Spring, Gardiner, «Memoirs of the Rev. Samuel J. Mills»
(New York, 1820)
斯普林, 加德纳: «塞缪尔·约翰·米尔斯牧师回忆录»(纽约, 1820)
- Stamp, Kenneth M.,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New York, 1956)
斯坦普, 肯尼思·M.: «特殊的制度»(纽约, 1956)
- «State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Liberia, Dr W. V. S. Tubman and Mrs Tubman to Sierra Leone, June 1959» (Freetown, 1959)
«利比里亚总统威·瓦·沙·杜伯曼博士和杜伯曼夫人对塞拉勒窝内的国事访问。1959年6月»(弗里敦, 1959)
- Staudenraus, P. J., «The African Colonization Movement. 1816—65» (New York, 1961)
斯陶登劳, P. J.: «非洲殖民运动, 1816—65»(纽约, 1961)
- Stewart, Lt J., «Extracts from a Diary Written on Active

- Service» (Sierra Leone Studies, February 1932)
- 斯图尔特中尉, J.: 《现役日记摘抄》(《塞拉勒窝内研究》, 1932年2月号)
- Stock, Eugen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99)
- 斯托克, 尤金: 《英国行教会史》(伦敦, 1899)
- Stockwell, G. S.,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New York, 1869)
- 斯托克韦尔, G. S.: 《利比里亚共和国》(纽约, 1869)
- «Substance of the Report delivered by the Court of Directors of the Sierra Leone Company... On Thursday the 27th March 1794» (London, 1794)
- 《塞拉勒窝内公司董事会 1794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报告概要》(伦敦, 1794)
- Thompson, George, «Thompson in Africa» (Dayton, 1857)
- 汤普森, 乔治: 《汤普森在非洲》(戴顿, 1857)
- Thompson, Virginia and Richard Adloff, «The Emerging States of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Stanford, 1960)
- 汤普森, 弗吉尼亚和理查德·阿德洛夫合著: 《法属赤道非洲的新兴国家》(斯坦福, 1960)
- «French West Africa» (London, 1958)
- 《法属西非洲》(伦敦, 1958)
- Thorpe, Robert, «A Letter to William Wilberforce» (London, 1815)
- 索普, 罗伯特: 《致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信》(伦敦, 1815)
- «A Reply 'Point by Point' ...» (London, 1815)

- «……“逐点”答复»(伦敦, 1815)
- Torrey, Jesse, «American Slave Trade» (London, 1822)
托里, 杰西: «美国的奴隶贸易»(伦敦, 1822)
- Trevelyan, G. O.,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ord Macaulay»
(London, 1881)
特里维廉, 乔·奥: «麦考利勋爵的生平和书信»(伦敦, 1881)
- Tubman, William V. S., «Aphorisms», Ed. John Bolton
Williams (Monrovia, 1968)
杜伯曼, 威廉·瓦·沙: «格言录», 约翰·博尔顿·威廉斯编
(蒙罗维亚, 1968)
- Tucker, St George, «A Dissertation on Slavery» (Philadelphia,
1796)
塔克, 圣乔治: «论奴隶制»(费城, 1796)
- Van der Laan, H. L., «The Sierra Leone Diamonds» (London,
1965)
范·德·朗, H. L.: «塞拉勒窝内的金刚石»(伦敦, 1965)
- Wadstrom, C. B., «An Essay of Colonization» (London, 1794)
沃兹特罗姆, C. B.: «移民问题短论»(伦敦, 1794)
- Walker, Samuel Abraham, «The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in Sierra Leone» (London, 1847)
沃克尔, 塞缪尔·亚伯拉罕: «英国国教在塞拉勒窝内的传道
事业»(伦敦, 1847)
- Walker, Thomas H. B., «History of Liberia» (Boston, 1921)
沃克尔, 托马斯·H. B.: «利比里亚史»(波士顿, 1921)
- Wallis, C. Braithwaite, «The Advance of our West African

- Empire» (London, 1903)
- 沃利斯, C·布雷思韦特:《我们西非帝国的进步》(伦敦, 1903)
- Walmsley, John, «Diary» arranged by E. G. Walmsley
(London, 1923)
- 沃姆斯利, 约翰:《日记》, E·G·沃姆斯利编(伦敦, 1923)
- Ward, W. E. F., «The Royal Navy and the Slavers» (London,
1969)
- 沃德, W. E. F.:《英国海军和奴隶贩子》(伦敦, 1969)
- Wauwermans, Colonel, «Libéria. Fondation d'un État Nègre
Libre» (Brussels, 1885)
- 沃韦曼斯上校:《利比里亚。一个自由黑人国家的创立》(布鲁
塞尔, 1885)
- Welch, Galbraith, «The Jet Lighthouse» (London, 1960)
- 韦尔什, 加尔布雷思:《黑色的灯塔》(伦敦, 1960)
- «Welcome to our Capital» (Monrovia, 1963)
- 《欢迎到我们首都来》(蒙罗维亚, 1963)
- Whitehead, Thomas, «Original Anecdotes of the late Duke of
Kingston» (London, 1792)
- 怀特黑德, 托马斯:《故金斯顿公爵的奇闻》(伦敦, 1792)
- Wilkeson, Samuel,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Liberia»
(Washington, 1839)
- 威尔克森, 塞缪尔:《美国在利比里亚的殖民地》(华盛顿,
1839)
- Williams, Gomer, «History of the Liverpool Privateers»
(London, 1897)

- 威廉斯, 戈默:《利物浦私掠船史》(伦敦, 1897)
- Wilson, H. S.,《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Sierra Leone Colony in the works of E. W. Blyden》(Sierra Leone Studies, December 1958)
- 威尔逊, H. S.:《爱·威·布莱登著作中塞拉勒窝内殖民地形象的变化》(《塞拉勒窝内研究》, 1958年12月号)
- Woodson, Carter G.,《Negro Orators and their Orations》(Washington, 1925)
- 伍德森, 卡特·G.:《黑人演说家及其演说》(华盛顿, 1925)
- Yancy, Ernest Jerome,《Historical Lights of Liberia》(Xenia, Ohio, 1934)
- 扬西, 欧内斯特·杰罗姆:《利比里亚历史概况》(济尼亚, 俄亥俄, 1934)
- 《The Republic of Liberia》(London, 1959)
- 《利比里亚共和国》(伦敦, 1959)
- Young, James C.,《Liberia Rediscovered》(New York, 1934)
- 扬, 詹姆斯·C.:《重新发现的利比里亚》(纽约, 1934)

MANUSCRIPTS

未发表的文稿

Public Record Office

伦敦档案馆

Adam.	1 Admiralty in-letters
海军部	1 海军部收文

- 3 Admiralty Board Minutes
3 海军部议事录
- 51 Captains' Logs
51 船长航海日记
- 53 Ships' Logs
53 航海日记
- 106 Navy Board in-letters
106 海军部收文
- C. O. 267 Governors of Sierra Leone to Colonial
Office
殖民部 267 塞拉勒窝内总督给殖民部的信
- F. O. 47 Foreign Office relating to Liberia
外交部 47 外交部有关利比里亚的档案
- H. O. 7 Convicts, miscellaneous
内政部 7 有关罪犯的杂件
- P.R.O. 30/8 Chatham papers
伦敦档案馆 30/8 查塔姆文件

British Museum

英国博物馆

- Add. MSS 41262 John Clarkson papers
41262 约翰·克拉克森文件
- 41263 John Clarkson papers
41263 约翰·克拉克森文件
- 12131 Papers relating to Sierra Leone
12131 有关塞拉勒窝内的文件

- 44393 Gladstone Papers. Containing
correspondence with E. W. Blyden
44393 格莱斯顿文件。内为与爱·威·布莱
登的通信
- 44394 Gladstone Papers, Containing
correspondence with E. W. Blyden
44394 格莱斯顿文件。内为与爱·威·布莱
登的通信
- 44395 Gladstone Papers. Containing
correspondence with E. W. Blyden
44395 格莱斯顿文件。内为与爱·威·布莱
登的通信
- 44398 Gladstone Papers. Containing
correspondence with E. W. Blyden
44398 格莱斯顿文件。内为与爱·威·布莱
登的通信
- 44420 Gladstone Papers Containing
correspondence with E. W. Blyden
44420 格莱斯顿文件。内为与爱·威·布莱
登的通信

Sierra Leone Archives Local Letters

塞拉勒窝内档案馆本地信件

PUBLISHED DOCUMENTS

公开发表的文件

Parliamentary Papers

议会文件

House of Commons and Lords' Debates

下院和上院的辩论记录

Sierra Leone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塞拉勒窝内立法会议辩论记录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报纸和期刊

«African Repository» (Washington)

«非洲宝库»(华盛顿)

«Blackwoods Magazine»

«布莱克伍德杂志»

«Christian Observer»

«基督教观察家»

«Daily Mail» (Freetown)

«每日邮报»(弗里敦)

«Daily Star» (Monrovia)

«明星日报»(蒙罗维亚)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The 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

«Palm» (Monrovia)

«棕榈»(蒙罗维亚)

«The Spectator»

«旁观者»

«The Sunday Times»

«星期日泰晤士报»

«The Times»

«泰晤士报»

-
- | | |
|------------------------------|--------------------|
| «Elders West African Review» | «Time» |
| 《埃尔德西非评论》 | 《时代》 |
|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 «Unity» (Freetown) |
| 《伦敦新闻画报》 | 《统一报》(弗里敦) |
| «John Bull» | «West Africa» |
| 《约翰牛》 | 《西非》杂志 |
| «Listener» (Monrovia) | |
| 《听众》(蒙罗维亚) | |

索 引

一 画

- 《1805 和 1806 年在英格兰、荷兰和苏格兰的旅行笔记》(西利曼)
 (《Journal of Travels in England, Hol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Years 1805 and 1806》[Silliman]) ——2。
 《一个殖民地的计划》(斯米思曼) (《The Plan of a Settlement》
 [Smeathman]) ——18。

三 画

- 大仲马, 亚历山大 (Dumas, Alexandre) ——6, 375。
 马尔盖爵士, 米尔顿 (Margai, Sir Milton) ——475, 477。
 马里兰 (Maryland) ——227。
 马隆人 (Maroons) ——96—104, 111, 245, 248, 250, 302。
 马莫腊王 (Momoru [Marmora], king) ——360—361, 383。
 马萨诸塞 (Massachusetts) ——127, 130。
 马歇爵士 (Marchais, Chevalier des) ——169。
 门迪族 (Mende tribe) ——336, 339, 455, 516。
 门罗, 詹姆斯 (Monroe, James) ——136, 137, 138, 155, 165,
 172。
 三K党 (Ku Klux Klan) ——420。
 山上住宅区 (Hill Station) ——447, 448, 510, 516。

四 画

- 巴宾顿, 托马斯 (Babington, Thomas) ——74, 87。
巴宾顿夫人, 托马斯 (琼·麦考利) (Babington, Mrs Thomas
[Jean Macaulay]) ——73, 87。
巴宾顿, 小托马斯 (Babington, Thomas Junior) ——116。
巴伯, 弗朗西斯 (Barber, Francis) ——7。
巴格纳尔, 罗伯特·W. (Bagnall, Robert W.) ——426。
巴克利, 阿瑟 (Barclay, Arthur) ——485, 490。
巴克利总统, 埃德温 (Barclay, President Edwin) ——432,
434, 490, 491, 498, 500, 502, 503。
巴克斯顿, 托马斯 (Buxton, Thomas) ——225, 300。
巴克斯顿勋爵 (Buxton, Lord) ——499。
巴纳纳岛 (Banana Island) ——76。
巴萨族 (Bassa tribes) ——205。
贝澳库-贝茨, E. S. (Beoku-Betts, E. S.) ——463, 465。
贝尔医生 (Bell, Dr) ——55, 57, 61。
贝克, 约翰 (Baker, John) ——3。
贝尼泽特, 安东尼 (Benezet, Anthony) ——15, 16。
贝萨城 (Bessa Town) ——359。
贝萨王 (Bessa, King) ——359, 360, 369。
比夫, 杰克 (Beef, Jack) ——3。
比夫拉 (Biafra) ——251。
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II of the Belgians) ——314。
《不带地图的旅行》(格林) («Journey without Maps»)

- [Greene]) ——467, 469, 502。
- 丹福思, 乔舒亚 (Danforth, Joshua) ——216。
- 邓肯, J·本杰明 (Duncan, J. Benjamin) ——525。
- 《反对奴隶制通讯员》(《Anti-Slavery Reporter》) ——223。
- 冈比亚 (Gambia) ——242。
- 戈尔迪爵士, 乔治·陶布曼 (Goldie, Sir George Taubman) ——324。
- 木萨杜 (Musardu) ——358, 367, 379。
- 《木萨杜旅行纪实》(安德森)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Musardu》[Anderson]) ——357, 360—370, 503。
- 瓦萨, 古斯塔夫斯 (Vassa, Gustavus) ——17, 22, 27。
- 瓦特, 詹姆斯 (Watt, James) ——78。
- 韦伯斯特, 丹尼尔 (Webster, Daniel) 137, 141。
- 韦达博滩 (Wedabo Beach) ——487—489, 490。
- 韦弗, 理查德 (Weaver, Richard) ——28, 30。
- 韦林牧师, 科尔森·M. (Waring, Rev. Colson M.) ——203。
- 《为塞拉勒窝内殖民地辩护》(麦考利) (《The Colony of Sierra Leone Vindicated》[Macaulay]) ——116。
- 尤尼莱佛 (Unilever) ——530。
- “云雀号”(利比里亚唯一的军舰) (‘Lark’ [Liberia’s only naval vessel]) ——237, 409。

五 画

- 艾伯特亲王 (Albert, Prince) ——259。
- 艾尔斯医生, 伊莱 (Ayres, Dr Eli) ——166, 170, 173, 179,

190—192。

艾伦, 威廉 (Allen, William) —224—225。

本森将军, S. A. (Benson, General S. A.) —353, 355。

边警队 (Frontier Policc) —325, 334, 338, 342, 408。

布埃耳, 雷蒙德 (Buell, Raymond) —414, 459。

布济族 (Boozie tribe) —360, 363—365。

布坎南总督, 托马斯 (Buchanan, Governor Thomas) —
231。

布莱登, 爱德华·威尔莫特 (Blyden, Edward Wilmot) —
371—402, 403, 415, 457, 509。

布莱登建立非教会大学的设想 (Blyden's idea of secular
university) —386。

布莱基斯顿, 佩顿 (Blakiston, Peyton) —509。

布莱克斯通爵士, 威廉 (Blackstone, Sir William) —14,
192。

《布莱克伍德杂志》 («Blackwood's Magazine») —109, 115。

布朗, 乔治·W. (Brown, George W.) —414。

布鲁厄姆勋爵 (Brougham, Lord) —372, 376, 392。

布罗赫, 弗伦罗波的最高酋长 (Broh, Paramount Chief of
Frenropo) —488。

布律诺, 亨利 (Brunot, Henri) —491, 493。

布希罗德岛 (Bushrod Island) —182, 203。

弗贝伊夫人, 伊丽莎白 (Furbay, Mrs Elizabeth) —501。

弗格森, 威廉 (塞拉勒窝内唯一的有色人总督) (Fergusson,
William [only coloured Governor of Sierra Leone]) —

- 261--262。
- 弗吉尼亚 (Virginia) ——127, 128, 135—137。
- 弗莱明, 伊恩 (Fleming, Ian) ——479。
- 弗雷勒博士, 季尔贝托 (Freyre, Dr Gilberto) ——529。
- 弗雷泽, 帕特里克 (Frazer, Patrick) ——22, 24, 27, 30。
- 弗里敦 (Freetown) ——75, 90, 108, 112, 260, 266, 286, 402, 459, 531; 最初的移民区 (original Settlement) ——28; 在弗里敦的新斯科舍人 (Nova Scotians in) ——54—66, 103, 448; 圣乔治大教堂 (St George's Cathedral) ——121, 267, 271, 300, 308, 310, 508; 在弗里敦的获释奴隶 (recaptives in) ——247, 260; 弗里敦风光 (descriptions of) ——268—269, 299—300, 507—519; 宗教和道德 (religion and morals) ——271—274; 伯顿和弗里敦 (Burton and) ——306, 348; 扩张和贸易 (expansion and trade) ——315—320, 443, 447, 461—46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弗里敦 (in First World War) ——45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弗里敦 (in Second World War) ——464—466; 格林和弗里敦 (Greene and) ——466—474, 511; 弗里敦市旅馆 (City Hotel) ——509—516。
- 弗里敦—博城铁路 (Freetown-Bo railway) ——442, 448。
- 弗里敦圣乔治大教堂 (St. George's Cathedral, Freetown) ——121, 267, 271, 300, 308, 310, 508。
- 弗里敦市旅馆 (City Hotel, Freetown) ——509—516。
- 弗利金格, 丹尼尔 (Flickinger, Daniel) ——316。
- 汉韦, 乔纳斯 (Hanway, Jonas) ——18, 20。

- 加利纳斯地区 (Gallinas Territory) ——354。
- 加里森, 威廉·劳埃德 (Garrison, William Lloyd) ——213—
225。
- 加纳 (Ghana) ——238, 525。
- 加维, 马克斯和“回到非洲去”运动 (Garvey, Marcus, and 'Back
to Africa' movement) ——416—439。
- 加文, 约翰 (Garvin, John) ——90, 92。
- 加西亚, 埃利 (Garcia, Elie) ——431—432。
- 卡迪尤, 弗雷德里克 (总督、爵士) (Cardew, Governor Sir
Frederick) ——324—336, 339, 340—342, 449。
- 卡鲁, 爱德华 (亚雷赫·库尔) (Carew, Edward [Yarreh Kur])
——317。
- 卡伦, 康提 (Cullen, Countee) ——415。
- 卡迈克尔, 斯托克利 (Carmichael, Stokeley) ——438。
- 卡梅伦, 洛维特 (Cameron, Lovett) ——305, 307。
- 兰金, 哈里森 (Rankin, Harrison) ——206, 268, 285, 286,
288。
- 卢加德勋爵 (Lugard, Lord) ——311, 325, 453, 495。
- 民权法案 (1875) (Civil Rights Act [1875]) ——396。
- 《尼格罗人报》 («Negro») ——388。
- 尼科尔博士, 戴维森 (Nicol, Dr Davidson) ——468, 517。
- 尼日尔河远征队 (1841) (Niger expedition [1841]) ——257
—258。
- 尼日利亚 (Nigeria) ——312, 314, 324, 525。
- 宁巴族 (Nimba) ——524。

- 奴隶贸易法案 (1819) (Slave Trade Act [1819]) ——198。
《奴隶制度》(西蒙) (《Slavery》[Simon]) ——483--484。
皮特, 威廉 (Pitt, William) ——36, 49, 87。
丘奇太太, M. (Church, Mrs M.) ——278。
圣保罗河 (St. Paul's river) ——182, 203, 390。
圣乔治山 (St. George's Hill) ——28。
圣乔治湾 (St. George's Bay) ——28。
圣乔治湾公司 (St. George's Bay Company) ——37—38。
“圣徒”(克拉彭派) (‘Saints’ [Clapham Sect]) ——8—17,
37, 46, 59, 74, 112, 130, 133, 141, 244, 313。
史汀生, 亨利·刘 (Stimson, Henry L.) ——484。
史密斯, 西德尼 (Smith, Sydney) ——282。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U. N. I. A.]) ——418, 422—425, 431—434, 435, 436,
437。
世界黑十字护士队 (Universal Black Cross Nurses) ——423。

六 画

- 纪德, 安德烈 (Gide, André) ——499。
安德烈斯基教授, 斯坦尼斯拉夫 (Andreski, Professor Stanislaw)
——521。
安德森, 本杰明 (Anderson, Benjamin) ——386, 503; 安
德森的探险 (Explorations of) ——357—370, 377, 379,
380。
“安娜号”(贩奴船) (‘Anna’ [slaving ship]) ——85。

- 邦纳, 乔治 (Bonner, George) ——338, 341。
达拉济阿赫 (Dalazeah) ——362。
达拉斯, R. C. (Dallas, R. C.) ——97。
达律 (Daru) ——457。
地产税 (Real-Estate Tax) ——522。
多森, 詹姆斯 (高等法院院长) (Dossen, Chief Justice James D.) ——433。
刚果镇 (Congo Town) ——112。
《关于非洲殖民的意见》(加里森) (《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Garrison]) ——217—219。
华盛顿 (哥伦比亚区) (Washington [D. C.]) ——133, 143—144。
华盛顿, 布克·托 (Washington, Booker T.) ——419。
“回到非洲去”运动 (‘Back to Africa’ movement) ——416, 417—439, 528—532, 并散见各页 (and passim)。
吉尔里爵士, 威廉 (Geary, Sir William) ——496。
考伯王 (Couber, King) ——151。
考德威尔, 伊莱亚斯 (Caldwell, Elias) ——144。
考尔菲尔德上校, 詹姆斯 (Caulfield, Colonel The Hon. James) ——334—335。
刘易斯爵士, 塞缪尔 (第一位黑人爵士) (Lewis, Sir Samuel [first black Knight]) ——245, 265—267, 318, 327, 340—342。
伦伯格, 菲利普 (Lemberg, Philip) ——450。
伦道夫, 约翰 (Randolph, John) ——144。

- 伦敦贫苦黑人医院 (Poor Black Hospital, London) ——17, 19。
- 《论奴隶制度》(克拉克森) (《Essay on Slavery》 [Clarkson]) ——11。
- 米尔斯牧师, 塞缪尔·约翰 (Mills, Rev. Samuel John) ——133, 142, 146—154, 189。
- 米尔斯, 塞利纳 (Mills, Selina) ——87—89, 93。
- “米罗号”(双桅船) (‘Miro’ [brig]) ——32—34。
- 米切尔, C. E. (Mitchell, C. E.) ——494。
- 乔治, 戴维 (George, David) ——83。
- 乔治敦 (Georgetown) ——103。
-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ured People) ——427。
- 汤普森船长, T. 包耳登 (Thompson, Captain T. Boulden) ——21, 22, 24, 28—30。
- 汤普森海军上校, 佩罗内特 (Thompson, Captain Perronet) ——103。
- 汤普森, 乔治 (Thompson, George) ——272。
- 托姆王(泰姆奈族的副头领) (Tom, king [Temne sub-chief]) ——28—29, 35, 101。
- 《问题的中心》(格林)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Greene]) ——466, 468—474。
- “西比耳号”(英国船) (‘Sybille’, H. M. S.) ——249。
- 《西非国家和人民》(霍顿) (《West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 [Horton]) ——251。

- 《西非漫游记》(伯顿) (《Wanderings in West Africa》 [Burton]) —291, 293—304, 305。
- 西非青年联盟 (West African Youth League) —464。
- 西非医疗队 (West African Medical Service) —450—451。
- 《西非》杂志 (《West Africa》) —497, 499。
- 西利曼, 本杰明 (Silliman, Benjamin) —13。
- 西摩 (黑人探险家) (Seymour [Negro explorer]) —355—357。
- 西蒙夫人 (Simon, Lady) —483, 490。
- 西蒙爵士, 约翰 (Simon, Sir John) —490, 492。
- 亚普, A. E. (Yapp, A. E.) —502。
- 扬西副总统 (Yancy, Vice-President) —487—489, 490, 505。
- 伊博族 (Ibo tribe) —112, 119, 246, 247, 251, 294, 378, 453。
- 伊济迪澳, 约翰 (Ezzidio, John) —248—249。
- “伊丽莎白号”(美国船) (‘Elizabeth’ [American ship]) —157—160, 165。
- 约翰斯顿爵士, 哈里 (Johnston, Sir Harry) —235, 405—407。
- 约翰逊, H. R. W. (Johnson, H. R. W.) —396。
- 约翰逊博士 (克里斯蒂调查团成员) (Johnson, Dr [in Christy commission]) —485。
- 约翰逊, 加布里埃尔 (Johnson, Gabriel) —424。
- 约翰逊上校, 伊莱贾 (Johnson, Colonel Elijah) —174, 236。
- 约翰逊, 威廉 (Johnson, William) —105, 119。

- 约翰逊博士, 塞缪尔 (Johnson, Dr Samuel) ——7。
约鲁巴族 (Yoruba tribe) ——112, 246, 247, 249, 252, 258—
259, 294, 398, 453。
在伦敦的黑人 (Negroes in London) 5—8, 17—21。
《在品德和虔诚上超群的、早年死去的年青人的真实故事》
(«True Stories of Young Persons...») ——47。
芝加哥 (Chicago) ——420。

七 画

- 阿夫济留斯, 亚当 (Afzelius, Adam) ——79, 82。
阿齐克韦, 纳姆迪 (Azikiwe, Nnamdi) ——414, 486。
阿散蒂族 (Ashanti tribe) ——112, 122, 311, 324。
阿什 (黑人探险家) (Ash [Negro explorer]) ——355。
阿什利勋爵 (后来的夏夫茨伯里勋爵) (Ashley, Lord [Later
Lord Shaftesbury]) ——237。
阿什曼, 杰胡迪 (Ashman, Jehudi) ——155, 156, 164, 174—
186, 188—208, 218。
伯顿爵士, 理查德 (Burton, Sir Richard) ——289, 290—311,
312, 348—350, 355, 378, 388, 481, 507。
伯吉斯, 埃比尼泽 (Burgess, Ebenezer) ——148—154。
“纯”黑种人 ('pure' blacks) ——354, 378—385, 416。
杜伯曼, 沙德 (Tubman, Shad) ——523。
杜伯曼总统, 威廉·瓦坎纳拉特·沙德拉奇 (Tubman, Presi-
dent William Vacanarat Shadrach) ——505—506, 522, 526
—528。

- 杜波依斯, 威·爱·伯格哈特 (Du Bois, W. E. Burghard)
——426—428, 435, 437, 438, 439。
- 杜林, 奥托 (During, Otto) ——475。
- 杜桑·卢维杜尔, 皮埃尔·多米尼克 (Toussaint L'Ouverture,
Pierre Dominique) ——137, 375, 389。
- 杜·夏伊于, 保罗 (Du Chaillu, Paul) ——355。
- 芬德利总督 (Findlay, Governor) 277, 279。
- 芬利牧师, 罗伯特 (Finley, Rev. Robert) ——133, 142, 145。
- 亨德森, 阿瑟 (Henderson, Arthur) ——491。
- 亨泽尔, 查尔斯·L. F. (Haensel, Charles L. F.) ——255—
256。
- 怀尔德, 罗兰 (Wild, Roland) ——500。
- 坎贝尔, 黑人探险家 (Campbell, Negro explorer) ——356。
- 坎贝尔, 邓肯 (Campbell, Duncan) ——91。
- 坎贝尔, 尼尔 (将军、爵士) (Campbell, General Sir Neil)
——277, 282, 284。
- 坎佩拉 (Campelar) ——159—163。
- 克拉克森, 托马斯 (Clarkson, Thomas) ——11, 38, 44, 50, 63,
75, 80, 148。
- 克拉克森, 约翰 (Clarkson, John) ——50—67, 75, 117, 148。
- 克拉彭派 (Clapham Sect) ——8—10, 87; 参见“圣徒” (see
also 'Saints')。
- 克莱, 亨利 (Clay, Henry) ——138—144, 210。
- 克劳瑟主教, 塞缪尔·阿贾 (第一位黑人主教) (Crowther, Bi-
shop Samuel Adjai [first black bishop]) ——245, 253—

- 260, 297, 305。
- 克雷森, 埃利奥特 (Cresson, Elliott) ——222—223, 225。
- 克里奥尔人 (Creoles) ——248—253, 260—267, 269, 276, 279
—280, 307—311, 313, 316—323, 326—328, 339—341, 442—
457, 458—469, 472—478, 530。
- 克里斯蒂医生, 卡思伯特 (Christy, Dr Cuthbert) ——485,
490, 497。
- 克朗山 (Crown Hill) ——199。
- 克鲁梅耳, 亚历山大 (Crummel, Alexander) ——356。
- 克鲁族人 (Kru tribesmen) ——169, 269, 277, 481—482, 492。
- 克罗泽, 塞缪尔 (Crozer, Samuel) ——159, 161。
- 库古阿诺, 澳托巴 (Cugvano, Ottobah) ——17。
- 里德, W·温伍德 (Reade, W. Winwood) ——308, 350, 403。
- 里德, 约翰 (Reid, John) ——30。
- 里基茨总督 (Ricketts, Governor) ——282。
- 里新特 (Regent) ——119。
- 里新特镇 (Regents Town) ——149。
- 《利比里亚》(约翰斯顿) (《Liberia》 [Johnston]) ——405—
406。
- 利比里亚的马里兰 (Maryland-in-Liberia) ——227, 233, 353,
433。
- 利比里亚开发公司 (Liberian Development Company) ——
407。
- 利比里亚—美国—瑞典矿业公司财团 (Lamco consortium)
——524。

- 利比里亚内政部 (Ministry of Interior, Liberia) ——393, 394。
- 利比里亚橡胶公司 (Liberian Rubber Corporation) ——405。
- 《利比里亚先驱报》 (《Liberian Herald》) ——201, 376。
- 利比里亚学院 (Liberia College) ——353, 379, 393—395, 406。
- 利克, H. (海军上将、爵士) (Leeke, Admiral Sir H.) ——260。
- 利文斯敦, 戴维 (Livingstone, David) ——355, 369。
- 利物浦市商会 (Liverpool Chamber of Commerce) ——325, 530。
- 麦迪逊, 詹姆斯 (Madison, James) ——136—137, 141, 228。
- 麦卡锡, J. B. (M'Carthy, J. B.) ——279。
- 麦卡锡爵士, 查尔斯 (MacCarthy, Sir Charles) ——117, 119, 120—123, 153, 242, 271, 277, 279, 508。
- 麦考利—巴宾顿商行 (Macaulay & Babington) ——112—113, 116。
- 麦考利, 肯尼思 (Macaulay, Kenneth) ——112—114, 116。
- 麦考利, 乔治 (Macaulay, George) ——112。
- 麦考利, 特恩布尔 (Macaulay, Turnbull) ——20。
- 麦考利勋爵, 托马斯·巴宾顿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Lord) ——74。
- 麦考利, 扎卡里 (Macaulay, Zachary) ——65—67, 70—95, 99, 112, 115—116, 191, 222, 225。
- 麦克布赖德上校, 哈里 (McBride, Colonel Harry) ——498, 504。

- 麦克福伊, J. T. (Macfoy, J. T.) ——320。
- 麦克唐纳总督, 诺曼 (Macdonald, Governor Norman) ——
262。
- 麦肯齐-格里夫, 艾夫里尔 (MacKenzie-Grieve, Averil) ——
40。
- 麦圭尔主教, 乔治·亚历山大 (McGuire, Bishop George Alexander) ——423。
- 麦奎因, 詹姆斯 (M'Queen, James) ——115。
- 纳尔逊勋爵 (Nelson, Lord) ——107。
- 纳因巴纳王 (Naimbana, King) ——42—43, 45, 58。
- 纳因巴纳, 约翰 (后来的亨利·格兰维尔) (Naimbana, John [later Henry Granville]) ——43—47。
- 纽厄尔 (美国的奴隶贩子) (Newell [American slave-trader]) ——81。
- 纽波特, 马蒂尔达 (Newport, Matilda) ——186。
- 纽约花旗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412。
- 邱吉尔, 温斯顿 (Churchill, Winston) ——410。
- 苏利马 (Sulyma) ——321。
- 沃德, W. E. F. (Ward, W. E. F.) ——243。
- 沃利斯, C. 布雷思韦特 (Wallis, C. Braithwaite) ——329,
333, 338。
- 沃利斯-约翰逊, 艾萨克·西奥菲勒斯·阿库纳 (Wallace-Johnson, Isaac Theophilus Akuna) ——464, 465。
- 沃波尔将军, 乔治 (Walpole, General George) ——97, 98。
- 希林角 (Cape Shilling) ——162。

- 肖伦凯赫-索耶 (Shorunkeh-Sawyerr) ——460, 513。
犹太人 (Jews) ——416, 421, 435, 531。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287, 323—324,
326, 328, 339, 342。
佐治亚 (Georgia) ——178。

八 画

- 彼得斯, 托马斯 (Peters, Thomas) ——49, 61—62。
彼得王 (梅苏腊多的酋长) (Peter, King [Mesurado chief])
——170—172, 182, 184, 188, 190, 203。
波罗会 (Poro societies) ——335, 522。
“波莫纳号” (军舰) ('Pomona' [naval vessel]) ——36。
波普-亨尼西总督, 约翰 (Pope-Hennessey, Governor John)
——263—264, 386。
波特博士, 阿瑟·T. (Porter, Dr Arthur T.) ——248, 264。
《到塞拉勒窝内河的两次航行》(福尔肯布里奇)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Falconbridge]) ——21—23,
40。
迪阿涅, 布莱斯 (Diagne, Blaise) ——435。
迪安船长, 哈里 (Dean, Captain Harry) ——416。
迪尔克爵士, 查尔斯 (Dilke, Sir Charles) ——324。
迪尤, 托马斯·R. (Dew, Thomas R.) ——211。
法属几内亚 (French Guinea) ——333。
法伊夫, 克里斯托弗 (Fyfe, Christopher) ——249, 287, 446,
452。

- 《非洲宝库》（《African Repository》）——208, 216—218, 226。
非洲教会，布莱登为建立独立的非洲教会所做的努力（African Church, Blyden's effort for independent）——386, 398。
非洲军团（African Legion）——423。
非洲汽车兵团（African Motor Corps）——423。
《非洲通讯员》（《African Intelligencer》）——177。
《非洲王子》（《The African Prince》）——47。
非洲协会（Africa Institution）——114。
《非洲宣讲报》（《African Interpreter and Advocate》）——264。
《非洲札记》（里德）（《African Sketch-book》[Reade]）——403。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480, 485—491, 492—493, 500, 526。
和平队（Peace Corps）——517, 523。
杰斐逊，托马斯（Jefferson, Thomas）——126—127, 135, 136, 138, 396。
杰克曼，艾萨克（Jackman, Isaac）——6。
杰克逊，安德鲁（Jackson, Andrew）——211。
杰米王（泰姆奈族的副头领）（Jemmy, King [Temne sub-chief]）——35, 42。
杰伊，威廉（Jay, William）——221。
金斯利，玛丽（Kingsley, Mary）——310—311, 315, 323, 335, 339, 342, 401。
金总统，查·邓·伯（King, President C. D. B.）——424, 432, 434—435, 484, 485, 488, 490, 494, 497。
凯里牧师，洛特（Carey, Rev. Lott）——165, 183, 186, 193,

- 196, 200, 202, 207。
- 凯内马学校 (Kenema School) ——519。
- 肯尼迪,阿瑟(总督、爵士) (Kennedy, Governor Sir Arthur) ——263, 277。
- 肯尼亚 (Kenya) ——238, 312, 313, 461。
- 肯塔基 (Kentucky) ——134, 138。
- 肯特公爵,爱德华 (Kent, Edward, Duke of) ——98。
- 矿业工人联合工会 (United Mineworkers Union) ——518。
- 拉斐特侯爵 (Lafayette, Marquis de) ——80。
- 拉各斯 (Lagos) ——253, 260, 397。
- 拉姆利总督 (Lumley, Governor) ——282。
- 林肯,亚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228。
- 罗伯茨副总督,约瑟夫·詹金斯 (Roberts, Lieut-Governor Joseph Jenkins) ——231—234, 236, 350—354, 370, 379, 384, 390。
- 罗伯茨机场 (Robertsfield airport) ——505。
- 罗德艾兰 (Rhode Island) ——130—132。
- 罗,塞缪尔(总督、爵士) (Rowe, Governor Sir Samuel) ——319。
- 罗斯爵士,罗纳德 (Ross, Sir Ronald) ——287。
- 罗素勋爵,约翰 (Russell, Lord John) ——257。
- 罗伊总统,爱德华·詹姆斯 (Roye, President Edward James) ——380—385。
- “茅屋税战争” (‘Hut-Tax War’) ——328—342。
- 欧文,约瑟夫 (Irwin, Joseph) ——22, 24, 29, 30。

- 帕尔马斯角 (Cape Palmas) ——227, 348, 485。
帕克斯, J. C. (Parkes J. C.) ——326。
帕麦斯顿勋爵 (Palmerston, Lord) ——237。
佩恩总统, 詹姆斯·S. (Payne, President James S.) ——
383, 391。
佩里海军准将, 马修 (Perry, Commodore Matthew) ——233。
佩奇, 杰西 (Page, Jesse) ——258。
舍恩, J. F. (Schoen, J. F.) ——257。
限制橡胶生产法案(1922) (Restriction Act [1922]) ——
410。
耶格, 穆里尔 (Jaeger, Muriel) ——10。
耶克帕 (Yekepa) ——524。
英国海军, 拦截贩奴船 (Royal Navy, and arrest of slave
ships) ——106, 107, 112, 243—244。
英国行教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18—119,
253, 255—257, 386, 389。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 ——462。
泽勒基 (Zelleki) ——362。

九 画

- 拜伊布里赫 (Bai Bureh) ——334, 337。
查默斯爵士, 戴维 (Chalmers, Sir David) ——339, 342。
费城 (Philadelphia) ——212, 227。
费尔石通, 哈维 (Firestone, Harvey) ——410—412, 413。

- 费尔斯通橡胶公司 (Firestone Rubber Company) ——410—
414, 480, 485, 491, 493—498, 504, 524, 530。
- 哈格里夫斯 (Hargreaves, J. D.) ——341。
- 哈莱姆群众大会(1920) (Harlem rally [1920]) ——422—425。
- 哈里斯, 约翰·迈 (Harris, John M.) ——321—322, 354—
355。
- 哈特太太 (Hatter, Mrs) ——206。
- 胡布里希, 查尔斯·亨利 (Huberich, Charles Henry) ——
163。
- 皇家地理学会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355。
- 皇家非洲军团 (Royal African Corps) ——112, 121。
- 皇家西非边防军 (Royal 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 ——
457。
- 济加赫-波腊赫-祖埃 (Ziggah Porah Zue) ——366。
- 科克尔, R. B. S. (Coker, Hon. R. B. S.) ——476。
- 科克尔, 丹尼尔 (Coker, Daniel) ——146, 157—158, 162, 163。
- 洛科港 (Port Loko) ——333。
- 《美国独立宣言》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27, 134。
- 美国独立战争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5, 16,
48。
- 美国福音派 (American Evangelicals) ——129, 133—135,
142, 145, 209。
- 美国殖民协会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133—
134, 142—145, 147, 153—156, 163, 165, 166—172, 177, 190,

- 193, 195, 196, 197, 200, 207, 230, 234, 353, 397, 415, 530; 加里森反对美国殖民协会的运动 (Garrison's campaign against) —209—229。
- 南卡罗来纳 (South Carolina) ——134。
- 珀西佛伦斯岛 (Perseverance Island) ——172。
- 威尔伯福斯, 威廉 (Wilberforce, William) ——9, 10, 37, 38, 68, 87, 102, 149, 224。
- 叙利亚商人 (Syrian traders) ——445—448, 465。

十 画

- 埃尔德—登普斯特轮船公司 (Elder Dempster line) ——458, 496。
- 《埃尔德西非评论》 («Elder's West African Review») ——496—497。
- 埃利奥特, A. (Elliot, A.) ——31。
-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238, 438。
- 埃塞俄比亚教会 (Ethiopian Church) ——416。
- 班科耳—布赖特博士 (Bankole-Bright, Dr.) ——463, 465, 476, 477。
- 班克罗夫特, 弗雷德里克 (Bancroft, Frederic) ——129。
- 班斯岛 (Bance Island) ——40, 42, 76。
- 恩克鲁玛, 克瓦米 (Nkrumah, Kwame) ——438。
- 格莱斯顿, 威·尤 (Gladstone, W. E.) ——313, 371—372, 374, 392。
- 格兰特, 威廉 (Grant, William) ——307。

- 格兰维尔镇 (Granville Town) ——28—36, 42, 55。
格雷厄姆, C. (Graham C.) ——493。
格雷-里彭伯爵 (De Grey and Ripon, Earl) ——355。
格里菲思, 艾利奥特 (Griffths, Elliott) ——43。
格里格, 雅各布 (Grigg, Jacob) ——90。
格利, 拉尔夫·R. (Gurley, Ralph R.) ——195—196, 198,
208, 212, 216, 220—221, 226—227。
格林, 巴巴拉 (Greene, Barbara) ——502。
格林, 格雷厄姆 (Greene, Graham) ——468—473, 502, 509,
511。
格林沃尔, 哈里·J. (Greenwall, Harry J.) ——500。
海岸角 (Cape Coast) ——122。
海地 (Haiti) ——238。
海尔·塞拉西皇帝 (Haile Selassie, Emperor) ——274。
“海豚号”, 美国船 ('Porpoise', U. S. S.) ——195。
海韦, 托马斯 (Heighway, Thomas) ——118。
贾勒特医生, 迈克尔 (Jarrett, Dr Michael) ——279。
宽加 (Quanga) ——356。
莱尔, 戴维 (Lisle, David) ——13, 14。
莱佛肥皂公司 (Lever soap company) ——443。
莱特哈德先生 (Lighthard, Mr) ——493。
《离婚》(杰克曼) («The Divorce» [Jackman]) ——6—7。
《流血中的非洲的呼声》(布莱登) («A Voice from Bleeding
Africa» [Blyden]) ——375, 377。
朗, 爱德华 (Long, Edward) ——3, 4, 5, 97。

- 莫尔, 汉纳 (More, Hannah) ——10, 68, 87—89。
- 莫尔, 帕蒂 (More, Patty) ——88—89。
- 莫雷尔, E. D. (Morel, E. D.) ——332, 338。
- 莫姆, R. C. F. (Maugham R. C. F.) ——496。
- 诺克斯牧师及其夫人, 约翰·P. (Knox, Rev. and Mrs John P.) ——373。
- 桑顿, 亨利 (Thornton, Henry) ——10, 37, 38, 44, 49, 51, 58, 64, 65, 67, 75, 87, 98。
- 桑顿, 威廉 (Thornton, William) ——130—131。
- 索普, 罗伯特 (Thorpe, Robert) ——114—115。
- 索普牧师, 塞缪尔 (Thorpe, Rev. Samuel) ——274—275。
- 索普, 约翰 (Thorpe, John) ——250。
- 索耶, A. J. (Sawyer, A. J.) ——317, 320。
- 泰姆奈族 (Temne tribe) ——28—29, 46, 78, 104, 331, 333, 335—337, 455。
- 特雷德镇 (Trade Town) ——204。
- 特纳总督 (Turner, Governor) ——282。
- 特内里费 (Tenerife) ——27。
- 夏普, 格兰维尔 (Sharp, Granville) ——11—17, 24, 25, 27, 30—39, 44, 49, 75, 131—132。
- 夏普医生, 威廉 (Sharp, Dr William) ——13。
- 夏普, 詹姆斯 (Sharp, James) ——16。
- 《致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信》(索普) (《Letter to William Wilberforce》(Thorpe)) ——114。
- 真正独立党 (True Whig Party) ——484, 490。

十 一 画

- 第一次世界大战 (First World War) ——409, 419—420, 457—459。
-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cond World War) ——464—466。
- 黄金海岸 (Gold Coast) ——242, 260, 311, 312, 324, 329。
- 《黄金海岸淘金记》(伯顿和卡梅伦合著) (《To the Gold Coast for Gold》[Burton and Cameron]) ——305—308。
- 混血儿 (Mulattoes) ——353, 378—385, 417。
-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黑种人》(布莱登) (《Christianity, Islam and the Negro Race》[Blyden]) ——390。
- 基, 弗朗西斯·斯科特 (Key, Francis Scott) ——142。
- 基泽耳, 约翰 (Kizell, John) ——150, 158, 161。
- 康多人 (Condo People) ——360。
- 康拉德, 约瑟夫 (Conrad, Joseph) ——467, 474。
- 勒德蓝总督 (Ludlam, Governor) ——100—103, 117。
- 勒斯沃姆总督(马里兰) (Russwurm, Governor [Maryland]) ——233。
- 累佛休姆勋爵 (Leverhulme, Lord) ——414。
- 累斯特山 (Leicester Mountain) ——149。
- 曼巴族 (Mamba tribe) ——169。
- 曼丁哥族 (Mandingo tribe) ——43, 294, 308, 360—365, 365—368, 444。
- 曼斯菲尔德法官 (Mansfield, Justice) ——4, 6, 15。
- 梅尔维尔太太 (Melville, Mrs) ——278, 285。

- 梅苏腊多角(后来的蒙罗维亚) (Cape Mesurado [later Monrovia]) ——166—174, 178—186。
- 培根, 塞缪尔 (Bacon, Samuel) ——155—162, 177, 189。
- 萨法赫王 (Safah, King) ——150—151。
- 萨马诺王 (Samano, King) ——150—151。
- 萨莫 (Samo) ——150。
- 萨默塞特, 詹姆斯 (Somerset, James) ——15。
- 萨维奇船长, 亨利 (Savage, Captain Henry) ——36。
- 维多利亚女王 (Victoria, Queen) ——237, 259。
- 《维多利亚之前》(耶格) (《Before Victoria》[Jaeger]) ——10。
- 象牙海岸 (Ivory Coast) ——237, 238, 399。
- 《野蛮动物和人的比较》(夏普) (《Comparison of Brute Animals with Man》[Sharp]) ——35。
- 《野蛮的非洲》(里德) (《Savage Africa》[Reade]) ——308。

十二画

- 奥尔里奇, T. J. (Allridge, T. J.) ——443—444, 446, 449。
- 奥利弗, 罗兰 (Oliver, Roland) ——405。
- 奥尼查 (Onitsha) ——253, 259。
- 《奥赛罗》(《Othello》) ——279。
- 博波卢 (Bopuru [Boporo]) ——360—362, 383。
- 博城 (Bo) ——442, 448。
- 博城学校 (Bo School) ——454—456, 518。
- 博卡萨赫 (Bokkasah) ——365。
- 博伊尔, 西布尔 (Boyle, Syble) ——249, 301。

- 道斯, 威廉 (Dawes, William) ——66—67, 75, 99, 103。
斐南多波 (Fernando Po) ——481, 484, 485—487, 500, 526。
《黑暗的中心》(康拉德) (《Heart of Darkness》[Conrad]) ——
467, 474。
黑豹党人 (Black Panthers) ——417。
《黑人都市》(《Black Metropolis》) ——437。
黑人复国运动 (Black Zionism) ——416。
黑人穆斯林 (Black Muslims) ——417, 438。
黑人权力运动 (Black Power movement) ——417, 424, 438。
《黑人世界》(《Negro World》) ——422, 427, 434。
黑斯廷斯 (Hastings) ——246。
黑星轮船公司 (Black Star Shipping line) ——428—430,
433。
黑鹰飞行团 (Black Eagle Flying Corps) ——423。
惠特布雷德, 塞缪尔 (Whitbread, Samuel) ——37。
缉捕逃亡奴隶法 (Fugitive Slave Law) ——374, 376。
腊斯塔法里派 (Rastafarians) ——438。
联合非洲公司 (United Africa Company) ——497。
联合矿业公司 (Union Mining Company) ——405。
普尔牧师, 托马斯·艾尔 (Poole, Rev. Thomas Eyre) ——
261—262, 272, 275, 284。
普拉特, 艾萨克 (Pratt, Isaac) ——247。
普劳德富特, 詹姆斯 (Proudfoot, James) ——454—455。
普罗宾总督 (Probyn, Governor) ——454, 456。
普希金, 亚历山大 (Pushkin, Alexander) ——375。

- 斯卡西河 (Scarcie River) ——76。
- 斯莱特, 亚历山大·兰斯福德(总督、爵士) (Slater, Governor Sir Alexander Ransford) ——435。
- 斯米思曼, 亨利 (Smeathman, Henry) ——18—21。
- 斯诺登神甫 (Snowden, Father) ——209。
- 斯皮克, 约翰·汉宁 (Speke, John Hanning) ——355。
- “斯特朗号”(美国双桅船) ('Strong' [American brig]) ——174, 178。
- 斯特朗, 乔纳森 (Strong, Jonathan) ——12—14。
- 斯图尔特, 查尔斯 (Stuart, Charles) ——222, 223。
- 斯图尔特中尉, J. (Stewart, Lieutenant J.) ——338, 340。
- 斯托克顿堡垒 (Fort Stockton) ——198。
- 斯托克顿, 罗伯特 (Stockton, Robert) ——166, 170。
- 塔彭, 阿瑟 (Tappen, Arthur) ——221—222。
- 《遗产》(卡伦) ('Heritage' [Cullen]) ——415。
- 援助贫苦黑人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Black Poor) ——17, 18—20。

十 三 画

- 鲍德勒医生, 托马斯 (Bowdler, Dr Thomas) ——10。
- 鲍威尔法官先生 (Powell, Mr Justice) ——4。
- 鲍伊船长 (Bowie, Captain) ——35。
- 福尔肯布里奇, 安娜 (Falconbridge, Anna) ——23—25, 40, 42, 44, 56, 64, 66, 79。
- 福尔肯布里奇, 亚历山大 (Falconbridge, Alexander) ——39—

- 44, 56。
- 福克纳, 托马斯·J. (Faulkner, Thomas J.) ——484。
- 福拉湾 (Fourah Bay) ——163, 246; 福拉湾学院 (College) ——255—256, 265, 386, 449, 478。
- 福音派(克拉彭派) ('Evangelicals' [Clapham Sect]) ——8—9, 12, 106, 119, 120, 149; 并参见“圣徒”(see also 'Saints')。
- 《解放者报》(«Liberator») ——215—216。
- 禁止奴隶贸易法案(1807) (Anti-Slave Trade Act [1807]) ——105, 243。
- 雷尼, 威廉 (Rainy, William) ——264。
- 蒙罗维亚 (Monrovia) ——172—173, 178—187, 188, 201—202, 207, 230, 234, 350, 373—376, 409, 502, 519—523, 531。
- 蒙罗维亚市银行 (City Bank of Monrovia) ——412。
- 塞达耳牧师, 亨利 (Seddall, Rev. Henry) ——253。
- 塞拉勒窝内的获释奴隶 (Recaptured Slaves, in Sierra Leone) ——104, 106—123, 154, 245—250。
- 塞拉勒窝内的新斯科舍人 (Nova Scotians, in Sierra Leone) ——48—67, 75, 77—79, 91, 96, 99—103, 143, 245, 247, 302。
- 塞拉勒窝内公会 (Sierra Leone Association) ——318。
- 塞拉勒窝内公司 (Sierra Leone Company) ——38, 43, 49, 52, 60, 64, 77, 91, 101—102, 114。
- 塞拉勒窝内立法会议 (Legislative Council, Sierra Leone) ——263, 266, 325, 328, 335, 341, 460, 463—464。
- 塞拉勒窝内人民党 (Sierra Leone People's Party) ——478。
- 塞西尔子爵 (Cecil, Viscount) ——495, 497。

歇尔布罗岛 (Sherbro Island) ——148, 149—153, 158—163, 165, 172, 174, 461。

歇尔布罗王 (Sherbro, King) ——151。

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 (New England Anti-Slavery Society) ——216。

十四画

赫德尔, 查尔斯 (Heddle, Charles) ——279。

赫克斯利, 埃尔斯佩思 (Huxley, Elspeth) ——479。

十五画

德比勋爵 (Derby, Lord) ——387, 392。

德拉尼(黑人探险家) (Delaney [Negro explorer]) ——356。

德曼, 哈里 (Demane, Harry) ——15, 34。

德纳姆总督 (Denham, Governor) ——282。

德族 (Dei tribe) ——169, 173, 359。

十六画

霍顿医生, 詹姆斯·艾弗里卡纳斯 (Horton, Dr James Africanus) ——250—252, 286, 451。

霍尔, G. W. (Hall, G. W.) ——347。

霍尔特, 罗伯特·L. (Holt, Robert L.) ——497。

霍普金斯, 塞缪尔 (Hopkins, Samuel) ——131—132。

穆斯林 (Muslims) ——269, 378, 385, 388, 398, 402, 464, 529。

十七画

戴维斯夫人, 亨里埃塔·文顿 (Davis, Lady Henrietta Vinton)

——423。

戴伊海军上校, 威廉 (Day, Captain William) ——103。